

孫中山

■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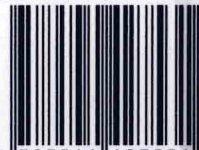


文奔走国事三十馀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 孙中山

上架建议：励志类


ISBN 978-7-5444-2753-1



9 787544 427531 >

易文网: www.ewen.cc

定 价: 39.00元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Sun Yat-sen,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der. 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 over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bow tie.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of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grey.

孫中山

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 編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 /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2
ISBN 978-5444-2753-1

I. ①孙… II. ①上…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9290号

孙 中 山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16.5 插页2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本

ISBN 978-7-5444-2753-1/K.0033 定价: 39.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编委会主任 陈兆丰

副主任 秦 量 赵福祥 马玉成

编 委 黄亚平（常务） 邹 镭 孙娟娟 陆柳莺

陈亚玲 刘国友 辛永康 朱玖琳 宋时娟

学术顾问 张 磊 沈渭滨

主 编 陈兆丰

策 划 秦 量

执行编辑 宋时娟 李 丽

撰 稿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路 王艳丽 王志鲜 王浩嵘 朱佳妮 任冉冉

刘 蕾 刘国友 孙 旻 孙娟娟 李 超 李 丽

宋时娟 张 珏 陈 樱 杨晓霞 金晓春 赵 青

段 炼 郭 骥 黄玉抒



序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自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无疑是最为波澜壮阔的。这是一段共和政体取代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抵御列强、血洗屈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也是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审视，这翻天覆地的一百六十余年贯穿着轰轰烈烈的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起搏击，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的血洒疆场，万古流芳。而孙中山、宋庆龄犹如茫茫夜空中的双子星座，在中华大地上焕发着特别璀璨的光芒。孙中山、宋庆龄既是生活伴侣，又是革命同志。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愈挫愈奋，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一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追逐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序

孙中山先生以“爱国若命”的博大胸怀和深邃广阔的世界眼光，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竖起“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伟大旗帜，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辟了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为中国人民迈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忠诚追随者，也是孙中山先生未竟事业的

继承者。她意志坚强，信念坚定，不避艰难险阻，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竭尽所能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她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孙中山、宋庆龄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影响历久弥深。他们无愧为中国人民和海外同胞共同敬仰、永远缅怀的民族英雄、历史伟人。

毛泽东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这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学习孙中山、宋庆龄，就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对教育文化事业关注较多，同时对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的工作也有所了解。兆丰同志担任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领导工作后，十分重视对孙中山、宋庆龄的文物和史料的研究。他主编的《孙中山》、《宋庆龄》是由其创意和主导，孙宋文管委系统的工作人员共同创作完成的。这两本书凝聚了大家多年研究的心血和劳动。读后掩卷，我感到其有科学性与可读性兼具、思想性与教育性并存的特点。读者可从真实的历史故事中了解孙中山、宋庆龄的革命实践、光辉思想和崇高品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通过阅读，在充分感受孙中山、宋庆龄伟大人格魅力的同时，亦会对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从中受到丰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目录

1. 少年时代	/ 1
2. 到檀香山去	/ 5
3. 学徒与学童	/ 9
4. 返乡亟思变革	/ 13
5. 反清“四大寇”	/ 18
6. 从医人到医国	/ 25
7. 上书李鸿章	/ 30
8. 创立兴中会	/ 33
9. 广州起义	/ 37
10. 伦敦蒙难	/ 42
11. 大英博物馆常客	/ 50
12. 广交日本与亚洲朋友	/ 55
13. 功败垂成的惠州起义	/ 59
14. 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 66
15. 联络学界 开导华侨	/ 72
16. 组建中国同盟会	/ 78

17. 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 84
18. “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 88
19. 扫荡“保皇邪说”	/ 94
20. 致力于兴师起义	/ 103
21. 黄花岗上党人魂	/ 114
22. 武昌首义 星火燎原	/ 120
23. 归国主持大计	/ 126
24. 催生中华民国	/ 133
25. 临时政府成立	/ 140
26. 让位于袁世凯	/ 151
27. 视察各地 倡办实业	/ 158
28. 坚持发动“二次革命”	/ 168
29. 成立中华革命党	/ 175
30. 愈挫愈奋 永不息战	/ 184
31. 著书立说 规划建国宏图	/ 195
32. 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200
33. 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 210
34. 开展群众运动 巩固革命策源地	/ 218
35. 黄埔建军	/ 224
36. 弭平广州商团叛乱	/ 231
37. 壮志未酬	/ 236
38. 奉安南京中山陵	/ 248
跋	/ 256

在富饶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南部香山县(今中山市),有一个小村庄叫翠亨村。翠亨村在县东南,离澳门37公里,背山临海,树木苍翠,风景优美。这里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民国之父孙中山的故乡。

贫困的农家子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孙中山出生在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排行老三,哥哥叫孙眉,姐姐叫孙妙茜,还有一个妹妹叫孙秋绮。由于孙中山的母亲信奉关帝,所以孙中山乳名叫帝象,读书时取名文,17岁到香港读书时取号日新,20岁时改号逸仙(粤语与日新谐音)。后来参加反清革命,遭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化名中山樵。从此,人们多称他为孙中山。

孙中山出生前后,翠亨全村居民共约六七十户,人数较多的是杨、陆、冯、孙等姓,而村中大部分土地被杨、陆两姓地主占有。翠亨村地少而贫瘠,所种水稻及杂粮的产量很低,村人多外出谋生。

孙家到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时,已沦为没有土地的佃农。父亲孙达成为人忠厚老实,迫于生计,16岁就到澳门做学徒,19岁满师后到一家葡萄牙人开设的鞋店当鞋匠,直到32岁薄有积蓄时,才返回家乡,与附近隔田乡(今崖口乡)杨胜辉的女儿杨氏结婚成家。当时孙达成没有田地,只好靠租种村子东



■ 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



■ 孙达成

离乡，前往檀香山另谋生计。

南的两亩多公田及在村中兼做更夫养活全家老小。

孙中山出生时，孙达成一家人口众多，上有八旬老母，中有因缠足而不能下地干活的妻子和两个弟弟的遗孀，下有几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大的儿子孙眉才12岁。这一大家子的花销全靠孙达成一人承担，全家挤在村边一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简陋泥砖屋里，以番薯为主要食粮，家境十分穷困。孙中山的降生，让孙家的境况更为困顿。孙中山3岁那年，迫于生计，刚满15岁的哥哥孙眉到邻乡一地主家做长工，17岁时又背井

勤奋好学

孙中山幼年就随姐姐妙茜到金槟榔山上打柴割草；年龄稍长，便下田劳动，做插秧、除草、挑水、打禾等农活；每年还要替人放几个月的牛，冲抵牛主用牛给孙家犁翻几亩薄田的工价；有时还跟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捕鱼取蚝。贫苦的生活和劳作，锻炼了孙中山坚韧的意志和毅力。

尽管生活困苦，但儿时的孙中山生性活泼、机灵勇敢，爱打抱不平。当他看到村中的儿童被其他孩子欺负，一定会奋勇上前，帮助被欺负的孩子，即使打不赢，也不甘示弱服输。爱打抱不平的结果是，孙中山常常会把对方的衣服扯破，为此，母亲要把人家的衣服补好，对孙中山严加责备。此外，孙中山喜欢放风筝、踢毽子、跳青蛙、量棒、劈甘蔗等各种游戏。儿时的孙中山非常顽皮，他常常会爬到参天大树上，用石头打小鸟，村里人见他倔强好动，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石头仔”。邻居是一家卖豆腐的，村人称之“豆腐秀”。他家的两个儿子都比孙中山大，常常欺负孙中山。有一次，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将两兄弟追赶到豆腐店，把石头投到了豆腐锅里，坏了一锅豆腐。当“豆腐秀”知道都是自己儿子不好时，非但没有责怪孙中山，反而对自己的儿子大加责备。孙中山的母亲觉得“豆腐秀”生活艰苦，自愿赔偿损失，“豆腐秀”深为感激。此后，他的两个儿子再也不欺负孙中山了。

10岁时，孙中山才正式进翠亨村的私塾读书。私塾设于翠亨村的冯氏宗祠，私塾的黄塾师见孙中山长得文雅清秀，便给他起了学名孙文。私塾里的课程有《三

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等,塾师授课从不解说书中的意义,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学生一字不漏地死记硬背书本。孙中山聪明、记性好,爱动脑筋,在同学中他的书背诵得最熟,字也写得最好。一天,黄塾师抽学生背书,孙中山却闭口不语,先生十分不满,孙中山却恭敬地向先生发问,每天唱这些书,一点不懂书里讲的是什么道理,背它又有什么用呢?孙中山对这种旧教学方法的诘问,令塾师惊骇不已,举着戒尺想要惩罚,但孙中山



■ 冯氏宗祠

毫不惧怕,仍沉着镇定地坚持读死书没有意义,还要求塾师讲解课文。由于孙中山是所有学生中背书最出色的一个,他提出的问题又不无道理,塾师无法回答,只好苦着脸连声说“散学、散学”。后来孙中山深刻批判了这种教学方法。

反清意识萌芽

少年时代的孙中山爱听故事。有一位名叫冯爽观的老人,被孩子们称为冯阿公,他是当年太平军的老战士,参加过金田起义,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陷落

■ 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的武装起义。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等人在



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次年春入广西传教,积极宣传组织农民群众。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寿诞,举行隆重的祝寿庆典,万众齐聚犀牛岭,誓师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封五军主将。颁布简明军律: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无犯;四公心和恤,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1月13日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金田东山大湟江口,开始了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时从清兵的屠刀下逃回家乡。冯阿公经常和村童们在一起,讲述太平天国抗击清王朝的故事。孙中山听得认真,常被太平军反清斗争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事后他曾对小朋友说,自己要当“洪秀全第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萌发了反清的意向。

促使孙中山反清意识萌芽的,除了太平遗兵的故事,还有当时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现象的刺激,女子缠脚就是其中之一。



■ 少年孙中山时常在这棵大榕树下听冯阿公讲故事

在家里,他母亲请来了村上缠脚的阿婆,给姐姐妙茜缠脚。孙中山见姐姐因缠脚疼痛而呻吟流泪,十分同情,一再与父母据理力争,认为缠脚是件极不合理的事,应该改变。

在村里,孙中山时常看到县里的差役不是来催粮,就是来逼税,要么就是蛮不讲理地抓人、派差。有一天,官兵到村里办案时,趁机诬陷良善,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村里一杨姓家的三兄弟抓进牢房,霸占了杨家的房屋,还分别判了三兄弟无期徒刑和死刑。这件事让孙中山意识到残暴的官兵与杀人的强盗没有区别。

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目睹旧中国农村百姓的悲惨生活、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暴政和种种不合理现象,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落后,他立志长大后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

2 到檀香山去

1871年,17岁的孙眉随舅父杨文纳远赴檀香山谋生。7年后,孙眉返回故里。大哥对檀香山的叙述使年幼的孙中山对远隔千里之外的异域充满向往。不久,他跟随母亲远赴檀香山投靠大哥。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少年孙中山的面前。

立志出洋

孙眉到达檀香山后,最初在一个华侨办的菜园里当工人,月工资15元,他省吃俭用,每月寄10元回家。这样做了不到1年,孙眉转到一个当地人开设的农牧场当了数部长工,后来又跑到茂宜岛去垦荒种田。在茂宜岛,由于善于经营,他慢慢积累起一些资金,开办了德隆昌米铺和一间杂货店,后来又开办了农场,被当地人称为“茂宜王”。孙眉从一个出身贫困的农家孩子成了一个华侨资本家,孙中山的家境随之有了好转。

1878年孙中山12岁,大哥孙眉回到家乡。他这次回来,一是奉命和谭氏结婚;二是得到夏威夷政府的特许,招募大批华工去檀,兴办垦务。孙眉向乡民详细生动地讲述了檀香山的景色和物产,以自己致富的事实鼓励乡民们去檀香山。孙眉的介绍得到了部分乡民的响应,也使孙中山对远隔千里的檀香山充满了向往。孙中山早年“在乡间,见乡人由广州、香港、澳门、金门、檀香山而回者,经济丰裕,并谈洋务”,非常向往和羡慕,早有出洋之志。趁此机会,他恳请父母同意让他和大哥一起去国外,却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父亲



■ 孙眉



■ 孙中山母亲杨氏

认为孙中山的两个叔父都死在国外,大儿子去檀香山冒险,这是生活的逼迫,是不得已的事。他不想再让孙中山背井离乡了。孙中山只好顺从父亲的意愿,继续留在翠亨村生活。他失望地看着孙眉带着招来的100多人远赴海外。

孙眉去檀香山一年后,1879年4月,他在檀香山的共事者在澳门租了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汽船“格兰诺去”号,准备载运中国侨民到檀香山。这次孙眉没有回来,思子心切的母亲非常想念漂泊在外的儿子,决定到檀香山去,亲眼看一看儿子在那里开创的一番事业。孙中山意识到这又是一次能够出洋的绝好机会,于是他再三

恳求母亲带他同去。有了母亲的陪同,他的父亲没有理由再阻拦了。于是这年6月,孙中山随母亲先从水道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搭乘“格兰诺去”号轮船赴檀香山。孙中山终于离开家乡,走出国门,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

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远离家乡。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他见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蔚蓝的天空,水天一色,茫茫无边;轮船犁起的浪花拍击船体,化为无数的水沫,冲撞发出的回声像巨兽吼鸣,和着海风渐渐远去。这壮美的景象,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山村的少年,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又是何等的新奇刺激!这次的出洋经历,大大打开了孙中山的眼界,拓展了他的胸襟。他对未来的热望,像这轮船一样不断前进。轮船上精巧的机械、奇异的汽涡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兴趣,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机器的威力和西方科技的发达。尤其是轮船上那巨大的铁梁使孙中山产生很深的感触:那么重的一个铁梁,要多少人才能安装好呢?继而他又想,外国人能做的东西,中国人却不能做,他立刻觉得中国有不对的地方了。要变革落后的中国,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正是有力的武器。日后,孙中山回忆自己的这段历程时,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中山看到的第二个奇异的景象是海葬水手。这条船上的水手都是英国人,有个水手病死了,他的尸体刚冷,同伴便把他缝在一只帆布袋里,放在甲板上,再把铁块塞在里头,以增加它的分量,又用一面色彩鲜艳的旗包着布袋。送葬的钟声响

了,船长低声祈祷,随着“砰”的一声,水花四溅,水手的遗体即被波涛汹涌的大海所吞没。

他那时不懂英语,更不知晓船长祈祷时诵读的《圣经》,不知道这是英国的风俗。他认为这种海葬仪式对于死者和家属都是不敬重的,对于死者是残忍的,心里很是反对。依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应该将死者送回去,由家人安葬。孙中山开始意识到他将要到一个与中国礼教不同的地方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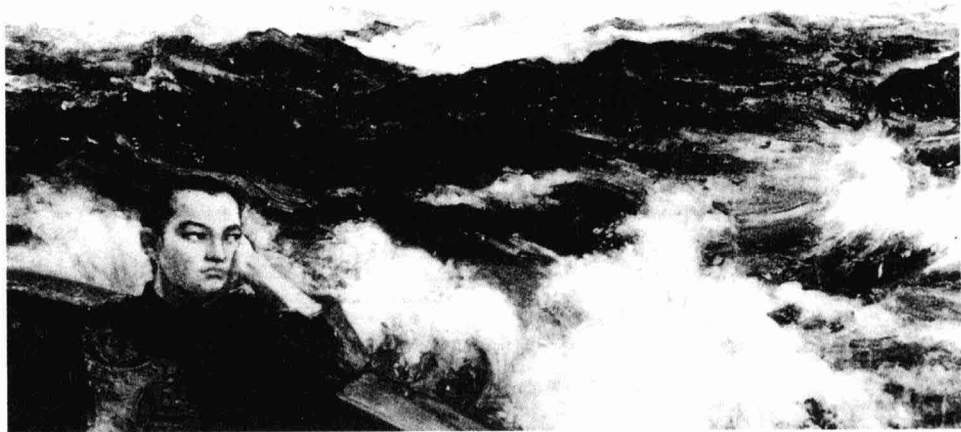
在奇巧的机械应用上,孙中山赞叹外国人的先进,但以传统的道德观念来判断,他又认为外国人残忍野蛮。矛盾复杂的思绪,充满了他幼小的头脑。那时虽难以做出合理的解答,但他认为在未来的探索研究中,他必定能够发现真理。

在20多天的航程中,孙中山时常独自伫立在甲板上,久久凝视着浩瀚无边的大海。第一次走出故土,外部世界的刺激,对孙中山的胸怀和眼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与母亲到达檀香山的时间,大约是1879年7月。对孙中山来说,檀香山的一切充满了新鲜而奇异的色彩。

初到檀岛

到达檀香山的第二天,孙中山和母亲在孙眉的陪伴下游览了檀香山。檀香山,当地语叫做“火奴鲁鲁”,即“避风港”之意,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中瓦胡岛的东南角,现在是夏威夷州的首府。檀香山岛北倚由火山作用形成的库劳山,南



■ 1879年6月,孙中山随同母亲从澳门乘船到檀香山



■ 檀香山旧景

临太平洋,这里终年气候温和宜人,四季草木苍翠,宛如人间天堂。美丽的风光使得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孙中山欣喜不已。这里有他在老家翠亨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奇花异草和迷人风光,富有当地特色的商店、民宅错落有致,街道、马路宽敞整洁。阵阵海风带着沁人的花草清香,温润地吹拂着整个小岛,让人感觉神清气爽。居民生活也与孙中山在家乡看到的完全不同,大街小巷秩序井然,听不见吵闹喧哗之声,邻里之间也友好和睦,无论在哪里他总能得到人们热情友好的对待。

檀香山的邮政局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邮政局是一座有游廊和栏杆的西式建筑。有人告诉他,只要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再贴上一张邮票,投进信箱里,这封信就可以跟着船被送到中国去。这让孙中山对西方的现代文明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孙中山很快适应了檀香山的环境,并喜欢上了岛上的生活。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孙中山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生活与故乡的差别如此之大呢?他更加留意这里的生活状况,满怀好奇地去关注、探索岛上的新鲜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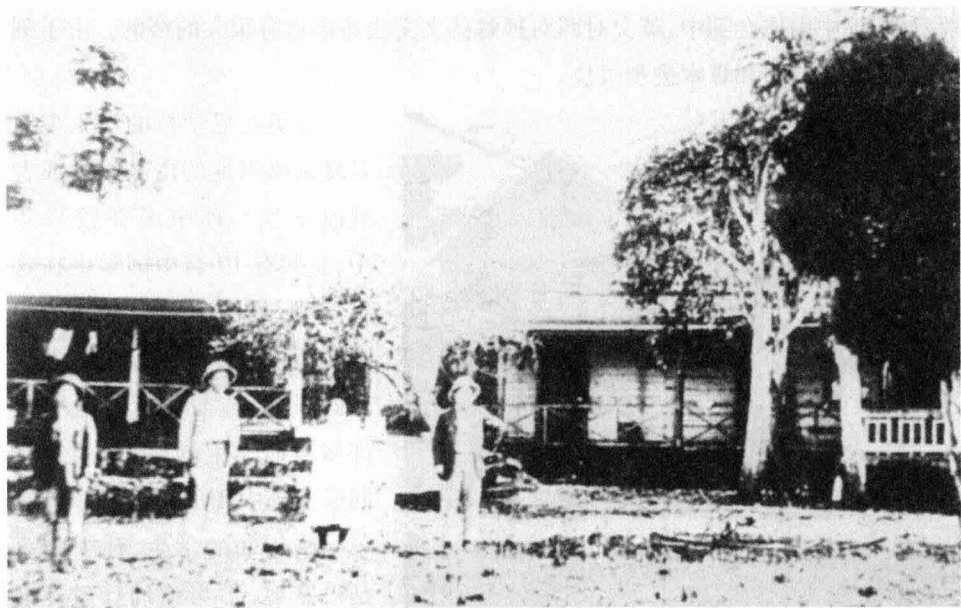
母亲看到孙眉的一切,感到十分宽慰,准备返回翠亨村。孙眉因为店里人手不够,希望弟弟能留下来帮忙。孙中山正愁找不到留下来的理由,于是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大哥的安排。

3 学徒与学童

孙中山的海外求学之路和旅居生活是从檀香山开始的。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一位日后改写中国历史的伟人，即将在这里成长起来。

聪颖的小伙计

母亲回国后，孙中山开始帮助孙眉打理店中事务。在哥哥的安排下，孙中山先是在店里帮忙，由店里的华人伙计带着他学做一些简单的杂活。他成了店里的一名小伙计。店里的事情既多且杂，这正好满足他初来乍到的好奇心。孙中山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事情他都很专注，总是尽力把事情做好。凭着自己的勤奋与好学，没过多久，他就对店里的事务得心应手了。店里有位记账师傅见这个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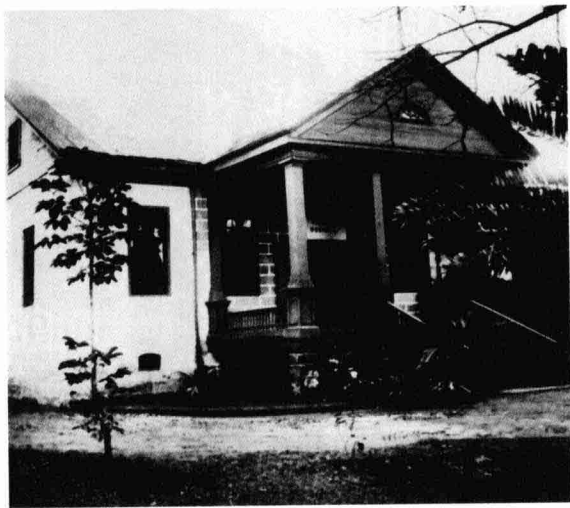
■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寓所



子聪明好学,便开始教他记账和打算盘。孙中山之前只读过一两年私塾,初学记账有些困难,但他认真好学、虚心请教。那段时间,人们总会看到一个华人小孩坐在店里的桌前噼噼啪啪地打着算盘,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背着珠算口诀。经过努力,孙中山的记账水平进步很快,打算盘的技术也十分娴熟,记账师傅和店里的伙计纷纷称赞他聪慧过人。哥哥孙眉一直在外奔波忙碌,很少关注孙中山。当他得知孙中山的进步后,也不禁惊叹弟弟的天分,因此决定送他去学堂接受正规的教育。当年9月,孙中山进入了岛上一所名叫意奥兰尼的教会学校。

好学自重的学生

意奥兰尼学校是一所男子初级中学,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是岛上唯一接受华人学生的学校。学校教师几乎全部是英国人,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这个学校收费也比其他学校高,但孙眉爱弟心切,不惜花重金安排孙中山在校住读。他希望弟弟学好英语,因为英语是岛上的通用语言。孙中山很快意识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意奥兰尼学校的课程全部采用英语教授,由于没有任何基础,上课时孙中山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整整10天,他只能坐在课堂上静静地听着。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他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补习英文。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英语学习上。他从字母到词汇、从听到读,在老师的帮助下一点一点地学。在学习中,孙中山体会到中、英文对照对理解英文文法与语意有很大的帮助。由于刻苦勤奋,他的读写和算术进步很快。



■ 意奥兰尼学校旧址

意奥兰尼学校的学生多数是夏威夷当地的白人学生或者混血学生。孙中山在校一年中,总共有10名中国学生在这里学习,其中7位住校。孙中山在学校里穿着中国式的衣服和裤子,还梳着辫子。这引起许多当地学生的好奇,经常有同学拉孙中山的辫子取乐。对于一些年幼的学生,孙中山总是很宽容,不与他们计较。但是对那些恶意欺负他的年龄较

大的学生,他会奋起反抗,狠狠地教训他们,使他们不敢再拿他的中国装束取笑。他的好学自重,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一位友善的外国学生问他为什么不把辫子剪掉,孙中山回答:“我们最后的目的,应该是大家联合起来,把这种满洲人强加给我们的愚蠢风俗减除掉,等到全体中国人都可以剪辫时,大家一起剪掉,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还说:“辫子不过是中国所受耻辱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把许多耻辱全部像剪辫子一样全部去掉!”可以看出,当时的孙中山已经萌发了剪辫反清的想法。

始生救国之心

意奥兰尼学校传统的英式教育让孙中山初步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思想。他十分喜爱阅读西方名人的传记,华盛顿和林肯的传记以及其他西方历史书籍经常让孙中山爱不释手。课外阅读让孙中山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历代伟人辉煌的功业、超凡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让他大受启发,引发了他深层次的思考。他痛恨腐朽的清政府,而家乡的落后又坚定了他救国图强的志向。孙中山在学习英文时,没有忘记学习中文。据他的同窗唐雄回忆,课余闲暇,孙中山经常独自一人研习中文,时而仰头吟诵,时而低头默读。有时他还会在纸上写些东西,但每次写完都会把写的东西撕掉。在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孙中山各科学业成绩都颇为优秀。

学习之余,孙中山还很关心岛上的社会变化与发展。当时的檀香山还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但是西方的民主思想逐步在岛上传播开来。孙中山对此十分感兴趣,开始关注自由、平等、公正司法等思想和制度,对岛上人民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也十分关注。同时,他也赞同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活动。此外,孙中山还热衷于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体操和救火会,他觉得这种活动很有意义。在故乡时,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由于缺乏这种演练,人们总是手足无措,因而常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孙中山觉得外国的这些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 檀香山国王架刺鸠



■ 檀香山王后奄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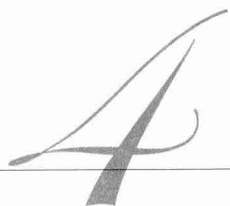
檀香山的学校生活、人文环境和岛上的政治现状,潜移默化地陶冶了孙中山的情操和品格,一颗拯救祖国、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种子,悄悄地在孙中山的心里种下,并在这热带小岛和煦的阳光下逐渐生根发芽。

1882年7月27日,意奥兰尼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檀香山国王架刺鸠携王后奄麻、公主利利奥格兰尼出席典礼。作为毕业典礼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表彰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并由国王、王后以及公主亲自为获奖学生颁奖。16岁的孙中山获得了英文文法科第二名的

嘉奖。当他上台接受架刺鸠国王亲自为他颁奖时,全场的目光都注视着这位3年前来到学校时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识的中国人。这个依然穿着长袍、梳着长辫,脑海里始终惦记着祖国,平日里寡言少语,学习勤奋刻苦的中国少年,通过刻苦的学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毕业后,孙中山本打算继续升学,无奈哥哥急需有人做帮手,只好到商店协理店务。这年秋天,孙中山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渴望,经孙眉同意,进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奥阿厚书院读书。该书院是一所高级中学,是当时檀香山岛上的最高学府,采用美式校制,规模比较大,有数千学生。

在檀香山的生活和学习,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回忆起这段岁月,孙中山总是感慨万分。他曾这样说:“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窗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返乡亟思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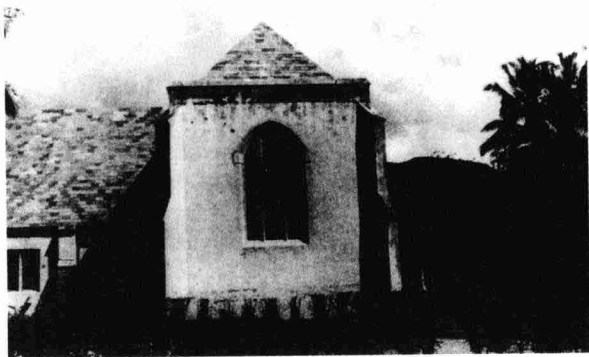
孙中山进入奥阿厚书院读书,本想毕业后前往美国继续学业,以学习“专门之学”。但由于受基督教教义,尤其是平等、博爱精神的影响,他想受洗加入基督教,遭到大哥孙眉的强烈反对,被迫中止学业返回家乡。

被迫回国

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接触到了基督教,他认真学习宗教课程,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活动,早晚在学校的教堂祈祷,星期日还去圣安德勒堂做礼拜。同校的许多华人同学都成了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想受洗入教,但遭到了哥哥的反对。在孙眉看来,只有中国的传统宗教最好,除此之外,其他无论什么宗教都应该反对。

在孙眉经营的农牧场,职工生病了,就到场内佛堂去祈祷。有一天,孙中山将孙眉挂在厅堂内的关帝像扯下来,并对职工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如果谁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疗。”

这件事令孙眉恼怒异常。他大发雷霆,严词责骂,并勒令孙中山停止与教会的往来。孙中山自幼秉性倔强,不肯屈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实,孙眉对孙中山信仰的干涉,是出于对胞弟的爱护。他本想把孙中山培养成有作为的经纪人,以



■ 孙中山在檀香山求学时常去听道的圣安德勒堂



便发展他的农牧商业,但感到弟弟的思想言论逐渐与他的愿望不合,又与中国礼俗相悖逆,便后悔让他入学校读书。他发现孙中山无意与基督教断绝关系,一心打算受洗礼入教,于是暗中写了一封信禀告父亲,并中止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学业,责令他回国。孙中山只得无奈地离开檀香山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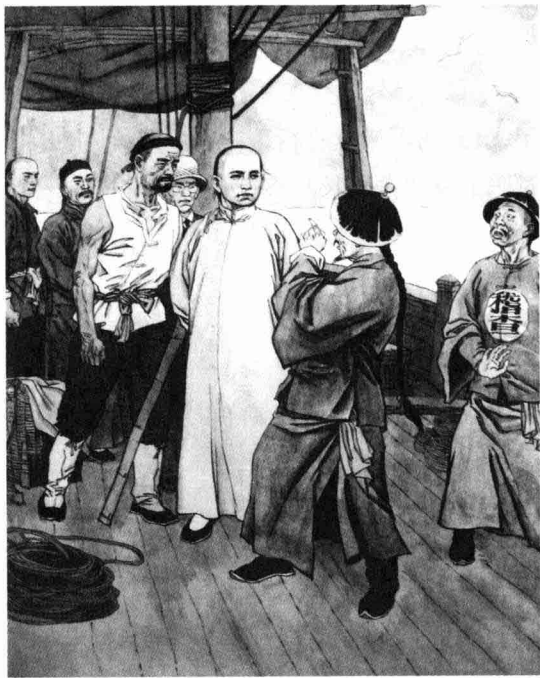
目睹官吏勒索

1883年7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启程归国。他先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搭乘沙船回乡。途中,船停靠在一座小岛边接受检查。船主劝告乘客,千万不能触怒上船检查的清朝官吏。大家都听从了劝告,在厘捐局人员上船检查时都忍耐着,任凭如狼似虎的清朝官吏翻箱倒篋,以征税、搜查等理由为借口,对乘客进行勒索。面对他们的嚣张气焰,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连续三次检查后,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又来了第四次检查,这回是一个军官带着手下的士兵上了船,别的乘客都忍气吞声地服从,可孙中山却觉得忍无可忍。他毅然站了出来,拒绝他们的搜查。面对军官的恐吓,孙中山不但义正词严地指责了这些检查人员的勒索行径,声言要向官府控告他们,还鼓励周围的乘客

不要屈服于其淫威之下,大家应联合起来抗争。

那名军官觉得太难堪了,于是命令部下把这艘船扣押起来,不准开行,以泄私愤。直到船主交付了一大笔“罚款”后,船第二天早晨才被获准放行。

经过这次遭遇,孙中山进一步感受到清朝官吏的贪婪、昏庸和腐败,他对早已麻木了的乘客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接着他讲述了一通改革弊政的必要性,但是说者谆谆,听者藐藐。民众尚未觉醒,这使孙中山深感唤起民众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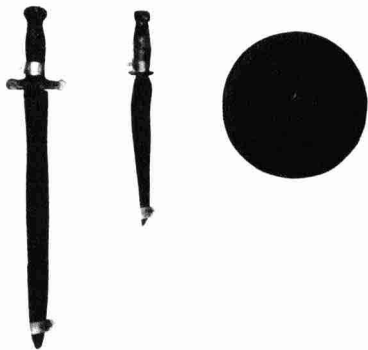


■ 目前所发现的孙中山最早的照片(摄于1883年)



孫中山

改良乡政的尝试



■ 村中壮丁巡路防盗所用的刀和帽子

回到阔别5年的家乡,孙中山看到的仍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村庄。应父老乡亲的要求,孙中山将他在檀香山的见闻说给他们听,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大家推举孙中山参与改良乡政的工作。当时翠亨村的主事者每月有一次会议,出席者都是村中的长老,年轻的孙中山被破例邀请出席,参与村事的讨论。在孙中山的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改良乡政的措施,如改修道路,在街道上点夜灯,壮丁带枪轮流守夜以防御盗贼。

然而,村中的私塾仍然沿袭旧规,除了背诵强记,很少有心智的启迪。有一天,孙中山偶然从冯氏宗祠前走过,听到学生正在高声朗诵《三字经》,不禁心头黯然。这个刚从国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归来的青年心怀大志,目睹故乡的贫穷落后、人民的愚昧迷信,百感交集,“觉得到了一个黑暗而奇异的地方来了”。强烈的对比、巨大的反差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必须改变这种现状才有希望。

改良乡政的同时,孙中山经常向村民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指出百姓交了赋税,却没有从这个政府中得到益处。他悲叹民众互不联络,极端迷信和愚昧。他曾多次对村民说:“这是不能归咎你们的。这是你们所称的天子的不是。一个政府至少应该使他的人民得到些便利于商业的基础……满洲人不但至少在政治上不替你们干什么,并且对于种种道德教育都是忽略的。”

毁损村中神像

孙中山这次回乡,看到乡亲们依然在贫困、愚昧、迷信中度日,与他在檀香山所看到的进步和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他在参与改良乡政的同时,极力宣传破除迷信,常对拜神的人说:木偶无知,信奉无益。



■ 孙中山建议村中添设的街灯

这段时间,孙中山常与村中好友陆皓东一起谈论中国政治的腐败,讨论改变家乡愚昧落后的办法。陆皓东,原名中桂,字献香,原随在上海经商的父亲居住,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回到翠亨村。



一天,孙中山和陆皓东等结伴出游,经过翠亨村的祖庙——北极殿。殿内供奉着

■ 北极殿

玄天上将和金花娘娘的神像,香火鼎盛,不断有人到此烧香磕头,求神消灾降福。孙中山想起家乡的房屋那么破烂,唯独北极殿的神像却装饰一新,神气活现地接受村民的膜拜,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和陆皓东决定,在中秋节把神像打碎,让那些被迷信毒害的村民解脱出来。

终于,中秋节到了。孙中山和陆皓东等同伴一起来到北极殿。殿里早已烟雾缭绕,月饼水果等贡品摆满了供桌,几个老人正向神像烧香磕头,脸上的表情无比虔诚。孙中山当场指出木偶无知,劝他们不要迷信。那些顶礼焚香的人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予理会。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孙中山同陆皓东一起将玄天上将的手指和身体分了家,把金花娘娘的脸皮刮破。这下可把在场的香客吓坏了,他们认为孙中山和陆皓东亵渎神明,必将招来祸害。而孙中山和陆皓东见目的已经达到,便离开了北极殿。

孙中山在北极殿毁坏神像一事立即在翠亨村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村民们无比愤怒。他们认为孙中山一伙亵渎神灵,大逆不道,纷纷向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兴师问罪,并要求把孙中山交出来严惩。

孙达成为了平息村民们的激愤和不安,答应出钱修复神像,并让孙中山暂离家乡,到香港避祸。翠亨村东面与香港隔水相望,南距澳门也只有 37 公里,从那里由海路乘船去香港十分方便。孙中山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破除迷信之举不但没有唤醒迷信的村民,反而落得被迫离开家乡的下场,心中万分沉重。1883 年秋,孙中山前往香港求学。



5 反清“四大寇”

1883年秋,孙中山到达香港。当时的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已有四十余年不受清政府的管辖。在这里,既能比较随意地谈政治,也可以通过来往于港、粤两地的华人及时了解国内的政治动向。

赴港求学

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读书。拔萃书室同样是一所用英语教学的学校,孙中山继续接受西方教育,学习刻苦努力。此时的孙中山深感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不多,身为一个中国人,很不应该,所以在课余时间他有意跟随一位伦敦会的长老区凤墀补习国文,并结识了美国传教士喜嘉理。

这年冬天,好友陆皓东也来到香港,两人相见分外高兴。他俩在美国传教士喜嘉理的劝说、鼓动和主持下,在香港的教堂正式接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入教时孙中山在受洗登记册上署名“孙日新”,区凤墀替他取粤语谐音改号“孙逸仙”,英文为 Sun Yat-sen,后来这个英文名字传遍了世界。

1884年4月,孙中山转学到香港最负盛名的中等学校中央书院读书。这是一

The entry in the school register reads—

Admission Number	Name	Residence	Age	Date of Admission	Remarks
2746	Sun Tai Tseung (孫帝象)	2, Bridges Street	18	15.4.84	Parents in Heung Shau (香山)

■ 孙中山入香港中央书院的注册记录。注册登记号为2746,“孙帝象”是孙中山当时用的名字,居住地址“必利者士街2号”是当时卫理公会会址,孙中山住在该楼二楼的信众宿舍

所由港英当局创办的高级中学,学生除华人子女外,有来自英国、美国、葡萄牙、印度、菲律宾等许多国家的青年。学校完全实行英国教育制度,有语文、文学、世界史、英国史、地理、几何、代数、算术、卫生、机械绘图、簿记和常识等课程。学校的老师大都来自英国著名大学,对西方历史的讲授尤其深入,孙中山听得津津有味,对西方共和国的组织、英国人民与王权斗争的经过,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有了新的理解。

孙中山进入这所学科设置完备、师资力量充实、教学方法新颖的学校读书,接触到许多国家的优秀青年,不仅对他汲取西学知识大有裨益,而且对他世界意识的拓展,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到中央书院半年后,大哥孙眉的来信使孙中山不得不中断学业再次赶赴檀香山。因为孙眉得知孙中山在家乡破坏神像及在香港入教后,十分生气,写信佯称檀香山生意失败,需要扩充经营,要孙中山赴檀香山协助。1884年11月,孙中山到檀香山,一见到孙眉就遭到大骂和责打。孙中山不甘示弱,跑到孙眉书房,将悬在墙上的关帝神像取下扔进厕所。此后,孙眉把孙中山送到茄荷蕾埠的商店帮做生意,并收回以前赠给孙中山的财产。学做生意并非孙中山的本意,店里的伙计也因为他受孙眉的责打而看不起他。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重回香港求学。在奥阿厚学院教师芙兰蒂文和同学钟工宇等人的资助下,他于1885年4月乘船回国,孙眉劝阻未成。直到1888年父亲去世,兄弟两人才尽释前嫌。此后,孙眉一直都倾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深受法国侵华刺激

孙中山在中央书院就读期间,由边疆危机引起的中法战争,极大地吸引了孙中山的注意力。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8月,法国议会决定扩大侵华战争,派遣军舰炮轰台湾的基隆炮台。没过几天又窜入福建闽江口,突袭停泊在马尾军港的中国军舰,还摧毁了马尾造船厂,迫使清政府对法国宣战。



■ 清末香港房屋和街道



■ 1885年5月26日,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婚后生子孙科,女孙妮、孙婉。图为孙中山与卢慕贞及子女在檀香山合影

在进攻台湾淡水的时候,法军被清军击退,好几艘军舰受创。当法国军舰开到香港想进行维修时,香港的船坞工人拒绝为他们修理。而法国商船抵达香港的时候,香港人民也不为他们卸货,不与他们交易。与此同时,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运动,香港《循环日报》评论说:“中法自开战之后,华人心存敌忾,无论商贾役夫,亦义切同仇。”发生的这一切让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感到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也有了种族的团结力。他四处向群众宣传,说要战胜法国并不是

是件困难的事情,只是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

次年,清政府任命70岁的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防备法军从中越边境进攻。3月,法军猛扑镇南关(今友谊关),冯子材率军抵抗。在中越军民的合力下,法军溃败,统帅纳克列尔也身受重伤,这就是名闻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战况传到了法国,议会大哗,总理茹费理的内阁因此倒台。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当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场战争的结局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震动。太平天国的反清故事,各族人民抗击清王朝的斗争事迹,在现实政治的巨大冲击下,一齐涌上心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是中国软弱落后的根源,实在是非打倒不可了。于是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志向应时而生。

借医术为人世之媒

1886年夏天,孙中山从中央书院顺利毕业,前往广州学医,打算以学堂作为宣传的阵地,借助医术深入社会。在传教士喜嘉理的介绍下,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

院学医。该院创办于1835年,是亚洲最早的西医院。1855年开始招收学生习医。孙中山入校时,学费每年20元,学生入学后住在医院内,男同学12人,女同学4人。令孙中山奇怪的是,同班的同学分开坐在教室里,而且男女同学之间还挂着帐幔隔开。学校还规定男学生不能参加产科实习,对此,孙中山极力反对。他对校长嘉约翰建议说:“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校长觉得孙中山言之有理,后采纳了孙中山的建议。不仅允许男同学参加产科的诊治实习,并且把男女同学之间的帐幔也撤去了。

除了学习医学知识外,孙中山还在课余请国文教师陈仲尧为他讲授儒学,有时候两人辩论学问直到深夜。有一次,陈仲尧讲解“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孙中山表示反对,说应该是“行之非艰,知之惟艰”。这可视作日后他“知难行易”思想的发端。孙中山一心扑在学业上,生活条件再艰苦也无所谓。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孙中山聪明过人,博闻强记,平日不苟言笑,遇有话题则议论滔滔。无论三教九流,都可以和他畅谈。

在当时的环境里,很多学生不敢和孙中山亲密接触。因为他太关心政治,言论又很激烈,很多人被他的“放言无忌”吓坏了,只有一个名叫郑士良的同学对孙中山很欣赏。郑士良是广东归善县淡水墟人,自幼练习拳技,稍长,好结交绿林豪杰



■ 广州博济医院旧址



■ 1887年,孙中山(前排右二)与香港西医书院同学合影

与洪门会党,深受“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他平日为人豪侠仗义,与孙中山一见如故。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常在一起谈论反清革命的话题。郑士良还私下告诉孙中山,自己就是一个“反清复明”的三点会会员。

1887年2月,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为纪念去世的妻子、英国人雅丽氏,创办了雅丽氏医院。何启是广东人,曾在英国学习医学和法律,主张中国应该进行改良。不久,他又开设了附属于医院的香港西医书院(又称雅丽氏

医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招收中国学生入学。孙中山听到消息,觉得西医书院的学科设置比较先进,而且香港言论自由,于是前去报名,9月转学到西医书院。西医书院按英国医科大学实行五年学制,设备和师资条件都很好,李鸿章是该校的名誉赞助人。何启亲自担任书院的名誉秘书,英国人孟生和康德黎先后任教务长,负责实际工作。孙中山入学后,第一年的课程有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学、物理学、临床诊察7门,各科教师都是专门的学者和医师。一年后的考试中,孙中山在同学13人中名列第三。第二学年新增了产科、妇科、外科学等6门课程,孙中山在考试中名列第一。

孙中山进入西医书院后,天天倡言革命,到1889年,他的言论已经充满反清革命思想,要推翻清廷,废除帝制。据孙中山的同学关景良回忆,有一次关景良母亲见孙中山言论激烈,就问他:“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中山回答:“不!”“想做钦差吗?”孙中山又回答:“不!”“然则想做皇帝吗?”孙中山又回答:“皆不是,我只想推翻清政府,还我汉族山河,那事业比做皇帝更高更大了。”

结交志士倡言无忌

1889年末的一天,孙中山的朋友王煜初牧师带了一位文弱的青年来见孙中山。青年名叫陈少白,广东新会人,毕业于广州格致书院,因为家贫,辍学去香港谋

生。他交给孙中山一封信，孙中山拆开一看，原来是国文老师区凤墀写的介绍信。孙中山读了非常高兴，和陈少白聊起来。10分钟后，孙中山建议去公园逛逛，于是两人来到植物园，选择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继续谈论时局和革命。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分别时孙中山问他，这次到香港准备待几天？陈少白略带憾意地告诉孙中山，他只待一天，马上就要走。孙中山提议，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经常谈谈！此后，陈少白每到香港，必定到孙中山的宿舍中谈论革命，两人总是聊得废寝忘食。

孙中山一再劝陈少白也去学医，认为学医是很有用的。然而陈少白认为自己的习性不适合学医。有一天，陈少白照常找孙中山聊天，孙中山忽然请他坐一下，说自己要听课去，等散课后，再回来聊。过了没一会，孙中山又匆匆地跑回来，告诉陈少白，康德黎博士请他去见个面。陈少白有点纳闷，人都不认识，哪里会有什么事情呢？孙中山不等他说完就抓起他的衣袖拉到教室内见英籍教务长康德黎。康德黎见到陈少白，表示对他很欢迎。原来，孙中山刚才走开是去找康德黎，他说陈少白想在学校读书，希望得到康德黎的同意。陈少白蒙在鼓里，听了康德黎的话无从回答，只能表示感谢。离开教室后，陈少白责怪孙中山不该强作主张，孙中山高兴地告诉他，进来念书后，大家就可以多谈了。不久，陈少白转入西医书院，比孙中山低两年级。



■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常与杨鹤龄（左一）、陈少白（左三）、尤列（左四）聚谈反清抱负，抨击时政，被称为“四大寇”；后排立者为同学关景良



■ 位于澳门水坑尾巷 14 号的“四寇堂”旧址

在香港,除了陈少白,孙中山还有两位朋友——杨鹤龄和尢列。杨鹤龄也是广东香山翠亨村人,自幼就认识孙中山,他生于澳门,家境富裕。尢列是广东顺德人,出身于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当地名人。尢列毕业于广州算学馆,好出外游历,曾到过日本、朝鲜。游上海时,参加了洪门,得知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孙中山与尢列的结识,还有一段故事。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时,一天傍晚,同郑士良一起上街买荔枝。没想到称好荔枝,却发现忘了带钱,于是郑士良同小贩商量,第二天到学校取款。小贩死活不肯赊账,双方争执起来。恰巧尢列随同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尢裕堂经过,看到此事,尢裕堂代付了钱。大家一同回校,便以水果当饭,边吃边聊,非常投机。

杨鹤龄毕业后来到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店里。没过多久,这个店铺就成了朋友们聚会的场所。每有休暇,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和尢列 4 人就在那里相聚,所谈论的皆是革命言论,所思考的皆是革命思想,所研究的皆是革命问题。陆皓东和郑士良从上海、广州经过香港时,也都下榻在杨鹤龄的店中,作彻夜长谈。

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和尢列四人都仰慕洪秀全,又因为洪秀全反清失败,被清政府视为敌寇,故被称为“四大寇”。没过多久,“四大寇”的美誉就在港、澳两地的朋友中传颂开来。



从医人到医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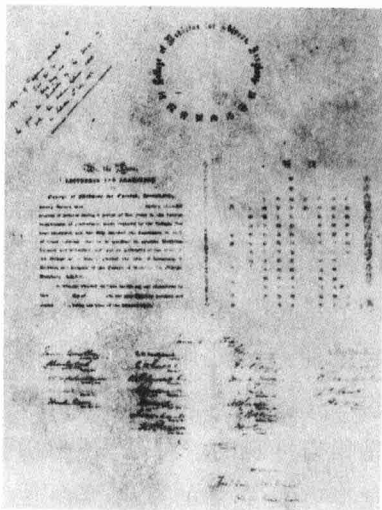
1892年,孙中山参加了香港西医书院的毕业考试,12门功课中有10门获得荣誉成绩,名列年级第一名。7月23日,香港西医书院举行了首届学生的毕业典礼。因为成绩优异,学校赠送孙中山《婴孩与儿童之病症》、《外科肾症》、《神经之损伤与病症及其治疗》等3部医学书籍,教务长康德黎博士亲自给他颁发毕业证书。孙中山获得西医书院授予的医学士学位,并取得在香港开业行医的资格证书。

赠诊穷人

毕业后,澳门镜湖医院聘请孙中山挂牌行医。镜湖医院是一所中医院,孙中山提出试行中西医联合施诊,使中西两种医疗方式互补不足。院方对这个建议很赞同,孙中山便成为该院的第一位西医师。

每逢周日午后,老师康德黎会从香港赶来协助,他对孙中山高明的诊断和手术极为称赞。高超的医术让孙中山在开业数月间便名声大振,来看病的人踏断了门槛,连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慕名前来就诊。

孙中山读书时曾医治好澳门士绅曹子基、何穗田家人的病,出于感激之情,他们决定资助孙中山开办药局,方便澳门人就医。孙中山收下钱,又两次向镜湖医院借款,终于在澳门草堆街开了一家中西药局。孙中山在药局里行医,由于医术精湛,服务态度又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对于穷困的患者,孙中山不但免收诊疗费,还赠送药品。澳门的葡萄牙医生眼见孙中山门庭若市,非常嫉妒,他们鼓动当局,



■ 香港西医书院颁发给孙中山的毕业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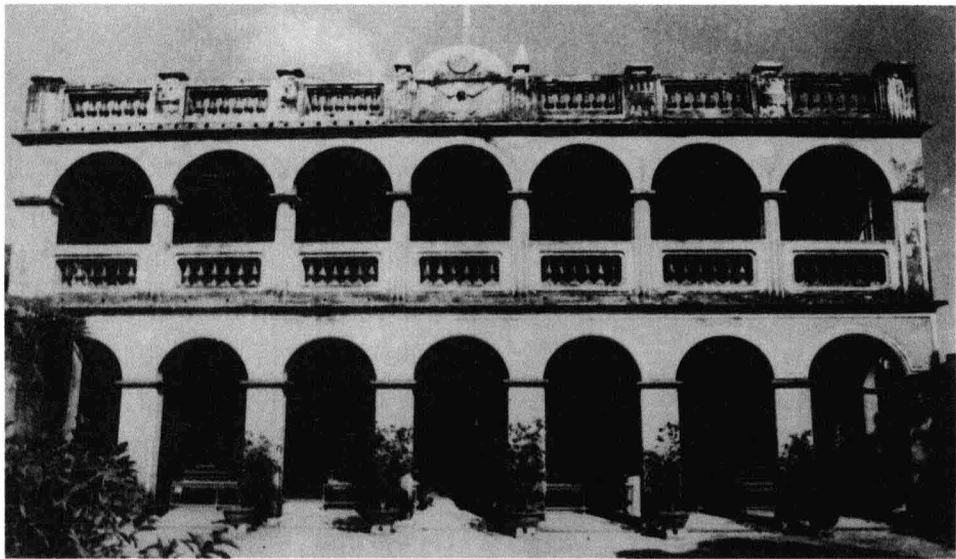
忧国忧民

早在檀香山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孙中山去拜访老师杜南山。他发现老师家的书橱里放着好些医学书籍,禁不住问老师怎么会购买这么多医学书。杜南山告诉孙中山,中国古代的名相范仲淹曾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孙中山陷入思考中,他觉得应该汲取古训,一面致力政治,一面研究医术,这样不偏不废,或许更有收获。从此,他定下了救国应自救人开始的志向。

孙中山一贯心存正义,嫉恶如仇。1892年,孙中山在家乡建造住宅时,一个工人的腿上生疮。当时一个江湖“杂医”路过,工人请他帮忙医治,“杂医”要价很高。孙中山问明情况,对工人说自己就是医生,能够医治。那个“杂医”见有人破坏他的生意,非常愤怒,从袋里取出一个飞砣,恶狠狠地对孙中山说,我一飞砣打断你的脚,也能替你医好。孙中山急中生智,进屋里拉了下抽屉,用长衫的袖子遮住手,又走出来对卖药的说,我一枪打死你,也能替你医好。卖药的不知道他袖中藏的是什么,灰溜溜地逃走了。

孙中山行侠仗义,出于忧国忧民。孙中山希望能为中国的未来找到方向,改变人民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他想效仿西方进行改革,富国强民。1890年,孙中山给同乡的退职官僚郑藻如写信。在信中,他提出希望仿照西方制度改革社会,先在



■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1892年由孙中山设计并主持修建



香山试行培植农桑、禁绝鸦片和兴办教育三项措施,如果能够成功,再推行到全国。其间,孙中山结识了曾被李鸿章任命为上海织布总局总办的郑观应,两人相谈甚欢。郑观应读了孙中山撰写的《农功》后极为欣赏,征得孙中山同意,以“孙翠溪”笔名将这篇文章收录在他的名作《盛世危言》里。孙中山有一套改革社会、发展经济的设想,然而这些意见,能被清政府采纳吗?

世道黑暗的程度,远远不是孙中山读书时所能想到的。虽然孙中山对百姓的疾苦有切身体会,很早就想过要“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但当他以医师的身份进出各个阶层的住宅,上至地方大员,下到平民百姓,目睹种种意想不到的状况后,心中极不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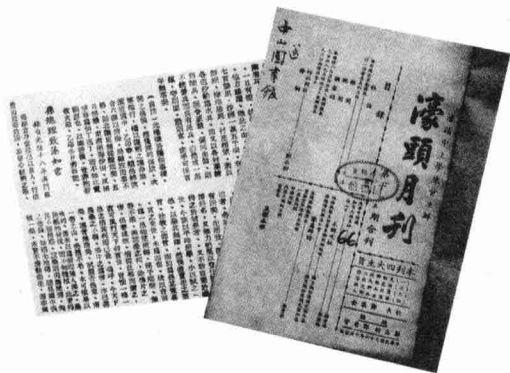
医人尤须医国

专制政府是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清政府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朝廷和官吏享用着山珍海味,曼舞笙歌,但拥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们贪得无厌,贪污行贿处处皆是,监察官员熟视无睹。皇权威严,高高在上,森严的等级下,百姓甚至没有基本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更不要说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遭到逮捕的疑犯被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在权力的面前,律法如一纸空文。此外,清政府还大兴文字狱,让百姓噤声,不允许他们有独立思考的空间,迫使他们忍受着特权阶层的压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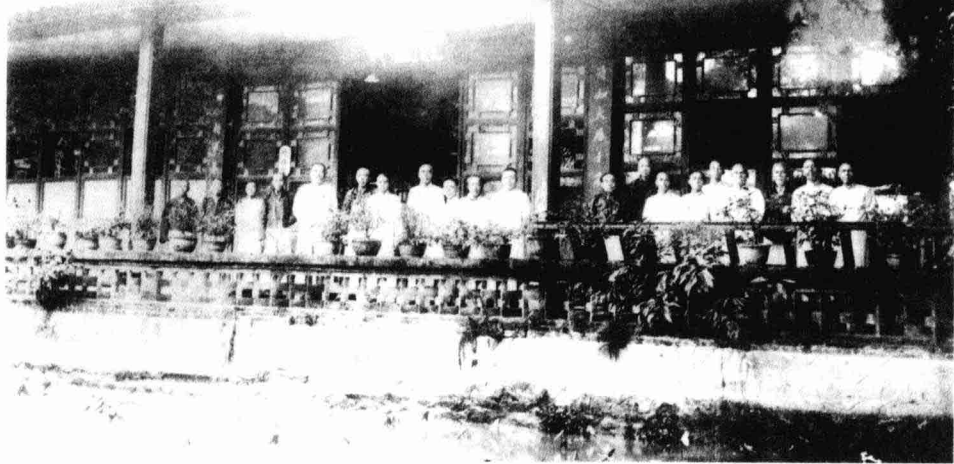
医生能治好病人身体的伤痛,却无法让民众的思想觉醒,无法拯救四万万受苦大众于水火。孙中山不愿满足于只做一个会治疗民众身体疾病的良医,他意识到“医国”比“医人”更重要。

面对国家的“痼疾”,除了改革,孙中山还想到了革命。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萌发于香港。在香港读书期间,他白天学习医学,晚上研究中文,空余的时间还广泛阅读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财政学、国政和各种派别的政治学等多方面的书籍。其中,孙中山最爱读的是《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中,孙中山得知英国的政治原来也很腐败恶劣,但那里的人民崇尚自由,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变革终于获得成功。据此,孙中山满怀信心,他认为只要一声呐喊,中国人民也会为自由而奋斗。



四月十五日 廖先生 生朝回 門公祭 於南園 羅浮精 舍禮成 為圖志 其事時 七十八 甲子首 夏也 門人桂 站記



■ 抗风轩，孙中山常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在此议论时政

孙中山有了愈来愈多的朋友，他们聚在一起，针砭时弊。在广州行医时，为了不引起清政府官吏的注意，他们更换聚会地点。东西药局成为孙中山和同志们聚会、谈论时政的地方，尤列、陆皓东、区凤墀等每次到广州，都会来这里畅谈一番。大家对腐朽的清政府义愤填膺，为国势衰微扼腕痛惜。孙中山提出，应该成立一个团体，这样能够团结更多的人加入到救亡图存的队伍中。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1893年冬，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程璧光等人在广雅书局的抗风轩聚会，正式把“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定为宗旨。

从这时起，孙中山开始着手一项比“医人”更重要的工作——“医国”。



7 上书李鸿章

孙中山的医术和医德虽然受到赞颂，名声也日渐远扬，但他的思想已从“医人”向“医国”转化。在行医实践中，孙中山深刻体会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亦然”，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救国，他决计“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在行医中结交各类不满清政府统治的爱国志士和会党分子，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从何入手医国呢？受到当时维新思潮的影响，孙中山试图通过上书清政府重臣李鸿章，使自己的救国良策能够为清政府所用。

闭门撰写《上李鸿章书》

1894年1月，孙中山离开东西药局，从广州回到翠亨村，闭门十余日，草拟了一封长达八千余字的长信，打算呈给李鸿章，史称《上李鸿章书》。

《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谋求中国富强之路的一篇政论性文章，是考察孙中山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在信中，孙中山首先申明自己的远大抱负和知识背景，接着，他提出了“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四大主张，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是欧洲列国富强的秘诀。他在信上说，如果清政府采纳这些主张，“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20年，必

能驾欧洲而上之”。他在信中对这四大主张的内涵加以详述：“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有害有益也”；“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碍，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孙中山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主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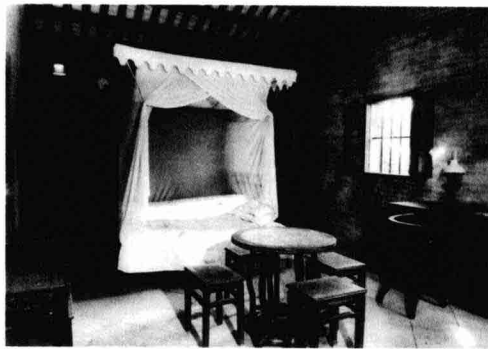
■ 李鸿章 (1823—1901)

安徽合肥人，晚清洋务派汉族大官僚。1847年中进士，入翰林。1861年组建淮军，次年率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任江苏巡抚。后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

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授大学士，仍留任总督，成为对清廷外交、军事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重臣。代表清政府签订过《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1894年对上书的孙中山未予接见，1900年7月路过香港时，拒绝香港总督计划安排的与孙中山的会见。



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为当朝宰相，位高权重，是推行改革的最合适人选。二是孙中山希望在汉族大官员中寻找对象。三是孙中山对李鸿章有好感。李鸿章是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又是洋务派的首领，打着了解西方、办理洋务、致力中国富强的招牌。所以，孙中山决定上书给李鸿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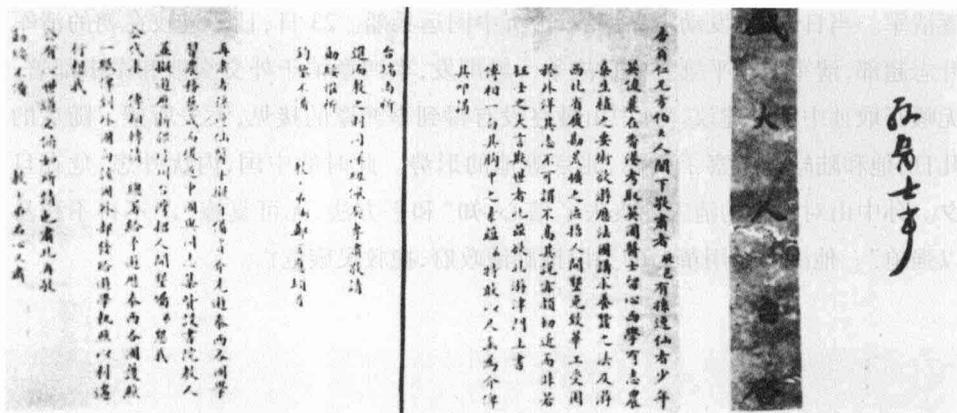
■ 孙中山在家乡翠亨村的书房起草了《上李鸿章书》

《上李鸿章书》反映了孙中山早期对国事的认知，集中表达了孙中山对发展近代社会经济的政见。

寻找上书门径

为了能将文章送到李鸿章手上，找到正确的途径是成败的关键。孙中山先找了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魏恒非常赏识孙中山，欣然致书盛宣怀，请他将孙中山推荐给他的堂兄盛宣怀，然后再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

1894年3月，孙中山由陆皓东陪同，离开广东，带着魏恒的信来到上海。孙中山如愿见到了盛宣怀，请他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在上海停留期间，孙中山又遇见了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他与孙中山是同乡，而且之前有过交往。郑观应读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后，极为赞赏，非常支持孙中山上书。郑观应长期在盛



■ 郑观应向盛宣怀介绍孙中山的信函



孫中山



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部分《上李傅相书》(即《上李鸿章书》)

宣怀手下办洋务,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立刻提笔给盛宣怀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郑重推荐这位“少年英俊”的同乡,希望由盛宣怀向李鸿章介绍孙中山。

此外,孙中山在郑观应家里还见到了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王韬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对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十分欣赏,不仅亲自帮助修改文章,而且提议说,自己有个朋友叫罗丰禄,是李鸿章的

幕僚,可以通过他上报李鸿章。王韬又写了封信,介绍孙中山到天津拜会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

上书受挫之后

6月下旬,孙中山与陆皓东带着介绍信函,满怀希望地由上海抵达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满楼客棧。6月26日,孙中山先后拜访了罗丰禄和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等,表达了上书的想法,罗、徐两人也表示愿意协助,他们向李鸿章报告了此事,并将“上书”一同呈上。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把孙中山上书当回事。此时他正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并在芦台督师练兵,以备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早在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要求,派兵入朝协助镇压,日本则不请自来,借机出兵朝鲜。6月21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了傀儡政权,并强令伪政府“授权”日本驱逐清军。当日,日本发动丰岛海战,击沉中国运兵船。23日,日军进攻在朝的清军叶志超部,清军退至平壤。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忙于外交交涉和军事部署,无暇听取孙中山的建议。孙中山最终没有得到李鸿章的接见,大失所望。随后的几日,他和陆皓东考察了天津、北京等地的形势。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危在旦夕。孙中山对没落的清王朝丧失了信心,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决心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挽救民族危亡。

8 创立兴中会

1894年10月,孙中山结束天津、北京等地的考察后,回到了上海。在郑观应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到了出国护照,于这年秋天,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檀香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兴中会的组建

檀香山是孙中山的旧游之地,那里不仅有哥哥孙眉,更有许多华侨同乡。他相信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经济上,都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到达檀香山后,首先前往茂宜岛见了孙眉,告诉他自己想要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抱负。孙眉对此表示支持,并表示愿意拿出一部分钱充当革命经费。他还写信给各埠亲友,希望他们接纳和支持孙中山。然而,当孙中山以真挚的热情向当地所有认识或不认识的华侨游说宣传时,大家却都掩耳走开了。当时的华侨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产业经营上,虽身处异国,但“三纲五常”等传统的思想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革命往往被视为犯上作乱,孙中山的宣传显然与他们的传统思想相背离。最初响应孙中山的人寥寥无几。对此,孙中山并不气馁,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赢得了一些有志华侨的支持和同情。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联合志同道合的同志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大会设在檀香山火



■ 孙中山在檀香山茂宜岛宣传革命的旧址



孫中山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无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遠之廢國喪地，割地賠款。有志之士，能無扼腕！我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而可憐如此，無救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睇；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蚕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將傾。用特集會於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

一、是會之設，專為興中事，並救中華受外國欺侮，已非一日。若由外侮起，上下之問題，固難相離。若吾日語，為吾日語，茲特將中興人，創興中會，以申其志，而救國難。

一、凡入會之人，每名捐資銀五元。另備機關，以助經費；隨人能力是荷。務宜踴躍樂輸。

一、本公舉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主席各一位，管理一位，庶務一位，以專司興中事。

■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无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睇，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孙中山慷慨激昂，在场的人屏气静听、心潮起伏，无不深受感染，掌声如春雷般响起。最后，《兴中会章程》获得了一致通过。根据章程的规定，选出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和卑涉银行经理何宽为正副主席；永和泰号司账黄华恢为管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李昌、郑金、邓荫南、黄亮、李禄、李多马、钟宇、林鉴泉等人为值理。

会后，兴中会会员填写了《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并在李昌宅宣誓。孙中山对大家说：“反清事业须立志牺牲，非寻常会社署名附和可比。须尊重宣誓，失信失忠，有始有卒，方克济事，所以今天入会者要一律宣誓。”接着由李昌领读誓词。与会的每个同志把左手放在一本《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跟着李昌高声朗读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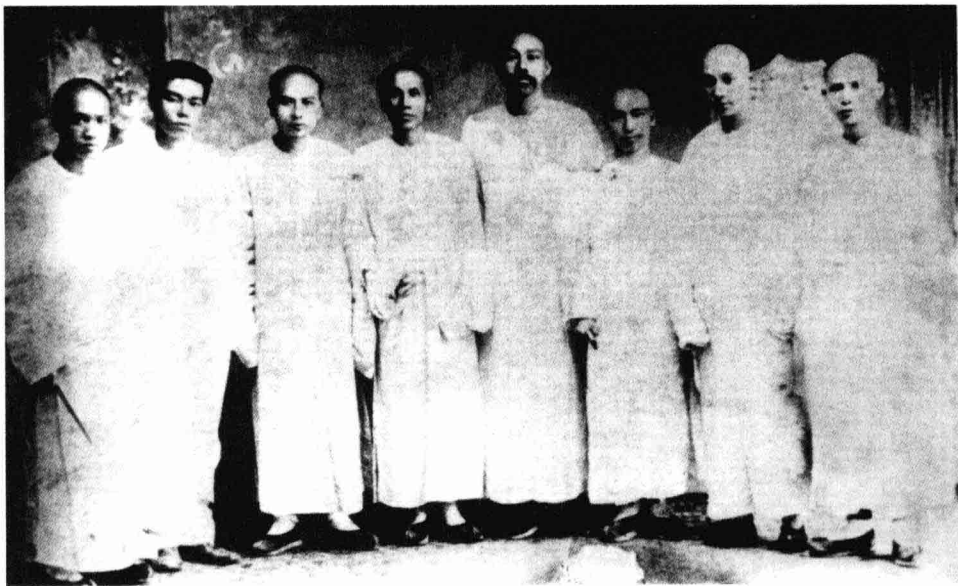
■ 檀香山兴中会首批会员宣誓地——李昌宅

兴中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章程第一条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由此可见,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已将推翻清政府与“振兴中华”、建立“合众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显然,这种政治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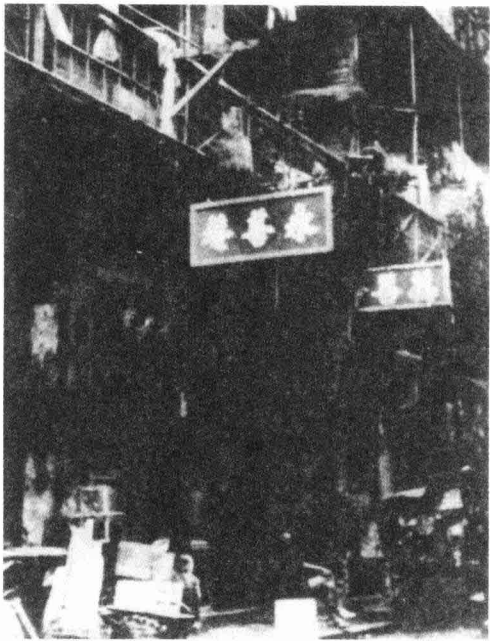
扩展兴中会组织

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后,开始派会员到檀香山各埠进行扩展组织、发展会员的工作。兴中会会员很快发展到130多人,孙眉也加入了兴中会。《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共有9条,其中规定:“凡入会之人,每名捐会底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随人惟力是视,务宜踊跃赴义。”当时孙眉非常支持弟弟的革命活动,捐银最多,其次是邓荫南。至1895年6月2日,共收到会银1388元。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全线溃败,威海失陷,旅顺大连接连陷落,京津岌岌可危。清政府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894年12月,孙中山收到上海同志宋耀如的来信,报告“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并催他乘此机会回国发动起义。孙中山下定决心以此为契机,回国发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经费紧张,十分焦急。孙眉听说这一情况后,毅然把檀香山农场的几百头牛以



■ 香港兴中会部分会员合影



■ 香港兴中会总部乾亨行

6至7美元一头的低价出售,资助孙中山。邓荫南也变卖自己的农场,把所得钱款全部交给了孙中山,还表示要随孙中山回国革命“去而不返”。这样,孙中山一共筹得1.3万美元的经费。1895年1月,孙中山和邓荫南等由檀香山启程赴香港,筹建分会组织。

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后,立即召集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杨鹤龄、尤列等同志商讨扩大兴中会组织,他们联合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成立香港兴中会,设机关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挂上乾亨行招牌,作为掩护。1895年2月21日

在乾亨行举行了兴中会总机关的成立大会,有49人入会,会员均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大会通过了修订过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修订后的章程比檀香山制定的章程语气要委婉缓和,以便掩盖其推翻清廷的真实目的。

此后,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一同到了广州,在双门底王家祠成立了广州兴中会分会,相继有数百人入会。此时的兴中会,已完全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宗旨的政治集团。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兴中会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号召,吹响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进军号。

9 广州起义

香港、广州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兴中会领导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反清起义。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起义未能全面发动即流产,遭清政府通缉的孙中山只好流亡异国他乡。广州起义成为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的发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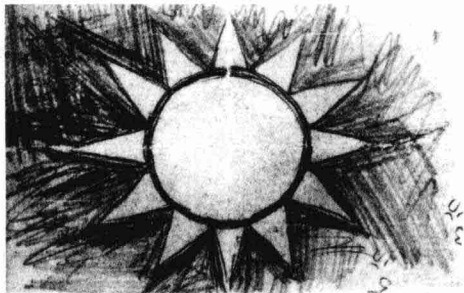
起义的筹备

1895年3月13日,孙中山与杨衢云、黄咏商等人在香港开会,筹划发动广州起义。他们推举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予以辅助;在黄咏商、谢纘泰的协助下,杨衢云驻香港担任后方接应兼财政事务。

3月16日,孙中山与杨衢云等开会具体筹划起义事宜。他们决定将广州作为起义地点,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并请何启代表兴中会起草宣言。

但是,在如何攻占广州问题上,兴中会的干部却出现了分歧。

孙中山认为要攻克广州,起义队伍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当时广州城的各个重要衙署虽然都有武装戒备,但因承平日久,都早已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认为主攻的队伍可以5人为一队,配备枪械炸弹,从衙署后方攻入人家眷住房,将他们的长官或杀或绑,这样城中便没有了可以发号施令的人。阻击打援的队伍,一方面要守住城中要害,如果城外的清兵发现城中有变前来支援便进行阻击,援军由于不明虚实,必定不敢贸然前进;另一方面还要派人将小巷子和一些房屋炸塌,使敌援军行动不便。如此,孙中山认为可以用20人进攻衙署,二三十人担任阻击,另外以二三十人攻击旗界,任务完成的小队分头放火,壮大声势,这样,起义



■ 陆皓东设计、孙中山手绘的青天白日旗图



■ 参与筹划广州起义的香港兴中会总机关会长杨衢云

一定能成功。但是其他同志都觉得这种做法风险太大,最后决定将“外起内应”的计策改为“分道攻城”,约定日期,让各地民团会党,分顺德、香山、北江三路汇集到广州后同时举事。

可是,起义人数众多,突然进入广州城,不仅驻地难找,而且难保不招致官方的怀疑。如果稍有不慎,秘密泄漏,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几经权衡,最终选定在1895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起义。重阳节是粤俗扫墓的日子,四乡大族的子孙都会结队来广州祭扫祖先,那时来往的人多,参加起义的成员杂在人群中进城,

就不易被人注意了。

中途生变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起义准备工作进展顺利,筹备的事项也很周密。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统。孙中山当选后,立即派刘裕统帅江北一路,陈锦顺率领顺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统帅香山一路,麦某(佚名)统帅龙眼洞一路,杨衢云统帅香港一路,吴子才在潮汕方面响应牵制岭东清兵。除潮汕一路以外,各路均定于九月初九早晨在粤垣候命。

这时,杨衢云忽然退缩,不肯去广州冒险。在众人的鼓励下,他才勉强答应在农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领三合会众等人搭夜船到广州,待天亮到岸,便立即发动起义。

隔天,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可否把总统职位让给他,以后到省城,事情办好了,再还给孙先生。

孙中山听到这几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之间便有了地位之争,感到非常的痛心,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他沉思了片刻,告诉杨衢云,这个总统的名义是大家推举的,如若让给他,也得请大家商议后才行,并且许诺尽快召开会议。



■ 王氏书舍——兴中会在广州的秘密机关旧址之一

孙中山马上约见了郑士良、陈少白，同他们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非常恼火，坚决反对，甚至表示要亲自去杀掉杨衢云。陈少白却很冷静，他并不赞成郑士良的做法，提出杀了杨衢云，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起事。他认为不如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就没有问题了，假如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也都无所谓了。

孙中山点头称是，觉得陈少白的意见很符合自己的想法。郑士良见陈少白说得有理，心里虽是愤愤不平却也不再说什么。

在10月10日兴中会干部会议上，孙中山从革命大局出发，主动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因为事前已同大家商量好，自然一致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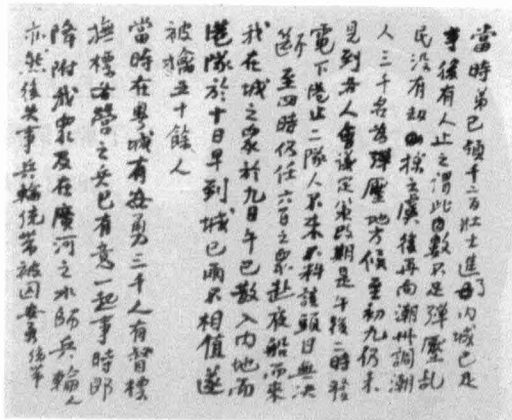
部署完毕后，孙中山随即动身赶到广州调度起义队伍。临行前，孙中山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香港的所有军械都交由杨衢云安排。

九月初八，除了香港一路外，其余各路人马都已到位，陈清率领的炸弹队，也已在城内要道埋伏。就在一触即发之际，孙中山忽然接到杨衢云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原来，杨衢云取得了总统的名义后，心存私念，他首先编了一支总统卫队，规定卫队队员与各队领队待遇一样：即先发饷，给手枪，又每人发与钟表。这样做引起了各队领队的的不满。在偏僻地方试枪时，各领队又发现他们的枪支有好有坏，而卫队的枪支，却是支支精良。领队们本来就有意见，这下更是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地要求更换坏枪，否则初八晚上决不带队开赴广州。到了这时，杨衢云哪里再有枪支可换？而领队们又不肯让步。一时间，杨衢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只得电告孙中山延期。

孙中山收到电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赶忙拿着电报，急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陈少白看了电报，大惊失色，告诉孙中山，凡事如过了期，往往走漏风声。假如贸然发动起义，恐怕要失败。更何况两天后香港一路是否真的能到也未可知，现在只能让各路部队暂时回去待命，等待合适的机会了。

孙中山觉得陈少白说得有道理，便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等候命令。接着，又发急电给杨衢云，称“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 1897年秋，孙中山在日本与友人宫崎寅藏谈话广州起义经过的手迹



起义流产

当时有个兴中会会员叫朱淇,加入兴中会后,由于努力工作得以参与了与此次起义相关的机要会议,并负责起草了起义的《讨满檄文》。初九的起义没有成功,他的哥哥朱湘得知后,生怕连累到自己,便冒用朱淇的名义向当时的省河缉捕管带李家焯告发,并交代了孙中山等人谋划起义的细节。

李家焯连忙报告给两广总督谭钟麟。谭钟麟一听,大惊失色。原来之前香港总督曾发电通知谭钟麟有人要偷运军械进入广州,要求他加强戒备。谭钟麟因为电文并未说明具体嫌疑人,没有过多追查。李家焯的这份报告让他惊恐万分,连忙调兵遣将,加强广州防卫,并派李家焯领兵搜查双门底王家祠和咸虾栏革命党机关部以及各处关口和码头。

孙中山和陆皓东听到清兵出动搜索的消息,连忙布置转移。陆皓东自告奋勇去云岗别墅焚毁兴中会名册。孙中山同意他前往,并与他约定:事完之后,黄昏在水鬼潭埠头会合,然后一同离开广州。

陆皓东随即赶到北岸的云岗别墅,销毁了名册,正要撤离,却发现清兵早已把云岗别墅围了个水泄不通。最终,陆皓东被清兵捕获。

这天黄昏,化装成劳工的孙中山到了水鬼潭埠头。他左等右等,可始终没有见到陆皓东的影子。风声越来越紧,他只好独自登上事先备好的小汽艇,在弯弯曲曲的小水道里穿行,躲过敌人的盘查,朝香山县唐家湾方向驶去。

杨衢云虽是接到孙中山“不要再来”的电报,但7箱军械早已交给“泰安”号轮船运往广州,若是取回,又怕事情败露。于是只好硬着头皮,仍派朱贵全、丘四带领数百人随船赶往广州,同时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



28日清晨,“泰安”号轮船刚刚抵达广州,便被等候多时的李家焯截获。起义用的7箱枪支,因被杂货积压在下面,临时无法拿出;先下船的朱贵全、丘四等40多人被清军逮捕,后下船的人将有关记号全部破坏才幸免被捕。

广州起义至此彻底失败。

陆皓东就义

陆皓东被捕后,发交南海县县衙李征庸审讯,妄图迫使他供出同党,一网打尽。陆皓东昂首挺立,不跪不拜。他反令李征庸拿纸、笔、墨来,当庭直书。在书中,他先是申明在外国列强入侵的危急时刻,清政府却腐败专制,所以决心和孙中山一起废灭清政府;接着痛斥清政府统治中原的各种罪行;最后他慷慨陈词:广州起义虽未成功,我还是感到欣慰的。你们可以把我杀了,但你们杀不尽后继者。他要求“请速行刑”。

陆皓东不肯供出同党,李征庸狂施酷刑。铁钉插入陆皓东的手、足,凿掉了他的牙齿,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横眉冷对审判官,嘲笑审判官虽然对他施酷刑,但他肉痛心不痛,就算再严酷的刑罚又能奈他何。

11月7日,陆皓东、朱贵全、丘四3人被绑赴刑场,惨遭杀害。闻知陆皓东牺牲,孙中山极为悲痛,称赞他是“命世英才”,“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清政府随后下令对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10多人悬赏捉捕。孙中山被列入缉捕名单的最前面,赏银也最高,为花红银1000两。同时,清朝总理衙门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清使馆发电,通缉孙文。



■ 翠亨村犁头山麓上的陆皓东墓园(1937年修建)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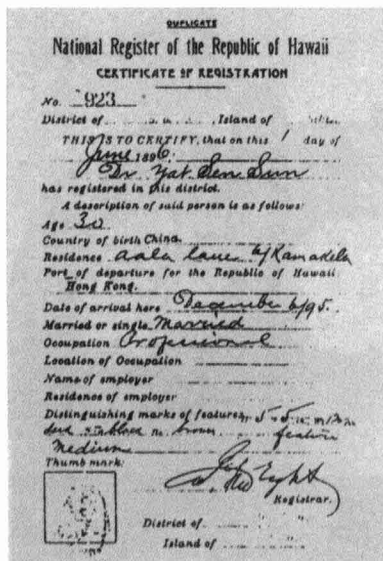
伦敦蒙难

孙中山在友人的帮助下，于10月27日深夜逃出广州城，在葡萄牙友人飞南第帮助下，经澳门到达香港。由于香港政府已接到两广总督的通知，便限令孙中山、陈少白等人5年内不准入境，孙中山只好与陈少白、郑士良等人离开香港乘船前往日本。在海上颠簸14天后，他们才抵达日本神户。一上岸他们便看到报纸上已登出广州起义的消息，上面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党人”。大家感到非常兴奋，从此便以革命党自居。

巧遇恩师

在日本，孙中山和战友们“断发易服”，剪去辫子改穿西装。然而，不到一周，就传来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引渡孙中山等人的消息。孙中山便决定先回檀香山再从长计议。

1895年12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檀香山。在孙眉的农场，孙中山见到了母亲和妻儿。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马上派人到翠亨村捉拿孙中山的家人。母亲杨太夫人、妻子卢慕贞得知消息后，匆忙收拾了一些细软，在陆皓东侄儿的帮助下，带着5岁的儿子孙科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孙姪远赴檀香山投奔孙眉。一家人短暂的团聚给了孙中山无限的安慰，孙中山向孙眉介绍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孙眉安慰他“这不算一回事，还应继续干下去”。哥哥的鼓励让孙中山信心大增，决心重新开始。他不久便到火奴鲁鲁去整顿兴中会会务，以增加革命力量。



■ 孙中山于1895年12月抵达檀香山的官方记录(左下角是孙中山的拇指印)

这里的华侨早就听说起义失败的消息。清

政府驻檀香山的领事也奉朝廷命令，正在这里调查兴中会会员的情况。因此不少同志心灰意冷，有的甚至动摇。孙中山召集会员开会，鼓励大家继续革命，并在隆记报馆设立了机关。经过努力，革命工作重新有了起色。为了动员更多的华侨加入到革命队伍，孙中山决定先到华侨较多的美国大陆作宣传发动工作，然后再到英国。



■ 康德黎

就在孙中山准备出行之际，巧遇老师康德黎。那天孙中山正在火奴鲁鲁的中国城街散步，忽然迎面驶过来一辆马车，定睛一看，坐在马车上的人原来是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和他的夫人。已好久没与老师联系了，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们，孙中山立即跳上马车与他们打招呼。康德黎看见一个留着短发、身穿西装的青年突然跳上车来，还以为遇到强盗，吓了一跳，定定神才认出是孙中山。康德黎非常高兴。孙中山把自己的情况简要地向老师作了介绍。康德黎告诉孙中山，他这次是乘船回国，经过檀香山时顺道登岸游览夏威夷风光的。孙中山自告奋勇当起导游。分手时孙中山告诉老师，他过几天就到美国大陆去，然后再到英国。康德黎把家里的地址写给了孙中山，两人约好在伦敦再相见。

被清使馆诱捕

1896年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不料这里的华侨风气未开，大都对革命并不关心，孙中山宣传几个月收效不大，于是决定离开美国前往英国。

1896年9月30日中午，孙中山乘船抵达英国利物浦，然后又转乘火车，到达伦敦已是晚上9点多，当晚他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孙中山到钵兰大街覃文省街46号去探望康德黎。康德黎夫妇极为高兴，热情地接待了孙中山，并建议他搬到附近来住，这样就可以常来叙旧。康德黎的朋友露丝·保勃丝小姐家里正好有一个带有家具的房间可出租，那里离康家不远。孙中山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天孙中山便拿着行李搬了过来。

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伦敦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第一大港和金融中心。这是孙中山第一次来到伦敦，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伦敦街上马车来来往往，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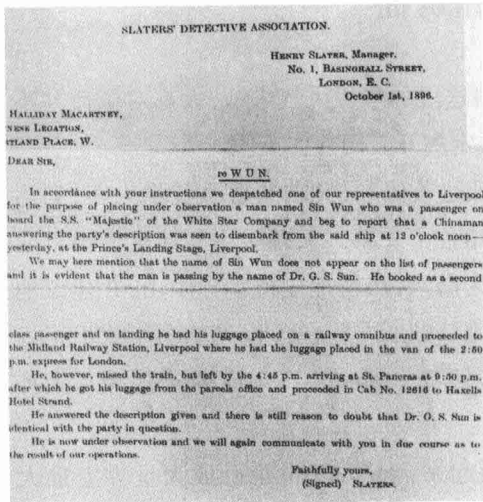
易市场商品品种繁多,市民在井然有序地采购商品,一切繁杂而又安静。孙中山几乎每天都忙于游览考察,然后到康德黎家,谈谈他的所见所闻。其间,他参观了圣保罗大教堂,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等名人墓地和植物园等。他丝毫没有察觉危险正悄悄地降临,完全没想到他在伦敦的一举一动早已受到清政府雇用的侦探的严密监视。

原来,在孙中山尚未到达伦敦时,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就接到清政府的电报:孙中山一旦抵达,立即将其逮捕押送回国,或派人将其暗杀。龚照瑗随即派使馆参赞马格里同英国政府交涉,要求英国当局在孙中山到达英国后将其逮捕并移交给公使馆。但英国政府以此举不符合英国法律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清政府为了斩草除根消除祸患,一再催促清驻英公使一定要想办法捉拿孙中山。龚照瑗只得一面派公使馆人员打探孙中山的动静,一面雇用侦探跟踪孙中山,以便找机会动手。

10月11日上午10点半,孙中山吃过早餐后,便从住所出来前往康德黎家,准备与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祈祷。这天是星期天,街上行人不多,孙中山正沿街走着,忽然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向他打招呼:“请问你是日本人吗?”“不,我是中国人。”孙中山回答。那人又问:“是哪里人?”孙答是“广东人。”那名男子高兴地说:“噢,那么我们是同乡了。”他还自我介绍说他姓邓。怕暴露自己,孙中山随口说他姓陈,名载之。他们边走边说,这时又走过来两名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当他们走到一幢房子前时,邓和两名中国人一同邀请孙中山进去坐坐,叙叙乡情。孙中

山刚想推辞,那两人已半推半拉把他拉进门。门关上后,先前那位自称姓邓的人却不见了,孙中山正在纳闷时,走过来两个彪形大汉,架起孙中山就走。走到四楼,孙中山被推进了一个小房间,接着门便被反锁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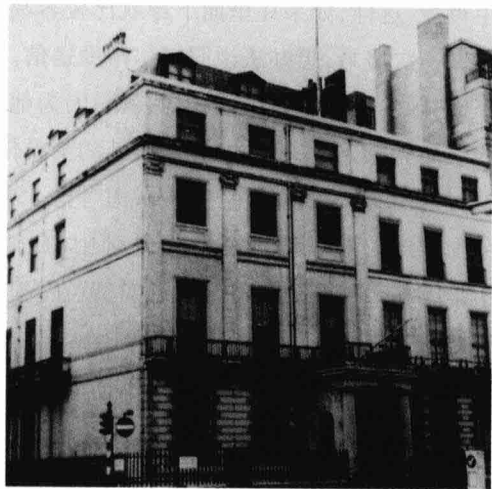
此时的孙中山才猛然想起康德黎曾告诉他,清驻英使馆就在附近。他知道自己中了圈套,被清驻英使馆囚禁了。孙中山和衣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想着如何才能脱险。他环视四周,这房间不大,只有一扇窗户,而且窗户朝着使馆内部,窗户上安装着铁栏杆。



■ 孙中山抵达伦敦第二天,英国一家私家侦探向清政府驻英使馆报告孙中山抵达伦敦的情况文书

门口有两个英国仆人在轮流看管他，他不可能逃出去。唯一的办法是要将自己被囚禁的消息告诉康德黎老师，让他想办法救自己出去。

中午，一个个子不高的英国人走进来，他自我介绍叫马格里，受聘在清使馆工作，他要求孙中山将旅店地址告诉他，以便让使馆人员把他的行李取来，其实他们是想搜查行李。孙中山识破了他的诡计，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于是他说，行李在朋友家，要写信托人去取。孙中



■ 秘密囚禁孙中山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

山写了一张便条给康德黎老师，便条上写道：“我在中国使馆，快将行李送来。”马格里拿了条子就走了，然而行李并没有送来。

第二天一早，一个名叫柯尔的英国仆人进入房间生炉子，孙中山请求柯尔帮助送信给朋友。他撕下一小片纸，写了一些字后，塞给柯尔。因为使馆曾告诫过看守人员不准将此事泄露出去，所以柯尔不肯接纸条。孙中山告诉他如果无法送出使馆，就把纸条从窗口扔到街上。但柯尔还是觉得事情对自己不利，就把纸条交给了马格里。孙中山得知纸条没被送出去，就决定自己试着将纸条扔出窗外。

第四天即10月14日，孙中山要求开窗吸点新鲜空气，使馆同意了。孙中山将纸条用一枚硬币裹着，用尽全力向窗外扔去，结果纸条落到邻家屋顶。他的举动被一个中国人看见了，并把纸条捡起来后交给马格里。清使馆发现孙中山一直在设法与外界联系，非常紧张。他们知道，万一让外界知道他们软禁了孙中山，会引来极大的外交麻烦。因为清使馆曾要求英国引渡孙中山遭到过拒绝，如未经英国政府同意就将孙中山偷运回国将触犯英国法律，一旦消息泄露事情就闹大了。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打了败仗，不希望在伦敦再闹出什么国际性事件。于是清使馆一方面将囚禁孙中山房间的窗户全部钉死，没收了一切文具，并严加看管；另一方面，使馆抓紧联系租用船只。他们花了7000英镑从木兰轮船公司租下一条船，准备用一个大木箱将孙中山装运回国，实在不行，就准备在使馆秘密处死孙中山，以除清廷的心腹大患。

时间一天天过去，孙中山却依然无法将消息送出去。他知道自己处境非常危险，焦急万分。为了防止清使馆人员在菜里下毒，几天来孙中山只吃面包、牛奶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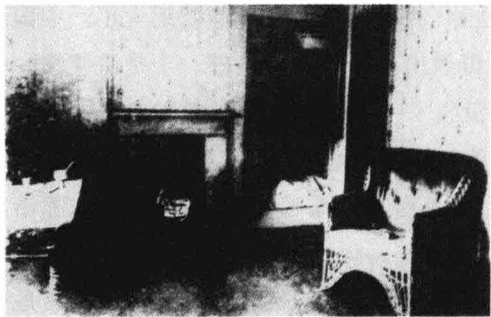
生鸡蛋,这样,如果在里面下毒就比较容易识别。转眼已是第6天了,孙中山决定再做一次努力,想办法说服柯尔帮助送信。这天柯尔进来后,孙中山恳切地告诉柯尔,中国的皇帝之所以要杀他,就是因为他是基督教徒,并且是一个力求政治改革的革命党人,如果柯尔能把他囚禁的消息传出去,他就可以生,否则他就一定会死。这时柯尔有点被说动了,答应考虑考虑。事后,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清使馆的女管家英国人郝太太,郝太太很是同情孙中山,她对柯尔说:“你应该帮助这个年轻人。”于是第二天早上柯尔进来送煤时,就在煤斗中夹了一些纸,上面写道,他同意试着送信给孙中山的朋友,并告诉孙中山不要伏在桌子上写,外面有监视,要孙中山伏在床上写。于是孙中山依照柯尔的话,在一张名片上写了几句话:“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使馆,将要运出英国到中国去受死刑,求即速援救。致康德黎博士,覃文省街46号。”孙中山又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交给柯尔作为酬劳,柯尔拿了钱和纸条就走了。

营救脱险

康德黎虽然已经好几天未见到孙中山,但他并没在意,还以为孙中山正忙着到处参观考察。10月7日(星期六)深夜11点半,康德黎一家正准备睡觉,忽然门铃响了,康德黎起床一看,门口空无一人,却发现门下塞进了一封信,捡起来看,大吃一惊,原来这封信是清使馆的女管家郝太太写来的,信上说:“您有一位朋友在上星期日起一直被囚于清使馆内,他们想把他送回中国,到那里肯定要绞死他。我不敢在信上签名,但我说的都是真话,请相信我,他的名字叫孙逸仙。”康德黎急忙连夜赶到伦敦警察署去报案,探长记下证词后告诉他,警方对此事无法干预。康德黎非常着急,无奈地回到街上,这时已经是凌晨了,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康德黎立即去见法官阿克罗伊德,请他想想办法;然后又去找在香港西医书院当过教师的孟生医

生一起商讨办法。

这天中午,康德黎又收到第二封信。这是孙中山托柯尔送来的名片,在背面写着求救信息。他拿着名片与孟生商量后决定到外交部去,由于那天是星期天没有人办公,直到下午5点,外交部的值班人员才接见了他们。耐心地听他们讲完了关于孙中山被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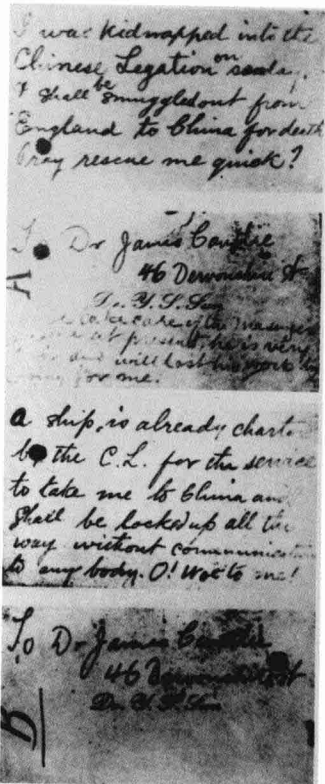


使馆绑架的事件后,值班人员说今天是星期天,他们无法处理这件事,但答应第二天向上级报告。在回家路上,康德黎担心,孙中山会被清使馆偷运出境,于是饭没吃完又赶紧出门,找了一个私人侦探去监视使馆。令康德黎没有想到的是,侦探立刻将这情况通报给了清使馆。原来他雇用的侦探,竟然也是清使馆雇来监视孙中山的那家事务所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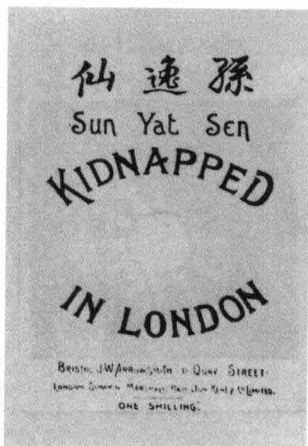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康德黎到泰晤士报社,想通过报纸将孙中山被绑架的消息发出去,但此事未引起泰晤士报的关注。康德黎只得又到外交部,递交了一份书面的陈述,在陈述中康德黎最后这样写道:“要解决这问题,除了向报界披露事实真相外别无他法。”这句话引起了外交部的注意,原来外交部在康德黎陈述后,立即与内政部联系,内政部担心如果这件事让报界知道并公之于众,会引起舆论大哗,建议外交部详细考虑整个事件的处理办法。于是当天下午外交部批示,请内政部立即布置监视清使馆,如发现有任何强行运送孙中山上船的企图,则立即采取行动。

稍后,警署派出6名便衣警察分3班24小时监视清使馆,同时派员监视所有即将开往中国的船只。接着警署乔佛斯探长又调查证实孙逸仙确实被囚禁在清使馆,外交部怕报社知道消息后使他们工作被动,于是准备正式照会清使馆要求他们释放孙中山。这时康德黎才松了一口气。

10月22日,《环球报》知晓风声后,抢先加印号外,以“可惊可怖的新闻——革命家在伦敦被诱,幽禁在中国使馆内”为标题加以报道,立刻在伦敦引起轰动。中央新闻社、《每日邮报》社等大批记者蜂拥而来,他们到覃文省街46号采访康德黎,又陆续叩响离康家不远的清使馆大门,询问绑架事件报道是否属实。但使馆英文翻译否认有此事,于是记者们又去找马格里,甚至到孙中山的暂住地去采访房东。10月23日,伦敦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以“绑架”、“一个华人在



■ 孙中山写给老师康德黎的求救信



■ 1897年1月2日,孙中山用英文撰写的《伦敦被难记》在英国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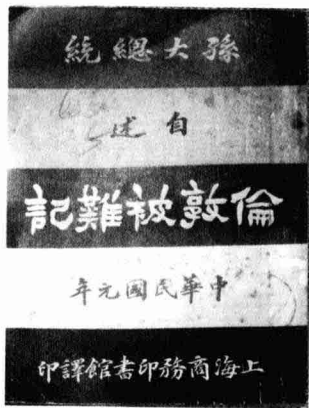


■ 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1896年摄于美国旧金山)

伦敦被绑架”、“中国使馆绑架事件”等为标题发表新闻。这时外交部也已正式照会清使馆，在外交部及舆论的压力下，清使馆不得不马上释放孙中山。

10月23日下午，得知清使馆放人的消息后，清使馆所在地立即成了一个热闹的去处，大家都要去看看被清使馆绑架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下午4点左右，孙中山身穿灰色西装，跟在仆人后面走下楼，他一到老师马上走上去握住了恩师的手，非常激动，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泪花。在确认这位年轻人就是孙逸仙后，乔佛斯探长立即领着他从清使馆后门离去。人们一听说孙逸仙离开清使馆了，便潮水般地涌向他。他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位在伦敦市中心的被绑架者。这是一位身材瘦小，穿着优雅，一副文弱书生的相貌，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年轻绅士样的中国人，而不是清使馆描绘的青面獠牙式的暴徒。在场的记者一下子围了过来，连连向他发问，一位画家还掏出本子画起速写。但孙中山只谈了几句，就被探长请上马车，疾驶而去。晚上，孙中山回到康德黎家里，他们一家设宴祝贺孙中山获释归来。

中国革命家孙逸仙被囚禁及获释的消息，通过路透社的电讯迅速传向世界各地。后来，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的帮助下，将这段经历用英文写成了《伦敦被难记》一书。1897年1月2日，该书在英国出版。英国的各大报纸刊登了介绍或书评，该书后又翻译成中文发表，从此“大革命家孙逸仙”名扬天下，这也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



■ 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伦敦被难记》

僕姓孫名文宇載之號逸仙籍隸廣東廣州府香山縣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歷十月十六日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間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是年母復回華文遂留島依兄入英監督所學之書院肄業英文三年後再入美人所設之書院肄業此為島中最高之書院初擬在此滿第即往美國入大書院肄業專門之學字僕兄因其切慕耶穌之道恐又進教為親督責着令回華是十歲時也抵家後親亦無所責隨其所居居數月即往香港再習英文先入棧裕書堂數月之後轉入香港書院又數月因家事離院再往夏威夷島月而回自是停習英文復治中國經史之學二十歲以習西醫先入廣東省城美教士所設之博濟醫院肄業次年轉入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五年滿業考拔前茅時二十歲矣此從師游學之大旨也文早嶺志窺遠天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遠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聖美國華威頭奇

■ 孙中山写于1896年的自传手迹



大英博物馆常客

1896年12月5日,一位身穿西服、头戴一顶普通呢帽的中国青年走进了位于伦敦市中心大罗素广场旁的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办理好阅览证后便借了一叠书坐下看了起来。之后,人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来到这里埋头读书的身影。他就是伦敦蒙难获释后名声大振的革命家孙逸仙。

寓居伦敦

在康德黎营救下,孙中山终于逃脱了清政府的魔爪,重获自由。但康德黎依然为自己的这位学生担忧,他知道清政府是不会轻易放过孙中山的。事实也是如此,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孙中山,但除掉孙中山的想法没有改变。他们一方面继续派密探跟踪监视孙中山;另一方面密谋用高价雇用杀手,等孙中山一离开英国就在海外实施暗杀。出于安全考虑,康德黎让孙中山暂住在自己家里,并试图说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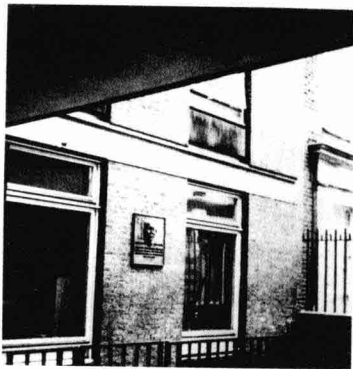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不要再从事革命,希望他能重新执业行医,通过行医来帮助弱者。康德黎特意安排孙中山参观了伦敦的医学院和医院。其间,孙中山结识了伦敦红十字会的柯士宾医生。柯士宾非常赏识孙中山的才华,将自己的著作《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交由孙中山译成中文。孙中山称赞柯士宾的书“言简意赅,剖理精当,洵为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素”,于是决定翻译。目的在于使“各人略知救伤之法,俾遇意外之事可即行设法施救,而被伤之人由此可保性命于危急之倾,并解痛楚于医者未至之时”。此书于1897年在伦敦出版,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的一本医学译作。1906年冬,孙中山对1897年出版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作了文字修饰,改



■ 1907年2月由东京民报社再版发行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

变了若干名词的译法,凡“红十字会”均改译为“赤十字会”,1907年2月由东京民报社再版发行,名为《赤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此书是中国近代较早介绍西方医学的译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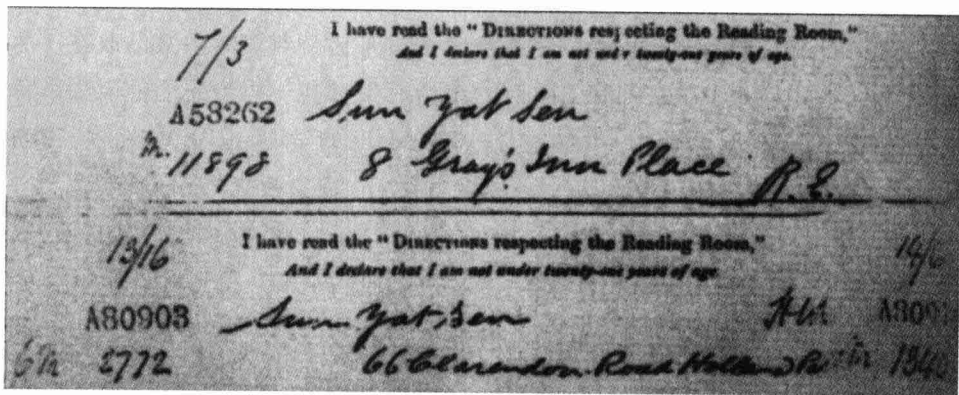
康德黎利用自己在英国医学界的影响力,多方奔走呼吁,准备在伦敦为中国人创办一所医学院。如果按照老师的安排,孙中山完全可以进入英国医学界这一名流云集的社会阶层,但想到积贫积弱的祖国在清政府统治下正蒙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和痛苦,便婉言谢绝。他知道,中国要摆脱目前贫穷落后的局面,只有走革命救国的道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中国才有救。他不愿只图自己的尊荣富贵,甘愿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和一切艰难困苦,为拯救祖国而努力奋斗。



■ 孙中山寓居伦敦时的旧居——格雷旅店街8号,墙上悬挂孙中山铜头像

勤奋苦读

为了使自己在思想上、理论上更加成熟,孙中山决定在英国居住一段时间,多读些书和进行实地考察。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各种文化设施也比较齐全。大英博物馆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珍藏文物图书资料最多的著名博物馆,它建于1753年,1759年对外开放,馆内藏书达几百万种。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居住的半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去看书,常常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饿了,他就去附近的布莱尔街金谷面包公司买点面包



■ 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读书时留下的签名卡



充饥；累了，就闭目养神，偶尔也会到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孙中山就这样如饥似渴地读着大量包括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农业、法律、军事、历史、哲学等内容的各类书籍，他希望能从中寻找出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的读书劲头让图书管理员们对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产生了敬佩之情，大英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先生成了孙中山的朋友。在阅览室，孙中山还结识了流亡到伦敦的俄国革命党人、爱尔兰恢复党党员摩根以及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等人，他们常常在阅读之余，一同探讨各种问题。

康德黎后来回忆这段时光说：“孙逸仙从不在玩乐上浪费时间，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关于政治、外交、法律、陆海军等方面的书籍，矿山及开采、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学等也为他所注意……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很少有人达到。”

在伦敦读书期间，给孙中山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亨利·乔治的学说和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亨利·乔治(1839—1897)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小出版商家庭，早年做过排字工，后在纽约一家报纸当编辑。受李嘉图地税理论影响，他写了《进步与贫困》。该书在1879年出版后引起各国注意，3年销量达10多万册，在当时风行一时。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人民贫困的根源在于土地被私人垄断，因此他主张把土地收归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这样资本主义的弊端就可以自行消灭。马克思从1849年5月到1883年逝世的30多年时间里，绝大多数时间也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马克思在这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时马克思学说已在欧洲广泛流传，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涌现。孙中山比较赞赏的是马克思“资本公有”和亨利·乔治“土地公有”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与亨利·乔治的主张虽各不相同，但都是社会主义的精髓，都是为社会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孙中山比较赞赏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法来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学说，希望用局部的改良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希望在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后用亨利·乔治的地价税法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后来孙中山借鉴了亨利·乔治的学说，把“平均地权”作为

■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德国革命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写)和《资本论》的作者，和恩格斯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孙中山称马克思是“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



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的一项内容。

在英国期间，孙中山还用英文写了《第一次广州革命起义》、《中国之现状与未来》、《中国之司法改革》等3篇文章。在文章中，孙中山介绍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揭露清朝官吏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以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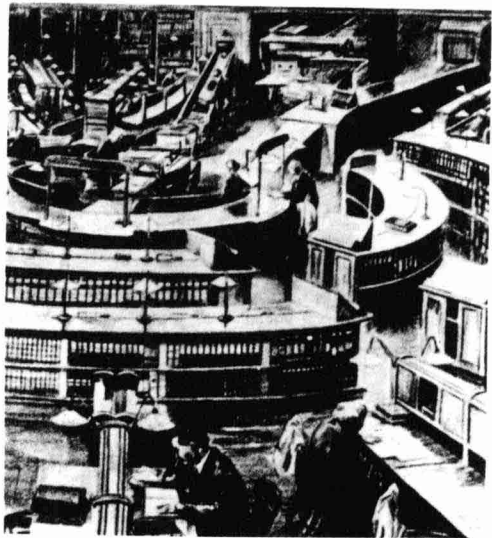
在中国进行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必要,说明如果不打倒清政府,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希望通过这些文章的发表,来宣传自己所主张的革命理论和方案,同时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

思考救国良方

孙中山在留居伦敦期间,为进一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除了大量阅读和研究民主主义理论和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外,还到英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1896年12月8日,伦敦北部伊斯灵顿地区皇家农业馆正在举行英国最大规模的“圣诞育肥家畜展览”。那里展出了各类品种的牛、羊、猪、鸡、鸭、鹅、兔等,还有各类植物、种子、农具、重型机器等,堪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农牧业展览。这对自小生长在农村、早就立志要振兴祖国农业生产的孙中山,有很大的吸引力。开幕当天,孙中山便赶去参观。12月11日,孙中山又去水晶宫参观,那儿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自行车展,展出的自行车种类繁多。当时,在欧洲自行车已成为民众便捷的交通工具,而中国老百姓出行时多靠徒步行走。孙中山很早就有发展交通以畅通物流的思想,所以他参观时认真仔细,对各类车辆加以对比考察,对先进的产品惊羨不已。此外,他还多次赴宪政俱乐部进行调查访问,参观了英国皇家亚拔船坞及英国的法院、议院。英国议院位于市中心,占地8英亩,是当时英国最雄伟的建筑之一,拥有大小房间1100间,而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立法机构,只有皇帝、朝廷和衙门,皇帝的圣旨就是法令,全国上下不得违抗,都要服从和奉行。英国先进的政治体制,给孙中山很大的感触和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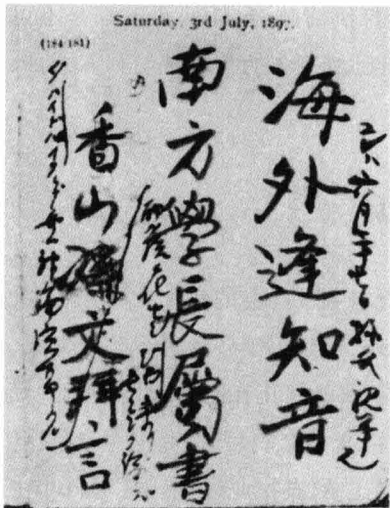
为了全面了解西方社会,孙中山除了考察英国资本主义的成就外,还深入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调查。孙中山住所后面隔3条街就是贫民窟,当时伦敦约有六七百万人口,每年冬季因工作停歇失业的饥民约百万人。在那里,孙中山了解到伦敦机器制造业工人举行持续7个多月的总同盟罢工,结果英国政府调动军队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



■ 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研读



孫中山



■ 1897年6月27日，孙中山离开英国前书赠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的题词

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引发了他的深思。他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西方各国经过工业革命后富强起来了，但广大民众却并未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贫富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孙中山意识到要挽救中国，仅仅拿西方社会的一切作为现成的榜样是不行的。他开始思考如何让中国人民既能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又能免受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后来他在自述中谈了当时考察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后的感受，他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

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在伦敦近9个月时间的大量阅读和考察，极大地开阔了孙中山的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为他日后制定“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同时，孙中山也发现欧洲当时还鲜有中国留学生，华侨也不多，限制了革命救国的宣传和发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于是，孙中山决定去日本，“以其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

12 广交日本与亚洲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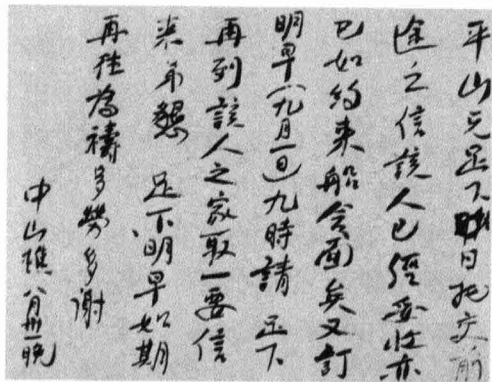
1897年7月2日,孙中山离开伦敦,乘“努美丁”号轮船,经加拿大蒙特利尔、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于8月16日到达日本横滨,开始了他新的革命生涯。

化名“中山樵”

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后,暂住陈少白家。陈少白曾和孙中山一起策划广州起义,失败后一直居住在日本,并组建了兴中会横滨分会,结识了不少热心中国国事的日本朋友,为孙中山到日本活动创造了人际条件。

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孙中山在陈少白的陪同下,拜访了横滨加贺町警察署长,提出入境特许申请。他担心在日本会再次遭到清政府的非法逮捕,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保护。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不想得罪清政府,不愿孙中山这样一个被清政府缉捕的“国事犯”久居日本。孙中山以后之所以能久居日本,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大尾亨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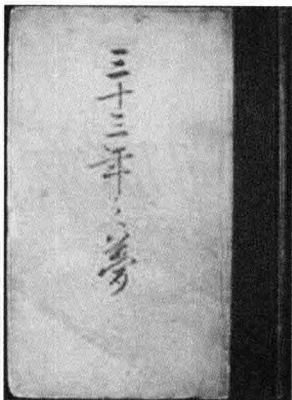
孙中山到日本后不久,宫崎寅藏便上门拜访并与其结成好友。宫崎寅藏最早通过哥哥岛津弥藏认识了陈少白,了解到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领袖,并看了英文本的《伦敦被难记》,未曾谋面已对孙中山十分景仰。宫崎寅藏原本是大陆浪人,深受犬养毅赏识。犬养毅是当时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好友,也是日本的民党领袖、政坛的实力派政治家。他对中国的秘密社团有浓厚的兴趣,并从部下的报告中得知了孙中山。宫崎寅藏拜访孙中山后,立即把孙中



■ 孙中山署名“中山樵”致日本友人平山周函

12

广交日本与亚洲朋友



■ 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

山引见给犬养毅。在外相大隈重信的干涉下，经犬养毅等人的奔走，孙中山终于在10月拿到了东京知事府签发的侨居证，这为孙中山日后以日本为基地筹划中国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获得侨居证之前，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9月上旬，孙中山在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人的陪同下，到东京拜访犬养毅。从犬养毅家中出来后，宫崎寅藏等人请孙中山住在书寄屋桥旁的对鹤馆内，在旅馆登记名字时，为隐藏身份就写了一个假名字“中山樵”，“是中国山樵之意也”。“中山”是日本的姓氏，后与朋友通信时，孙中山用过“中山”、“中山樵”或“樵”。1903年，章士钊翻译宫崎寅藏日文著作《三十三年之梦》时，因一时疏忽，误将孙文同化名“中山樵”连缀成文，“孙中山”这个名字即由此得来。

结交日本友人

从1897年8月到1902年12月的5年多时间里，孙中山有4年多的时间居住在日本，结识了许多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宫崎寅藏和孙中山的相识可谓一波三折。1897年，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派平山周、可儿长一等前往中国调查秘密社团的情况，宫崎寅藏在香港与平山周会合，并迫切寻找他景仰已久的孙中山。在香港，他们从孙中山的中文老师区凤墀处得知孙中山已到日本。宫崎寅藏、平山周又赶紧回国寻找孙中山。宫崎寅藏回到横滨的当晚，就到陈少白的寓所去打听消息，女仆告诉他陈少白已去台湾，但是家里面有一位从美洲来的客人，刚好出门散步去了。宫崎寅藏非常兴奋，认定这位客人就是孙中山，但他一直等到晚上11点也没有见到孙中山，只好返回旅馆。第二天一大早，宫崎寅藏又来到陈少白的寓所，这次他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国革命家，两人一见如故，对中国革命畅谈良久。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初次会面，宫崎寅藏只能说几句不流利的英文，中国话完全不懂，因此重

■ 宫崎寅藏 (1871—1922)

本名宫崎虎藏，通称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接受“支那革命主义”思想，决心到中国熟悉语言风俗，以逐步实现帮助中国革命的计划。1897年8月与孙中山见面并成为知交。1900年参与惠州起义，事败后回国。1902年出版《三十三年之梦》，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1905年介绍黄兴与孙中山会晤，加入同盟会。此后长期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在广州会见孙中山。



要的谈话主要靠笔谈。宫崎寅藏首先询问孙中山：“听说先生以中国革命为大志，不知先生的革命宗旨是什么？”孙中山说他的政治目标是人民自治，主张实行共和制度，并向宫崎寅藏详细解释了中国必须进行革命的原因，并恳请宫崎寅藏等人鼎力相助中国革命。在孙中山看来，“拯救中国的四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孙中山的一席话使宫崎寅藏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孙中山“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实在是东洋的珍宝”。宫崎寅藏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宫崎寅藏一生追随孙中山，竭力帮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与孙中山患难与共，历尽艰险。后来，在1900年10月惠州起义失败后，宫崎寅藏又撰写了《三十三年之梦》，专门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1903年章士钊节译此书，译编成《大革命家孙逸仙》，在上海出版后一时风行天下，影响广泛。

宫崎寅藏在横滨首次会晤孙中山后，第二天就赶赴东京向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报告，犬养毅非常兴奋，想与孙中山见面。9月27日，平山周等从横滨陪孙中山到东京拜访犬养毅。他们一见如故，抵掌相谈天下事，非常痛快。犬养毅是日本众议院议员，他的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列强的主张和孙中山该时期的志向是比较



■ 1898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的合影（前排左起：安永东之助、杨衢云、平山周、末永节、内田良平；后排左起：可儿长一、小山雄太郎、宫崎寅藏、孙中山、清藤幸七郎、大愿义刚）



接近的，犬养毅愿意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孙中山称犬养毅为知己。此后孙中山通过犬养毅等人穿针引线，结识了大隈重信、头山满等日本政界人士。

除此之外，孙中山还结识了不少日本民间人士，其中包括后来倾尽全力资助其革命的梅屋庄吉以及生物学家南方熊楠、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等。他们中有政界、军界、财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也有大陆浪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资助孙中山，负担他的部分生活费用等，有的还为中国革命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支援亚洲革命志士

孙中山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活动于东京、横滨、神户、长崎、马关等地，宣传革命，吸收一些华侨参加兴中会。同时，他还亲赴上海、台湾等地，联络会党，召集革命党人云集日本，商议革命活动，策划国内起义。

其间，他还支援菲律宾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开始了他与亚洲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人士的广泛联系。1898年，美国取代西班牙，将菲律宾视为自己的殖民地。菲律宾独立运动领导人阿奎那度率领菲律宾独立军对美宣战，彭西作为阿奎那度的代表到日本寻找援助。11月10日，孙中山和彭西首次会晤。孙中山认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



■ 1901年1月，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与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合影

的任何一个胜利都是所有东方人的胜利，菲律宾革命的基础与条件与中国很相似，所以友好的菲律宾共和国的建立，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榜样。并提议在条件成熟时由他暗中率领中国革命党员，到菲律宾援助独立党作战，等菲律宾革命成功后，再来协助中国革命。彭西对此极为感激。彭西要孙中山帮助他们购买武器，孙中山找到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并通过犬养毅的帮助，购得一些武器，7月，雇用日本“布引丸”货轮运送，结果船驶至浙江宁波遭遇台风而沉没。不管结果如何，孙中山已经把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与本国的革命连结在一起。在他看来，若想革命成功，亚洲人民首先应该团结，相互支持，反对西方列强，共同振兴亚洲。

13 功败垂成的惠州起义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列强纷纷加入瓜分、共管中国的行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身在日本的孙中山经过对形势的分析，决定派史坚如、毕永年到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的首领，又派郑士良、杨衢云在香港设立机关，准备把哥老会、三合会、洪门等帮会联合起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筹划起义

1899年11月，兴中会邀请哥老会、三合会和洪门的首领到香港开会，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都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地处广东省东江的惠州位置重要，如能占领惠州，继而进兵广州，将会造成高屋建瓴之势，更何况广东三洲田、博罗、新安等地也有为数众多的革命党人。会后，杨衢云等人东渡日本，向孙中山汇报了详细情况，商议筹划惠州起义。

此刻，在中国的大地上，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团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恶霸，清政府趁机利用义和团作为抵御外侮的工具。



■ 郑士良



■ 陈少白



■ 邓荫南

13

功败垂成的惠州起义



■ 1900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在东京合影（左起：末永节、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小山雄太郎、青藤幸七郎、孙中山）

1900年，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由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从大沽口登陆，兵陷天津、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避难。

孙中山认为这是推翻清王朝的大好时机。5月，孙中山、杨衢云和几位日本友人从横滨乘坐法国“烟迪斯”号邮轮到达香港。在船上，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人举行了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郑士良前往惠州发动起义，邓荫南和史坚如在广州策应，杨衢云和陈少白等人留在香港接济粮饷和军械。

在筹划惠州起义期间，孙中山一度有过联合两广总督李鸿章谋两广独立的设想。北京沦陷后，孙中山命陈少白和何启请香港总督卜力写信给李鸿章，劝他脱离清朝，与孙中山合作成立一个中国的新政府。那时，李鸿章对朝廷招抚义和团对抗列强的措施深感不安，正与长江以南的几个实力派督抚商议东南互保。为自身利益计，他对英国驻香港总督从中牵线和孙中山据两广独立的主张颇有兴趣，决定派代表先与对方接触，试探虚实。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没过几天，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就派了一艘炮舰“安澜”号来接孙中山，表示希望同他谈谈。为了慎重起见，孙中山让宫崎寅藏先去试探一下。宫崎被带到广州，刘学询在家里接待了他，并且

询问孙中山有什么要求。宫崎寅藏简要地提出两条：首先下令特赦孙中山，保证他的安全；其次给予贷款10万两，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刘学询满口答应向李鸿章汇报。第二天，宫崎寅藏被送上炮舰返回香港。到了中午，刘学询派人先送来3万元钱。

孙中山乘坐邮轮继续前往越南西贡，希望取得法国政府的支持，又派宫崎寅藏拿着这3万元钱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劝说他与孙中山合作。没想到宫崎寅藏到了新加坡，康有为非但不肯见面，反而控告他是李鸿章派来的刺客，于是宫崎寅藏一行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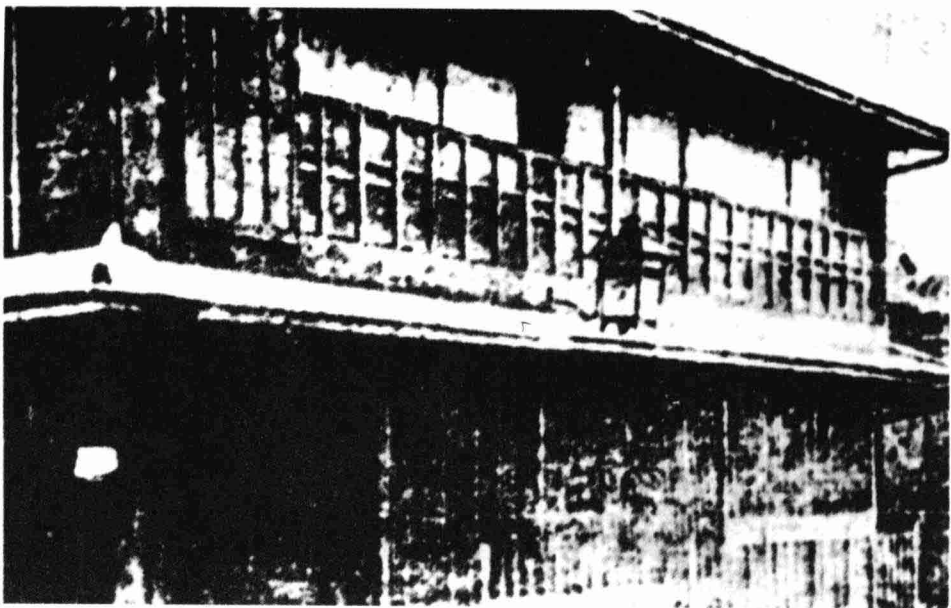
孙中山闻讯后，立即由西贡赶往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随后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号返回香港。由于“新加坡刺康案”，孙中山遭到香港政府的监视，不能上岸。不久，就听说李鸿章决定奉旨北上，合作的希望落空。孙中山便在船上第二次召集会议，布置了惠州起义的军事安排，并让日本同志协助郑士良潜入内地，伺机发动起义。



■ 周平山

旗开得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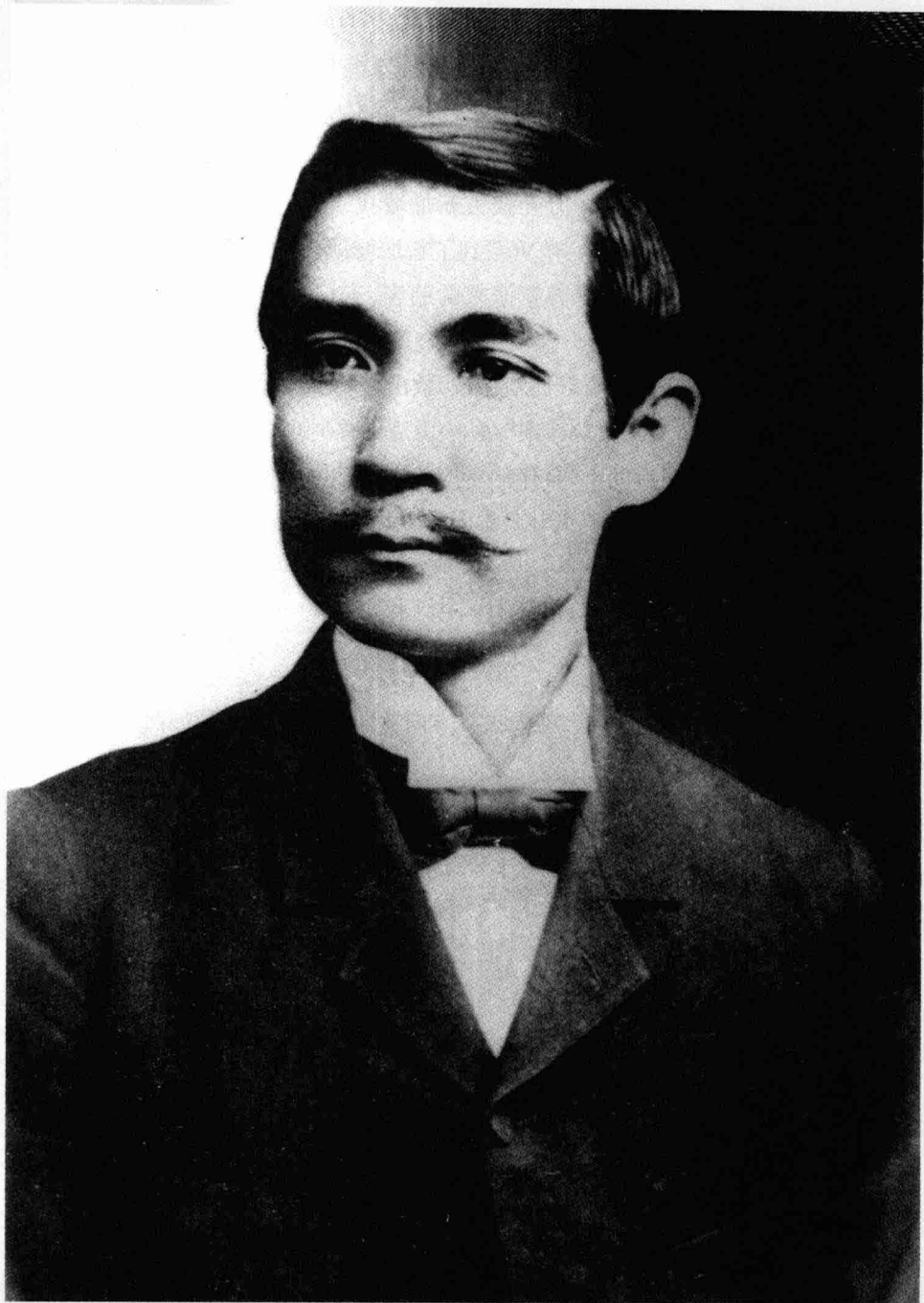
没过几天，孙中山离开香港，他先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彭西借得该党向



■ 台北惠州起义指挥中心旧址

13

功
败
垂
成
的
惠
州
起
义



■ 1900年孙中山留影

日本购买的军械,再前往台北请求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协助革命活动。当时列强都有瓜分中国的意图,日本政府表面上支持南方的革命活动,暗地里却蓄谋加以控制。因此儿玉爽快地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还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商议援助革命军的计划。于是,孙中山在台湾着手建立指挥起义的中心。

就这样,孙中山在台北,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分别在惠州、广州和香港加紧准备,决心摧毁清王朝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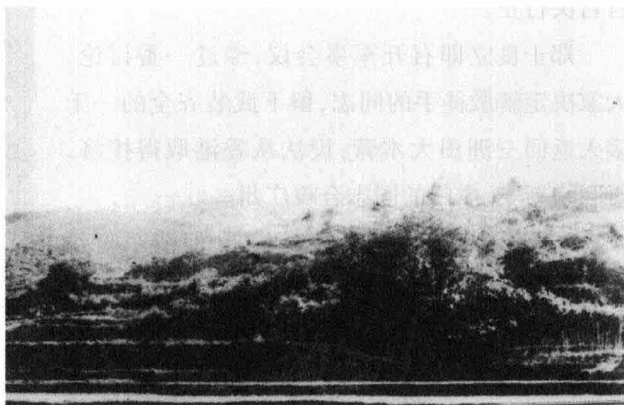
10月的一天,郑士良突然从香港给孙中山发电报说,留在惠州的同志因清军已逼近三洲田,决定先发制人。原来继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的德寿侦探到革命党的活动,便调遣军队前来镇压。

10月8日,革命军趁着夜幕,由黄福统率80位同志,高举先烈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袭击了驻扎在新安县沙湾的清军陈良杰部。这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当时三洲田的革命军总共只有600人,300支枪,9000发子弹,但结果革命军大胜,斩杀40人,俘虏了30多人,夺枪40支,还缴获了不少弹药。被俘清兵自愿剪去辫子,纷纷加入革命军。

攻下沙湾以后,郑士良赶回部队,传达孙中山的命令,决定放弃夹攻新安县城的计划,转往厦门。原来,由于装运孙中山向彭西借来的军火的船只不能在广州靠岸,只得改道厦门。孙中山电令郑士良改变原定进军计划,转往厦门,以取得军火接济。

以后的几天里,革命军分三路向清军进攻,一路攻惠州府城,一路攻博罗县城,一路攻镇隆镇。惠州与博罗虽然未能攻下,革命军却在镇隆获得了胜利。15日,革命军逼近镇隆,手持戈矛者在前面,持枪的分左右两翼,乘清军不备,匍匐登山。一时呼声大起,清军慌乱溃退,斩杀了一个守备和几十名清兵,归善县丞兼管带被俘,此外还夺获枪支700多杆、子弹5万发。

两天以后,革命军又在永湖镇打了一次胜仗,俘虏清兵数百人、枪五六百支和子弹几万发。这一战中,清军的人数有五六



■ 惠州起义发源地三洲田



■ 山田良政

千，而革命军仅有 1000 人，以少胜多，足见革命军的气势。

革命军继续推进到黄沙洋、三多祝，沿途的百姓为革命军燃放爆竹，送来食物，热烈欢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入队伍，不久，革命军就扩大到 2 万多人。

清政府发现镇压没有效果，就改派广州起义时兴中会的叛徒陈廷威到香港劝降杨衢云和孙中山，孙中山一口回绝。

日本变卦导致起义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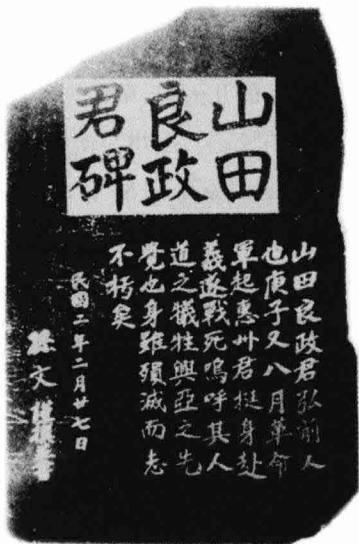
孙中山得知革命军连战连捷后非常高兴，立刻四处寻求援助。他给东京的宫崎寅藏发电报，催促他先将向菲律宾独立党订购的军火运到前线，同时又请台湾总督儿玉尽快履行先前的约定。可没想到的是，日本内阁改组，新任总理伊藤博文敌视中国革命，不许台湾的儿玉总督为革命军输送军械，也不准日本武官参加中国革命军，还禁止从日本出口军械。这时，孙中山又发现菲律宾志士采购武器上了当，他们买到的军械全是废品。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得命郑士良自行决定是否将革命军解散。

10 月 21 日晚上，革命军在三多祝东面的白沙镇驻扎，突然来了一位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他带来孙中山给郑士良的手令：“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决行止。”

郑士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解散徒手的同志，留下武装齐全的一千多人返回三洲田大本营，设法从香港取得接济，再联络新安、虎门的同志合攻广州。

回军途中，革命军想偷袭黄冈，但清军防备严密，而且革命军粮饷弹药缺乏，最终失利。郑士良只能解散队伍，自己和黄福等人返回香港，继而流亡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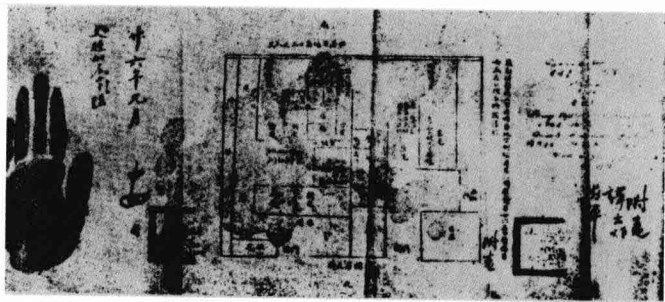
这次起义，革命党阵亡的将领只有 4 人，然



■ 1913 年 2 月 27 日，孙中山在东京参加追悼山田良政纪念会，并手书碑文表彰山田在惠州起义时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业绩



■ 史坚如



■ 广州清吏审讯史坚如的档卷

而不幸的是,山田良政在归途中和郑士良走散,他不认识路,加上语言不通,不久便被清军逮捕杀害,后来孙中山称其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当郑士良率军转战惠州时,史坚如和邓荫南正积极图谋在广州响应。可是孙中山筹集的起义经费已经都用于郑士良的军队,没有钱就买不了武器,也不能联合会党。

史坚如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想办法炸死两广总督德寿来支援惠州方面的军事行动。他在练达成、苏焯南和兄长史古愚的协助下,从房子底下开始掘地道,一直通到德寿卧房外的地下。可是炸药爆炸后,德寿宅后的围墙倒了一大段,总督被震得从床上摔下来,跌出几尺之外,却没有被炸死。

史坚如谋再炸德寿,前去总督府探听虚实,不料被侦探认了出来,当场被捕,押送到南海县衙门,受尽拷打,坚贞不屈。11月9日,史坚如英勇就义,年仅20岁。孙中山闻讯后非常悲痛,将他与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陆皓东并称:“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土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

惠州起义因日本态度变卦而功败垂成,但是义军转战南方,声势浩大,振聋发聩。人们由此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正在为推翻清王朝而奋斗不息。



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1900年是两个世纪相交的一年。对中国而言,1900年更有新旧交替的意义。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曙光已现

在1900年,国内三条大河的流域都发生了重大战乱。三个不同区域、不同形式的斗争,具有相同的目的,那就是拯救中国。

黄河两岸,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反抗西方列强。京畿的百姓站到了义和团的一边,希望通过赶走侵略者来挽救中国。然而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贸然向列强宣战,导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肆烧杀抢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是仓皇出逃,后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但是,义和团所表现的反帝爱国精神,使西方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美梦宣告破产。

长江流域,保皇党麾下的唐才常率领自立军宣称“勤王”起义,力图挽救夭折的维新变法。自从1898年慈禧太后扼杀了“百日维新”后,受到通缉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逃往日本。身处异国他乡的改革家们,仍然寄希望于光绪皇帝,盼着有一天能重回故土,继续施行未完成的变法革新,振兴中华。但是,起义的战火没燃烧多久,便遭到清政府无情的扑灭。唐才常的这次起义,为保皇党“救圣主”的行动写下了空前绝后的一笔。

■ 戊戌变法

1895年甲午战败,随之而来的是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组织学会、印发刊物,以“变法图强”为号召,掀起维新运动,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中国的近代化。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103天间,清朝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宣布变法,颁布维新法令,任用维新人士,推行新政。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血腥镇压而失败。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在珠江边,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更是插响了驱除鞑虏的战鼓,挥舞起推翻清政府的旌旗。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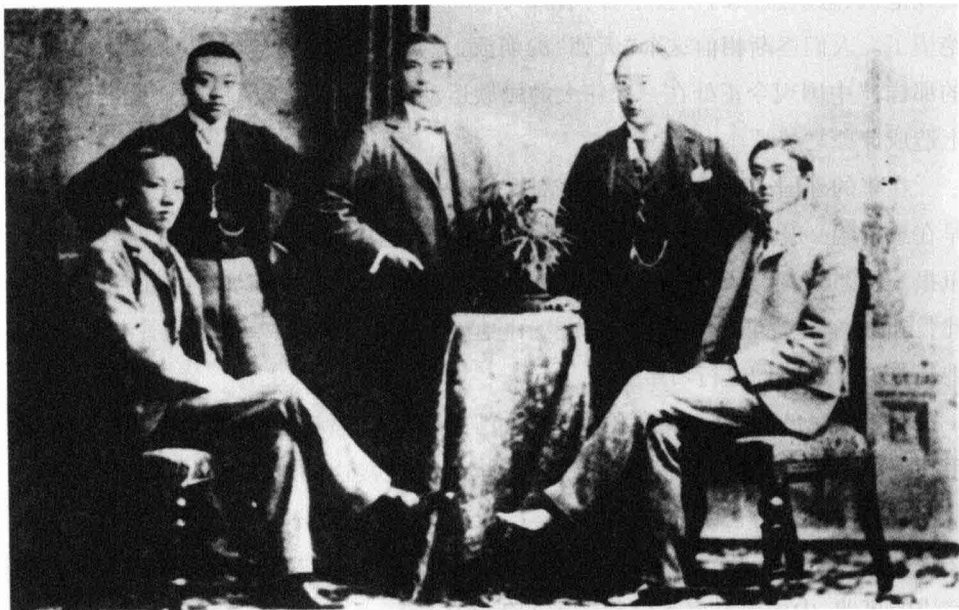
山游历西方,结交志士,博览群书。他眼见中国“扶清”、“变法”等一条条道路都是无法走通的死胡同,便领导革命志士,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再次发动反清起义,攻占惠州。这一回,比起5年前的那次起义来,声势更为浩大,依附的民众更多。可惜因日本对华政策改变,未能得到军火接济而功败垂成。但是,这种愈挫愈奋的精神,引来了世人的瞩目。

20世纪第一年的种种变故,就像东升的太阳在晨雾中渐现,昭示着苦难的中国正在从历史的尘埃中挣扎着走出,迎接那新世纪即将到来的独立、自由、民主的曙光。

革命风潮涌动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先进的中国人都因此开始觉醒。

后来,孙中山曾经将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后人们的态度作过比较。他说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视之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然而仅仅过了5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



■ 1900年冬,孙中山与起义失败的自立军骨干人物在东京合影(左起:尤列、唐才常、孙中山、秦力山、沈翔云)



■ 1901年9月7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左起：荷、日、比、奥、西、俄、德、英、美等11国代表；右起：中国代表奕劻、李鸿章）

人们渐渐明白，孙中山所领导的起义，是拯救中国的爱国行动。革命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孙中山从人们“差若天渊”的态度中受到激励，“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他清醒地看到，“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的确，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遭到了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屈辱的《辛丑条约》又在中国人民的颈项套上了新的枷锁，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让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政府绝望了。人们逐渐相信这个“天朝”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在华的外国人也开始对革命党刮目相看，把他们同以往的农民起义区分开来。早在惠州起义开始之初，英文报纸纷纷报道惠州起义的进展情况。此外，《香港电讯报》还报道了起义军纪律严明，各地人民欢迎革命者，主动提供饮食的情况。因此，当时的香港总督卜力也对起义表示同情，后来起义失败、革命者经香港避走时，港督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刁难。

有了人民的支持，孙中山的信念愈加坚定。他知道新的世纪已经来临，于是着手壮大革命队伍，宣传革命思想，募集革命经费，迎接这世纪的曙光。孙中山坚信，“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令不再来矣！”

孙中山乐观地断言，中国完成革命的进程不会久远，“日本人需要三十年才能完成的事业，中国人最多不会超过十五年之久”。



■ 1901年,孙中山在日本留影



钻研军事与作育人才

1901年春天,美国《展望》杂志的记者林奇看到海外报刊上关于惠州起义的报道,很感兴趣,于是在香港、广州遍访孙中山,希望与他会谈,但一直没能找到。后来,他听说孙中山已经返回日本横滨,立刻写信请求会晤。来到孙中山的住所时,他看到孙中山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书,书架上摆满了军事、政治、经济、历史类的英法文书籍。林奇仔细地看了看军事方面的著作,发现有最新出版的布洛克的《现代战争与武器》、格里利的《近击战术》等书籍,这些都是研究非洲布尔人游击战术的军事专著。此前,英军入侵非洲后,布尔人运用散兵战术和夜袭,以寡敌众,多次击退英军。孙中山在认真研究了布尔人的战术后,认为这“最适用于揭竿起事之中国革命军”。

见到了林奇,孙中山向他介绍起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他对革命者缺乏武器弹药深感遗憾,但确信一旦获得必要的装备,定能“很容易地把清朝军队击溃”。林奇发现,孙中山渴望再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惠州起义的失利,不仅促使孙中山认真钻研军事,而且使他意识到必须尽快培养军事人才,以适应再次发动起义的需要。几经准备,他终于在1903年创办了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这是一所秘密的军事培训班,学员有李自重、胡毅生、卢牟泰等10余人。学校聘请日本军事专家作教官,向学员传授军事知识以及械弹制造和布尔人的散兵战术。





■ 1901年4月,孙中山自日本横滨赴檀香山与流亡在此的家人团聚,并合影留念(中坐孙母杨太夫人,前立次女孙婉,左立子孙科,右立长女孙姬;后排左二起:孙眉夫人谭氏、侄儿细威、长兄孙眉、孙中山、夫人卢慕贞、侄女信霞)

除了日本,孙中山还很重视与中国接壤的越南。筹划惠州起义期间,他曾前往那里,当地中国移民人数众多,西贡及其附近的堤岸都是华侨聚居地。孙中山将这里开辟成革命根据地,辛亥革命前他领导的10次起义中有4次就是以越南作为基地的。而孙中山所参加的军事活动中,唯一一次他亲自发炮的镇南关起义,也正是从越南攻入中国的。

孙中山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辗转奔波,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他抱着“革命党人必须为民众而忍受一切苦难”的信念,为促成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奋斗。他满怀信心地宣称:“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祖国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15 联络学界 开导华侨

流亡海外的严酷现实和已体察到的有利形势,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不能拘囿于兴中会的小团体,必须从更宽广的背景思考中国革命,当务之急是大力组织革命力量。他在和好友尤列等讨论今后革命策略时,确定了“联络学界”、“开导华侨”的新方针。

联络日本欧洲留学生

20世纪初年,在甲午战败的刺激和学习西方思潮的鼓舞下,中国出现了留学热潮。其中,因为日本学西方有成效、离中国近、留学费用低,再加上清政府鼓励留学日本,派官费生赴日留学,所以留日的学生最多。据统计,从1896年第一批留日学生13人开始,至1905年增加到数千名。后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专供清政府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公派留美学生也多了起来,加上一些自费留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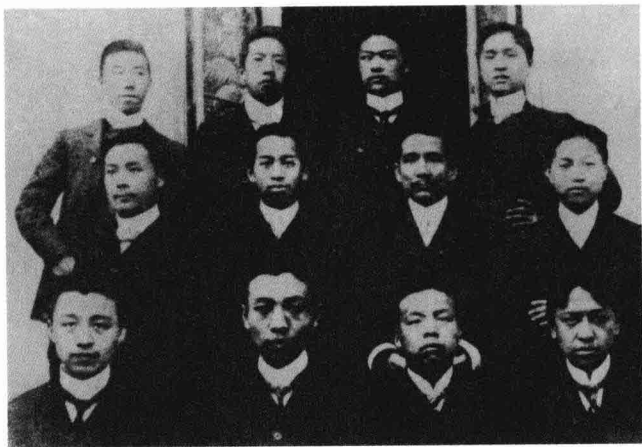


■ 1900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部分中国学生合影

1905年留美学生亦达数百人。这些留学生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纷纷创办杂志,鼓吹反清革命,并把革命刊物秘密输入国内,加速了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化。

1903年是近代中国政治觉醒的重要年代。国内一批深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纷纷倾向反清革命。他们撰写并出版革命小册子,大力宣传反清爱国和民主思想。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孙中山曾称赞邹容的《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并称:“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在革命宣传积极进行的同时,革命小团体也先后成立。主要有:1903年留日学生组建的军国民教育会;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领导的以湖南、湖北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华兴会;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以武备学堂学生和新军革命士兵、中下级军官为骨干的科学补习所;蔡元培、章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中枢的光复会等。新的革命力量的扩展,极大地吸引了孙中山的目光。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加入反清革命阵营,孙中山在海外广泛“联络学界”,积极结交留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在日本,他嘱托廖仲恺、何香凝“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1903年,湖广总督端方为消除学界的革命影响,决定将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



■ 1905年,孙中山与留欧学生合影



■ 邹容著《革命军》

派往欧洲留学。朱和中、周泽春等被派往德国,贺子才、魏宸组、胡秉柯等24名学生被派往比利时。这批学生由于受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革命著作的影响,决定从军、学两界入手,进行革命活动。湖北当局派他们出洋留学,正好为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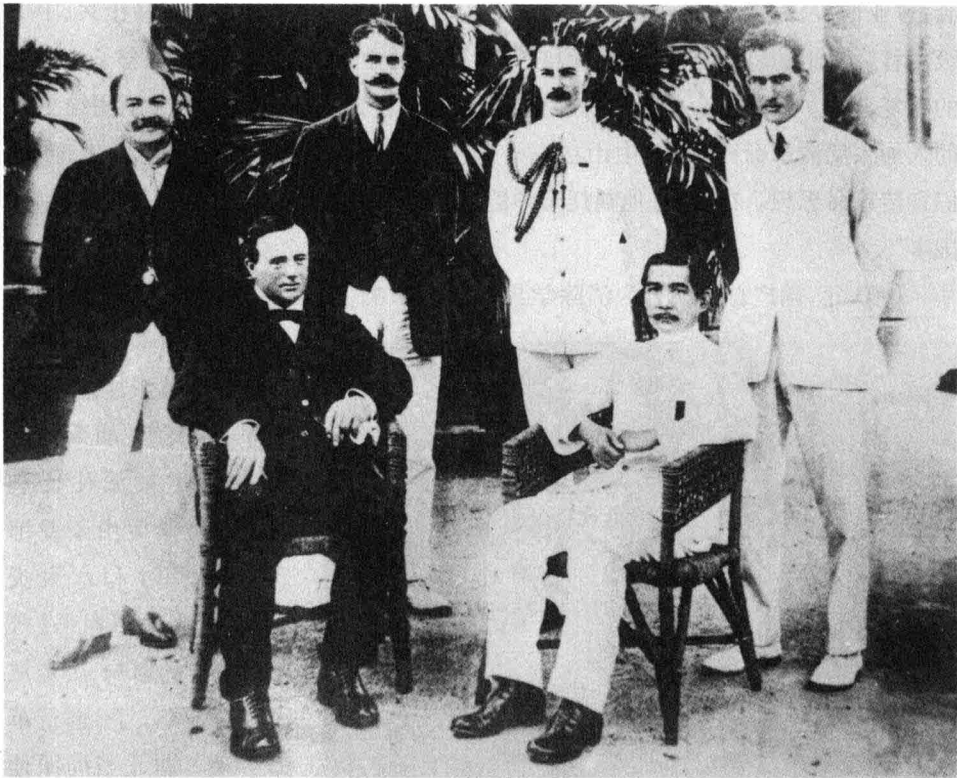


寻找、联系孙中山提供了机会。当时孙中山也有与留欧学生接触的想法,但苦于无旅欧经费。这批留欧学生途经上海时,结识了与孙中山相知的刘成禺,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孙中山的欧洲之行,以便与孙中山会面。

1904年12月下旬,孙中山到达英国伦敦,刘成禺即分别写信告知贺子才、朱和和,孙中山愿去比利时与他们相见,但“囊空如洗”,望“竭力接济”,贺子才、朱和中随即分别汇给孙中山3000法郎和1200马克,充作旅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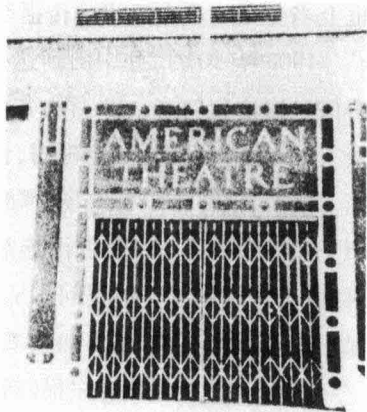
1905年1月上旬,孙中山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朱和和从德国赶往比利时,与贺子才等前往迎接。在胡秉柯寓所,孙中山与湖北籍留学生就革命方略问题进行交流讨论,由于对革命依靠力量问题产生分歧,讨论进行了三天三夜。通过交流讨论,确定了军、学界和会党“双方并进”,以留学生为骨干,领导新军和会党进行革命的方针。

确定革命方针后,在孙中山提议下,朱和和、贺子才、胡秉柯等30余名留学生组成革命团体,统称革命军。孙中山当即手书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交给贺子才、朱和中等,



朱和中接过誓词看后打趣说：“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今见誓词简老，书法道俊，知康梁之见忌而思毁之也。”孙中山笑答：“我亦读书破万卷也。”随后，孙中山教给他们与同盟党会面时的秘密联系手语和口号。

经朱和中事先安排，孙中山于1月下旬到达德国柏林，与留德学生讨论建立革命团体之事，除有3名学生因不赞成平均地权没有参加外，其余20余名留学生全部加入组织。2月初，孙中山赴法国巴黎，又组织10余名留学生加入。对留欧学生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孙中山感到非常兴奋。



■ 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对华侨进行革命演说的戏院旧址

开导华侨立志革命

中国人旅居海外始于唐宋，明初开始兴盛。清初曾一度实行海禁，闭关锁国，“片帆不准下海”。康熙年间，海禁废除后，中国人，特别是广东、福建沿海居民纷纷出国谋生。到1907年，华侨大约有730万人。华侨在居住国虽然为当地的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当地政府和殖民统治当局对华侨排挤乃至无端迫害、屠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华侨非常希望有一个能为他们说话、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海外华侨强烈渴望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以改变他们受人欺逐的软弱地位。祖国的命运和他们息息相关。

孙中山开展革命事业，最初就是从海外华侨开始的。1894年，他联络部分檀香山华侨，建立起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的经费，就主要来自檀香山华侨。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政府通缉，很多华侨不敢和他交往。孙中山不得不隐

姓埋名，非常艰难地在美洲、南洋进行革命宣传。

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海外，两三年间，海外各地广大华侨都汇集到康、梁的“保皇救中国”旗帜下，在各地华侨社会中建立了保皇会组织，檀香山兴中会有不少会员被拉了过去，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 1904年10月出版的《檀山新报》

15

联络学界
开导华侨

75



也上当受骗。革命思想的传播受到了极大阻碍。

1903年10月,孙中山到达檀香山,开始重新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反击保皇谬论和勾当。11月上旬他到希炉,先组织“中华革命军”,首批入会者有10余人。入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接着,他在希炉各农场、耶稣教堂、洪门组织联兴会馆等处发表演说。从12月13日开始,孙中山在檀香山连续演讲三天,每次演讲听众都在千人以上,演讲结束,留出时间回答华侨提问。从此,华侨知道了革命与保皇是“名殊途异”,曾误入保皇会者纷纷退出,要求加入革命组织。

1903年底,为反击保皇报《新中国报》的攻诋,建立革命宣传阵地,孙中山改组了华侨程蔚南办的《檀山新报》,并发表《敬告同乡书》,引起了保皇派的恐慌,保皇会人著文攻击孙中山。孙中山于1904年1月又在《檀山新报》发表《驳保皇报书》,进行回击,批驳保皇派“革命必召瓜分”的谬论,指出清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鹰犬,“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并揭穿了保皇党人鼓吹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邪说,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论证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权,要先打破常规,先破坏专制,然后“一棹而登彼岸”。

改组美国致公堂



■ 1904年3月,夏威夷政府发给孙中山的出生证明

孙中山在檀香山完成了华侨的组织宣传工作后,准备去美洲继续清除保皇思想在华侨中的影响。为便于开展工作,经旧金山洪门首领黄三德介绍,孙中山于1904年1月11日在檀香山致公堂国安会馆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之职。同时为方便入境美国,在其兄孙眉、舅父杨文纳帮助下,于3月9日领取了檀香山出生证。3月13日,孙中山领到美国岛居人民所持护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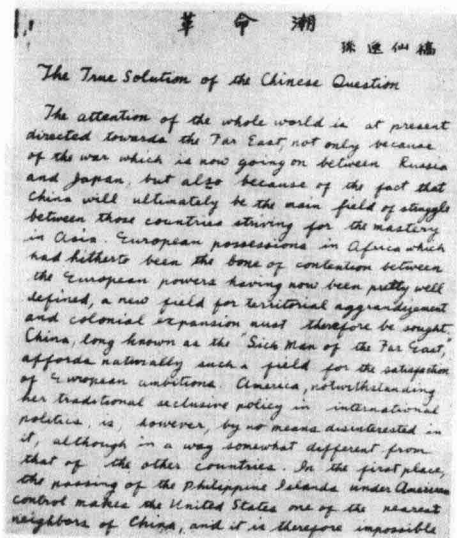
1904年4月6日,孙中山到达旧金山,因保皇党从中作梗,被美国移民局拘禁,经黄三德等奔走相助,28日方获准入境美国。

旧金山是美国加州保皇会总部,亦有保皇会机关报《文兴日报》,保皇会员约有万人,对

华侨影响很大。孙中山反击保皇会的斗争就从旧金山开始。首先,他委托《中西日报》印刷邹容的《革命军》11000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侨胞,以广宣传”。其次,劝说黄三德和《大同时报》总经理唐琼昌改组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换掉保皇派总编辑欧榘甲,由刘成禺接替,使《大同日报》成为全美宣传革命、反击保皇派的言论阵地。第三,征得黄三德同意,修改致公堂章程,实行全美会员总注册,把致公堂“反清复明”的宗旨修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孙中山、黄三德推动下,全美10多万会员绝大部分都按新的章程

进行注册。第四,在黄三德陪同下,孙中山先后到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费城、芝加哥、西雅图等20多个城市进行演讲,并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发动华侨支持革命。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所作演讲鼓舞人心。曾有媒体撰文评论孙中山的美洲之行:“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而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

孙中山通过“联络学界”、“开导华侨”的活动,团结了革命力量,宣传了革命思想,使革命阵营得以扩大和巩固,同时也确立了他的民主革命领袖的地位。



■ 1904年8月,孙中山在美国撰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英文手稿



16 组建中国同盟会

1903至1905年,革命思潮勃兴,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形势的飞速发展,使孙中山顿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他觉得必须抓住有利形势,尽快组织一个革命大团体。这就需要与流亡日本的志士及留日学生沟通思想,磋商讨论,以达成组建大团体的共识。

初识黄兴于东京

1905年6月,孙中山由法国启程,乘船经新加坡、越南西贡,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这时,中国留日学生已有数千人,数量远远超过欧美,日本已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策源地。这些留日学生多以家乡、省区形成各种革命小团体,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孙中山的到来受到留学生的热烈欢迎,革命出现新的转机。

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国内一些革命团体的领导人流亡日本,一时间日本东京成了中国革命党人最集中的地方。孙中山抵达欧洲之时,黄兴在日本联合各省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同志会。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在东京经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孙中山和黄兴在中国餐馆风乐园一见如故,不拘礼节,约有两个小时,一直都在商议国家大事,动箸很少,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随后,孙中山又在东京约见了杨度、邓家彦、宋教仁、



■ 1905年,流亡日本的黄兴赠给日本友人的自题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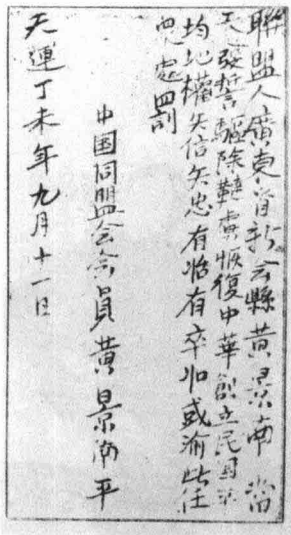
■ 1905年,华兴会会长黄兴与部分同志在日本东京合影

陈天华等。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受到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宋教仁记述:“孙逸仙所以迟迟未敢起事,以声名太大,凡一举足皆为世界所注目,不敢轻于一试。”“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

7月28日,在东京黄兴寓所,华兴会成员讨论“参加孙逸仙会事”,即考虑参加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组织。当天,革命党人召开筹备会议并商定新建组织的名称。孙中山主张定名为“中国革命党”,黄兴觉得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讨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召开预备会议

7月30日下午,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桢、胡毅生、马君武等分头通知,邀集10省留日学生70余人在东京黑龙会会址集会,共同商讨筹建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这是中国革命者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聚会。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并作了一个小时的演讲,阐明了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倡议下,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各人自愿参加组建新的革命团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的革命政党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字。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提议“对满同盟



■ 1907年，同盟会会员入盟书

会”，孙中山认为：“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经过一番讨论，“中国同盟会”的名称最终确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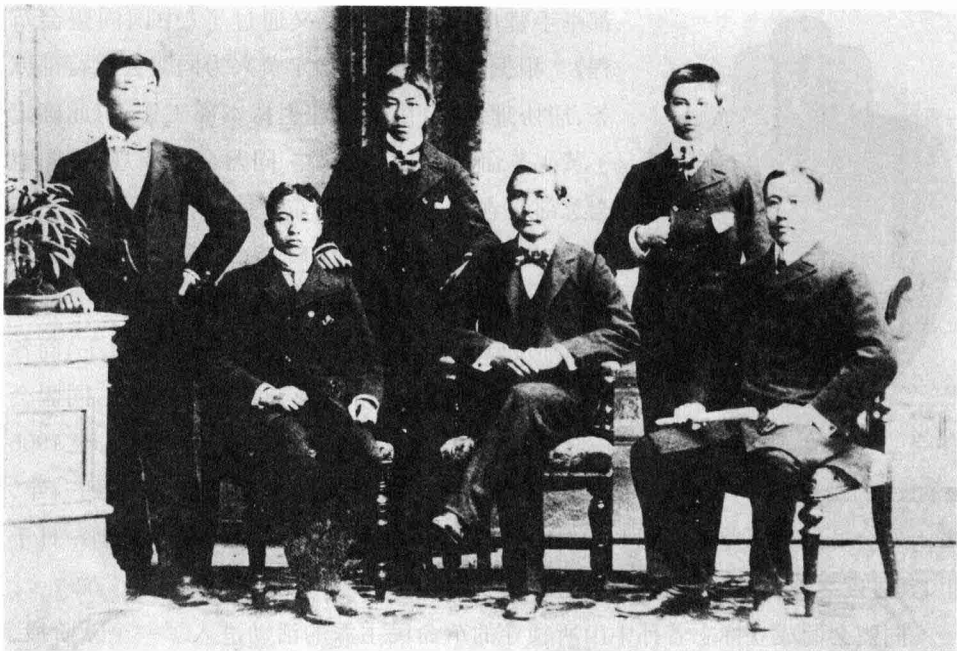
接着，孙中山提议该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很多人对“平均地权”持有疑义，要求取消。孙中山当场演讲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历史及其趋势，说：“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虽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不可不防微杜渐，以谋人民全体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又说：“不当专问种

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对他的演讲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曹亚伯首先表示愿意签名。遂由孙中山起草盟书，黄兴和陈天华审定。盟书为：“联盟人，省府县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 日中国同盟会会员○○○。”与会人员各自书写盟书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孙中山带领大家一起举右手宣誓。由于同盟会还没有成立秘书处，孙中山决定会员盟书由他暂为保管，而他自己的盟书则由大家推举黄兴保管。

之后，孙中山到另外一个房间分别授予会员同志相见握手的暗号以及秘密口号，问：何处人？答：汉人。问：何物？答：中国物。问：何事？答：天下事。并与会员一一握手礼，欣然道喜：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满朝人矣。话一说完，房间后面的木板突然倒塌，见此情景，孙中山说：这是颠覆清政府的预兆啊。大家都鼓掌欢呼。这次会议还推举黄兴等8人为章程起草人员，约定下次开会时提出。

充满激情的演说

8月13日，孙中山出席了日本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大会。开会时间定于下午1点。日本警方限出席人数为900人，由于东京留学生都想一睹孙中山风采，上午11点，可容纳1000人的会场即已爆满，日本警吏封门，迟来的数百人只好站在街



■ 1905年,孙中山和尤列(右坐)、侄儿孙昌(左坐)等在日本东京合影

道侧边仰观会场。这次大会留学生人数众多,人员整齐,是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之最。大会由宋教仁致欢迎词后,孙中山发表演说,他首先感谢留学生的盛情欢迎,接着叙述环游全球经历以及中国和留学生的变化。他说,往年我提倡民权主义,和者寥寥无几,曾几何时,民族主义一日千里,现在到处都谈论革命的必要性,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他要求留学生担当起革命的重任,为四万万同胞和子孙后代造福。孙中山的演讲,众人鼓掌不绝。最后有数名留学生登台演讲,赞扬孙中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表示只要人人以孙中山的意志为意志,以孙中山的行为为行为,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演讲将欢迎大会推向新的高潮,他说,他倾家以谋中国之革命,盼的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看到今天的情况他非常高兴,中国的革命一定能成功!参加欢迎会的留学生陈天华撰文谈他对孙中山的印象时说:“吾敢下一断辞曰:(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

东京建立同盟会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国内17省代表共100余人列席了会议。大会首先公推孙中山为总理。此为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代表

第二,同盟会在组织方面具有近代政党的形态。它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采取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由会员每四年选举一次,彻底消除了会党的封建宗法习气。

第三,同盟会员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的加盟,增强了同盟会的能量和活力,同时也密切了同盟会与国内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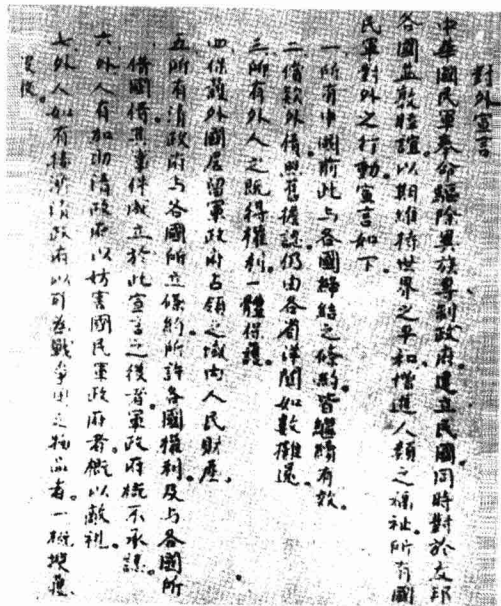
第四,在同盟会内部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核心。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并集

聚了宋教仁、蔡元培、章太炎等一批较有威信和革命经验的领导人。

第五,同盟会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方针政策。1906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和《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8个重要文件。《革命方略》已成为革命党人在斗争中所遵循的准则。

第六,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除同盟会本部外,下设支部和各省分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先前一些革命团体的地域性和分散性,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枢。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确认同盟会的成立是开了革命的新纪元。他满怀信心地宣称:“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 《革命方略》中的《对外宣言》



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4句话16个字是孙中山提出的，最早在1903年创办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时作为学生入校的秘密誓词，后来在1904年改组美洲洪门致公堂时用作该堂宗旨。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时，经会员一致通过，成为同盟会纲领。从此，中国革命民主派以孙中山为旗手，为实现同盟会纲领而不屈不挠地进行艰苦的奋斗。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推翻清政府，光复民族的国家。

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一开始就是在“反满”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清军入关后，满洲贵族以征服者自居，对汉族广大人民和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例如，旗地、旗房、旗人财产继承权等均受到大清律例的特殊保护，满人犯罪可享受“减等”和“换刑”的特权，甚至连诉讼也自成系统，专门设立了审理满人的司法机关。在满洲贵族的统治下，中国实际上成为了民族牢狱。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对原先被称为“鞑虏”的满洲贵族俯首称臣，一直心有不甘，民间“反清复明”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满”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各革命团体无不以“反满”为旗帜。如，孙中山等人成立的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创立





■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留影



的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成立的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纲领之一,领导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统治,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是顺应民心,得到反对清政府剥削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是消灭满族人,而是推翻满族统治者(其中也有汉人)所建立的腐朽政权;也不是建立汉族统治的种族政权,而是建立“五族共和”的中华共和国,实现民族平等。因为清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已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与清王朝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满”主张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作用,即为明证。孙中山非常明确地指出:“清政府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也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垂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同于“反清复汉”、“反清复明”,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趋势,包含了避免瓜分的救亡内涵。同时,也融会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桎梏的要求。严峻的事实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在对外意义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无疑是主要的,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在对内意义上,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压榨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因而,多民族的国家成为一个民族上层“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不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未把最突出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放在民族革命的首要地位,终究是具有消极意义的。孙中山在后期活动中改变了这种缺陷。

创立民国

“创立民国”就是推翻君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推翻清王朝后,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的国家?这是摆在革命民主派面前的必须思考、抉择的大问题。早在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的人宣誓词中,孙中山首先提出了“创

■ 邹容
(1885—1905)

原名绍陶,四川巴县(今重庆)人。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1903年5月在上海撰写《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许,大力鼓吹革命,揭露清廷卖国罪行,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苏报》案”发生后,自投英租界监狱,1905年死于狱中。1912年3月被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



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因为美国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所以“合众政府”是共和国的代称。但“合众政府”一词的含义还较模糊。在革命派中,第一次把民主共和国方案说得最具体的是年轻的革命家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稍后,孙中山在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的人校誓词中也提出了

“创立民国”的主张。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表演说,明确表示要“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宣告以建设共和国政体来实现国家政体的改造,以反对保皇派鼓吹的君主立宪政体。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把“创立民国”作为纲领之一,得到了全体会员的拥护。

所谓“民国”,孙中山简要解释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平民革命,“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者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创立民国”提出以共和制度取代绵延2000余年的君主制,无疑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是以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为核心,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中国历来是个以农立国的农业国,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民最根本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土地绝大多数被地主占有。推倒清政府后,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怎样解决土地被少数人占有,让农民拥有土地,从而发展生产,推进社会建设?这一直是孙中山朝思暮想、着重关注的大问题。早在留居英国伦敦时,他看到了号称富强的欧洲各国,由于贫困悬殊而面临的社会革命阵痛,触发他思考祖国未来社会的改造。他努力寻求一种能在政治革命成功后避免两极分化,防止社会革命于未然的办法,开始从土地问题入手思考未来的社会改造。他服膺亨利·乔治的理论,后来又同章太炎等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1903年,他终于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把“平均地权”作为纲领之一。其内容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和按价收买四个相联系部分,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后产生新的社会危机。孙中山对平均地权作了这样的说明:“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科学的民主革命纲领,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富强的愿望,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动员全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统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亨利·乔治 Henry George
(1833—1897)



美国土地改革论者和经济学家。幼年家贫,未满14岁便辍学做工。后从事报业工作,竞选过美国纽约市长。代表作为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迎合了当时人们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不满情绪,大受欢迎,被译成多种文字。1896年孙中山接触该书,受其影响,形成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自称:“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国人亨利·乔治之单税论”,认为单税法、土地国有最适宜中国社会经济之改革,并在民生主义论述中多次征引其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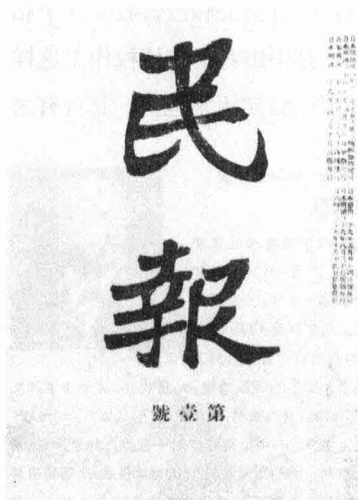
18 “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是在发刊词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从而鲜明地竖起了三民主义的光辉大旗。

民族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它的基本内涵是反对外来民族统治,争取本民族独立。孙中山说:“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因此,“反满”的关键就是夺取政权,即推翻清政府,建立“民族的国家”。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只有将民族主义与夺取政权问题结合起来,建立真正的“民族的国家”才是民族独立的标志。这样,孙中山就扬弃了带有封建“宗法”色彩的单纯的种族复仇主义思想。

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推行的民族政策,造成了它同汉族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坚持以民主主义精神处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关系,认为任何民族无论大小,均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应当受到歧视和排斥,必须实现民族平等。即便是满族也不例外,他一向把“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的主张视为“大错”。革命党人“并不是恨满人,是恨害汉人的满人”,对于满族“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反满”实为“反清”!



近時雜誌之作，亦夥矣。跨詞以爲美，聽而無所終，摘遺索，不獲則反響其詞，而自惑求其辭，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况夫孤懷宏識，遠矚將來者乎？夫結羣之遺與羣俱進，而擇別取舍，惟其最宜。此羣之歷史，既與彼羣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爲輿論之母也。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民權、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自治，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休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間。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十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々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播場時代也。三大主義皆基於民，民運變

■《民報》發刊詞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进一步淡化了“反满”情绪。他认为，由于“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其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而“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当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起“民族的国家”后，关于汉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孙中山宣扬“五族共和”。他主张在未来的共和国家中，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应“立于平等地位”，“在昔之受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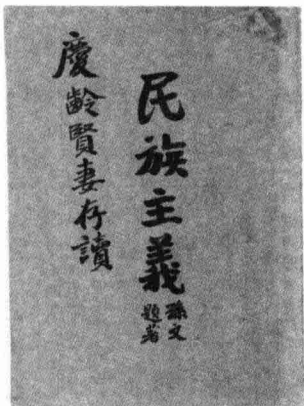
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以“五族共和”思想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构成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后来，他又提出“种族同化”主张。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近代中国社会交织着双重民族矛盾：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在对内意义上又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外国侵略者把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者当作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而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者则把侵略者引为靠山。按照客观现实的需要，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内外两个敌人：对内推翻清王朝统治；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力谋国际平等。

为什么要革命？孙中山曾在《孙文学说》中回忆，自中法战争中国失败之后，他始决意倾覆清廷，创建民国。当时人们起来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刺激，革命是以避免中国被瓜分鲸吞为主要出发点的。孙中山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踏上革命道路的。在香港兴中会宣言中，孙中山开宗明义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而“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奋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



孫中山



■ 1924年，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民族主义》

从此沦亡，由兹泯灭”。因此，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无疑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又一基本内容。

至于如何避免“瓜分”、“共管”厄运呢？孙中山的答案是明确的，即“先倒满洲政府”！孙中山从这里引申出了“反满”，即否定现存政权的重要结论。只要打倒了清政府，就是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背后的帝国主义者，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中国过去的屈辱，皆因统治集团的腐败而自招其祸；推翻清廷后，建立一个新的中华民国必然将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个新国家，为各族人民所共有。所以，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就是美国总统林肯所主张的“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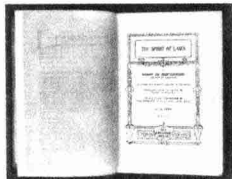
民权主义

“创立民国”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其基本内涵就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认为，推翻清朝政府，从驱除满洲贵族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是平行并进的，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不是分成两次。因为，推翻清朝政府不等于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反满的民族革命要结合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的需要。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实践中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了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相辅相成的两大支柱。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所以要实行民权主义，通过“国民革命”的手段推翻毒害中国的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准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孙中山后来还揭露和批判了成为官僚、军阀和政客之“三专制政治”的假共和，要求实现真正的共和。

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大体仿效西方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通过选举产生建立的，“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由

■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

孙中山藏书。译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法文原著，美国克罗尼尔出版社1900年出版。孟德斯



鸠积14年努力于1748年完成《论法的精神》一书，提出了著名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影响巨大，成为公认的政治理论和法学史名著。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就是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为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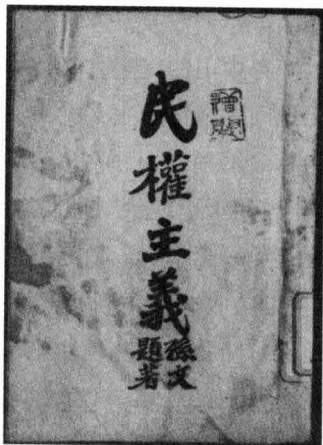
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共和国政体的建设要经过三个相关联的阶段,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放弃了他早年主张的联邦共和制,主张按照五权宪法原则建立总统制式的共和政体。1906年他在《民报》创刊周年演说中谈到民权主义时,强调要防止革命派内部相争、各据一方,造成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他认为革命党人如果存有帝王思想,就会导致亡国。

孙中山民权主义中一个创造性的内容就是“五权宪法”,即在学习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把对官吏的“考察权”和“纠察权”独立出来,形成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选权、纠察权五权分立的宪法体制。他认为共和制度中的国家官吏,都是人民的公仆,美国过去对官吏的选拔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选举和委任的方式,结果造成政治上的腐败与散漫。“所以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握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对于官吏的监督弹劾,在西方立宪各国都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因此生出无数流弊。从理论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员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理论上说不上去的,故此机关也要独立。”孙中山指出,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孙中山自己认为,他发明的这个五权分立的政体架构,条理不够详细、结构也不完整,希望大家好好研究,使之成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五权宪法论,可谓是一个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

民权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政治革命”的旗帜,孙中山把它概括为美国总统林肯所主张的“民治”。

民生主义

人类历史上最重大、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孙中山认为是民生问题,他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关于民生,孙中山有过很多解释,其核心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存与发展。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而苦苦思索的智慧



■ 1924年,孙中山题著《民权主义》



结晶。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平均地权”,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在民生主义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03年孙中山就把“平均地权”列为革命纲领之一,而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完整地表述了“平均地权”的内容:首先“核定天下地价”,即要求土地所有者报告地价,价高则税重,价低则税轻,因此能避免以多报少或抬高地价的弊病;然后“照价收税”,贵地税多,贱地税少;接着再“照价收买”,由国家实行“土地征收权”,惩罚少报地价的土地所有者;同时“土地涨价归公”,防止地主坐享其成。因为,土地涨价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地价是资本主义化的地租,只有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才能使“社会发达”而“公家愈富”。因此“土地涨价归公”在“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方案中居于关键地位。孙中山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指出:“平均地权”不是把土地“从实分配”,“土地国有”也不是把土地“尽归所有”,而是将增加了的“土地价值”转化为人民的财产,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这才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真谛。

“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思想,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长期在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缺地、少地,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土地。而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所以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所以,农民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和农民“分头合作”才能实现革命目的。要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土地国有”革命纲领。

在孙中山看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只有“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才能防止垄断,同时还能给社会全体成员带来福祉,“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他认为:“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

非耕者有其田不可。”“耕者有其田”成为民生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最后归宿。

民生主义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即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称

■ 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自学成才。历任售货员、土地测量员、邮政局局长、律师、州议员、联邦众议员。美国第16任总统(1861—1865),结束南北战争,统一美国,废除奴隶制度。1865年4月14日被暗杀。“民有、民治、民享”是他在1863年11月19日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的。孙中山认为“民有、民治、民享”就是自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多次称赞林肯为“伟人”、“圣人”、“雄才大略的大总统”。



为“国家社会主义”。他说：“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物，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并把国家资本企业所获得的利润，由人民共享，以此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他指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可“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在孙中山看来，“节制资本”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十分理想的“实业化”道路。一方面，它能避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文明的恶果”，“为四万万人民谋幸福”；另一方面，它又是迅速摆脱贫困、实现国家近代化的有力手段。以铁路和煤矿为例，孙中山指出：“少数富豪投资，全社会受其制裁，价格之高下，不得不听其垄断。不能推广，难以发达。”而“如能合全国之资力，分头开采，并多铸铁路，以便转运，能如是则民富矣”！在孙中山看来，垄断是很可怕的灾难，“一国之需要皆取给于数托拉斯，一国之民生权遂为数托拉斯所握”，所以他反对私人占有的托拉斯，却盛赞“人民公有”的托拉斯，因为“大公司能节省浪费，能产出最廉价品物，非私人所能及”。此外，孙中山认为“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之血汗所构成”，工人“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然而，工人却受“强有力者之虐待蹂躏”，甚至“有功于资本家而反受资本家之戕贼”。因此，出于对无产者利益的关怀，也必须“节制资本”和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以“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所以，他把民生主义概括为美国总统林肯所主张的“民享”。

“民有”、“民治”、“民享”，这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最简要的、本质性的概括，“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



■ 1924年，孙中山题著《民生主义》



19 扫荡“保皇邪说”

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驻日公使杨度认为孙中山在日本一天,留学生一日不得安宁,于是敦促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在此形势下,孙中山只好离日赴越南等地发展同盟会会员,在越南西贡、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处组建同盟会分会。同时,又领导革命派对保皇派展开针锋相对的大论战。

同盟会成立前的论战

在传播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的进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了来自保皇派的攻击和阻挠,他们散布的保皇思想严重阻碍了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和革命阵营的扩大。为了让更多的华侨和有志青年加入革命的行列,从1903年起,在海外流亡的孙中山赴檀香山开始扫荡“保皇邪说”之行。

保皇派,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反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保救光绪皇帝而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当维新派流亡日本时,曾一度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谋求合作,但由于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双方谈判破裂。1899年,康有为流亡到加拿大,干脆组织“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先后在美洲、日本、南洋(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澳洲等地建立总会11个、支会140余个。康有为任正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总部机关设在澳门《知新报》。加拿大保皇会成立

■ 康有为 (1858—1927)

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生,晚年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早年即萌生变法思想,1895年入京参加会试,发动“公车上书”,成为戊戌变法的领袖。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拒绝与孙中山见面,反对与革命派合作,后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主张尊君保皇,反对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认为共和政体不适用中国,之后鼓吹孔教,参与张勋复辟活动,晚年到处讲学,在宴请宾客席间常非议孙中山。著有《大同书》、《戊戌奏稿》等。



后,曾发动过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勤王起义。起义失败后,更大力在华侨中鼓吹保皇立宪,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争夺华侨。于是双方展开了革命还是保皇的论战。

康有为于1902年炮制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书》,很多华侨,尤其是上层人士纷纷加入保皇会,期

望将来能够得到清廷重用,混个一官半职。当时,梁启超暗中授意檀香山的《中国新报》和旧金山《文兴日报》,大肆进行“保皇不过借名,实亦革命”的蛊惑性宣传,很多华侨、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内,都被蒙蔽,投入保皇派的队伍,檀香山兴中会甚至因此而陷于瓦解,横滨的一些兴中会会员也都转向了保皇派。

面对保皇派的猖獗、特别是梁启超挖兴中会墙脚的做法,孙中山非常气愤,决定进行反击。孙中山反击保皇党、宣传革命的方法之一是口诛,即发表演说。他于1903年赴檀香山,在希炉、火奴鲁鲁等埠的演说中,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呼吁人们颠覆清政府,建立民国。他的演说每次长达两三个小时,在各埠的演说都受到群众的欢迎,当地的《英文早报》勾勒他的形象道:“孙逸仙穿白色麻织西服,短发蓄须,雄辩滔滔,态度温和,确是一位有吸引力的演说家。”

孙中山反击保皇党、宣传革命的办法之二则是笔伐。孙中山到檀香山后,就改组《檀山新报》作为兴中会机关报,并亲自撰写文章反击保皇党对革命派的攻击,指出革命和保皇的本质区别。1903年12月和翌年1月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篇文章,揭露康有为、梁启超之流借“革命”之名,行“保皇”之实的伎俩。《敬告同乡书》一文明确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很快,檀香山4岛中有两个岛的保皇谬论被大体扫荡干净,很多华侨纷纷登报声明脱离保皇党。

在旧金山、纽约等地,华侨也被康梁等的宣传所蛊惑。1904年4月底,孙中山抵达旧金山不久,即改组《大同日报》社成为革命派在美国的言论机关,与保皇派展开论战。孙中山在纽约的华人戏院演说反清革命,抨击保皇邪说,听众很多,座无虚席,其中很多是保皇会会员。当时,康有为门徒欧榭甲正在纽约鼓吹保皇,也借此戏院进行演讲,反驳孙中山。第二天,孙中山再次来到戏院与欧氏互相辩论。论战一连进行了10天,使得多数华侨明白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很多保皇党人纷纷转向革命派。孙中山在美洲打击保皇势力取得很大成效。



■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驳保皇报书》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

如果说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同保皇派的思想交锋还是前奏,同盟会成立后的大论战,则更为激烈、尖锐和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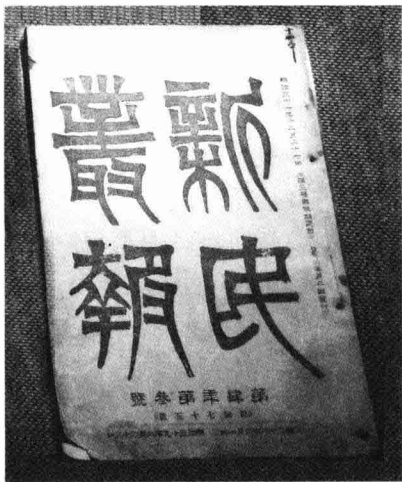
从1905年开始,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为阵地,通过对《新民丛报》的论战,有力地批驳了以梁启超为主要喉舌的保皇党散布的各种谬论,揭穿了他们的狡诈伎俩,丰富和发展了三民主义,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

同盟会成立时,决定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定名为《民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东京创刊。《民报》一成立,立即担负起宣传革命民主思想的重任,在孙中山的亲自领导下,掀起了对保皇党的大论战。《民报》发刊词上,孙中山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成为与保皇党论战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民报》初期的主编是张继,撰稿人有朱执信、宋教仁、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等。他们都是热血沸腾、文才出众的革命青年,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探幽析微,文采斐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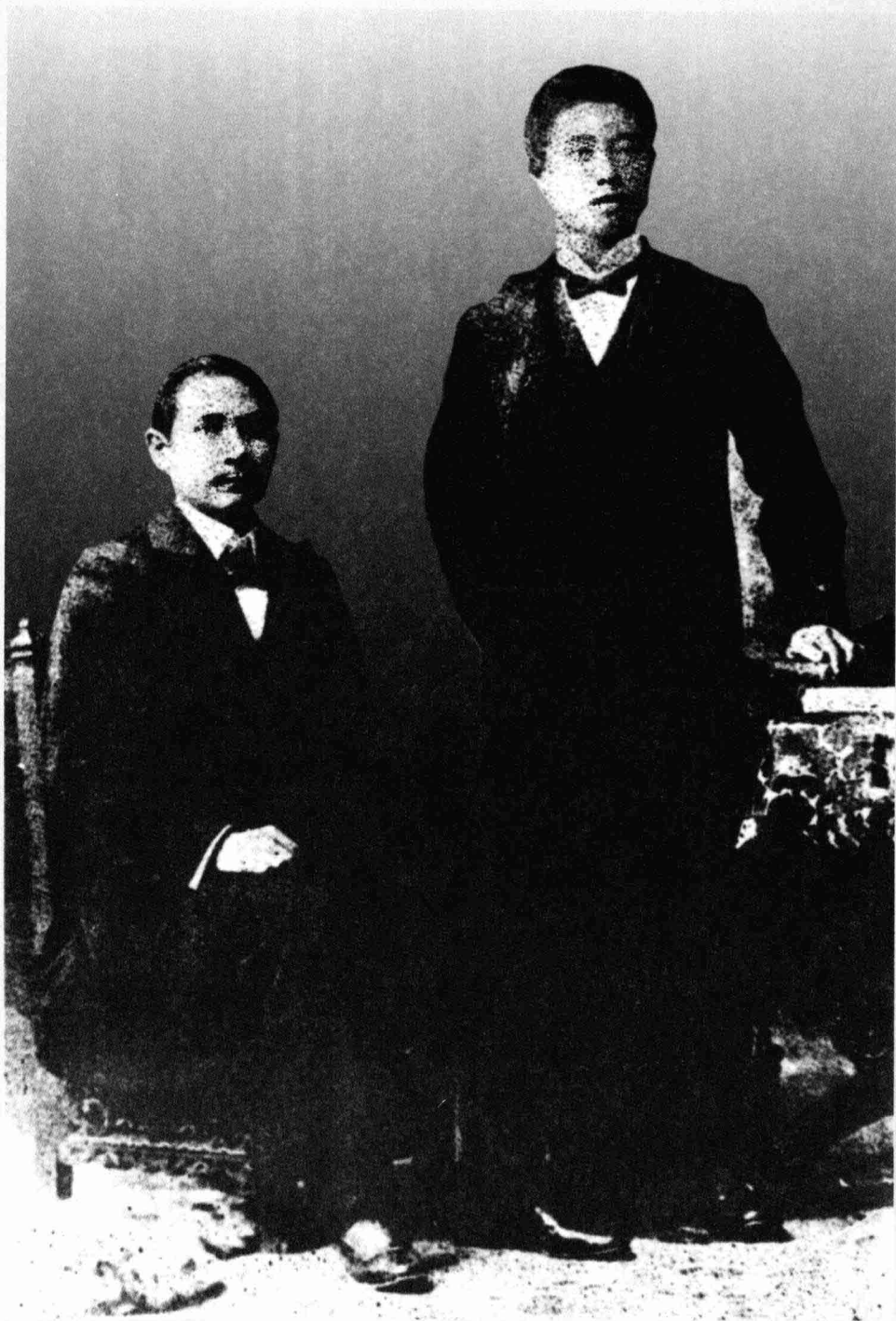
保皇派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阵地,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挑起了两派的论战。

为了明辨是非,反击保皇谬论,1906年4月28日,《民报》第三号发行号外(增刊),提出与《新民丛报》辩驳的12条纲领,标出两派的根本分歧所在。两派的论战正式开始。



双方论战的内容主要集中为三点:一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二是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三是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实行土地国有。

第一个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新民丛报》认为,革命必定会造成流血,四万万人“必残其半”;革命会招致列强乘机瓜分中国。《民报》认为,古今中外,凡是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大都要经过流血牺牲,革命的目的是“保国存种”的仁



■ 1904年,孙中山与侄儿孙昌在檀香山合影



孫中山

民報第三號外

民報與新民叢報辨駁之綱領

近日新民叢報將本年開明專制論中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諸語。合刊為中國存亡一大問題。本報以為中國存亡誠一大問題。然使如新民叢報所云。則可以立亡中國。故自第四期以下。分兩期。期與我國國民解決此大問題。並先將辨駁之綱領開列於下。以告讀者。

- 一 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
 - 二 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制。
 - 三 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
 - 四 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故鼓吹教育與革命以求達其目的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 五 民報主張政治革命同時主張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主張政府開明專制同時主張政治革命。
 - 六 民報以為國民革命自顛覆專制而觀則為政治革命自驅除異種而觀則為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以為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 七 民報以為政治革命必須實力新民叢報以為政治革命祇須要求。
 - 八 民報以為革命事業專主實力不取要求新民叢報以為要求不遂繼以密警。
 - 九 新民叢報以為密警之法在不納租稅與暗殺。民報以為不納租稅與暗殺不過革命實力之一端。革命須有全副事業。
 - 十 新民叢報詆毀革命而鼓吹虛無黨。民報以為凡虛無黨皆以革命為宗旨。非僅以刺客為事。
 - 十一 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
 - 十二 民報鑒於世界前途。知社會問題。心須解決。故提倡社會主義。新民叢報以為社會主義。不過煽動乞丐流氓之具。
- 以上十二條。皆辨駁之綱領。民報第四號刊日出。其中數條。皆已解決。五號以下。接續辨駁。請我國國民。心及決之。

日本明治廿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號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日本明治廿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民報》第三号外刊登的革命派同保皇派论战的提纲

事,决不是屠杀百姓。《民报》宣称:只要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就不会因造成内乱而招致瓜分。同时,进行“有秩序的革命”,即符合国际法,可免于列强干涉而招致瓜分。

《新民丛报》认为,清政府虽然是满洲人建立的,但二百多年来,满汉已经同化,况且今天的光绪皇帝也愿意改革,实行过维新变法,所以这样的政府不能推翻。《民报》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极端反动腐败的政府,处处与国民对立,已不可能指望它进行任何改革;光绪皇帝“不辨菽麦”,清朝大臣“廉耻丧尽”,清王朝对内政策是“防家贼”,对外政策是“利列强”,这样的政府已经“绝无可望”,完全成了“国民的仇敌”,非推翻不可!

第二个问题,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新民丛报》鼓吹中国人民由于长期处在专制政体之下,既没有自治的习惯,又不懂得团体的公益,“只知各营其私”。这样的民智程度,根本不能通过革命建立共和,甚至连“立宪”的资格也不具备。梁启超认为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然后顺序“拾级而上”,由开明专制而君主立宪,10年、20年后,再由君主立宪进到民主共和,所以目前“只可立宪,不可革命”。

《民报》针锋相对地指出:“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也。”革命派以天赋人权论为武器,宣称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普通性也”,共和政体正是植根于这

种人类的天性,本乎此精神的政体,而革命又必能激发这种天性,加上又有西方各国已经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参照,国民一定会很快具有实现作民主共和制度下的公民的资格。《民报》根据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批判梁启超由开明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民主共和,次序井然,“不能躐等”的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开民智。既然梁启超的“拾级而上”承认最后也要实现民主共和,那何必还一定要先君主立宪呢?跳过这个阶段,直接由推翻清政府后即实行民主共和,不是更符合时代进步的趋势吗?况且清政府已彻底腐败,根本不能指望它实行宪政改革,依靠它实行君主立宪,无疑是痴人说梦。



■ 1907年4月出版的《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汇集了革命派写的反对清政府和批驳保皇派的文章

第三个问题,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实行土地国有?《新民丛报》认为中国今日不必实行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经济社会组织优良,没有贵族制度,赋税极轻,没有极端的贫富两个阶级的对立;中国今日也不可实行社会革命,因为社会革命是“煽惑劳动者”与资产者对立,使中国资本家蒙受损失,以致“裹足不前”,从而导致外国资本侵占我全国市场;中国今日更不能实行社会革命,因为今日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社会革命的程度,没有建设“社会的国家”的人才,社会革命论者只不过博取下等社会的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新民丛报》坚决反对土地国有,认为土地私有是历史产物,实行单税制解决不了土地问题,也难以使国库富裕,财用充裕。

《民报》根据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驳斥了《新民丛报》的观点。指出当今欧美资本发达国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主义思潮日益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是“纠正贫富不均而图大多数之幸福”;贫富不均主要是因为资本家“垄断居奇”。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反映在政治上,使一切国家机关成为它的傀儡,所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毕其功于一役”。革命派阐述了实行社会革命即民生主义(也称国家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概括起来有两个要点:一是反对垄断国计民生的大私有企业,凡是有关“公益之权利”如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等等,“皆宜归国家所有”,即后来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二是平均地权,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国有,推行单一税制,“中国诚能实行土地国有制,则凡地主所得概为国家所有,以四千万平方里之土地,其地租总额之收入,可埒于欧洲全土之地租。一旦得此重大之国用,则财政之社会上之充分改革,直旦夕间事耳。”

19

扫荡「保皇邪说」



■ 1907年孙中山留影

的“集积”休止了,其财产也不是采取平分的方法,所以最终对“欲富有者有益无损”。这就驳斥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把社会革命称作“贫民专政”、“荼毒一方”的恶意攻击,申明了社会革命并非“强夺富民财产而分之人人”,只不过是具有秩序、合理的做法使富有者不再通过垄断而积聚财富。

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出席了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的《民报》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的讲演,进一步阐释三民主义,再次批驳了保皇派的主张。“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因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因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至1907年初,双方论战一年多,在革命派口诛笔伐、群力围攻之下,保皇党渐渐陷入被动局面。主将梁启超等势单力薄、孤军奋战,1月10日托人向《民报》求和。同时,梁启超还私下会见汪精卫,“欲以乡谊动之”,希望停止论战。孙中山主张坚持到底,反对“可以许其解和”的主张。

在梁启超提出调和要求不到一个月,康有为于2月3日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保皇,已不合时宜,国民宪政会也不过是应急之举。1907年11月20日,《新民丛

针对《新民丛报》鼓吹私有是历史产物,不能实行国有的言论,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撰文指出,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往社会制度都“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今日之社会主义,盖由是制度而兴者也,因其制度之弊而后为之改革之计划也”。他明确指出实行社会革命是要废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朱执信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革命的主体是“细民”,即劳动者,革命对象是“豪右”,即资产者。社会革命实行的方法是有秩序的、合理的,“使富之集积休止”。富人的

■ 梁启超
(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89年中举人,1890—1894年师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帮助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随后参与发动“公车上书”,建学会、办报刊,宣传变法,与康并称“康梁”。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后成为保皇派与革命派论战的主将。武昌起义后与康有为主张“虚君共和”。拥护过袁世凯,反对“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前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科学,倡导“新文学”、“新史学”、“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晚年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成果丰硕。



报》出版最后一期后“关门大吉”。《民报》直到1910年才结束。

南洋论战余波

在论战的主战场日本,《民报》和《新民丛报》集中交锋仅一年就结束了,最后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保皇派不得不承认:“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留学界成为革命党的天下。可是在南洋华侨中,保皇势力还很嚣张。由保皇党人徐勤、欧渠甲、伍宪子等人主持的保皇党喉舌《南洋总汇报》,发表了《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革命不可勉强》、《呼请侨民全意致力于国会》等文章,鼓吹保皇改良思想,反对革命。

1908年秋天,孙中山在筹集革命经费、指导国内反清起义之余,在新加坡以《中兴日报》为阵地,领导汪精卫、胡汉民等革命党人与《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孙中山为论战拟定了“攻心为主、以理服人”的方针,并用“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发表了3篇批判保皇党的文章,分别是《平实开口便错》、《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平实是《南洋总汇报》的一名记者,1908年9月14日发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一文,孙中山遂发表文章逐条予以驳斥。

这次双方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种族革命与革命可行性的问题,君主立宪制的问题。革命派指出,只有进行种族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才能使中国富强,免遭列强瓜分的命运。革命派认为:革命党人发动的一系列起义虽遭到挫折,但革命形势不断高涨,革命终会成功。针对保皇派鼓吹的君主立宪,革命派揭露了清朝所谓君主立宪的虚伪性,指出清朝统治者绝不会自动交出政权,而是要利用君主立宪解除革命武装;国会的权力只有来自人民,才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作用,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否则只是君主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

《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报》围绕革命与保皇的论战,堪称《民报》与《新民丛报》在日本论战的延续,不过此刻南洋保皇党势力更加薄弱,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无需全力应付,所写文章仅需浅显易懂,让一般华侨理解即可。后来



■ 1907年,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

20 致力于兴师起义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病故。次日,影响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也随之西去。3岁的溥仪继位,由其父亲醇亲王载沣监国。清王朝如日落西山,散落各地的保皇党没有了根基,时势所迫,声音渐没。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在两广和云南不断发起反清起义,革命犹如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

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同盟会成立之时,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此前伴随着边疆危机和民族矛盾激化的反帝爱国运动,使得清朝统治岌岌可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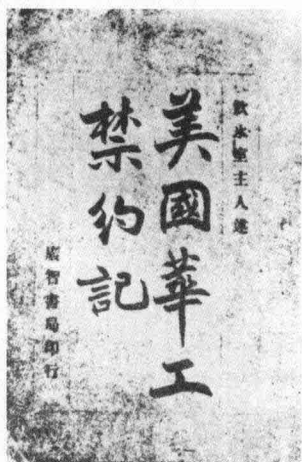
1903年春,中国边关广西发出了危机的信号。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屯凉山的法军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允诺在事平之后用全省铁路、矿山等权益为报酬。4月24日,日本报纸刊登了此消息,一时舆论哗然。第二天,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大会,揭露法国的侵华阴谋,要求清政府撤除王之春的职务,拒绝法国人的无理要求,并致电中国教育会力争。同时,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张园召开拒法大会,决定发电阻止借兵借款。由于国内人民规模巨大的一致声援,迫于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免



■ 载沣与其子溥仪(右)、溥杰(怀抱者)合影。1908年12月2日,溥仪即位,年号宣统。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被迫宣布退位,长达268年的清王朝灭亡

20

致力于兴师起义



■ 1905年,广智书局印行的《美国华工禁约记》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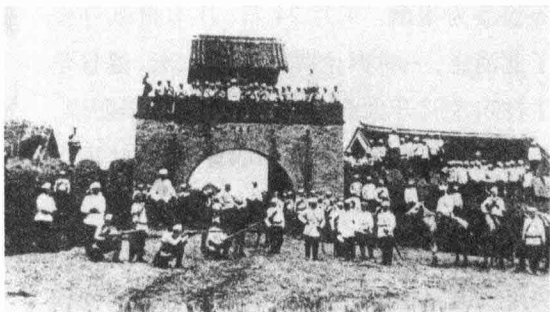
去王之春的巡抚职务,抗法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与此同时,又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反对沙俄侵占东北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入侵我国东北。1902年4月,沙俄同清政府订约,规定将侵占中国东北的俄军分3期于13个月内全部撤走。1903年,沙俄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了7项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4月27日,汪康年在上海张园召集民众千余人集会,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外交部,表示决不承认俄国的无理要求。4月29日,东京留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略,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先改名“学生军”,后又改称“军国民教育会”,积极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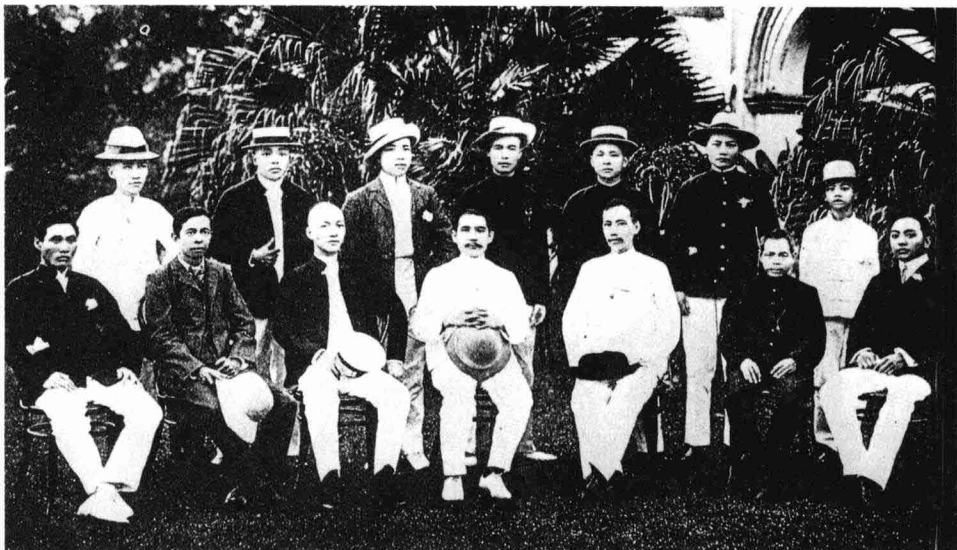
训练,准备开赴边疆;北京、武昌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举行抗议示威,声讨沙俄罪行。但这些运动都被清政府镇压。

1905年爆发了反对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要求废止《中美华工条约》的爱国运动。1904年12月,美国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旅美华侨10余万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废约。美国政府悍然拒绝这一正义要求,并再度提出续订新约,激起中国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慨,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控诉美国排华罪行,反对美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1905年5月,上海商务总会集会,作出了不用美国货、不定购美国货的决定,抵制美货成为这次运动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上海、南京、北京、天津、保定以及其他各地学生纷纷集会响应,大大增加了运动的声势,上海一些美国教会办的学校的学生也举行罢课,支持这一运动。中国留日学生也有许多人参加了这个运动,其中以四川人最为积极。东京的四川同乡会(主要是留学生)首先在上野公园集会,讨论抵制美货的办法,会上决定迅速与成都、重庆等地取得联系,以便在全川发动抵制美货运动,不久这些地方迅速展开了斗争。各界人民的斗争迫使清政府不敢公然和美国续订新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

孙中山认为,清朝统治已经像一座破房子,整个结构从根本



■ 1900年10月1日,俄军侵占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宫



■ 1906年4月,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分会。图为他与会员的合影(左二、左三分别为分会正、副会长张永福和陈楚楠)

上彻底地腐朽了,只要抽去一根木头,或者挖去一块墙砖,就会整个地倒塌下来。他庄严地宣告: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在这个大变动即将到来的时刻,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燃遍全国,推翻清朝统治者。所以,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领导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与保皇派进行论战的同时,积极筹划、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孙中山除了派遣一部分同盟会成员秘密回国,为准备武装斗争集结力量外,他本人也把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筹备反清起义的各种工作之中。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频繁往来于日本、南洋和美洲各地,在华侨中进行反清革命思想的宣传,建立同盟会分会组织,筹集起义款项,联络会党,购买军械,操练军队,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萍浏醴起义

同盟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孙中山于1905年10月7日离开日本前往越南、新加坡等地,发展同盟会组织,并筹划在中国华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回到日本东京,和黄兴、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一起编制了《革命方略》,以备国内各地起义之用,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关系条件、军队之编制、各项军政府布告和《对外宣言》等文件。

1906年底发生在湖南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是同盟会会员领导和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斗争。这年春天,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由日本返回国内,



■ 萍浏醴起义的发难地——石麻街遗址

召集萍浏醴百余会党首领在萍乡会盟，宣称奉孙中山的命令，成立起义领导机关，图谋起义。12月4日，三地会党同时起事，参与人数达3万余人。但由于平时缺乏训练，又无有力的领导，在清政府调集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省近5万兵力的联合围剿下，起义坚持到次年1月就失败了。起义失败后，清军连续3个月大肆搜捕革命群众，起义军前后被杀者1万余人，群众被杀2万余人。刘道一、蔡绍南先后被捕牺牲。

这次起义实际上并非由同盟会总部策划，而是由同盟会会员个人发动的。起义时，刘道一曾经密电东京，结果电报被湖北电局扣押。12月12日，当东京的同盟会会员从日本报纸获悉起义的消息后，纷纷要求回国。孙中山当即与黄兴商议，相继派人回国到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运动新军、联络会党响应起义，但缓不济急，于事无成。

对于这次起义的失败和刘道一等人的死难，孙中山极为沉痛，他在《孙文学说》中称此为“同盟会之第一次流血”。1907年2月3日，东京革命党人以孙中山的名义题写了追悼刘道一的挽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粤桂滇六次边疆起义

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感到国内革命声势渐强，决定联络18省会党，乘机举行起义。为起义所震动的清政府认为孙中山是革命排满的“罪魁”，要求日本政府将他驱逐出境。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3月14日抵达越南河内，在甘必大街62号设立指挥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开设“日新楼”饭馆作为联络，同时将兴中会分会改为同盟会分会，在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积极准备在岭南的钦、廉、潮、惠四府同时举行起义，并制订了统一的起义计划。

钦廉地处两广，交通便利，与越南相邻。由于法国殖民当局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采取默认和不干涉的态度，所以便于接济和运送人员；钦廉地区发生过大规模的

群众性抗捐斗争,人数达几千人,并和同盟会建立了联系。为此,孙中山重点部署钦廉地区,坐镇河内总机关亲自布置;黄兴则亲赴钦廉地区,直接进行发动指挥;胡汉民和汪精卫则在香港筹划指挥潮州、惠州的起义;另外,孙中山还派关仁甫到广西边境,联络镇南关守军起义响应。为从事秘密活动,孙中山和胡汉民均改姓陈。筹措起义款项事宜刻不容缓,孙中山致电西贡的曾锡周和巴黎的张静江。张静江依照以前的约定寄来了6万元。

1907年5月至9月间,孙中山按照统一部署,在广东钦廉潮惠四府连续发动武装起义。结果由于领导不力,联络不周,又因客观形势出现变化,导致部署被打乱,最后演化成3次分散的、此起彼伏的起义: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钦廉起义。

潮州黄冈起义于1907年5月22日发动,5天后起义军因伤亡过重、缺乏接济而被迫解散。黄冈起义的消息传到惠州,孙中山派往惠州的邓子瑜在七女湖响应。七女湖距离惠州府20里。6月2日,当地会党群众100多人起义,各乡会长也纷纷响应,人数增加到300多人。当邓子瑜得知潮州起义失败后,觉得孤军奋战,易被清军镇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派人将枪械埋于地下,解散队伍。

潮、惠两地起义先后失败,孙中山按照原定计划,准备组织武装力量集中在钦廉两地发动起义,然后以郭人漳、赵声掌握的清军响应,直取广西省府南宁。驻守钦廉地区的清军军官郭人漳、赵声已经加入同盟会,黄兴和他们商定,如果有正式的革命军起义,郭、赵将反戈响应,孙中山对郭、赵寄予厚望。

1907年9月1日,绿林出身的王和顺率起义军六七百人在钦州王光山起义。义军大破清军,3天后占领防城,王和顺按照孙中山的部署,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按照《革命方略》发布3个布告。后来,在进攻钦州和退向廉州时,没有得到事先约定的郭、赵清兵的响应,17日义军被迫解散。历时半月后,起义宣告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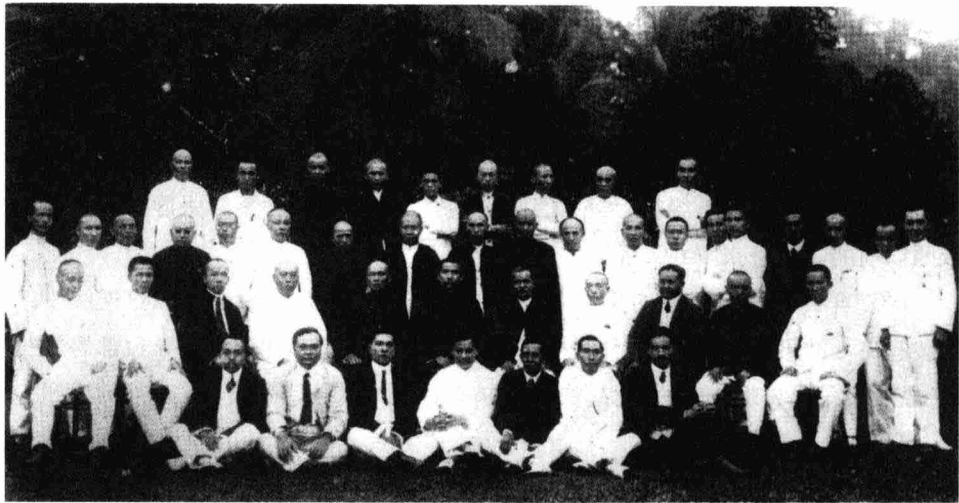
3次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并没有气



20

致
力
于
兴
师
起
义

■ 1907年,孙中山在越南留影



■ 1908年，孙中山和黄冈起义失败后流亡新加坡的部分同志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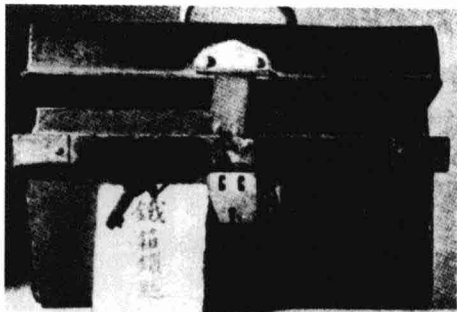
馁，他将先前积累起来和经过联络的武装力量进行一番调整和重新部署后，从1907年12月到1908年5月，在西南边境地区又连续发动了广西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其中，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这也是他流亡海外12年后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1907年夏天，孙中山开始筹划镇南关起义，他任命王和顺为镇南关都督，负责组织事宜。王和顺联合广西游勇首领黄明堂、关仁甫深入镇南关等地联络绿林、游勇。由于绿林和游勇存在门户之见，孙中山只好改派黄明堂为镇南关正都督，同镇南关守军联络，同时派王和顺与云南三合会首领响应起义。孙中山认为这次起义既有守军里应，又有会党外合，还有其他地方起义响应，起义成功有相当把握。他自己亲率黄兴、胡汉民等赶赴前线指挥。

12月1日凌晨，镇南关起义按计划发动，义军很快占领镇南、镇中、镇北3座炮台。当晚，孙中山与河内机关内的同志整夜未眠，急切等待前线的消息。2日9点左右，传来了捷报。孙中山当即偕黄兴、胡汉民等乘火车到同登，然后再去镇南关。在车厢里，孙中山无限感慨，历经多年的磨难与奋斗，终于听到了捷报，不免心中快慰，遂纵谈一番：“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入中国帝国最南角的镇南关，悬军万里、衿旗堂堂，贯通中国帝国的中腹，而出中国帝国最北角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则即可送爱新觉罗帝的末路了……”晚9点，孙中山到达第三炮台，受到义军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稍事休息后犒赏义军并发表演说：清朝太腐败，太可恶，我们一定要将它推翻，我们的革命一定成功！

“反对清政府 20 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他还和黄兴持枪向敌人射击。当出现伤员的时候，他就近进行抢救，忙得不可开交。

战斗持续到 10 点左右，孙中山召集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部署。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敌众我寡，而且清军援兵正在



■ 为云南河口起义筹款用的铁箱

赶来，义军得不到支援，特别是饷械缺乏，难以持久。黄明堂劝孙中山下山筹饷接济，孙中山表示非常不愿意下山，10 多年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现在踏在这个山上很高兴，简直舍不得去。

义军又坚持了两天，弹尽粮绝，18 日被迫突围撤退，转入越南境内，等待时机。这时，孙中山在河内的消息被清政府探知，即要求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境。1908 年 3 月，孙中山将粤、桂、滇 3 省的军事交给黄兴、胡汉民代理，自己离开河内，经西贡赴新加坡。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吸取以往起义军械缺乏的教训，加紧筹划饷械，授权日本朋友池亨吉回日本筹款。他离开越南的时候，部署黄兴入钦廉地区再次发动起义，要求黄明堂、王和顺等到云南河口发难，以作响应。

黄兴在得到冯自由等人所准备的军械后，即协同黎仲实等人率领广东钦州军民 200 余人，于 1908 年 3 月 27 日进入国境以攻占钦州，并击溃清军两个营的兵力。黄兴率军转战广东钦廉和广西上思间，终以弹尽援绝而失败，仍退回越南。经此一战，黄兴威名大振。孙中山也称赞不绝，认为：“照这一次战事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

1908 年 4 月 29 日，孙中山命令黄明堂在云南河口起义。5 月 3 日，起义军占领新街。5 日，任命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11 日，黄兴在老街为法国警察截留，递解出境。起义坚持到 26 日，才退回到越南。

广州新军起义

一年内连续 6 次失败，无疑给革命党人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一时也无力再次发动起义。但失败没有击倒孙中山，他积极劝说和鼓励处于苦闷和彷徨中的其他同志，要“谨慎戒惧，集思补过，折而愈劲，道阻且长，期以必达，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



■ 1909年5月,孙中山在法国巴黎留影

这时,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混乱局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危机持续恶化,假立宪真专制的面目逐渐暴露。立宪派先后发动了3次全国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抗捐斗争和抢米风潮的次数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对此,孙中山指出,中国内地的事情有岌岌不可终日的态势。



策动广州新军起义的倪映典

起义屡遭失败,孙中山认为是由于财力有限,难以获得足够的武器,因而无法保持和扩大已经获得的胜利成果;而冲锋陷阵的主力——会党,不仅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而且散漫不羁,难以约束,无法形成坚强的战斗力。为此,孙中山进行了战略调整:一是由原来分散的小规模的起义,发展为集中人力和物力的大型起义;二是改变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方略,转而集中精力运动新军。相比于会党,新军守纪律、训练有素、文化水平较高,以及军中不乏有心救国的人,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因此,孙中山着力向新军渗透。

1909年5月,孙中山从新加坡赴欧洲筹款,以解决一直困扰和影响革命事业的经费问题。临行前,他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领导国内的革命活动。1909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作为指导南方革命的总机关。孙中山命黄兴、赵声、谭人凤等集中到香港,共同领导组织广州新军起义。这样,孙中山在海外积极筹款,黄兴、胡汉民等人在国内负责起义。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至1909年冬,广州新军有半数以上加入同盟会。南方支部决定于1910年2月24日发动新军起义。

但旧历年除夕,即2月9日,新军一协二标的士兵与警察冲突被捕。2月10日,二标、三标士兵数百人愤而入城捣毁警察署。广东都督袁树勋和水师提督李准等布置镇压,先后将各标士兵枪械收卸,子弹收缴,且传令13日阅兵,引起各营士兵的不满。此时,倪映典赴香港报告,决定改为15日发动起义。2月12日,回到广州的倪映典,得知形势大变,李准已有布防,遂拿枪突入新军营垒,击杀管带,聚众起义。倪映典担任司令,向广州进攻。起义军与李准带领的防兵两千人在东门的茶亭附近相遇。在双方交战之时,曾欺骗倪映典表示支持革命的李准部属管带李景廉传话给倪映典,请他人营磋商条件。在倪映典离开时,李景廉用乱枪将其打死并进攻新军。新军大败,起义者战死百余人。第二天,清军又逮捕了很多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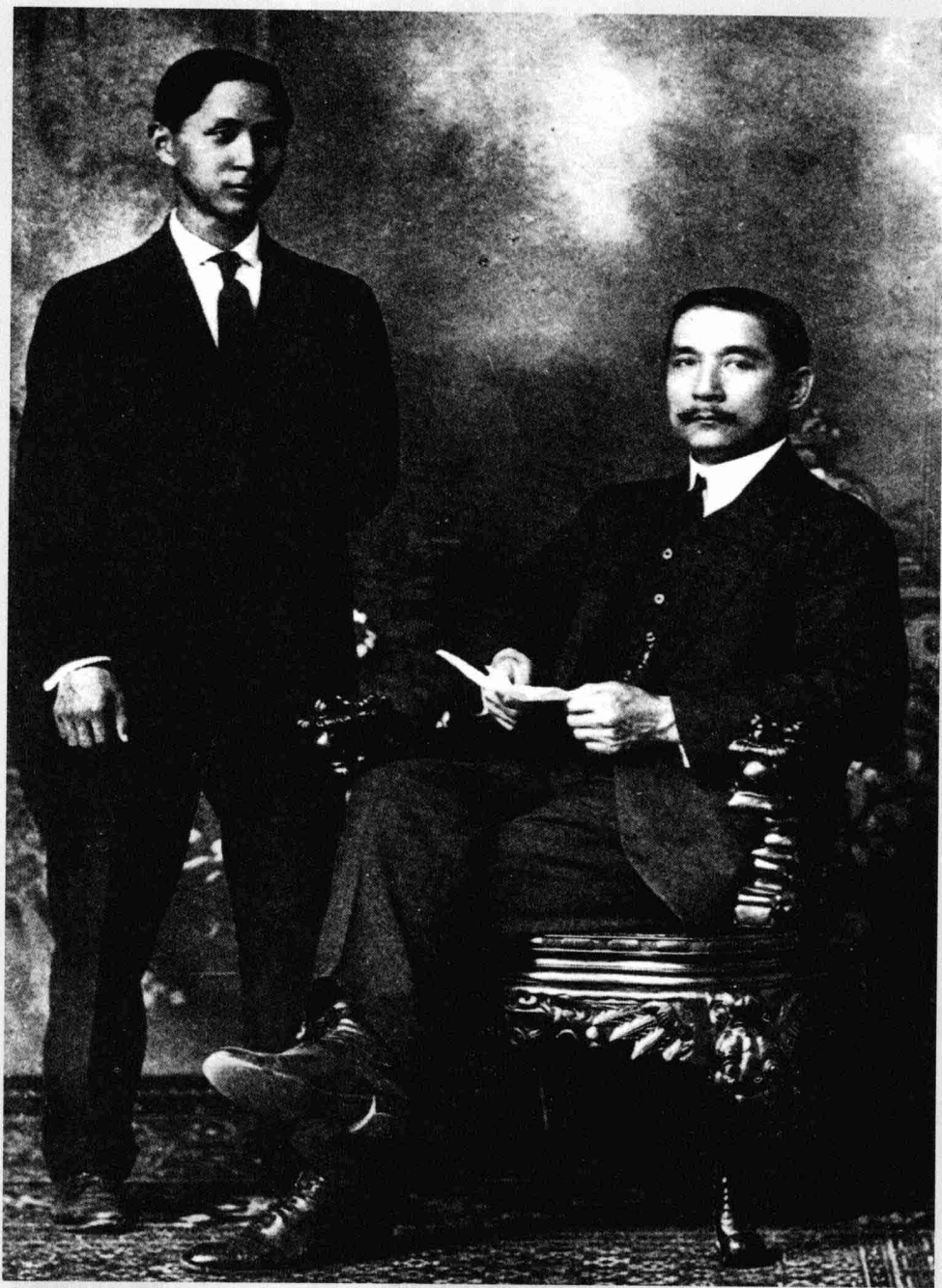
■ 秋瑾



■ 徐錫麟

军余众纷纷溃散。新军起义不到一天,即宣告失败。孙中山称新军之役是他领导的第九次起义。

孙中山等人在西南领导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1907年在长江流域爆发了同盟会员秋瑾以光复会名义发动的浙江绍兴起义和徐锡麟领导的安徽安庆起义。虽然起义都失败了,但同盟会前仆后继的武装斗争,在政治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唤起了民众的觉醒,“革命党”3个字从此深深地印刻在广大民众的脑海中。



■ 1910年3月,孙中山抵达檀香山,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檀香山分会;5月与子孙科在檀香山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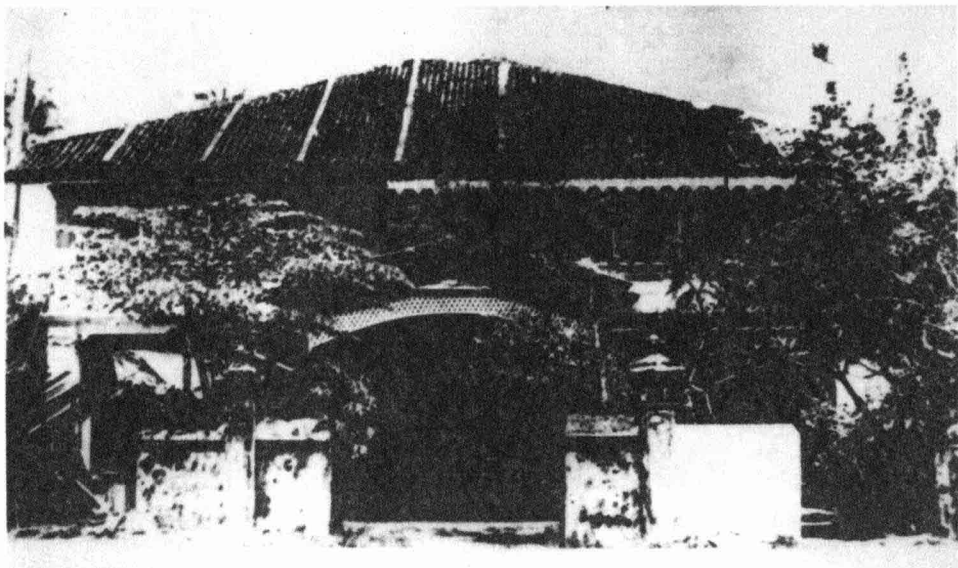


21 黄花岗上党人魂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策划在广州举行第十次武装反清斗争,即“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又称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比较充分,规模和影响比以前任何一次起义都大,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序幕。

起义的酝酿与筹备

起义连续失败,战友不断牺牲,使得一部分革命党人意气消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中有的人积郁成疾,有的人急躁冲动,不愿再从事艰苦细致的革命工作,打算以暗杀的方式,与清廷拼个你死我活,用这样的速成办法推进革命成功。由



是,暗杀风潮一度盛行。1910年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图谋用炸药炸摄政王载沣,事败后汪精卫被捕。几乎同时,刘思复等8人因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策划暗杀清廷官吏。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不赞成把个人暗杀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他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为了坚持武装反清的初衷,考虑到在广州新军中形成的革命力量仍然存在,孙中山和黄兴一直在讨论再次发动广州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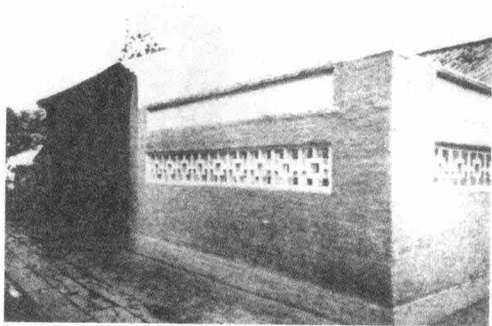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以槟榔树多而得名)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发动起义。同一天,孙中山函约南洋各埠同盟会会员派代表来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孙眉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孙中山说:“一败何足馁?”他进一步鼓励大家道:今日革命风潮已盛,华侨思想已开,从今以后,只担心我们没有计划、缺乏勇气。大家一定要鼓足勇气,做好充分准备,筹足款项再行发动起义。会议决定: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力,鉴于以往教训,先选择500革命党人充当“选锋”,即敢死队,担任突击发难之责。夺取广州后,由黄兴统帅一军出湖南进湖北,赵声统帅一军出江西进南京。在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清兵响应,会师北伐。并指派黄兴、赵声、胡汉民3人主持筹备。

槟榔屿会议前,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写信给美国的朋友,恳请他们帮助筹款。会后,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到南洋各埠筹款,冯自由等负责美洲方面的筹款。孙中山因各地殖民当局禁止入境,只得在槟榔屿以信函方式联系各方筹款事项。12月

6日,由于南洋殖民当局勒令孙中山出境,无奈之余,他只好远赴欧美筹款。在孙中山远离祖国的流亡岁月中,似乎全世界都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但他历经艰辛仍百折不挠。当时,筹款工作相当艰难,邓泽如在马六甲向富商筹款时,说到革命,富商大都非常赞成,说到筹饷,就没人应声了;而黄兴因筹得款项和会议的要求差距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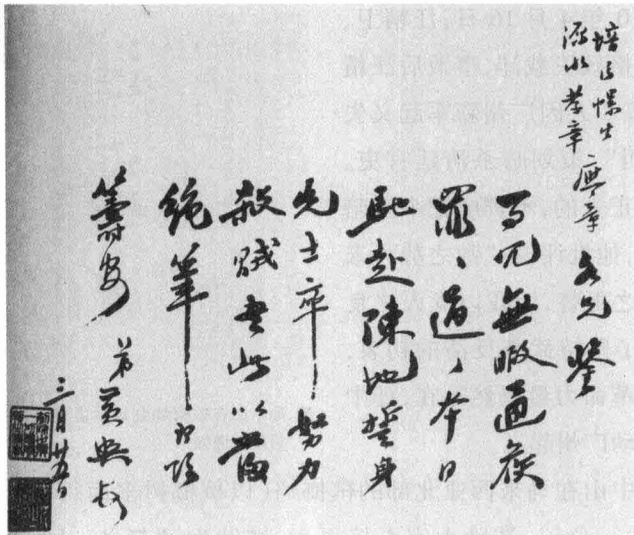
■ 孙中山在槟榔屿会议后发往各地的筹款通知



■ 起义指挥部旧址——越华街小东营5号



孫中山



■ 黄兴的绝笔书

徽、四川、贵州、广东各省抽调革命党人组成。在越华街小东营5号建立了统一的指挥部，由赵声、黄兴分任正、副总指挥。

4月8日，统筹部召集会议，决定13日起义，分兵10路攻占广州城，不料开会当天发生了意外：从马来西亚来的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枪杀了广州将军孚琦。枪杀事件引起清廷注意，整个广州城戒严，再加上从日本购买的武器也没有运到，起义只好推迟到月底。4月23日下午，黄兴由香港到广州主持一切军务。因走漏风声，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黄兴被迫再次推迟起义日期，由赵声率领“选锋”300余人离开广州到香港避难，以保存实力。不久，黄兴得到情报称，若再推迟起义时间，将会更加被动，遂决定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因起义人数减少，只剩不到500人在广州，遂临时改为4路进攻。由黄兴、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各领一路，分别进攻总督衙门、小北门、督练公所（今中山纪念堂所在地）、大南门。可是，届时陈炯明和胡毅生均按兵不动，姚雨平也因为没领到枪械而无法起事，只有黄兴一路孤军作战。

誓死豪情泣鬼神

参加这次起义的人，个个都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起义前，敢死队成员都给同志、父亲、妻子写了绝命书，充溢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豪气。

大，万分焦虑，以致落泪。

黄兴于1911年1月18日从新加坡回到香港主持军事。月底，在香港跑马地35号成立统筹部，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部长，下设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8个分部，又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8处，并组织“选锋”800多人，由南洋华侨革命青年和国内福建、江苏、安



■ 林觉民

黄兴写给南洋华侨同志的书信中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赴广州参加起义前3天，林觉民在香港江滨楼挑灯给妻子和父亲写下了绝笔书。给妻子陈意映的《与妻书》写在一块正方形的白色手帕上，读来荡气回肠，哀婉感人。信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



■ 方声洞由日归国参加起义前与妻儿诀别

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太上，指修养至高的圣人）之忘情也。语（指论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书信还追述了夫妻恩爱之情：“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说，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他还安慰妻子，嘱托她抚育5岁的儿子和尚未出世的孩子。

敢死队成员方声洞4月26日在写给父亲的绝笔信中说：“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信，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义所应尔也……”

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自由幸福，他们舍生取义，义薄云天。他们都是“国之良骏”，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豪情壮志和英勇献身精神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碧血横飞 浩气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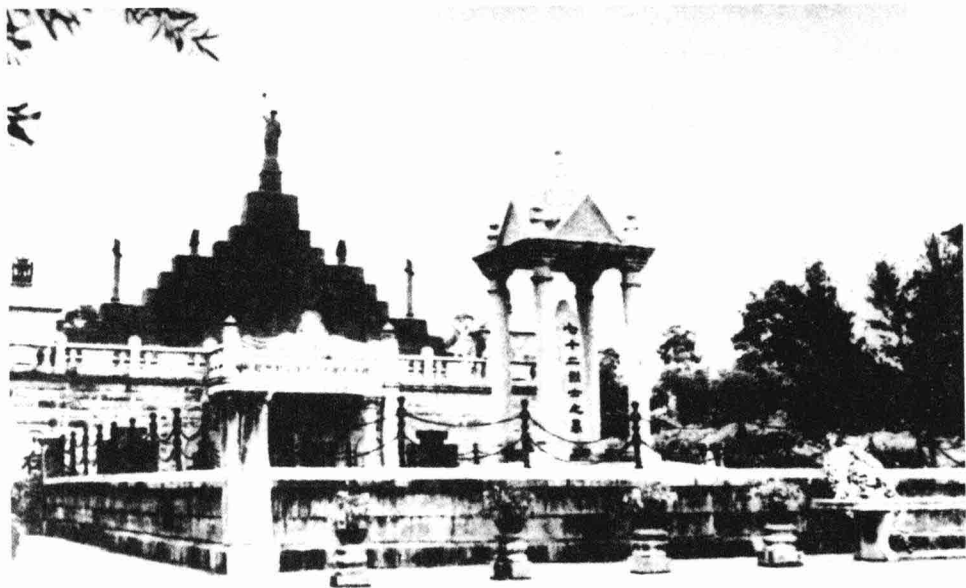
4月27日（旧历的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点半，号角齐鸣，孤军奋战的黄兴率领敢死队约130人，臂缠白巾，脚穿黑面胶底鞋，持枪械、炸弹，从小东营指挥部出发，途中击毙抵抗的巡警，跑步直奔西边不远处的两广总督署，击毙清兵管带金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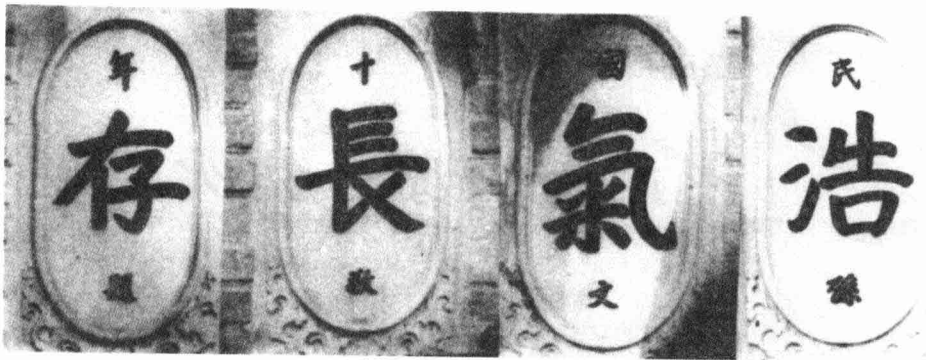


邦,冲入内堂。本想活捉两广总督张鸣岐,但革命党与督署卫队交战时,张鸣岐仓皇丢下老父妻妾,越墙逃到水师提督公所,与水师提督李准指挥清军抵抗。黄兴等放火焚烧总督署,后在东辕门与李准调来的卫队遭遇,黄兴在枪战中右手中弹,中、食二指伤断。革命党分3路突围,黄兴率领10人出大南门,计划接应防营起义队伍数百人,转攻督练公所等处,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终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伤亡太大,坚持一昼夜后失败。黄兴与朱执信化装逃脱,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86人战死或被捕牺牲。后由未暴露身份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通过广善堂出面,收敛烈士遗骸72具,葬于广州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红花岗从此改名黄花岗,黄花即菊花,意为烈士节操,千秋共赏。葬于该处的烈士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称为“黄花岗之役”。

4月28日,孙中山抵达美国芝加哥,听说起义失败,急电香港,询问起义善后情况。由于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孙中山连日愁眉不展。直到5月4日,才得到胡汉民的回电:“克伯展归。”克,就是黄兴,号克强;伯,就是赵声,字伯先;展,就是胡汉民本人,字展堂。知道黄兴等人平安,孙中山几天来的担忧有所缓解。他坚信“天下事尚可为也”,认为这次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加奋发。

黄花岗起义聚集了同盟会海内外的大量人力、财力,向清朝反动统治作猛烈冲击,许多同盟会的优秀成员都在这次起义中牺牲了,孙中山因而哀叹“吾党菁华,





■ 孙中山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题词

付之一炬”。后来，孙中山多次高度赞扬这次起义和死难的烈士气壮山河，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1912年5月15日，黄花岗起义一周年纪念之日，孙中山主祭并宣读《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他在著作《建国方略》中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造成也。”1921年12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又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1921年，烈士墓和纪功坊先后落成，孙中山书“浩气长存”4字镌于墓坊。1924年5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应邀出席岭南大学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学习烈士的志气，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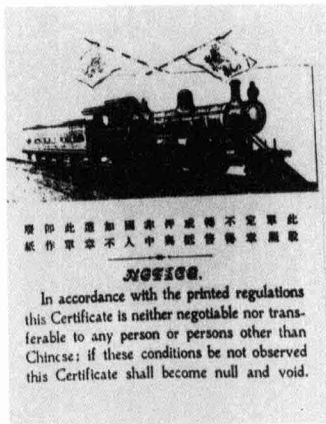


22 武昌首义 星火燎原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着手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同当地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取得联系,在推动武汉革命团体筹备起义的同时,也加速了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1911年8月,两个革命团体正式达成协议,决定协作开展革命活动。其间,湘鄂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尤以四川为甚,最终发展成保路起义,对革命形势起了重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四川“保路风潮”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4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600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此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已收股金强行夺去。此举严重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士绅和民众的利益,各省掀起“保路风潮”。消息传到四川,川民极为愤慨,风潮愈演愈烈,请愿逐渐演变为反抗斗争。



早在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次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四川的绅商乃至百姓,都成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

当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企图掠夺民办铁路股东的消息传来,川民深为愤慨。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集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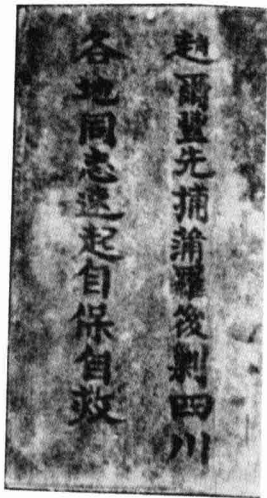
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派会员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总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资源和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



■ 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

延至8月，斗争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并迅速席卷全川。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愤怒的群众捣毁了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

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政府严令，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恼羞成怒，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30余人，制造了“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漂流，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吴玉章、王天杰、龙鸣剑、张捷先、张达三、侯宝斋等人率领下，从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与清军展开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荣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给全国革命形势以有力的推动。



■ 同盟会会员制作的“水电报”



武昌首义

四川的局势令清廷惊慌震骇，四处调兵遣将前往四川弹压。9月21日，清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抵川。鄂军第八镇所属第十六协大部分兵力入川，另一部分兵力驻防汉阳、汉口和附近各县，武昌城内外兵力仅14个标约7000余人，其中参加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和倾向革命的兵士约占1/3以上，形势对武昌首义极为有利。

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举行由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合会议，决定发动起义，并确定了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负责人选：军事上，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内，政治筹备处设俄租界汉口宝善里14号。起义定为1911年10月6日（中秋节）。后因时间紧迫，起义延至10月11日。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宝善里28号共进会机关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前往搜查，受伤的孙武与其他在场的人迅速脱逃，但起义的文件、印信、旗帜等重要机密文件被搜走。与共进会机关相邻的刘公寓所亦被搜查，刘公之弟刘同等4人被捕。湖广总督瑞澂深感事态紧急，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址搜查革命机关，并据名册搜捕革命党人。

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恐怖中。当日下午5点左右，在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的蒋翊武、刘复基等军事负责人得知汉口出事，起义计划暴露，认为如不尽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断然决定起义提前至当晚12点，以中和门（今起义门）外炮声为号，并派人火速向新军各兵营革命党人秘密传递起义命令。

当晚，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包围，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慌忙中投弹，炸弹未炸被捕，彭楚藩也被捉，蒋翊武因身著长袍马褂且蓄长辫未被军警注意而乘机

脱逃。革命党人杨洪胜在给各营送弹药途中被军警跟踪，投弹失误自伤而落入敌手。由于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命令未能按时送达城外炮队，以至当晚12点起义的计划没能实现。

10月10日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志士在湖广总督署英勇就义，军警的搜捕仍在紧张进行中。许多革命党人



■ 端方（中坐者）率鄂军出发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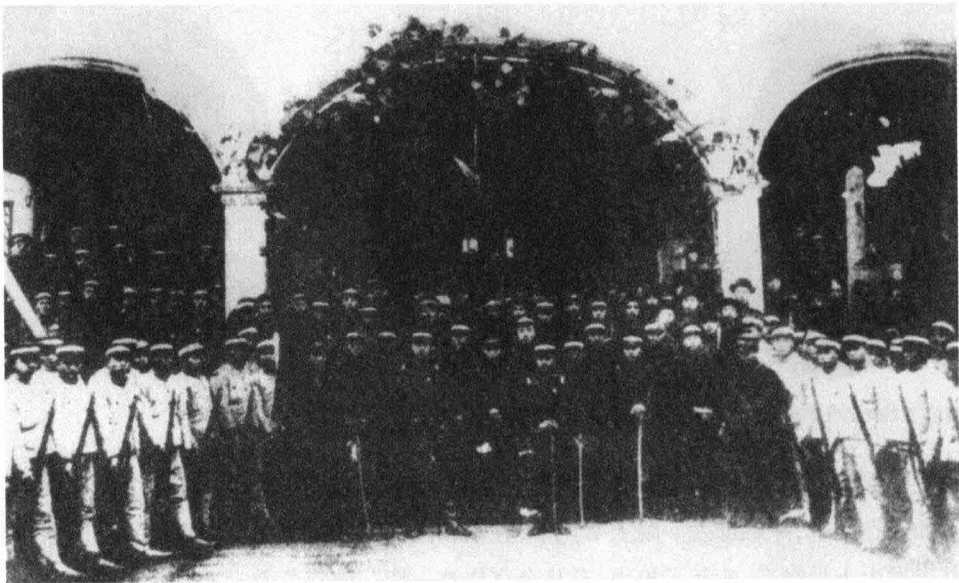


■ 英勇就义的武昌首义三烈士——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

和发动起来的新军认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求生。起义形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晚上7点多,驻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里首先发生士兵哗变,响起了枪声,有几个官佐被击毙。该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见状,立即率数十名起义士兵奔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在本营驻防军械库士兵的策应下,占领了军械库。起义部队得到军火,士气大振。这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士兵约有300余人。由于孙武负伤住院,蒋翊武在军警搜捕时脱逃,其他起义领导人或殉难,或被捕,现场一时群龙无首,无法统一指挥。在场职位最高的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负责现场指挥,尽力稳住军心。这时,有士兵建议,把起义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约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来当总指挥。熊秉坤胸怀全局,考虑自己职卑位低,恐难左右局势,给起义带来不良后果,于是欣然顺应士兵要求,推举吴兆麟当临时总指挥。吴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的活动,但没有加入任何革命组织,其为人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他不负众望,立即命令一部分兵力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同时再次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城内外的革命部队纷纷向楚望台集结。

在各起义部队向楚望台集结的同时,吴兆麟、熊秉坤已率起义部队向湖广总督署(今武昌造船厂)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得很艰苦,不克而返。南湖炮队入城,楚望台、蛇山等处的炮击开始以后,战局出现转机。新军各标营越来越多的士兵起义响应,营以上军官绝大多数见势不妙,离营保命。此刻,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兼防营提督张彪,以及督办公所总办铁忠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组织可靠兵力保卫督署,会剿起义士兵,致使进攻督署之战,连连受阻。当晚革命党人兵分3路进攻督署。由于天黑又下雨,目标能见度低,炮屡发不中,于是有人冒死冲往督署附近纵火,以火光为标志,提高炮击的命中率。瑞澂和铁忠见大势已去,慌忙打破署院后墙逃往停泊在长江中的一艘兵舰上。起义军经过3次进攻,终

22



■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湖北军政府时合影

于在炮队的密切配合下于天明前攻克了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张彪在其司令部被攻克前逃往汉口。

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高高飘扬。次日夜里,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部光复。不久,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由于孙中山在海外,黄兴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都 在香港、上海等地,而原来组织起义的领导者们有的牺牲,有的出走,有的病伤,最后,清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举担任军政府都督。这个旧军官阴错阳差地成了革命首义省份的首脑。

烽火燎原

10月10日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便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湖南、陕西、江西、山西和云南等5省,以新军为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起义,在武昌起义的当月先后宣布独立。其他各省风闻后也跃跃欲试,革命的浪潮迅速向华东和华南扩展,清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东南地区工商业繁荣,一直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税源。近代以来,随着东南沿海口岸陆续开埠通商,围绕江浙两省,逐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

会财富最集中、文化最繁荣、思想最活跃的地域。其中，上海成为执牛耳之区。1843年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资金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上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成长为全国的中心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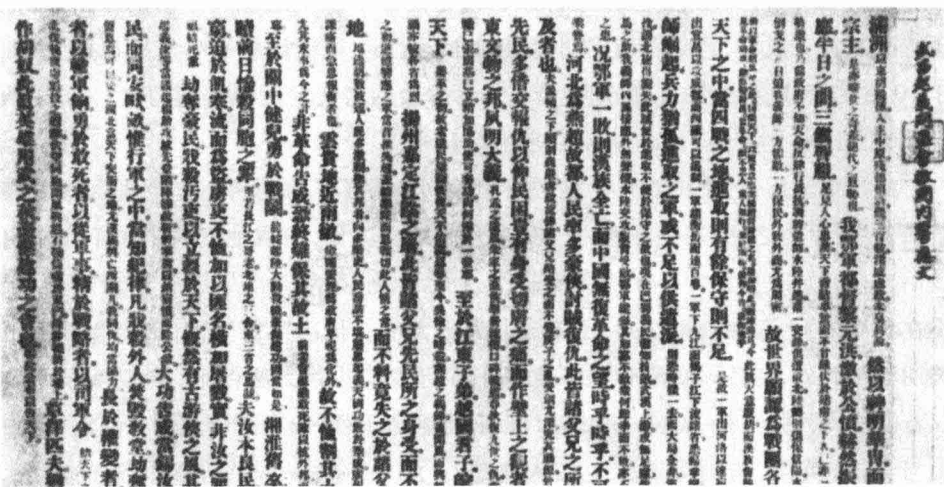


■ 沪军都督陈其美

武昌首义后，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联络上海绅商李平书等于1911年11月初成功光复上海，并立即派员协同江浙革命党人，迫使江苏、浙江宣布独立。不久，安徽、福建也相继独立，东南地区除南京外，都已光复，并成立军政府。对于上海的光复，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说：“武昌既稍能久持，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一著，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能见于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在东南各省相继独立的同时，辛亥风云迅速席卷华南和西南，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和四川在内的西南各省相继独立。12月2日，随着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

在北方，山东曾一度宣告独立，但是11天后又取消反正。1912年1月，新疆伊犁新军起义，成立了临时都督府。直隶、河南、甘肃等省虽然没有独立，革命党人也在那里积极酝酿或组织过起义。在各省独立过程中，满族、蒙古族、藏族、壮族、维吾尔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也积极参加到起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印发的号召全国各地响应的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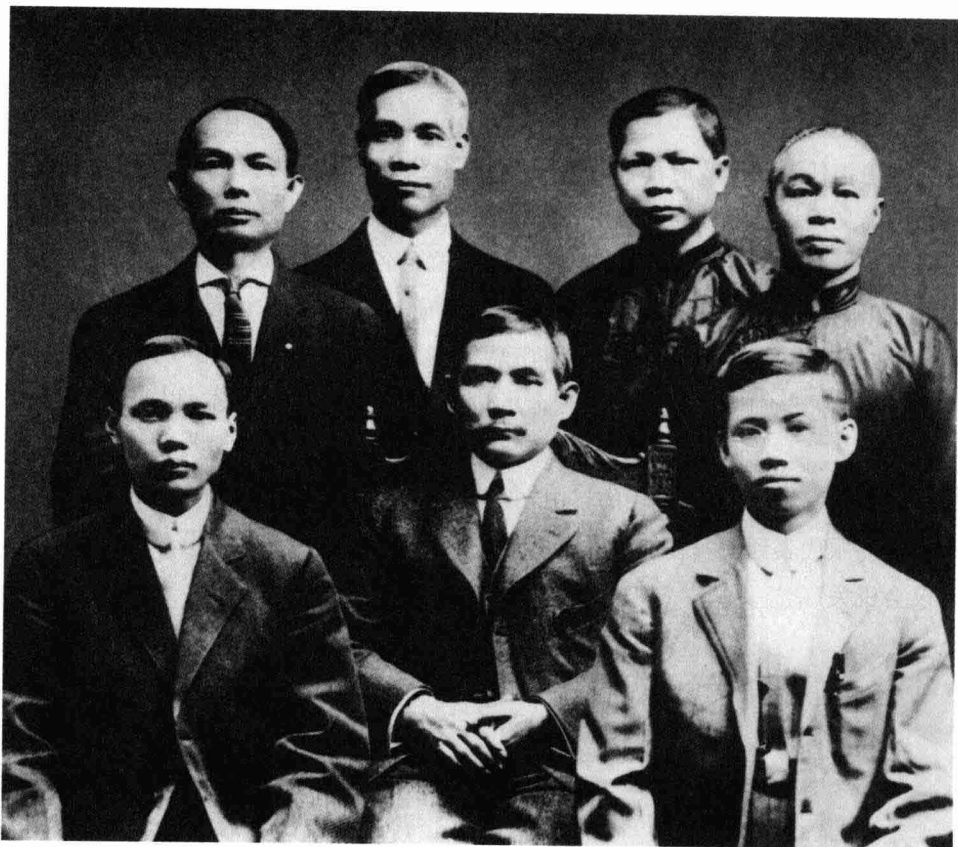
23 归国主持大计

形势的迅猛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以最后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在筹建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孙中山为了缔造共和制度由欧洲回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寻求欧美外交支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当天,孙中山为了向华侨募捐,正在美国从西海岸乘火车前往中、东部各地的旅途中。10月12日,孙中山在科罗拉多州的典华(Denver,今译作丹佛)城通过报纸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感到颇为意外和十分振奋。意外,是因为他一贯把首义之区放在两广与云南边疆,不认为在清政府重点控制的长江流域会有先发条件。当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他还和黄兴等人策划云南响应。10月初,孙中山接到黄兴密电报告武汉同志准备起义时,曾劝湖北同志勿动。不料,武昌首义迅速发动并取得成功,这使孙中山大感意外。所谓振奋,是他预感武昌首义成功,意味着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已定,民国即将诞生。所以,他立即于10月13日赶到芝加哥,以同盟会芝加哥分会的名义发表布告,定于15日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希望各界侨胞齐临庆祝。

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对自己是否回国的问题作了认真思考。是立即回国亲与革命,以偿平生之愿,还是在西方国家中开展外交工作,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作出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孙中山踌躇良久。最后,他认为:“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他决定暂不回国,因为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与各国政要有较多接触,任何革命党人都无法相比。他认为革命政权若能取得列强支持,就能站稳脚跟,彻底推翻清王朝,取得全国胜利。随后,孙中山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上层人物进行了广泛接触,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西方列强要么对中国革命缺乏信心,拒绝支持,要么模棱两可,拒绝给予明确



■ 1911年,孙中山与美洲同志合影

答复,乃至提出苛刻条件。除了争取到对中国革命更多的舆论同情之外,孙中山近两个月的外交奔走收效甚微。他从与各国政要的接触沟通中,知道列强对中国反清起义后成立的新政权,采取暂不干涉、观望和“中立”政策,同时又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官僚、政客袁世凯的身上。这使他意识到必须利用列强暂时中立的有利时机,立即回国部署革命政府的成立。于是,他在11月下旬从马赛乘船回国。

复杂的国内形势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革命烽火已成燎原之势,清政府极为惊恐,立即重用已被革职回原籍“养病”的袁世凯。北洋军奉袁世凯令南下,用武力镇压首义之区武昌,攻占了汉阳。武昌革命军民,不得不与北洋军进行坚决的战斗。袁世凯使用打拉结合的伎俩,在进攻武昌的同时,派人潜入城内,秘密与湖北军政府



都督黎元洪谈判,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双方实行停战。虽然黎元洪默许,但革命党人坚持民主共和,秘密谈判不成,妥协停战的声浪却在革命阵营中渐有市场。

被迫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为了获取更大权力,在11月9日以首义都督的名义倡议已经独立的省份各派代表集会武昌讨论组织中央政府。而沪军都督陈其美,则在11月14日发表通电,请已独立的各省都督派代表到上海讨论组织议会(即国会)问题。于是,南、北两方围绕着府、会展开了明争暗斗。斗争的实质是一个“权”字,即政权由谁掌握?黎元洪明显是利用首义之区相号召,以建立政府为标榜;陈其美则以专主长江革命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为资本,以组建国会相号召。

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支持陈其美的主张,通电各省咨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代表到上海参加陈其美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讨论“设立临时议会机关”。

沪汉之争,以上海先期集会而取得优势。11月15日,上海在只有苏、闽、沪三地代表报到的情况下,匆忙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讨论组织议会。后来,浙江、湖南、山东等省都督府代表和河南、直隶等省的咨议局也派代表参加,比之湖北方面只有赣、鄂、粤、桂都督府代表参加的武汉集会,明显地占了人多势众的优势。但是武汉方面坚持“代表会议应在政府的所在地”举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组织政府是当务之急。上海方面不得不承认“武汉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于是议决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除各



■ 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期间接受《滨海》杂志记者访问时发表《我的回忆》一文



■ 1911年11月,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开会商讨组织临时政府

省留一人在沪联络外,其他人都到武昌参加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武汉方面又占了上风。

武汉方面的优势地位没占多久,被北洋军攻占汉阳、炮轰武昌的军事行动所改变。在北洋军的炮声中,鄂、湘、闽、鲁、苏、皖、桂、直、豫、浙、川11省代表讨论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同意与北方谈判,南北双方各派代表进行和谈,条件是只要袁世凯承认共和,推翻清王朝,就可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月4日,南京光复。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并把会议搬到相对安定的南京,继续开会讨论。

12月12日,自武汉东下的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讨论临时政府大总统问题。由于上海留沪各省代表推选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以大元帅负责筹建中央政府工作,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方面极为不满,要求取消。

正在代表会议争执不下时,传来消息说袁世凯也主张共和,但必须经国民会议议决后,由袁内阁据以报告朝廷,清帝即可退位。并说,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已经派出,不久将来上海进行谈判。这条消息使会议代表感到袁世凯赞成共和,清廷即将垮台,因此决定暂缓讨论选举临时大总统人选,并追加《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一条:“大总统未举定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很明显,尽管有沪、汉之争,但大家都奉行“虚位以待”的方针。

这就是孙中山回国时国内的复杂形势。概括起来就是革命阵营内部为了权力,明争暗斗;君宪派要与革命派分享权力资源;袁世凯利用革命派内部矛盾和希望达到廉价胜利的心愿,伪装拥护共和,藉以夺得大总统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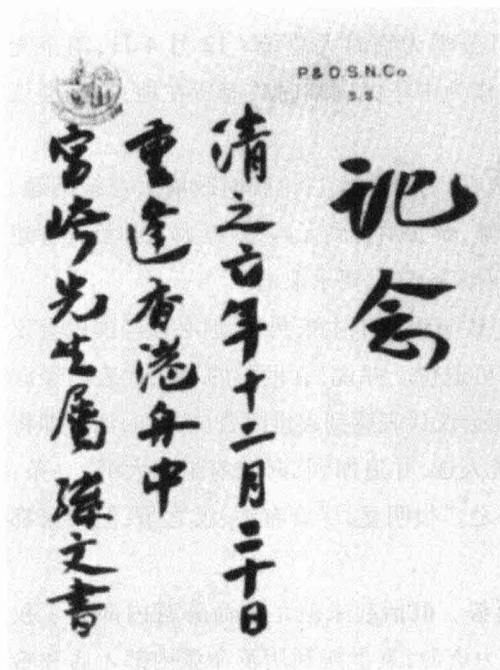
去沪宁主持大计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由法国马赛港乘“地弯夏”号邮轮返国。他对未来共和国的担忧,一是新政权的财政问题;二是如何彻底推翻清王朝,迅速达到南北统一,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

12月16日,“地弯夏”号在新加坡停泊。孙中山电约当地侨商、同盟会会员邓泽如、张永福等上船相见,向他们解释了自己迟迟不归国的原因是为了谋求新政府的外交支持,并且商借外债以解决新政府财政需求。据他估算,新政府一旦建立,非有5亿“不能建设裕如”。希望邓泽如等人一本初衷,设法为新政府筹措经费。

12月21日,孙中山船抵香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与廖仲恺等到港迎接。当时,胡汉民希望孙中山留在广东,大意是:若你去上海,必然被推戴为新政府首脑,而政府必定设在南京。手无兵力,用什么力量进行北伐,推倒清政府?不如留在广东,整编军队,然后挥师北伐,定能稳操胜券。袁世凯即使倾其全力,二三个月内未必能摧毁东南起义各省的革命政权。而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整顿军力,定能以实力廓清强敌,真正实现南北统一。

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的分析 and 决策。他认为,以形势而论沪宁是前方,广东是后方,自己若不亲临前线,不仅是避难就易,而且一定会使等候他的同志失望。他指出:目前湖北方面内部已有矛盾;南京各省代表也纠纷甚多,如果自己不去上海,等有利形势完全失去之后,再举兵北伐,怎么能说得计呢?明朝末年,因为东南不守,粤桂遂不能支,其教训深刻,我们不可重蹈覆辙。现在革命军有不可阻挡之势,而列强在仓促匆忙之间,无以为计,只得守其局外中立的惯例,不为干涉,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实现共和的目标呢?袁世凯表示拥护共和制度,诚然不可





■ 1911年12月,孙中山抵香港时在船上的留影



■ 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

相信,但正可利用他来推倒清王朝,这比用兵10万要好得多。即使他助清王朝为恶,但我们大局已定,而他的基础远不如前,推翻他自然比目前容易。所以我们今日可以先成一圆满的段落。孙中山认为自己若不去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绝非他人所能胜任”。他希望胡汉民与自己一起北上。胡汉民被孙中山所说服。

孙中山与胡汉民这场“由晨至晚”的辩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对时局的宣言。他对时局估量的基本出发点,是利用列强暂时采取中立的态势,迅速完成推翻清王朝、实现共和政体的大业。他的策略是以共和国元首的位置为代价,逼袁世凯拥护共和政体,利用袁来推翻清王朝,终结帝制,达到实现共和的目的。

12月下旬,孙中山偕胡汉民离粤赴沪。辛亥革命这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至此奏响了十分重要的一章。

24 催生中华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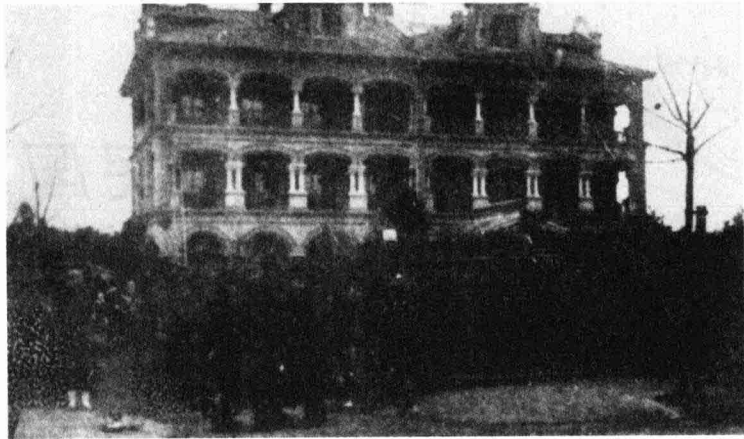
1911年12月25日,历经16年海外流亡和艰苦斗争的孙中山,终于回到了上海,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他接受记者采访,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紧张地工作,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到上海巧答记者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当天早晨,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建威”号军舰前往吴淞口迎接。由于多日阴雨连绵,吴淞口笼罩在一片迷雾中,当孙中山所乘邮轮从旁边驶过时,“建威”号竟然没有觉察。幸亏革命党人已先期乘“江利轮”在吴淞口迎候,才不致误事。



■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时留影



■ 宝昌路408号行馆外景

上午9点45分,悬挂着两面革命军旗帜的“江利轮”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海关码头徐徐靠岸。此时的孙中山心潮澎湃,历次起义的场景和为革命牺牲的同志

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涌现,但码头上的欢呼声将孙中山的思绪重新拉回到现实中。

孙中山一上岸,即受到黄兴、陈其美、汪精卫、黄宗仰等革命党人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并接受了革命派报纸《民立报》记者的采访。他向记者说:“武昌举师以来,即由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今归上海,得睹国内近状,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孙中山这一席谈话的主旨是希望革命党人团结一致,本着革命真精神与各种困难作斗争。因为当时同盟会已经逐渐趋于涣散,革命营垒内部出现了与旧官僚、旧政客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不良情况,所以孙中山有感而发,希望大家摒弃前嫌,团结一致,战胜困难。

孙中山接受采访后,先由黄宗仰等人陪同,乘车前往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所在地)午餐。然后,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安排到宝昌路408号行馆(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休息。

26日,孙中山接受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大陆报》主笔的采访,其中有如下对话:

主笔:君与日本政府有关系否?

孙:吾辈将与各国政府皆有关系。吾辈将建设新政府,岂不愿修好于各国政府?

主笔:君是否中国民主国大总统之候补者?

孙:我不能言。

主笔: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大笑：何故问此？

主笔：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否，故问此。

孙：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主笔：革命军中有内讧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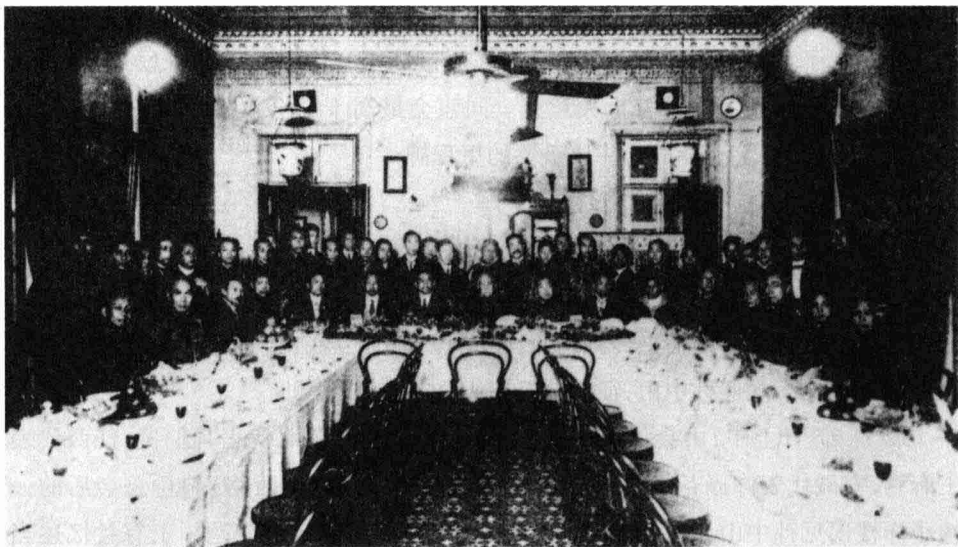
孙：吾辈从无内讧之事……

这些对话，孙中山表达了四个方面的意向：一是未来新政府的外交方针，即愿意与各国修好；二是对未来新政府的人选，避而不答；三是明确表示革命成败不在金钱，而在是否有敢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四是关于革命阵营内部团结的问题，断然否认“内讧”之说。

这四个方面都是中外瞩目的重大问题，孙中山的回答，巧妙地宣告了作为革命领袖对国内外大计的主张和看法，这不仅有利于稳住列强中立与不干涉的政策，而且有利于促成袁世凯向清王朝施压；既向党人呼吁团结一致，以大局为重，又向世人宣告，革命党人坚持革命精神的初衷，不以金钱为革命成败的关键。孙中山的答《大陆报》主笔问，显示了他主持“内外大计”的胸有成竹。

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

孙中山来到上海，使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在未来新政府首脑人选问题上的僵局有了解决希望。



■ 孙中山(左七)出席广东香山同乡会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宸虹园举行的欢迎宴会



如前所说,代表会议准备虚位以待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但袁世凯扬言要等到国民会议公决后,才能向清廷劝说逊位。为此,代表会议决定让大元帅黄兴暂代行使职权。可是黄兴既不愿意任大元帅,更不愿意代行大总统职权,成立临时政府一事由此难产。孙中山到上海后,使代表会议中的革命派看到了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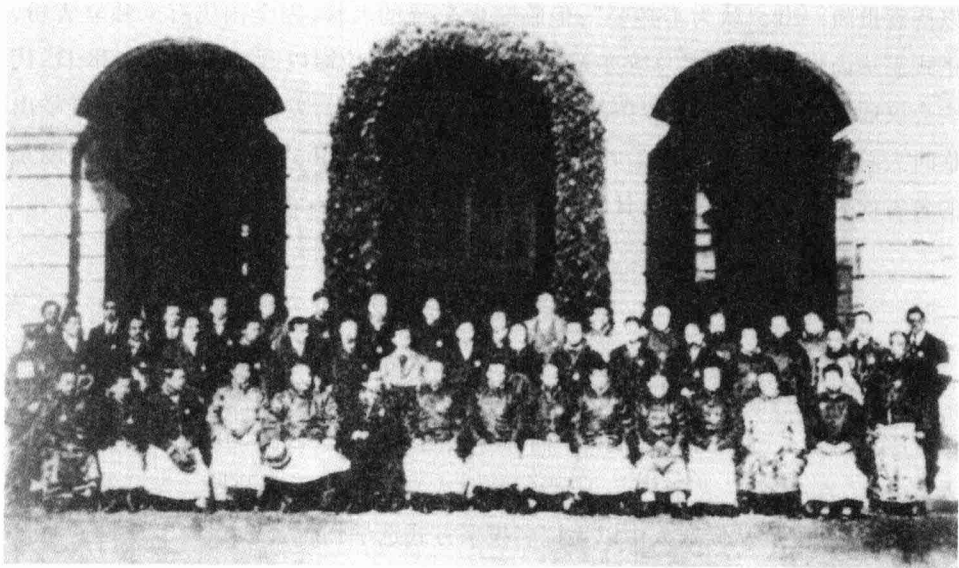
12月26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在宝昌路行馆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出席者有胡汉民、黄兴、陈其美、汪精卫、宋教仁、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人,会议主题为“选举与组织政府问题”。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决定采用总统制。在这两个问题上,宋教仁早有推举黄兴为大总统、自任内阁总理的意向。由于大家一致拥戴孙中山出任民国大总统,宋教仁服从党议,但仍坚持实行内阁制。孙中山认为非常时期中国不适合实行内阁制,并指出:以内阁总理对国会直接负责来限制和排除总统的作用,容易造成大权旁落。中国形势错综复杂,应集权于总统一身,怎么能对一个因大家信任而推举出的总统又处处设法加以防范呢?他声称自己不愿意作个傀儡,以误革命大计。孙中山观点明确,态度鲜明。张静江第一个表态,说:“对,先生之外,没有第二人能这样说。我们只有遵从先生的意见行事。”于是大家都同意了孙中山关于总统制的主张。宋教仁则保留自己的意见。

27日晚,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继续开会,会上决议选黄兴为内阁总理。黄兴不允,再三推辞,经与会同志反复劝说,最后同意。当夜,居正、宋教仁同赴南京。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对打破各省代表会议在选举上的僵局,催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和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孙中山作为被同盟会推举的大总统候选人,对新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有着重大意义。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的适时召开及其决议,在中华民国史上无疑成为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当仁不让 舍我其谁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消息传到南京,使彷徨无策的各省代表大为振奋。会议决定派代表到上海欢迎孙中山,征询他对组织临时政府的意见。

12月27日上午,由会议派出的广西代表马君武、湖北代表马伯援、江西代表王有兰、安徽代表许冠尧等到达上海,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斜桥总会后的一幢小洋楼谒见孙中山。在致欢迎词后,双方即谈到组织政府问题。王有兰忆述当时的谈话要点如下:



■ 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后合影

同人谓:代表会所决议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武汉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南方如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议又决议此职暂时留以有待。

先生答: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同人谓:这样发生修改组织大纲问题,俟回南京与代表会商量。

先生谓:本月十三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

同人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用,必多窒碍,似宜慎重。

先生谓: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使得欢迎孙中山的南方代表心悦诚服,大家都感到孙中山真挚亢爽,直截了当,“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一洗中国缙绅虚伪谦虚、矫揉造作之态,虽细微处,亦见伟大”。

欢迎孙中山的代表在了解孙的意图后,于当夜回到南京。28日,各省代表会议开会,由马君武报告在沪与孙中山会晤情况。经讨论,代表会议对保留总统位置

24
催生
中华
民国



以待袁世凯一事,“认为不必要”;但临时大总统的名称,因全国仍有未独立省份,正式宪法尚未制定,正式总统亦无从产生,所以仍然应冠以“临时”字样。28日,代表会议通过了采用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临时大总统和实行差额选举法。当天推举出临时大总统候选人,但投票后并未开箱,决定翌日举行正式选举,并要求离开南京的各省代表务必于12月29日回到南京以参加选举。

当选临时大总统

12月29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到会代表有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山东、河南、直隶、奉天等共17省49人。上午9点,庄严的临时大总统选举正式开始。先开箱检出候选人选举票,然后从候选人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临时大总统。

会议由议长汤尔和担任主席,王宠惠为副主席,袁希洛为书记,刘之洁为监选员,先揭晓28日投票选举的候选人,结果获得临时大总统候选人资格者共3名——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然后进行正式选举。按规定,1省1票,会议代表17省,共计17票,凡满投票数2/3以上者当选。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选举当天,代表会议作出了三项决议:一、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上海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二、通电各省都督府,请每省选派参议员3人,来宁组织参议院(即国会),参议员未到院前,由本省参加代表会议成员中暂留1至3人代行参议员职务;三、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员系由各省督府所派,至于各省咨议局所派代表,仍称某省代表,得列席参议院。第一项决议,由各省代表具签名书,表示对选举正常有效的证明,第二、第三项决议,确定参议院的组成。这样,政府、议院都有法定依据。



12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又通过决议:袁世凯和谈代表唐绍仪要求开国民会议公决共和还是君宪的政体问题一节,应由南方各省议和代表伍廷芳转告,17省代表已选举临时大总统,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不用再开国民会议。

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和严正拒绝袁世凯召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两事,向世人表



■《民立报》刊登的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明,尽管有党见、政见的差异,但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和革命派的领袖,终究为历史所选择,为国人所认定。而一旦获得独立的人民,完全有权威藐视骄横不可一世的旧权威。

选举完成后,即由代表会议电告在上海的孙中山,请他赴南京就职。孙中山于29日下午3点接到选举总统的正式报告,立即复电南京各省代表,表示“当冠日赴宁就职”。

孙中山同时致电黎元洪和袁世凯。黎是三个候选人之一,孙中山致电给他,自然有抚慰之意。给袁世凯电报,则寓有深意,电文表示:

“公方以旋移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很明显,这个电文,既是将来必当让位于袁世凯的声明,又是促袁推翻清廷、赞成共和之忠告。孙中山为实现民主共和政府大业,不计个人进退的高尚情操表露无遗,但也显示了他的无奈和对这个举措的消极后果缺乏充分的估计。

24



25 临时政府成立

共和既成,孙中山旋赴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短短的3个月里,孙中山主持的临时政府陆续颁布了30余项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法令。

赴宁宣誓就职

1912年1月1日,无论是对孙中山个人还是对中国历史而言,都将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孙中山身穿黄褐色呢质军服,头戴嵌有红边的军帽,从哈同花园乘马车来到上海北站,乘专车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沪军都督陈其美代其准备一切,并嘱咐:“我辈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是日,依然有



上海各界人士及市民数千人自发集聚车站欢送孙中山。孙中山与欢送者合影后登车，45名敢死队员承担了专列的安全保卫工作。上午11点，专列在“共和万岁”的欢呼声中徐徐驶离上海。

专车沿沪宁线北上，沿途有很多民众自发来到车站欢送孙中山前往南京就职，至常州、镇江时，欢迎人数达万人。

下午5点，专车缓缓驶入南京下关车站，瞬间礼炮齐鸣，“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南京政界、军界、在宁各省代表和男女学生四五万人在车站恭迎大总统的到来。孙中山在此换乘小火车前往两江总督署东剑道车站。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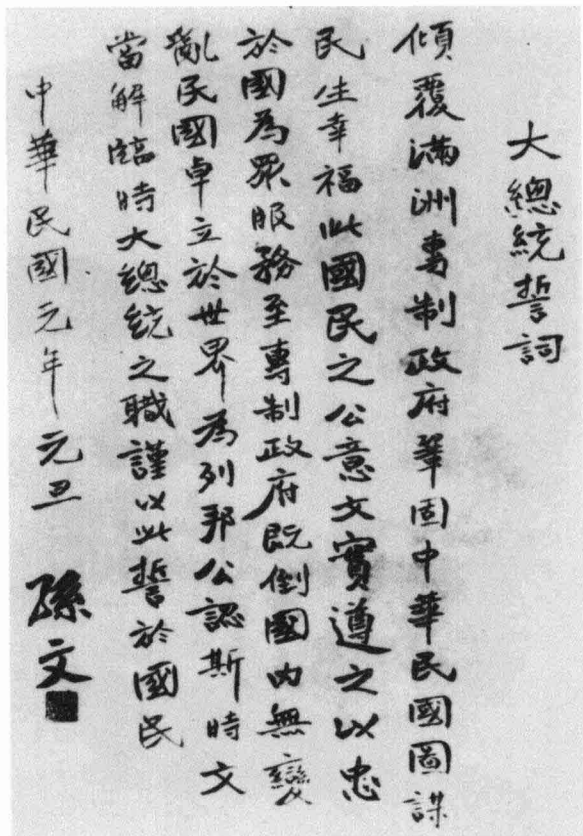
京城内彩旗飘扬，处处洋溢着一派节日的气氛。

孙中山在东剑道车站换乘一辆蓝色丝绸花马车，在军乐队凯旋曲中直抵原两江总督衙门。太平天国时期这里曾是天王洪秀全的府邸，此时将作为共和国的总统府，迎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到来。

总统府已是华灯高照，彩旗与苍松翠柏交相辉映。总统府前广场上自发聚集了大量南京市民，他们翘首以盼孙中山的到来。在军乐声和人群的欢呼声中，载着孙中山的马车缓缓驶来。孙中山从容地走下马车，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并与革命同志握手寒暄，在黄兴等人的护送下走进了总统府。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在朴素而不失庄重的总统府西暖阁内举行。孙中山身穿刚缝制的大总统礼服，笔直地面南站立在暖阁正中，表情庄重而严肃。各省代表、各军将领、各界人士200多人以及各国领事、外宾，站立两侧。

当晚11点，司仪宣布“中华民国大总统莅位典礼开始”后，山西代表景耀月首先向与会者报告选举经过，最后高呼：请大总统宣誓就职。孙中山举左手高声宣誓：



■ 孙中山手书的大总统誓词



■ 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

在宣读就职誓词后，孙中山立正躬身敬受大总统印。在掌声和欢呼声中，一向沉稳的孙中山，此时激动得举起双手向大家表示感谢。

典礼结束后，孙中山设宴款待各省代表及来宾。晚宴结束，孙中山亲自送代表们到大堂阶沿。代表们一再恳请他留步，孙中山说：“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礼当送至阶下。”他在阶下与代表和来宾握手告别。在寒风细雨中等候多时的数万民众热烈鼓掌，孙中山亲切地向大家挥手致意。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明确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规定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规定对内方针：“民族之统一”、“领土之完整”、“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宣言发布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在1912年1月2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 中华民国改元纪念章

主要施政措施

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孙中山提交的各部部长、次长任名单。陆军、海军、司法、财政、外交、内务、教育、实业及交通9个部的总长中，同盟会员占3名，立宪派和旧官僚占6名；各部次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则全由同盟会员担任。各部部长多数并未到任，多由次长在南京主持工作，因此被称为“次长内阁”。各省代表会议继又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1月28日，改各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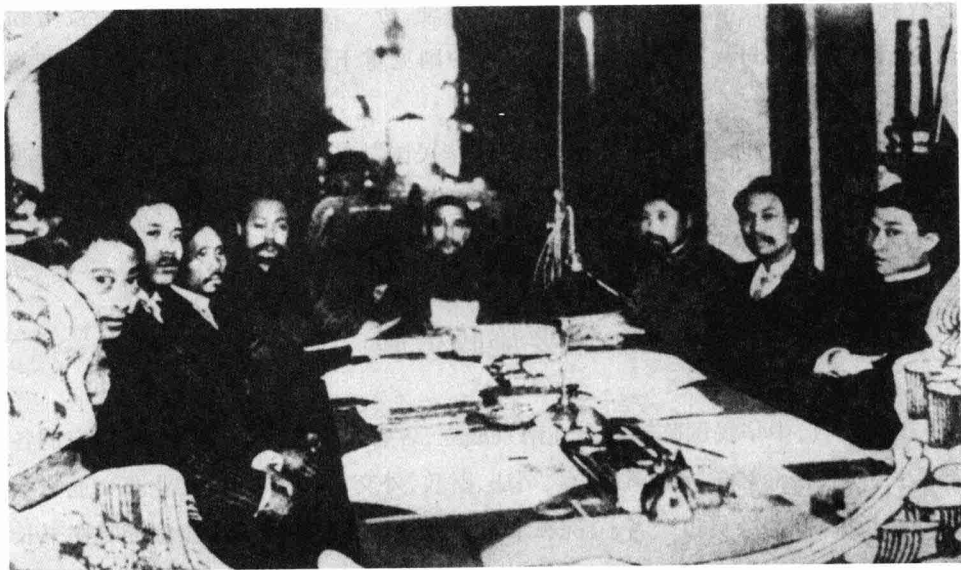


代表会议为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充任参议员,推林森为议长。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终于诞生了。

临时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政府,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追求民主共和而多年奋斗的结果,它的成立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孙中山为建立完整的民主共和国,履行他“尽扫专制之流毒”的誓言,在短短的3个月里,主持临时政府陆续颁布了30余项有利于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法令。

在政治方面,临时政府制定了效力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过程中,孙中山强调“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之所以如此,“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仿照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它根据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为了保护人民权利,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整顿警察,维持治安,整顿吏治,严禁违法乱纪。临时政府还改革了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如限期剪除辫子,禁止缠足,禁止种植、吸食和贩卖鸦片,禁止蓄娼,反对封建迷信等。“临时约法”所包含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对于长



■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左起:海军总长黄钟英、教育次长景耀月、教育总长蔡元培、财政总长陈锦涛;右起:财政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黄兴)

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启蒙意义；同时，它也成为后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同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经济方面，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废除部分清代的苛捐杂税，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

在文化教育方面，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些进步主张，并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规定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止读经、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于“共和国宗旨”；新办工业科技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蒙回藏师范学校。

在对外政策方面，临时政府主张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

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拟订和宣布的这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目的是要清除封建余毒，保障民主政权，维护人民权利，促进社会生产，革除社会恶习，以有力地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

面临财政困难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然而，缔造共和的大业并不



■ 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出席临时参议院成立典礼时与参议员合影（前排左三起：蔡元培、黄兴、孙中山、赵士北、魏宸组、胡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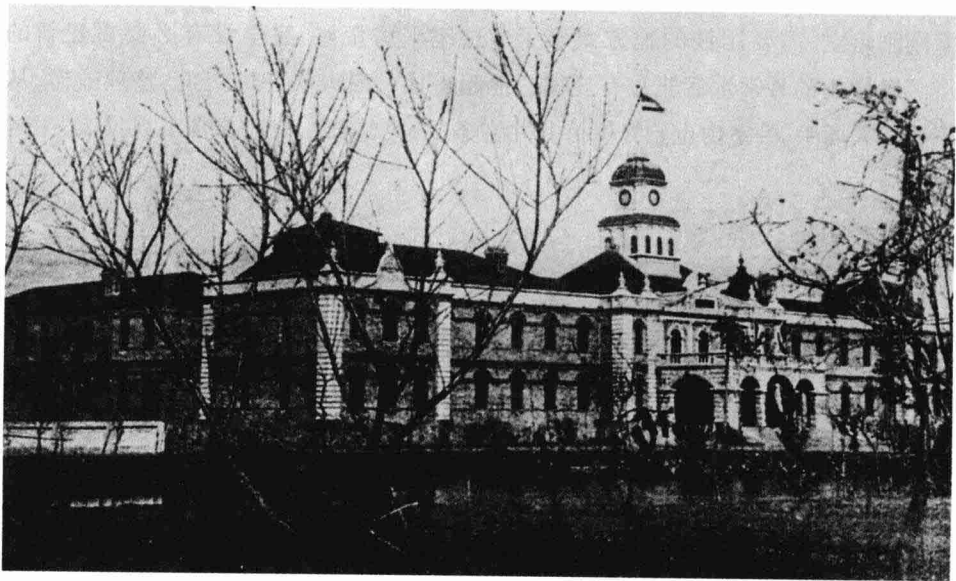


■ 1912年2月5日,孙中山召开内阁会议时留影

是一帆风顺的。财政困难是临时政府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一贯敌视中国革命的帝国主义，极力在经济上对临时政府施压，企图从经济上绞杀革命。帝国主义借口保障外债偿付，乘机完全攫取中国海关税收，拒绝用海关税收接济临时政府，同时从根本上否认临时政府借款的资格，拒绝了临时政府的借款要求。革命党人占领的各省税收也为数不多，供应各地军政府尚嫌不足，更无力上交中央政府。华侨赠款和国内民众的捐助，数目毕竟有限，不能最终解决问题。所以临时政府刚成立，就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不仅难以支付 10 多万部队的军饷，连日常开支也无法保证，甚至出现财政部金库只剩下 10 元钱的危急局面。临时政府几乎难以编制财政预算。

为解决财政危机，孙中山曾主张厉行征发，但由于内部意见不一作罢；发行千万公债，但“未尝得一钱以应急”。孙中山不得已采取“借各省之各种实业，以为抵押而借款”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在 1912 年 2 月，发生了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的事件。

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 3 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于 1908 年由盛宣怀奏请清政府批准合并而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 7000 多人，年产钢近 7 万吨、铁矿 50 万吨、煤 60 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 90% 以上。由于汉冶萍公司是当时唯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控制该公司实际上等于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



■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外景



孫中山



■ 盛宣怀

在“军民待哺，日有哗溃之虞”的困境下，孙中山派人向逃往日本的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募款，说：民国对于盛宣怀并没有恶意，如若盛氏能为临时政府在日筹款，“自是有功”。盛宣怀为保住自己的产业，便在日本奔走借款，并与日本签订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其中规定：“公司股本为日金 5000 万元，并由中日合资办理”，“除公司现存由日本借入日金 1000 万元外，公司尚需续借日金 500 万元。”

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大哗，各界抨击之声不绝于耳。临时参议院也两次对此事提出咨询。事后孙中山感叹道：“此事非弟不知利权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

平民大总统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生活上简朴如常。总统办公室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面仅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一个小书橱和一套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在孙中山的办公桌上除了文具盒和公文外，还摆着一些书籍。不少人建议孙中山在总统府内另建一座办公楼，但都被一一拒绝。孙中山告诫部下说：“国家刚刚建立，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这座平房蛮好，完全没有必要再建新了。”孙中山的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他起得比一般人早，坚持自己整理被褥，从不要他人插手，卧室内也始终保持井井有条，清爽整洁。他还非常重视仪表，平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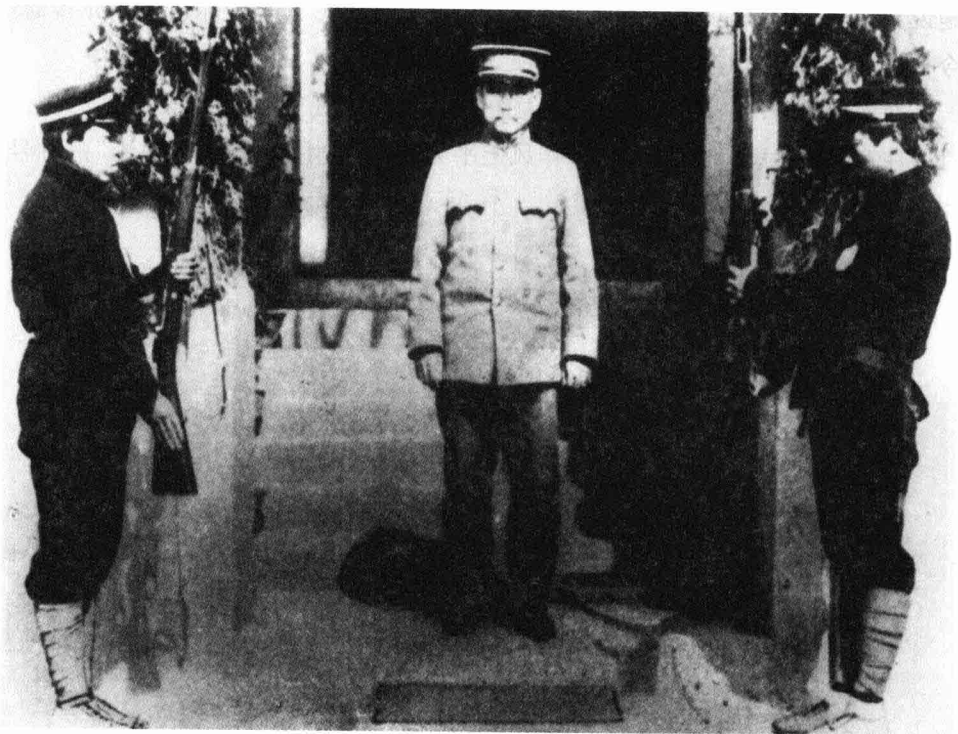


着装朴素、庄重,除了发的军装外,经常穿的就是一件半旧的中山装,外出戴的礼帽也褪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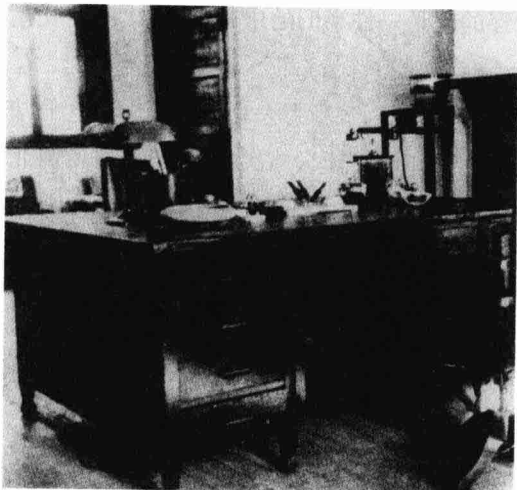
当时,总统府内工作人员每餐花费约在3元以上,身为大总统的孙中山吃的却是4角钱左右的素菜,而且他从不讲究吃什么和使用什么档次的餐具。一日,南北双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前往总统府晋謁,孙中山留他二人吃饭,除几碟普通菜外,别无佳肴,这使得生活一向奢侈的唐绍仪无法下箸。孙中山的言传身教,也让他身边的秘书和卫士都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习惯。

孙中山非常反对摆官架子。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在总统府内称他“孙先生”,不要称大总统。1912年3月初的一天,孙中山便装步行去参加同盟会的一次会议。会场门口的卫兵拦住他,说是孙大总统要来,别人不让进去。孙中山微笑着说:孙大总统不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吗?他不过是百姓的公仆。孙中山拿出名片,卫兵看后,惊慌失措,怎么也不会想到大总统会穿着便装步行前来。孙中山微笑着走了进去。

有一天,孙中山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卫队长郭汉章走进来报告:“有一个80多岁的盐商,特意从扬州赶来,说是要一睹大总统的容貌。我们说大总统很忙,没



■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总统府办公室前留影



■ 孙中山南京临时总统府办公室内景

时间见他,可是他不愿意离开。”孙中山闻言笑道:“扬州盐商名闻天下,我倒是很想见见这位老先生,快请他进来。”不一会,孙中山就看到一位老者在郭汉章的搀扶下从前门走了进来。老者看到站在走廊上迎候自己的孙中山,连忙跪下,行起三跪九叩之礼。孙中山疾步向前,将老者搀扶起来,说:“三跪九叩是旧礼陋俗,如今民国建立,人人都是平等的。”接着孙中山又询问起老汉姓名,来此有何事。

老者答道:“我姓萧,是专门来看民国的大总统是什么模样。”孙中山笑着说:“你看,我不是和大家一样吗?民国的总统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国民服务的。”老者又问:“总统离职后呢?”孙中山正色答道:“总统离职后和百姓一样。”老者非常兴奋地说:“我来之前,邻里都笑话我老糊涂了,说大总统怎么会见你这样一介盐商?今日我算是见到民主了。回去后我一定要告诉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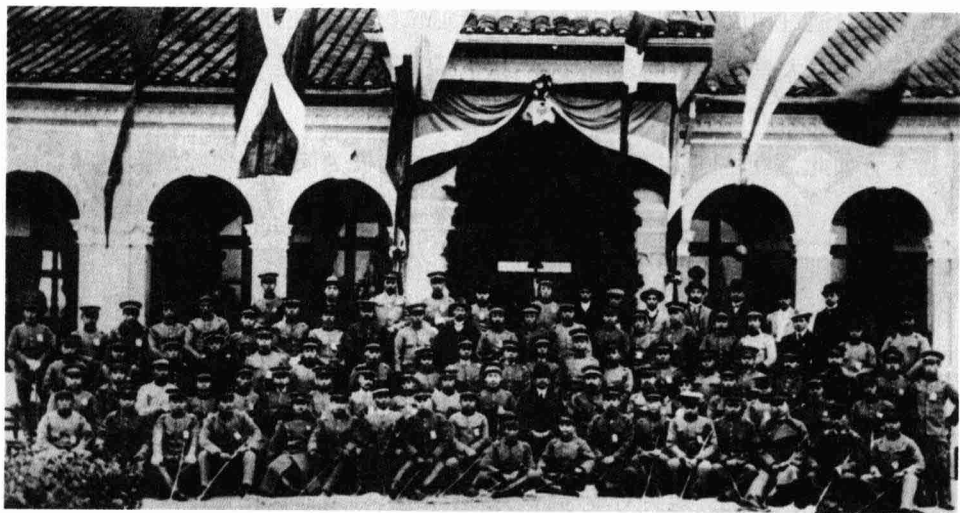
在南京期间,孙中山还经常走出总统府走访群众、视察市政,每次外出,孙中山都很注意不要扰民。生活上简朴,作风上平易近人,孙中山“平民大总统”的称号当之无愧。

26 让位于袁世凯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的3个月内,克服重重困难,勉力而为,组建了临时政府,成立了临时参议院,颁布了30余项法律法规,包括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共和政体初具规模。随着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位于袁世凯,共和制度实际上在摇篮中被扼杀了。

“虚位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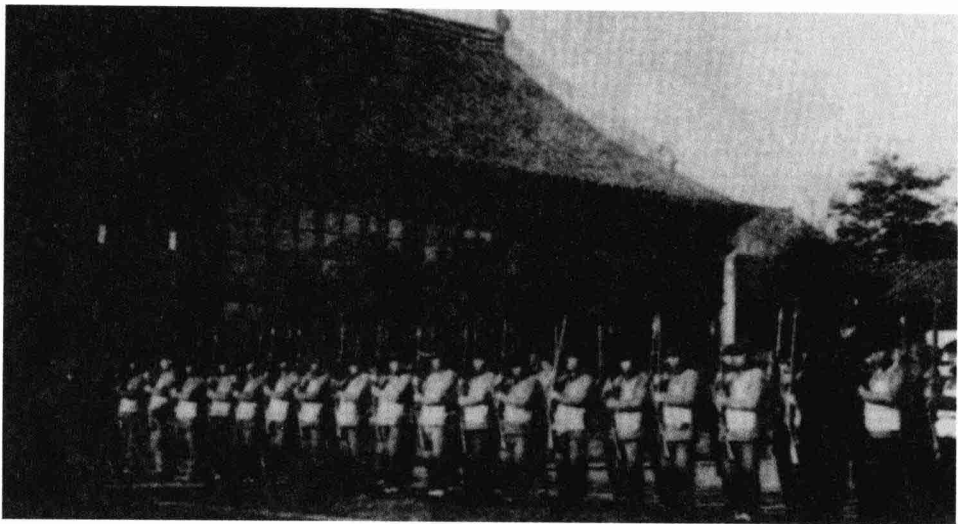
孙中山回国后,很快发现自己被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被各省代表推举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领袖;另一方面又被作为过渡阶段的政府首脑来看待。各省代表原先通过的正式决议依然有效:只要袁世凯反戈倒清,孙中山就要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革命老人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孙中山先生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



■ 1912年1月9日,孙中山与陆军部人员合影(孙中山左为陆军总长黄兴,右为陆军次长蒋作宾)

26

让位于袁世凯



■ 1912年驻扎南京待命北上的广东北伐军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把建立民国的重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一度不赞同与袁世凯妥协议和。因此当他刚从海外归来时就讲：“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主张采取强硬态度用武力北伐讨袁。但是孙中山希望早日实现共和与南北统一，因此他又想利用袁世凯，“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以此避免流血，尽早结束战争。同时，孙中山对袁世凯也是抱有一些幻想的，认为“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孙中山主观上并未反对通过和议，利用袁世凯加速清帝退位，达到“建立民国”这一目标。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致电袁世凯，表示对于总统职务只是“暂时承乏”，对袁“虚位以待”。

尽管如此，袁世凯仍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他唆使部下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召回和谈代表，以中断谈判相威胁，企图使南方革命势力作出更大的让步。

孙中山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毫不退让。1912年1月11日，他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定进军计划，下令出师北伐。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财政上捉襟见肘，身为大总统的孙中山实际上没有多少军事实力，革命党人内部思想也不统一，所以尽管北伐战争偶有胜利，但是很难一鼓作气继续下去。

袁世凯一方面调兵遣将对革命势力进行反扑；一方面又抛出了北京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他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以“统一”中国的诡计。孙中山

坚决抵制了袁世凯的这一阴谋，斥责他是“民国之蠹”，宣称：“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举国民军，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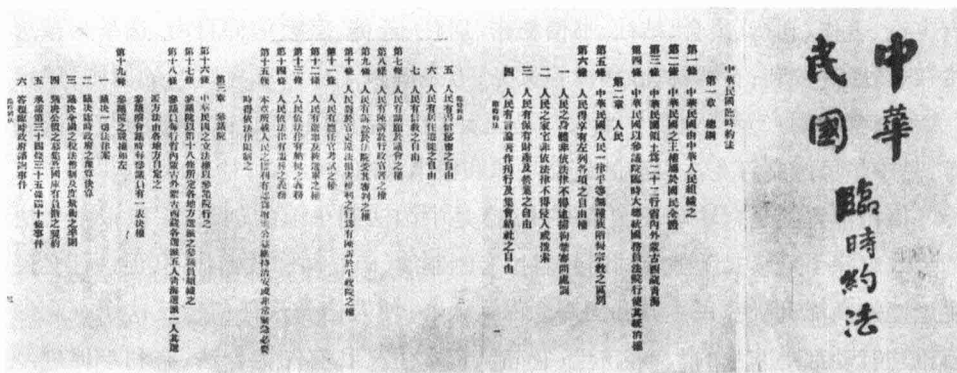
但帝国主义国家极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视其为新的代理人，他们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拒绝给予贷款，甚至调兵遣将，施加种种压力，催迫孙中山尽快与袁世凯达成协议。

临时政府内多数成员认为由袁世凯推翻清政府对革命是有利的，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主张向袁让步。黄兴认为：“南方实力不如北方，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以剖腹谢天下。”汪精卫则坚持联袁倒清实现共和的计划，并生怕袁世凯变卦，因此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表示不满，有时竟然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听后极为生气。

在此情形下，孙中山表示，只要“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清朝隆裕太后连发3道懿旨，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实行立宪共和国体。第二天，孙中山当即表示让位于袁世凯。消息一经公布，引起全国上下巨大反响！许多革命党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有的甚至愤而自杀。海外华侨纷纷来电，反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

制定《临时约法》

为形势所迫，孙中山只好让位于袁世凯。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防备袁世凯撕毁协议，破坏共和，孙中山在提出辞职的同时，附加了3项条件：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得更改；第二，辞



■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0
让位于袁世凯



■ 1912年2月15日上午11时,孙中山率各部将士赴南京明孝陵,行祭告礼

职后,新总统必须来南京就职,原总统和国务员再行解职;第三,《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订,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其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8日由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它有六大基本内容:一是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二是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从而确认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三是规定了国家机构采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体制;四是规定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与义务,其中包括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徙、宗教信仰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请愿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五是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六是规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效力与宪法相等,是中华民国制订宪法以前的最高法律和根本大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举,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共和政治体制,促进社会民主思潮的高涨,促使“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与行动都是非法的”。经济上,它确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合法,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政治上,它确认中国为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统一的多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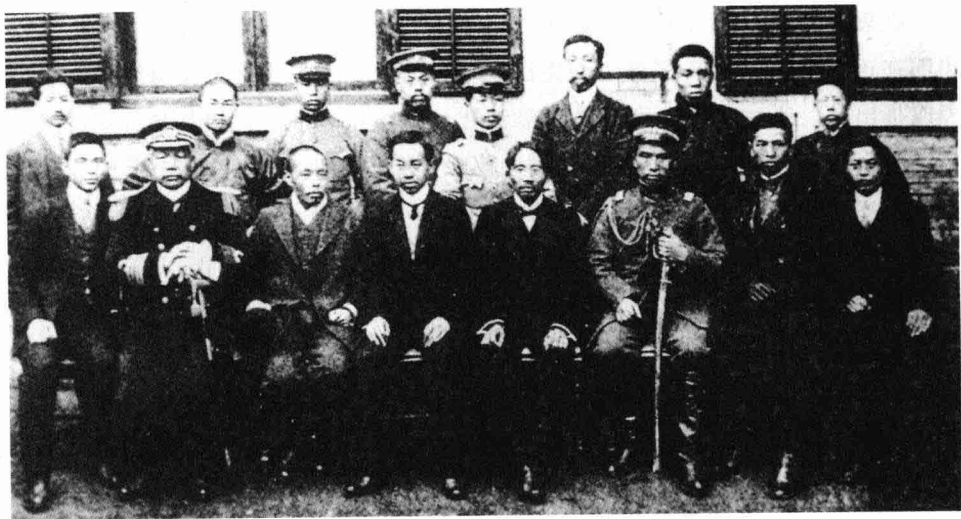
族国家,从而对民族独立、反对分裂与维护统一提供了法制根据。

孙中山在提出辞职时附加3个条件的目的在于,把袁世凯调离经营多年的京津老巢,迫使他到革命力量相对集中的南京就职,以便新总统摆脱封建腐朽势力的包围,置身于革命的势力氛围之中,并用《临时约法》加以约束,以防止袁世凯上台后推翻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经参议院通过后,一再电催袁世凯南下就职。

同意袁世凯北京就职

在北方,袁世凯接收了清政府的政权,控制了北方的军队。临时政府又在促他前往南京就任,奸诈的袁世凯当然知道孙中山的用意,离开北洋巢穴南下就职等于削去羽翼。他迟迟不肯南下,并假惺惺地表示:“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孙中山在多次电催未果的情况下,委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为迎接员,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等人于1912年2月27日抵达北京,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打开了以往只有皇帝才能进出的正阳门,以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蔡元培等人。在车站,袁世凯拉着蔡元培的手假惺惺地说:“赴宁就职一事,我已做好准备,不日即启程。”又说:“赴任前,拟先往武昌面见副总统黎元洪,然后顺江东下到南京。”袁世凯的一席话,让蔡元培等人备感意外,心中疑惑顿释,安心留在北京等待。



■ 南京临时政府派出的迎袁专使团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右四为蔡元培)



■ 北京兵变后由各国领事馆卫兵组成的国际兵团

如此动乱，倘若袁世凯南下，北方局势将不可收拾。蔡元培等人立即将北方情况向孙中山报告，并反过来力图说服南京临时政府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帝国主义也再次跳出来支持袁世凯，纷纷向北京调兵，故意制造紧张气氛。许多立宪党人、旧官僚和一些革命党人，也都主张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国内政局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如果再发兵北上迫袁南下，就是“师出无名”了。在妥协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再次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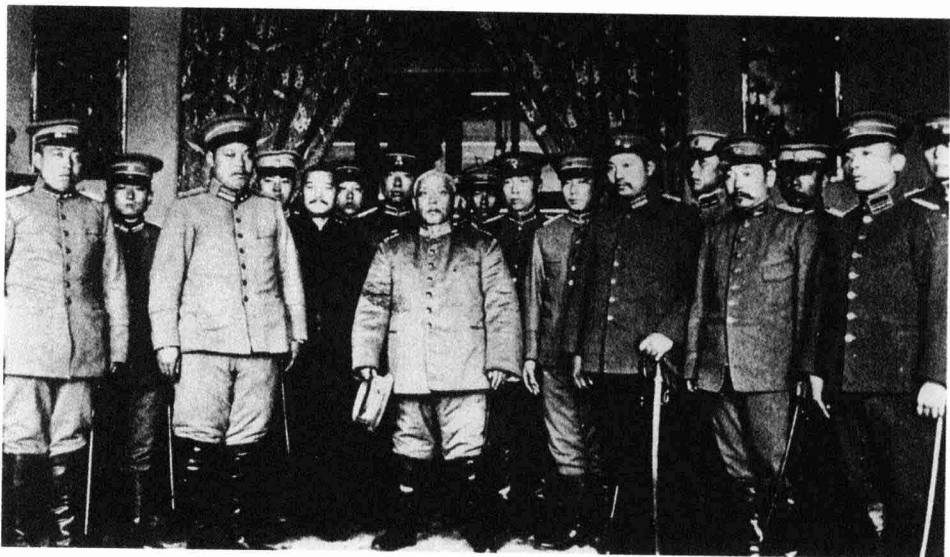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宣誓就职。下午3点，他仍身着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出现在就职典礼上。一些人对袁世凯赞成共和制度的诚意有所怀疑，孙中山无奈地安慰他们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

在袁世凯宣誓就职的次日，即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申明在正式宪法产生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这是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时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他认为依靠法律可以防止袁世凯背叛共和。袁世凯对于孙中山要求他遵守临时约法和临时参议院颁布的各项法律并不介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遵守任何法律。此后，围绕维护约法与破坏约法的问题，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势力展开了史称“护法运动”的斗争。

袁世凯表面上赞成共和，却掩盖不了独裁的企图。在就职问题上得手后，袁世凯并不满足，提出要“修改”《临时约法》，为他日后废弃《临时约法》埋下伏笔。他置南北议和的约定和临时参议院决议于不顾，借调整各省督抚，大力安置北洋旧部，不断扩充势力。临时政府时期所取得的各项民主成果不断被袁世凯所蚕食，共和制度实际上在摇篮中被扼杀。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并成立了国民党，竭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准备用资产阶

在破格欢迎的伪装下，袁世凯暗地里却精心策划着兵变。1912年2月29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军开始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处制造兵变，烧杀抢掠，荼毒民众。身处北京的专使团被兵变所吓倒，认为袁世凯未离开北京就已经如



■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就职典礼上同部分军政人员的合影

级的民主政治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一心要建立独裁统治的袁世凯当然不愿意。在收买不成之后,谋划暗杀宋教仁,上海北站的一声枪响,结束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使他所积极倡导的民主政治无果而终。此后的袁世凯,独裁野心急剧膨胀,尽管孙中山曾倡导“二次革命”,但也未能阻止袁世凯独裁政治的步伐。在逼迫参议院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解散了参议院,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仅存“中华民国”4字。最终,袁世凯背弃了他“永不使专制政体复行于中国”的诺言,帝制自为的闹剧随即上演。



27 视察各地 倡办实业

1912年3月12日,将要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写信给康德黎夫人说:“满清的逊位,并非是中国的完全得救。在我们的面前,尚有大量工作必须完成,俾使中国能以伟大强国的身份与列国并驾齐驱。”正式辞职后第三天,他就启程南下,到全国各地视察,足迹达大半个中国。他在所到之处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同时兴致勃勃地投身于“振兴实业”和“发展物力”的各项活动。

足迹遍布南方

当孙中山被迫把政权让给袁世凯时,并没有意识到革命已遭到破坏,反而认为革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



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当努力的即在此事。”这是1912年3月底,孙中山在千余南京同盟会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说的话。在这次关于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的长篇演说中,孙中山以平静的心态说明辞职不是不做事情,而是有比政治更要紧的事情等着他去做,那就是社会革命,发展民生,让人民“全数安乐”,享受幸福。孙中山主张要发展实业就要借外债,要使国家富强,实行均富,防止资本家垄断,就要采用国家社会主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4月3日,卸任离府。各部总长、次长、军政长官及军队为孙中山举行了送别仪式,并合影留念。在总统府大堂前的空地上,护卫队持枪立于两旁,前导马队整齐威严地排成方阵,一辆敞篷汽车擦得铮亮,悬挂在廊檐下的旗帜在春风中轻轻飘荡。总统府门外被自发赶来送行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孙中山看到众人依依不舍的样子,便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我不是李后主,更不是什么亡国之君啊。《礼记》上说‘大道之行,天下为



■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在湖北都督府与欢迎人员合影(前排左二起:孙科、汪精卫、黎元洪、孙中山、胡汉民、李晓生;二排左五起:孙婉、秘书宋蔼龄、孙妮;三排右四:廖仲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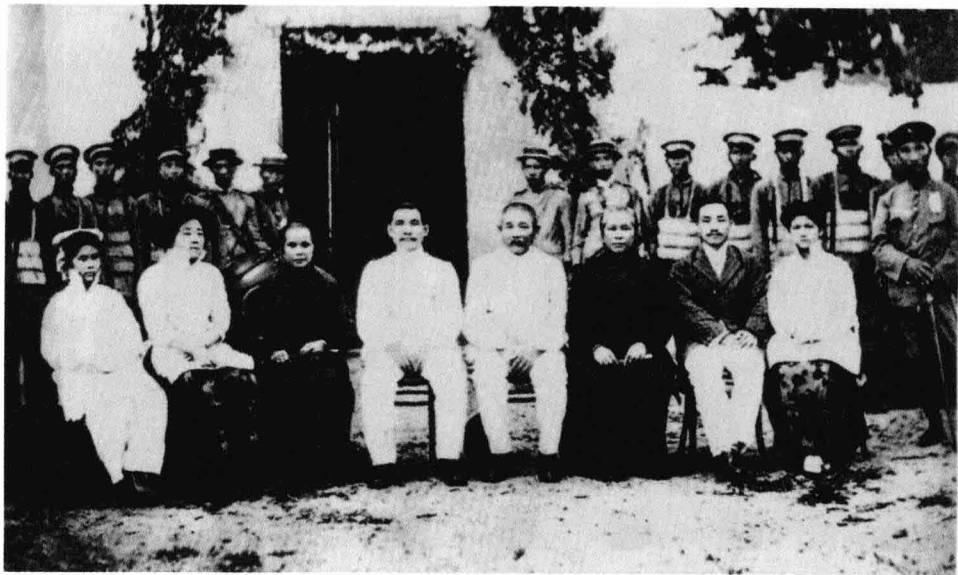
公’。只要以‘天下为公’，便可处处有‘大道之行’。我计划10年之内，修建铁路20万里，造福天下民众。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啊。”

孙中山与前来送行的人握手告别后，登上了敞篷汽车，同行的有唐绍仪、胡汉民、于右任等人。汽车缓缓驶出总统府大门，“天下为公”的声音依然在人们耳边回荡。

离开任职91天的南京临时总统府后，孙中山乘专车抵达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中外记者，表示自己辞职后将尽力从事社会革命，并提出中国实行民生主义需要借助外国财力修筑铁路等等；其间，他还携子孙科、女孙婉、孙姪考察了上海江南制造局。

4月7日，孙中山接受黎元洪邀请，坐船从南京赴武汉。到达武汉时，黎元洪派代表孙武、蒋翊武等迎接孙中山上岸，当他坐马车途经长安街的时候，街道两旁的店铺民房，结彩悬旗，燃烛焚香以表达敬意。一路上，老幼夹道瞻仰，孙中山看到道路被人群所拥塞，就让驾车的人慢慢走，以免伤着民众。在武汉几天，孙中山不仅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还多次演讲民生主义。

4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住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91号宋耀如家中。第二天，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及上海商界欢迎会上演说民生主义。4月17日上午11点，孙中山出席“中华实业联合会”在张园举办的欢迎会，在会上，他被推选为该会的正会长，并发表了民生主义的演说，指出中国非常贫穷，一定要发展实业，



■ 1912年5月，孙中山在家乡翠亨村住宅前与亲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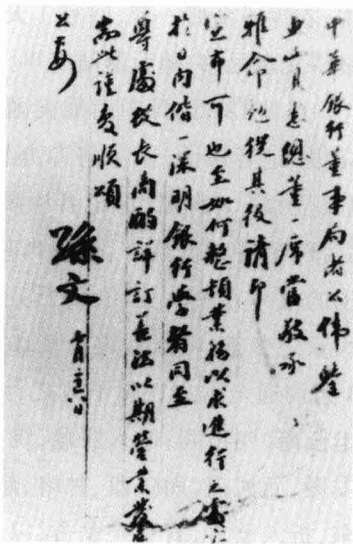
三民主义的归宿就是民生，即发展实业。“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

4月18日清晨4点，孙中山乘招商局“顺泰轮”号启航赴广东。4月20日，当轮船抵达福州时，江面小船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孙中山看到后，当即表示不满，说自己是卸任总统，是平民，“万岁”是帝王的称呼。前来迎接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赶紧命人改为“欢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这才离船登岸。在福建马江，孙中山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船槽、锅炉、拉铁各厂。

孙中山在福建停留3天后，于4月22日从福州启程继续南下，24日抵达香港。本来香港居民打算召开欢迎会，因香港当局不允许孙中山登岸，于是孙中山下午乘船前往广州。第二天，抵达广州天字码头，陈炯明派出数千军队，自码头至都督府沿途迎接。孙中山登岸时，长堤上人头攒动，大家都想一睹伟人风采。

在广州期间，孙中山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不断出席各界欢迎会，多次解说平均地权的方法和意义。有一次在广东省记者的茶话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说自己这次来广东办两件事，“其一是练兵……其一则办实业，使粤人生计不至困难”，并答复了报界人士提出的关于借债、外人监督财政、报界应如何忠告政界等问题。

5月下旬，孙中山访问了自己曾经挂牌行医的澳门镜湖医院，接着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故乡——香山县翠亨村。当乡亲们看到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回来，自然感到无比自豪，纷纷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孙中山穿着整齐的西服，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地向路旁群众挥手致敬，平易近人。面对贫困如故的家乡，孙中山很是不安。当乡亲们提出拨公款修缮祠堂、兴建道路、创办学校的要求时，孙中山说：现在国家百废待兴，财政困难，要想把家乡搞好，还得靠大家出力。孙中山摒除光宗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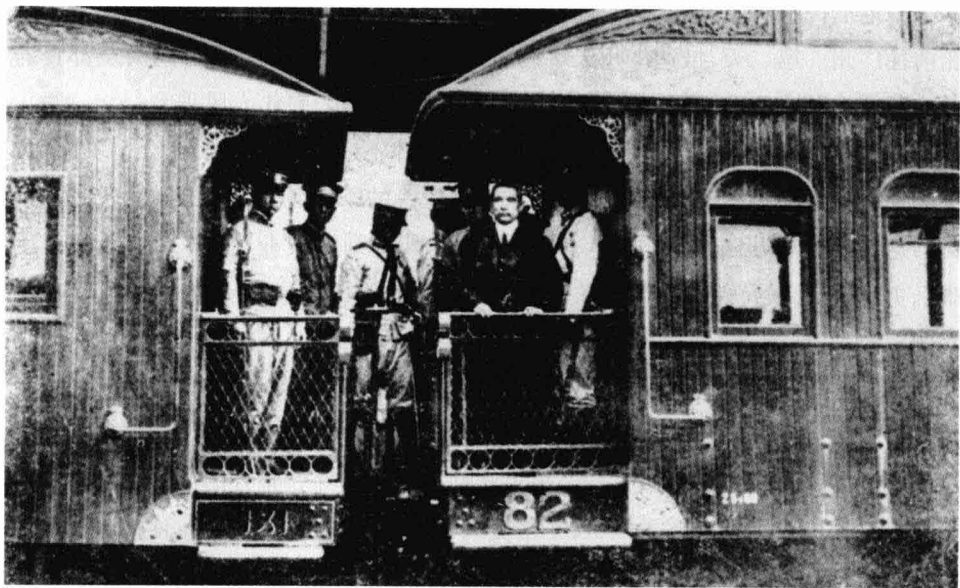
■ 1912年7月26日，孙中山复中华银行董事局允任董事函



祖、衣锦还乡那一套，回家3天演说3次。直到临别那天，才摆了10桌简便酒菜，宴请父老兄弟，随后返回广州。

6月18日，孙中山乘美国油船“高丽”号离粤赴沪，22日抵达上海后，与《民立报》记者谈话，表示将专办铁路事业，欲以10年期其大成。25日，又分别与《民立报》、《大陆报》记者谈政局、修筑铁路计划、外债、国民捐等问题。在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中，认为当时中国政局之困难是由经济困难所引起的，振兴中国的唯一方法，完全依赖于实业。他强调：“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还谈及3条沟通全国之铁路干线之计划：“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这个构想表明他对铁路建设的计划已胸有成竹。

在上海期间，孙中山与黄兴分别担任了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正副会长。该会原由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于右任等组建，一度解散。现因孙中山提倡铁路，重新恢复会长。孙中山还绘制铁路地图，详论建筑方针；订立《创办中华振兴商工银行草约》，计划与荷兰银行家合办银行；担任中华银行董事，议定中华银行完全商办，重订新章，扩大招股，并准备在各埠设立分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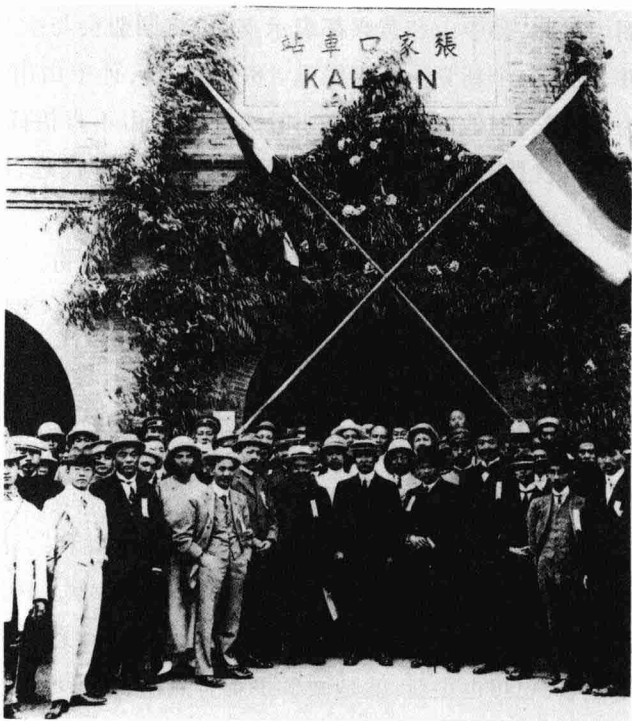


北上与袁世凯会谈

孙中山解职后,袁世凯一再邀请他去北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复电表示应允。当他在广州时,北京党派之争愈演愈烈,由几个党团组成的共和党,以拥护袁世凯为宗旨与同盟会对抗,而同盟会内阁成员自6月份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后也纷纷辞职。袁世凯想借孙中山和黄兴来调和矛盾,8月份又派人到上海敦促孙、黄二人去北京。当时,袁世凯借黎元洪电请之机捕杀了湖北两名革命党人,各省在沪人士认为袁世凯并非真心赞成共和,劝他们不要北上。孙中山认为不能失信于袁世凯,遂不顾自身安危,于8月18日乘“平安”号轮船离沪北上。船抵达天津塘沽时,孙中山对某报记者表示,北上无非是为了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项,如果袁世凯询问,一定会倾诚相告,要是袁世凯不问,他也不会过问。

到京后,孙中山到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会见袁世凯。袁在致词中假惺惺地说:“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答词表示:“如有所知,自当贡献。”并说:“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对于袁世凯的虚伪表现,孙中山没有察觉,他曾对人说:“袁总统可与为善,绝不中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8月至9月,孙中山



■ 1912年9月6日,孙中山视察京张铁路,与欢迎人员在张家口车站合影(前排左六为梁士诒,右一为叶恭绰)

27

视察各地
倡办实业



在北京与袁世凯多次会谈，他向袁世凯宣传了民生主义的主张，袁世凯大都表示赞成。据参与会谈的梁士诒回忆，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13次，每次谈话时间从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或12点，还有三四次谈到凌晨2点。谈话内容都是国家大政、中外形势。有一次，孙中山对袁世凯说，如果袁世凯练成陆军100万，自己将经营铁路20万里。袁世凯微笑着说：“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通过谈话，孙中山觉得与袁世凯政见大多相同，甚至对“耕者有其田”一事，本以为袁世凯会反对，结果袁不仅不反对，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此，孙中山不能理解，后来问过梁士诒，梁的回答颇有意思，大意是孙中山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剥削农民，又生长在南方，亲见佃农的痛苦，所以主张耕者有其田；袁世凯生长在北方，没有到过南方，而北方多数农民都是自耕农，受剥削的佃农少之又少，所以认为耕者有其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孙中山听了梁的解释后，哈哈大笑，认为二人谈话，“所见略同”。

孙中山北京之行除会晤袁世凯，另一重要任务就是调和党派之争。早些时候，面对同盟会与内阁的冲突，宋教仁主张在国会组织一多数党，以实现责任内阁。对此，孙中山和黄兴都表示支持，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成立一个新党——国民党。8月25日，孙中山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并被推为理事长，但他以自己要从事社会事业为由不肯担任，在黄兴、宋教仁和其他理事再三挽留下，才答应不辞，但仍委托宋教仁代理，以后对国民党党务也很少过问。

在北京期间，孙中山依旧尽显自己的平民身份。当他出席同盟会欢迎会的时候，发现途中没有行人，对袁世凯派来的招待员说：“我已是退位总统，是国民一分子，请将随从马队和沿途的军警一律撤去，如果袁大总统坚持不肯，我住一两天就走了。”袁世凯这才下令撤去军警。

9月17日至21日，孙中山在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邀请下赴山西考察铁路，调查矿产，后经天津、济南、青岛回到上海。

此次北上，孙中山自认为“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认为政府内阁成为国民党内阁，党争问题已经解决，南北双方取得了谅解。10月份，孙中山在上海出席国民党欢迎会时，希望国民党全力协助北京政府和袁世凯，认为袁头脑清晰，明了天下之事，思想也很新，就是做事手腕有点旧，办事不能全采新方法：“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 1912年9月,孙中山在北京留影



专心铁路建设



■ 中国铁路总公司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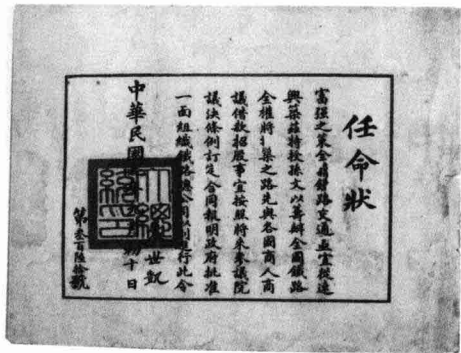
赴北京之前，孙中山就写信给宋教仁，表示不想过多参与政治，国家内忧外患的局势不能只靠政治来解决，而应从根本下手，那就是“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所以他舍弃政治，“而

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10年之中，筑20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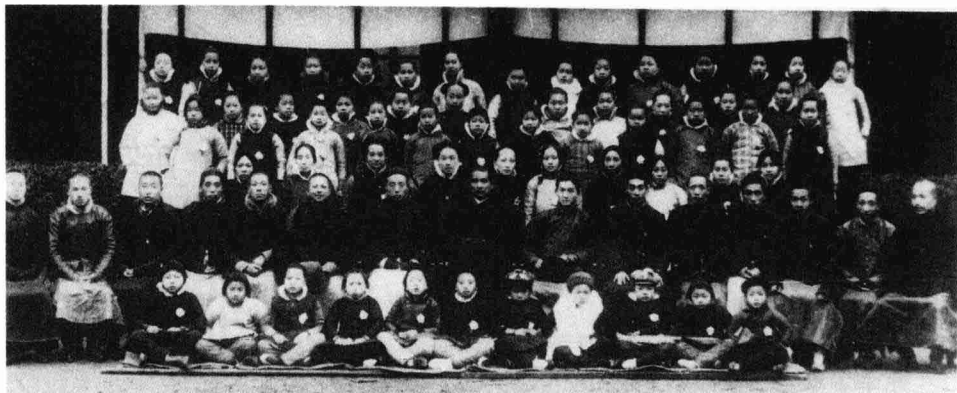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1912年9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特授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并令孙中山将“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将来参议院议决条例订定合同，报明政府批准；一面组织铁路总公司，以利进行”。当时南北舆论界有反对借债修路计划的见解。孙中山先是向《中国报》记者解释借债筑路并非是把中国权力送给外国人，又在北京迎宾馆召开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自己修筑铁路的方案：我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国人包办，原因有三：一、我无资本，利用外资；二、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三、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

回到上海后，孙中山为《大陆报》撰写《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作为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文章具体阐释了铁路计划完成后，中国将出现“商业繁荣”、“市场扩大”、“生产激增”、“人民幸福”、“保障统一”、“不受各国宰割”、“抵御侵略”、“列于世界大国之林”的“黄金时代”。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专心致力于发展经济、修建20万里铁路的指导思想，显示了为实现民生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在沿长江西行视察半月后，11月14日，孙中山筹划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开办。总公司设立总务处、文书处、庶



■ 袁世凯颁发给孙中山的“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任命状



■ 1912年12月27日,孙中山在松江清华女校发表推广女子教育的演说,并与该校师生合影

务处等10个处,并于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设立事务所。不久,孙中山派人到北京将拟定的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送给袁世凯交参议院审议。尽管他极力反对,但袁世凯于次年3月31日正式公布的修正条例还是将草案修改得面目全非,并把孙中山所主持的铁路总公司置于政府交通部的隶属地位。在上海期间,孙中山还在许多场合发表了关于筑路、借款、社会主义等的演说,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从1912年4月至12月的9个月中,孙中山访问各地,发表演说、谈话有150多次,其中专讲民生主义的就有40多次。

1913年2月11日,踌躇满志的孙中山以全权筹办全国铁路的名义,乘“山城丸”号自上海启程赴日考察。海浪滔滔,在驶向日本的船上,孙中山始终以平民身份与乘客谈笑。回想自己多年来为拯救中国、振兴中华,多少次出入日本,隐姓埋名,就连孙中山这个名字都是为掩盖真实名字而得来,所以当日本朋友说日本政界“在迎接阁下一行上并无任何妨碍时”,孙中山放声大笑。

孙中山在日本访问期间,受到日本各界和中国华侨、留学生的热烈欢迎,他整日奔波于各界欢迎会和各地考察中。然而,40天后国内发生了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一案,他想避开政治而专注于发展经济的美好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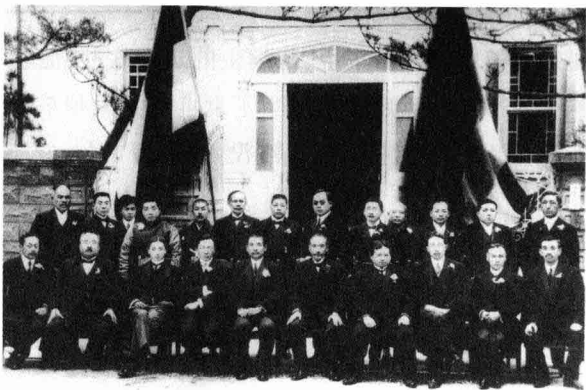


28 坚持发动“二次革命”

孙中山专心致力于实行民生主义的各项活动，黄兴也辞去南京留守军事职务。宋教仁则热衷于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希望成立责任内阁，以掌握政权、限制袁世凯。这导致了袁世凯的忌恨，从而引发了遇刺身亡的悲剧。孙中山得知宋案消息后，立即中断在日本的访问，归国发动了武力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孙中山在历述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过程时，把辛亥革命称为第一次革命，把这次反袁斗争称为“二次革命”。

宋教仁被刺

1912年8月，同盟会合并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负责党务工作的宋教仁将大批官僚政客吸收进来，党员人数众多。他准备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实现民主政治。所谓责任内阁，通俗来讲就是国家行政事务由内阁向国会直接负责，而不是由总统一个人说了算，总统要发布命令，要内阁成员签名才能生效。内阁制使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约束。



■ 1913年3月14日，孙中山出席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正支部长吴锦堂在寓所移情阁（今神户孙文纪念馆）所设的午餐会（前排左三起：戴季陶、马君武、孙中山、吴锦堂、宋耀如、何天炯，右一为山田纯三郎）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大权旁落，开始时对宋教仁百般笼络讨好，送了一套价值3000元的西服和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给宋教仁，并特意表示如果不够用还可以再增加。宋教仁丝毫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毅然于1912年10月从北京南下，到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

地,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身份,积极开展选举活动。他沿途发表演说,批评时政,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为国民党竞选众议员和参议员进行宣传。金钱贿赂的失败让袁世凯萌生了杀害政治对手的念头。他在宋教仁南下后,一边收买流氓特务跟踪,一边物色得力的杀手。当袁世凯得悉宋教仁在湖北黄州演说时,咬牙切齿地说道:“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他对宋教仁恨之入骨,指使人匿名写文章投稿北京各报批驳宋的演说,为自己辩护。



■ 宋教仁

1913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的正式选举中赢得胜利,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承担了组织责任内阁的重任。作为第一大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理应是未来的内阁总理。此时的宋教仁成为全国的风云人物。3月12日,他在上海尚贤堂发表《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的演说,随后又代草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主张责任内阁制,加强民主政治和经济的建设。袁世凯一面暗地里策划暗杀宋教仁,一面公开拍电报催促宋教仁赴京商讨国事。陶醉在选举大获成功中的宋教仁急于赴京组织新内阁,对袁世凯的祸心没有任何提防。他没有听从于右任和陈其美的警告,嫌坐轮船太慢而决定乘火车去北京。

3月20日晚10点45分,在上海北站,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陪同下刚刚走到检票处,忽然,“砰!砰!砰!”3声低沉的枪响,只见宋教仁中弹倒地,凶手则趁人们慌乱之际逃逸。送行的人急忙把宋教仁送到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但因子弹射中心脏附近,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年仅31岁。临终前,宋教仁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电,内称:“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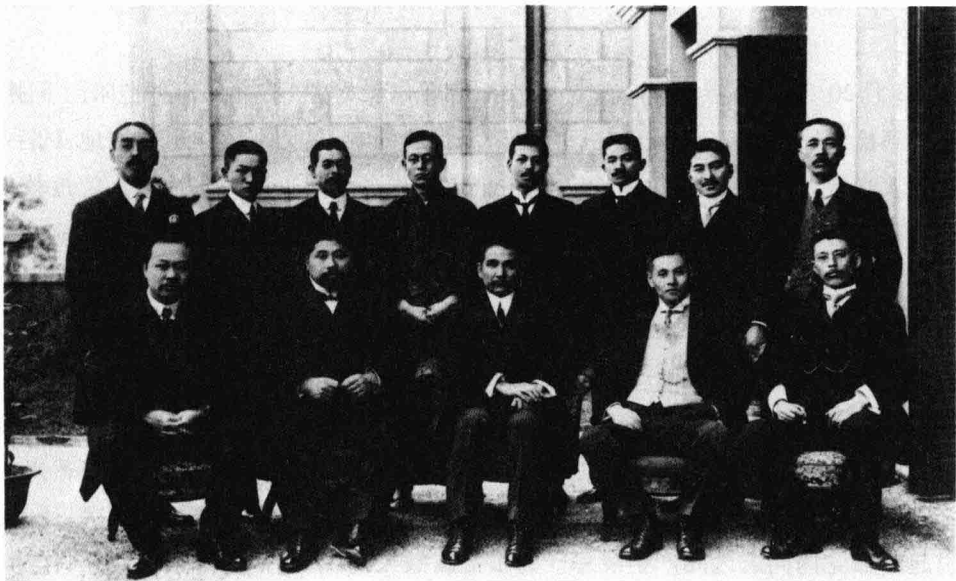
宋教仁被刺震惊全国。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满心欢喜,却贼喊捉贼,立悬重赏,下令缉拿凶手,并派人去上海慰问。他授意舆论界散播宋教仁之死纯粹是国民党内部斗争所致的谣言,而国民党方面也密切注意着“宋案”的侦破。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密商对策,认为此案真相一天不大白,首先愧对死者,其次,还易引起革命党内同志之间产生疑忌。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他们赏银一万元,作为侦破宋案的酬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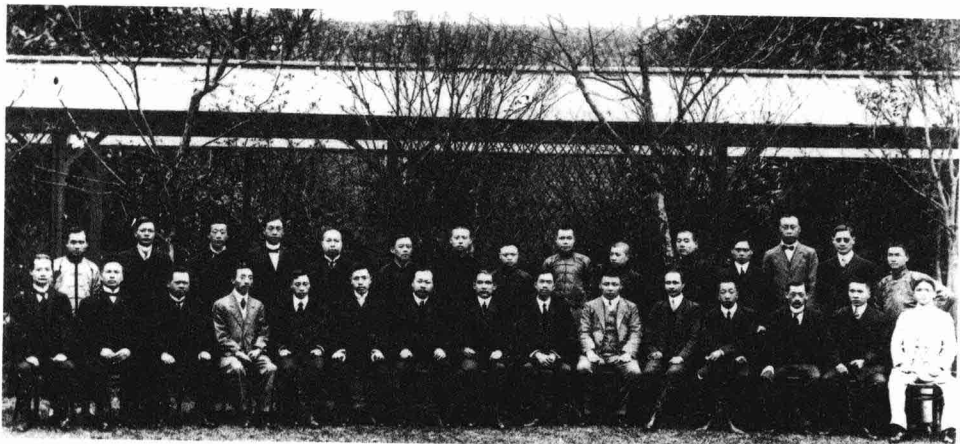


在侦破过程中,有古董商王阿发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一星期前,因出售字画,到小西门外应桂馨处,应出示一张照片,说如果能够谋杀照片上这个人,酬银一千元。我无此能力,当即将照片交还与他。现在见各报所登的宋教仁的照片,与一星期前所见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这条具有重要价值的线索对侦破“宋案”起着决定性作用。经过层层排查,顺藤摸瓜,一举抓获了凶手应桂馨,并在其住所搜到了大量的相关秘密函电。他与北京政府内务总长赵秉钧、秘书洪述祖等人的来往密电证明赵秉钧、袁世凯是“宋案”最大的主凶。

力主武力讨袁

宋教仁去世当天,孙中山收到黄兴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异常悲愤,立即致电国民党本部和上海交通部,要求认真查究“宋案”真相,并中断在日本的访问,于次日从长崎乘船回国。25日回到上海后,孙中山连夜赶到黄兴寓所,“相见泪下,谓不意海外归来,失此良友,为党为国,血泪皆枯”。他们满怀悲痛地商量解决“宋案”的办法,应对剧变的形势。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身为大总统,竟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谋杀宋教仁,后悔自己当初错看了袁世凯,主张武力讨袁。但黄兴等人则反复强调起兵的时机还不成熟,应该运用法律和平解决,召开议会弹劾袁世凯。孙中山、黄兴以及在上海的国民党领袖多次反复议论讨伐袁世凯的事情,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最后共同





■ 孙中山在策划反袁的同时，仍致力于中国经济建设。图为1913年4月1日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在上海辰虹园召开周年纪念会时，会长孙中山与代表合影

商定分别致电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寻求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结果，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回电都主张法律解决，暂时还不能起兵。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使他们丧失了讨伐袁世凯的有利时机，反而给袁世凯对付国民党提供了充分准备的时间。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袁世凯每日数封电报催促他到北京“面商要件”。此时的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的真面目，一面回信敷衍，一面加紧策划讨袁。4月13日国民党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时，孙中山派马君武代为出席，并在悼词中说：“当竭尽心力与官僚派竞争……以竟宋先生未竟之志。”这就公开表明将与“官僚派”代表袁世凯势不两立。

不久，在孙中山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努力下，“宋案”44件主要证据公布于众，袁世凯、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和各报馆都收到了这些证据。铁证如山，真相大白：袁世凯是“宋案”的主谋！

狡猾的袁世凯非常清楚国民党和他已是势同水火，便在暗地里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为了取得战争经费，他不顾各方反对，未经国会讨论通过，便完全接受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提出的苛刻借款条件，派内阁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于1913年4月26日夜偷偷同5国银行代表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所谓“中国善后借款”合同。4月29日，北京参议院被迫通过善后大借款案。孙中山和部分国会议员试图阻挠签约，但没有成功。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善后借款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孙中山非常气愤，4月27日，他向5国银行团声明：袁世凯属于非法借款，中国人民绝对不承认；随后劝告日本当局不要借款援助袁世凯；5月3日，又电告各国政府和人民，揭露袁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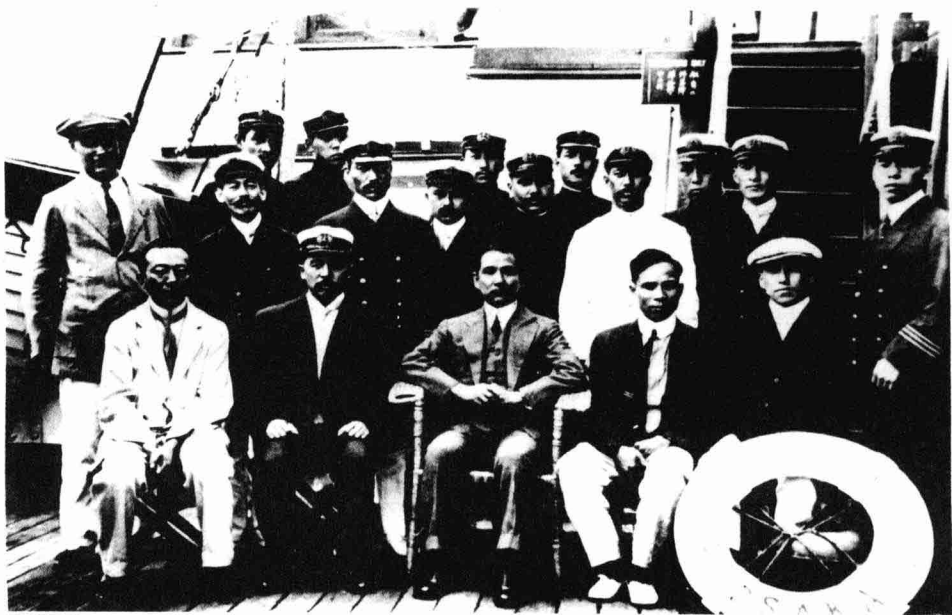


凯政府的阴谋和罪行，恳请各国政府设法禁止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政府。但是，孙中山的努力毫无效果。5月5日，湖南、江西、安徽和广东4省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联名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借款。

各省革命党人有的主张本省立即宣布独立，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系；有的主张“各省联合组织护国军”，“共讨叛奴”。对此，袁世凯积极准备反扑，他于5月6日在总统府召开秘密会议，为发动内战进行军事部署，下令“除暴安民”；后又颁令攻击谭延闿等4都督反对政府违法借款的通电是“捏词耸听，淆乱人心”，“雌黄信口”，“自污国体”，命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官，“遇有开会聚众，散布谣言，潜谋内乱者，立予查拿惩办”。袁世凯举起了屠刀，一时乌云压城。

“二次革命”昙花一现

获得善后大借款的袁世凯，花重金收买各地军队首领。5月底，他利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刊登电文说孙中山、黄兴只会“捣乱”，别无本领，并让人传话给国民党，如果敢另外组织政府，就“举兵征伐”国民党。6月9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被袁世凯免职。6月14日，广东都督胡汉民被袁世凯免职，由陈炯明继任。李烈钧被免职后到上海同孙中山、黄兴等商量对策。黄兴依旧主张和平解决，孙中山说：“本人无



172 ■ 1913年6月25日，孙中山从香港乘“巴拿马”号轮船返回上海时在船上合影（前排左一为马君武，左四为朱卓文）

孫中山先生宣言

當南北統一之際，僕推袁世凱於參議院，原望其開誠布公，盡忠民國，以慰四萬萬人之望。自是以來，僕於權利所在，則為引導；危疑之變，則為襄助；離散之士，對於袁氏，時有責言；僕之初衷，未嘗少易。不意袁世凱，生袁氏陰謀，一旦盡揭，僕於當時，已將反袁之決心，宣布天下。使袁氏果知公義自在，與論無難，則即卸職辭職。以謝國民。何謂袁氏專為私權，倒行不巳，以致東南人民，漸支離，旬日之內，相逼並發，大勢如此。國家安危，人民生死，皆繫於袁氏一人之去留。為公僕者，不以國利民為懷，反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爭一己之位，中華民國豈容此先例。願全國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禍端，庶可以挽回危局，而救民罪，無任翹企之至。

敬告全國同胞

兵凶戰危，吾儕安分良民，對於不正當之戰爭，決無有贊成之者。其正當之戰爭，為保護吾儕安全幸福之關係作用，則吾儕不得不肯反對；且相率而助成之。其或吾儕不必加入戰爭，而礙於戰爭以外，尚者可以致力之處，使吾儕之安全幸福，由此而保存，而且使間接作用之戰爭，由此而截止。則尤吾儕所當引以為己任者矣。

一年以來，政府之失德，雖吾儕愛愛之者，決不能為之諱。至公而行，則設：借借外款，不復留吾儕以承認政府之地位；吾儕中之一部份所謂國民者，攻擊政府為激烈之主張；何嘗不公認必不得已之舉；能以兵革初行，所與未也。苟於爭和解決一方面，尚有幾希之望，則非吾儕所願；而強抑制之，雖然政府之播惡也，乃變本而加厲；且以是為動盪

■《民立報》上發表的《孫中山先生宣言》

論如何將以冒進主義一舉去袁，此种考虑始终不变。”6月12日，孫中山交給黃興5萬元，安排討袁軍事。黃興收到錢後，分別在上海、南京兩地進行部署，並派人到湖北、湖南組織討袁勢力。6月18日，孫中山從上海到澳門，專門和持觀望態度的陳炯明商量討袁對策，陳炯明答應如果4省獨立，廣東同時宣布獨立。孫中山在澳門還探望了病危的長女孫姪。在他離澳門去香港的第二天，孫姪病逝。6月29日，痛失愛女的孫中山從香港回到上海。次日，安徽都督柏文蔚被免職。一個月里，接連3省國民黨籍都督被袁世凱免職，孫中山的心情格外沉重而憂慮：且不说敵人袁世凱如何囂張，即黨內同志意見始終不能統一，軍事實力也不容樂觀。黃興之所以主張和平解決，就是考慮到國民黨所能調動的軍事力量不足。

袁世凱在解除3都督職務的同時，命北洋軍隊分兩路迅速南下，東路逼向江蘇、安徽，西路進撲江西。北洋軍重兵壓境，戰事迫在眉睫。孫中山力排異議，決定立即起兵武力討袁。他派李烈鈞於7月8日悄悄返回江西湖口。7月12日，李烈鈞在湖口成立討袁軍司令部，發布討袁檄文，袁世凱派兵鎮壓，討袁軍向北洋軍發起進攻，“二次革命”的帷幕正式拉開。7月15日，黃興在南京通電誓師討袁。隨後，柏文蔚在安慶、陳其美在上海、陳炯明在廣東、許崇智在福建、譚延闓在湖南、熊克武在四川紛紛宣布獨立討袁。這些省份雖然宣布了獨立，但各省的內部意見却不統一，有些省份本身就不主張獨立，只是迫於形勢而不得不宣布；有的省份沒有統一的領導與部署，且大都缺乏實力。所以，南昌、湖口等地很快相繼失陷。其他獨立省份的情況更糟：上海組織起來的討袁軍不久就解散了；江蘇都督在宣布獨立後又溜回了蘇州，通電反對討袁；安徽師長被袁世凱收買，宣布取消獨立；福建、湖

28
堅持發動“二次革命”



■ 李烈鈞

南、四川也先后宣布取消独立。至此,仅延续两个月的“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在李烈钧和袁世凯军队交锋后的第十天,即7月22日,孙中山向全体国民、北京政府、参议院和袁世凯本人发表宣言,要求袁世凯辞职以平息战祸,并义正词严地申明各地讨袁的正义性,指出当今的扰乱者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恼羞成怒,他先是下令夺去黄兴、陈其美和柏文蔚的一切荣典、军职,然后利诱上海工部局驱逐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8名革命党人。7月23日,袁世凯下令“销去”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之全权。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之下,加之上海、南京的讨袁军相继失败,8月2日,孙中山不得不偕同胡汉民、朱执信离开上海。翌日,袁世凯妄图指使人诱捕孙中山并置之死地。形势异常严峻,孙中山原计划南下广州,此时也只好转去台湾,抵达台湾基隆港时化名“汪国权”登岸。不久,孙中山赴日本,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暂时隐居下来,但处于日本外交部的严密监视之下。随着各地讨袁相继失败,黄兴、李烈钧等人也纷纷逃往日本。

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袁斗争——“二次革命”犹如昙花一现。灾难深重的中国,重又陷入了独裁专制的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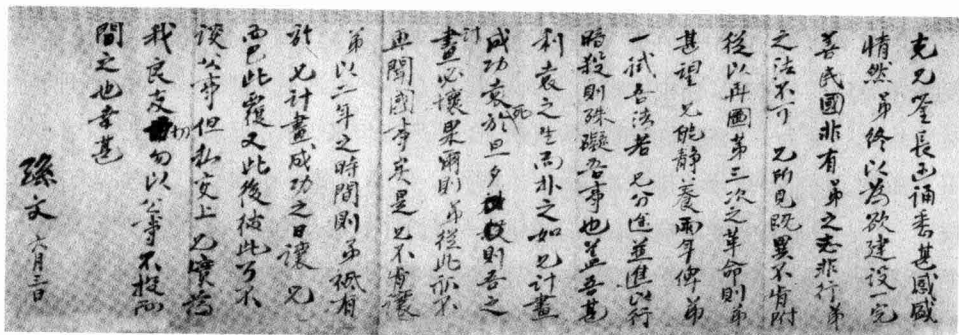
29 成立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实力几乎损失殆尽。袁世凯则大兴党狱，除灭异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秘密住在东京。许多老同盟会员也陆续到东京避难。当时，流亡到日本的国民党人生活十分艰苦，衣食困难，甚至向公费留学生寻求接济，有时只得以烤红薯充饥。许多革命者感到迷茫，革命情绪跌至低谷。总结“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重整队伍，继续斗争，成为摆在孙中山等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孙、黄分歧

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孙中山与黄兴之间产生了分歧。孙中山力主起兵反袁，但黄兴一味主张法律解决，贻误了战机；黄兴则认为“宋案”后，国人对袁的真面目认识不清，必须利用法律进行合法斗争，而袁世凯早有准备，革命派方面力量不足，如仓促应战，难以取胜。

在分析形势时，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表面似乎不可一世，气焰嚣张，实则内外交困，我党应团结一致，积极进取，一两年内定可造成一番新形势，共图第三次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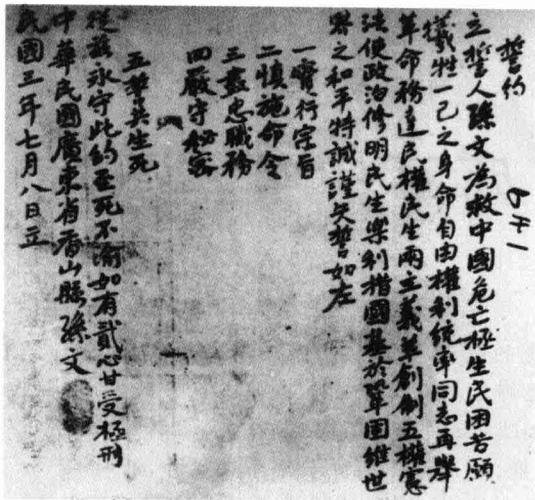
■ 1914年6月3日，孙中山就讨袁问题致黄兴的信

29

成立中华革命党



孫中山



■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时手书的誓约词

黄兴则认为目前袁氏势力正处于强势，革命形势尚不成熟，不能贸然举义，只有积蓄力量，等待袁氏野心暴露，才能“蓄之久而发之暴”。

在是否要重新组党问题上，孙中山认为，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国民党成立后，一大批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涌进国民党，甚至连袁世凯的亲信、刺杀宋教仁的主谋赵秉钧也加入，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他愤慨地说：“国民党已经成

了一盘散沙，这个党我不要了。”他要成立一个足以担当中国革命重任的革命党。黄兴则不同意另组新党，认为“不可因噎废食，使党有所分化”，应继续保全国民党而加以整顿，“力求扩党”，以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与袁世凯的专制作斗争。

孙、黄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使流亡东京的老同盟会员也发生分化，陈其美、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许崇智、居正等人支持孙中山的主张，而李烈钧、柏文蔚、钮永健、陈炯明等则拥护黄兴的意见。

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主张，决定在日本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党，以扭转革命局势。这个党取名中华革命党，孙中山特别强调“革命”二字，以号召真正的革命分子来参加。黄兴则不愿参加新成立的党，他和一些支持者另组“欧事研究会”。

筹建中华革命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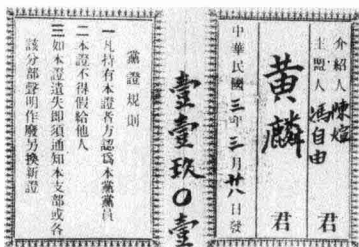
191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开始筹建中华革命党。为使中华革命党真正能够发挥领导革命的作用，孙中山提出了3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的、不纯粹的分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他亲自起草了“入党誓约”，并严格规定，凡是要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无论资历有多深，功劳有多大，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方式重新履行入党手续：立誓人首先要亲笔将誓约照抄一份，接着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按指模印，紧接着站立在主盟人的面前，宣读誓约，最后将读完的誓约交给主盟人，双方亲切握手以后才算是完成了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程序。誓



■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留影



孫中山



■ 中華革命黨黨證

约词如下：

“立誓人×××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目的，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死生。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省××县××亲笔(指印)。民国××年××月××日(中华革命党党部印)”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在东京开始秘密吸收第一批党员，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1914年5月，中华革命党人员已达四五百人。1914年6月，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革命党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并发表了演说，他号召大家要“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取福利”。会上公布了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同时还发布了《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1914年5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于日本东京创办的《民国》杂志，成为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此外，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美洲等地也亦有报刊，成为反袁斗争的重要工具。

《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本党以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党的建设上，孙中山认为中华革命党必须成为一个由意志坚定的革命分子组成的、有旺盛战斗力和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要清除原来国民党里的腐败官僚、投机分子。孙中山还根据入党时间的先后，把党员分成三等，分别是“首义”、“协助”、“普通”。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未能科学地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因之，作出了一些偏颇的举措，如根据功劳的大小，分别定为元勋、有功、先进公民。这种把党员分成不同等级的做法，既违反了平等的原则，也不利于党内团结。又如，为改变以往一盘散沙、互不统属的状况，孙中山



■ 中華革命黨本部之印

规定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服从命令,而且必须服从孙中山一人,以严格纪律和增强战斗力。孙中山这种近乎专断和类似秘密结社的做法,遭到黄兴、李烈钧等许多老同盟会会员的批评,但孙中山坚持己见,最终导致他和黄兴分道扬镳。1914年6月,黄兴决定离开日本去美国,孙中山为他送行,集古诗联句送给他:“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共尝”,表示了一种惜别和期望之情。

坚持反袁斗争

尽管中华革命党存在很多缺陷,但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孙中山没有萎靡消沉,而是勇敢地挑起武装讨袁的大旗,显示了他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

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野心更加膨胀。首先,他动用大批军警及地痞流氓包围国会,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他在前清皇帝登基的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11月4日,他下令解散国民党,派军警强行收缴国民党议员证,导致国会停止活动。1914年1月10日,他解散国会,公然宣布停止所有议员资格,每人发400元旅费回家。鉴于临时参议院当初制定限制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他专制独裁不利,袁世凯于1914年5月1日下令废除,并另外炮制了袁记《中华民国约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自己和皇帝一样的权力。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促成他的皇



■ 1915年9月25日,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成员在日本中华革命党本部花园内合影



討袁宣言 一九一五

壬子之月，國民憤袁之慘，非謂袁臣自罪，謂袁以臨時總統行袁世凱。國辱之內憂，不知告曰，息兵安民，以事建設，是最大之義舉也。吾民既誠誠以望焉，今遂所親民者何如也。平心之說，謂袁世凱，人盡好生，何為而然。苟知其罪，更甚于前，則又何苦責其罪乎，以備一人皇帝之尊也。所以死而後生者，蓋謂共和相轉移耳，今袁世凱既死，解散自治會，解散國會，解散國會議員，而國家無正憲法，遂廢人才，而招國家於危殆之地位矣。小國則危殆矣，而袁世凱之罪，有如此者，國亡不亡，國亡則民奴。國真與三附從之奸，皆可與國爭，以保富貴，吾民何不幸，而袁世凱國家生命於袁氏哉。自袁世凱總統，野有能爭，而天下之強不強，國之強不強，而邪正之與惡未忘。萬戶流涕，一處處，誠心向共和二字存耶。既共和，即謂反賊，吾儕吾民以大仁大義，為已降受賊，不取不取不取不取。以後存民，今長江大河萬里以內，武漢京師都察院，皆已降受賊，附賊以待，一旦義旗呼，則動天地，當以萬軍，出湖北招，用楚一軍，規復中原，開身救國，合將等以救京左。三軍既興，我與漢子，我與漢子，定應併以待東附之賊。當此危急，誠心向共和，將可拭目俟也。袁曰，長江非本，本則非軍。又曰，特存以望，惟望萬心，不有臣三千，誰一心，正漢了，何望不復，則與袁之慘使去之。誰。

■ 1915年12月，孙中山发布的《讨袁宣言》

帝梦，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12月12日，他在自己选定的黄道吉日，接受皇帝称号，称中华帝国大皇帝。次日，接受百官朝拜，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在元旦这天正式登基。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铲除这个“国贼”，“国贼未除，什么主义都行不通”。为此，孙中山四处奔走，筹措军费，组织力量，策动武装讨袁活动，甚至利用他之前反对的暗杀求达目的。

中华革命党首次武装斗争是1914年6月在湖南发动的。28日，中华革命党人李国柱受孙中山的委派，在湖南组织讨袁军，占领郴州市。

与此同时，雷瀛、雷英等人也受孙中山的指派组成讨袁军，在湖南桂阳发动武装起义。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这次起义最终由于敌军势力过于强大，寡不敌众而失败。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掠夺，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空前绝后的良机，决定在江苏、浙江、广东3省建立革命基础。他分别派邓铿到广东、夏之麒到浙江、复灵兄弟到江苏进行革命活动，并派蒋介石和陆惠生到上海筹办指挥部总部。同时，还派遣了大批党员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不久，这些地区发动的武装斗争都一一失败。

为了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相关军事问题，1914年9月到12月，孙中山在东京多次召集中华革命党领导人开会，商讨建立中华革命军。他还制定《革命方略》6编，印刷2000本，秘密散发给党员。《革命方略》的制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华革命党的宗旨是“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在斗争方式上以“军事为先决”。这是孙中山建立同盟会以来制定的最为详细的一部军事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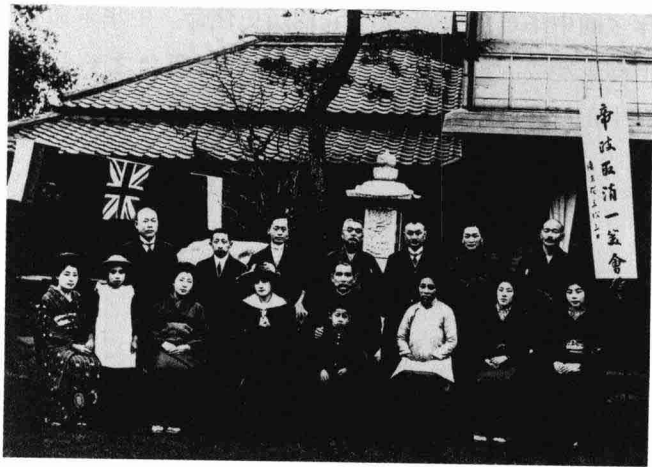
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机扩大侵略利益，妄图霸占中国，急于做皇帝的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孙中山及时召集会议分析局势，并于1915年5月4日发布《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揭露袁世凯的称帝卖国阴谋，同时在全国各省组织力量积极策动武装起义。

孙中山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进一步加强国内发动武力讨袁的组织与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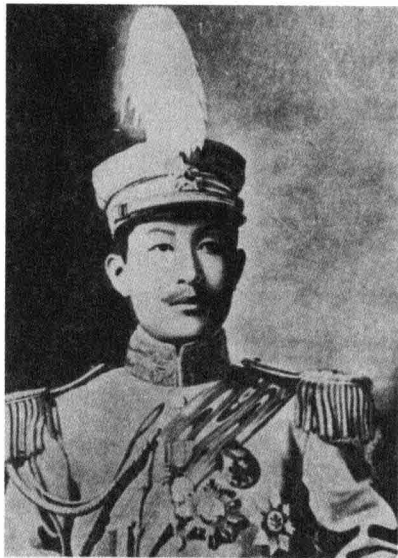
组织了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4个总司令部。1915年夏末,孙中山在东京委任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总司令,在上海设筹备处;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在青岛设筹备处;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在广州设筹备处;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在陕西省三原县设筹备处。10月,居正、于右任分赴各省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筹建司令部等机构。孙中山以“举义要件,不外乎兵力财力”,又派胡汉民、许崇智、邓铿等分赴南洋筹募起义军饷。同时,中华革命党美洲、南洋所属的海外支部都把筹集军饷作为主要工作。许多爱国侨胞纷纷慷慨解囊,积极支持国内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海外支部还组织了军事团体进行军事训练,中华革命党更在日本成立了飞机学校,虽然当时只有15名学员,但孙中山依然非常重视,曾到该校亲自对学员讲话,他说:“中国要航空救国,我们现在只有海陆军,将来一定要有海陆空军,而且是空海陆军。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中国更需要空军。”

1915年秋天,孙中山召集陈其美、居正、许崇智、周应时开会,商议讨袁计划。他们根据当时袁世凯的兵力以及革命党的情况,认为袁世凯在西南一带的势力比较薄弱,决定从那里着手发动革命斗争。会后,孙中山派人到云南、贵州一带进行反袁宣传和武装起义准备,全国其他地方也兴起了讨袁斗争,如河南开封、浙江绍兴、陕西、四川、山东等地都在跃跃欲试。全国各地讨袁斗争风起云涌,孙中山充满了信心,认为“袁氏末运,去兹不远矣”。

在武装讨袁的同时,中华革命党还进行了一些配合性的暗杀活动。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暗杀活动主要有:1915年7月17日,革命党人钟明光在广州暗杀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广东都督龙济光,暗杀未成,钟明光当场被抓,后被处死;1915年9月10日,革命党人杨玉桥在上海刺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要宣传刊物《亚细亚报》的总理薛大可,暗杀亦未成,杨玉桥被捕;1915年10月17日晚,革命党人吴先梅成功枪杀袁世凯收买的革命党人蒋士立;1915年10月10日上午,革命党人王明山、王晓峰



■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等在日本庆祝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时合影



■ 蔡鐸

成功刺杀袁世凯在上海的得力干将、上海镇守使郑汝城。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了举国反对。1915年12月25日，蔡锷将军在云南宣告独立，成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孙中山得到消息后，非常振奋，接连致电上海、福建、直隶、山东、山西的革命党人，加强指导反袁斗争。

在全国上下一派反对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5月初，孙中山决定从日本回上海，并再次发表《讨袁宣言》。胜利在望之际，孙中山多年的战友陈其美在上海遇刺，噩耗传来，

孙中山痛心不已。6月6日，独夫民贼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孙中山虽喜亦忧：迭遭破坏的共和国能否得以重建呢？

1916年6月，中华革命党本部由东京移驻上海，孙中山一面通告中华革命党各地支部、分部，指示“一切党务亦应停止”；一面要求各地中华革命党结束军事行动，解散武装。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本部事务由胡汉民、廖仲恺负责，仍在秘密吸收会员，但党务逐渐停顿，中华革命党旗帜没有在护法运动中出现。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通告全党，将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存在5年多的中华革命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业绩不容否认，但却未能成为护国运动的核心——如同盟会之于辛亥革命。所以如此，正如后来孙中山所总结：“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 离日返国前的孙中山

1911年

孙中山在东京

孙中山在东京

孙中山在东京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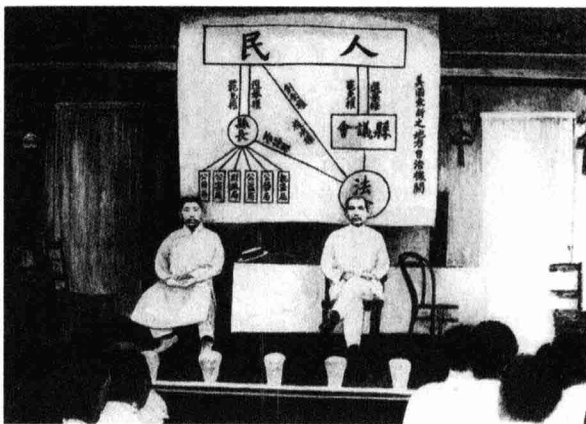


30 愈挫愈奋 永不息战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是辛亥革命的两项重要成果，也是共和国的重要象征。孙中山曾明确指出：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袁世凯 83 天的皇帝梦尽管破灭，然而继续掌控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孙中山在随后 6 年的时间里，两次在广东组建政府，发起护法运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愈挫愈奋、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

第一次护法运动

1916 年 5 月 1 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妻子宋庆龄也返沪。宋庆龄是孙中山好友宋耀如的第二个女儿，1913 年 7 月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毕业后来到日本，协助父亲为孙中山工作。姐姐结婚后，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为了追随孙中山拯救中国，她不顾家人反对，于 1915 年 10 月 25 日在日本东京与已离婚的孙中山结婚。从此，宋庆龄成为孙中山的同志、战友、助手和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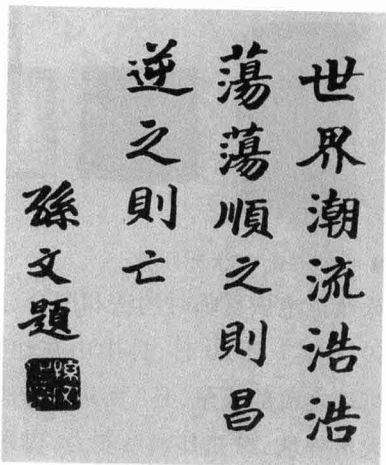
■ 1916 年 7 月 17 日，孙中山在上海张园举办茶话会，并发表关于建设的演说（孙中山右为黄兴）

6 月 6 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忧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于次日继任大总统。孙中山认为黎“为人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会顺应民心而为国效劳，而不至于假借权柄以谋私利”。6 月 29 日，黎元洪在孙中山和各地首脑的要求下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召开国会。被袁世凯破坏的共和制度在表面上得到

恢复。于是,孙中山再次萌生了从事实业建设的念头,他到杭州、绍兴、宁波等地游览、考察,发表建设国家的谈话和演说。他甚至想去美国考察,并曾两次致电黎元洪请辞政府高等顾问一职。10月9日,黎元洪授予孙中山大勋位荣誉称号,孙中山为了表示与黎元洪政府的合作,于次年1月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寓所举行了接受仪式。

1917年2月底,孙中山在上海完成了《会议通则》一书。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进行,英、美、日等国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断交并参战。参战与否,引发了总统黎元洪

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结果,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一职。后者不服,唆使各省宣布“独立”。6月1日,黎元洪被迫下令让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一年前就有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的计划,入京后,他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7月1日,又和康有为等人拥护溥仪上演复辟闹剧,黎元洪无奈避入日



■ 1916年9月,孙中山在浙江海宁观潮返回上海后题词

本使馆。段祺瑞趁机打着“再造共和”的幌子,于7月12日击败张勋的辫子军,复任国务总理,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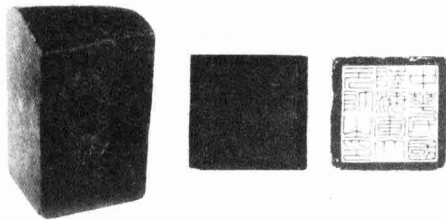
孙中山对混乱的北京政局心灰意冷,遂于7月6日率领驻上海海军、部分国会议员,偕同章太炎、廖仲恺、朱执信、陈炯明等乘军舰南下广州,决定武力讨伐张勋,捍卫约法。北京政局混乱,为南方实力派军阀提供了扩充实力的机会。桂系军阀陆荣廷宣布自己的地盘广东、广西暂时“自主”,意在脱离内阁,7月3日通电“拥护共和”,反对复辟;滇系军阀唐继尧也在同一天发出讨逆



■ 1917年,孙中山在环龙路寓所留影



孫中山



■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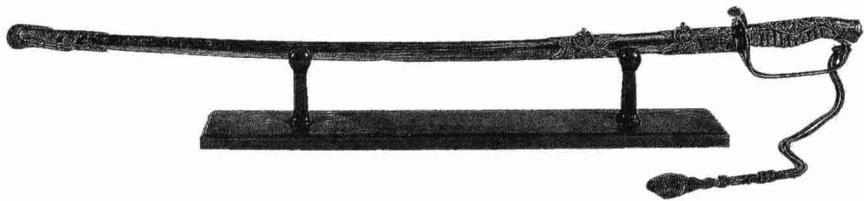
通电。张勋复辟失败后，唐继尧又表示“决心自主”，不承认重新上台的段祺瑞内阁。为稳定政局，孙中山曾多次致电陆、唐和西南各省督军，要求他们“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唯一之任务”。

以“再造共和”姿态上台的段祺瑞竟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反而另谋召集临时参议院，企图毁弃临时约法。1917年7月20日，孙中山在驻粤滇军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现在与段祺瑞之流的斗争，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与此同时，段祺瑞欲借对德宣战，大借外债，扩充其嫡系实力，谋求武力“收复两广”、“制服滇黔”，这使得一直与北洋军阀貌合神离的西南军阀深感不安，他们力图借革命的旗号来反对段祺瑞。8月13日，唐继尧通电表示拥护约法。

以“再造共和”姿态上台的段祺瑞

孙中山在广州开始着手召开国会和联合西南军阀组织护法政府。1917年8月25日，追随孙中山南下的国会议员120余人在广东举行“国会非常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简称“非常国会”）。8月31日，非常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由非常国会依次选举；在《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处理政务。9月1日，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被选为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当晚，广州人民为庆祝孙中山就任大元帅举行了提灯会，场面盛极一时，写有“共和万岁，民权复振”、“南方之强，民国复苏”、“恭祝大元帅就职”等字样的灯笼遍布广州城。

军政府的成立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本意在于借护法之名达到称霸西南、对抗北洋军阀的目的，他们对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并不真正赞同，所以始终不肯就任元帅之职。在各省护法军兴起的时候，段祺瑞决心武力镇压以统一南方。9月6日，冯国璋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北洋军随即南下攻打湖南，与桂系陆荣廷军队日渐冲突。9月18日，孙中山发表坚持护法通



■ 孙中山的大元帅指挥刀

孫大元帥中山肖像



■ 孙中山大元帅像



■ 1918年3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大元帅府合影

滇系军阀借护法之机，组成滇黔靖国联军，与孙中山派往四川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四川国民军相配合，对吴光新率领的入川北洋军开战，并于12月3日攻占重庆。川军熊克武部也加入了靖国军。

在此形势下，湖北、陕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及东北地区也都相继出现规模不等的护法武装及活动。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使孙中山非常振奋，他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制定护法北伐的进军战略。

护法战争打响后，北京政府内部的直系首领冯国璋和皖系首领段祺瑞，正在为争夺北洋派的正统地位以及北京政府的中央大权而明争暗斗。11月22日，冯国璋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很快又发布南北停战令。

停战令一公布，孙中山明确表示反对南北调和，坚决要求继续护法。而陆荣廷和唐继尧在各自占领了湖南和四川后，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已无意继续护法，先后宣布停战。1918年2月，川滇黔联军进入成都，唐继尧控制了川、滇、黔3省。

在护法战争中，西南军阀违背孙中山的护法宗旨，与直系军阀几番议和停战；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更是进行干扰、压制和打击。广东督军署也从内政、财政和对外交涉方面，极力破坏军政府。为使军政府成为西南各省护法斗争的“军事最高统一机关”，孙中山对桂系军阀和广东督军进行了积极抗争。但军政府始终极其困难，军事方面更是受到诸多束缚和压迫。为了达到排挤孙中

电，并对湖南镇守使刘建藩等宣告自主并加入护法军致电嘉勉。9月21日，孙中山召集军政府特别会议，商讨军政进行方略。10月3日，孙中山下令“缉拿乱国盗贼首逆段祺瑞”。10月6日，护法湘军将领林德轩率师北伐，北洋政府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向湘南进攻，护法战争正式开始。

护法军与北洋军激战1个多月后占领了长沙。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桂系军阀控制了湖南。与此同时，以唐继尧为首的滇

山及军政府的目的,1918年1月,由一部分官僚政客和西南军阀发起的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东督军署成立。2月,依附于桂系的官僚政客提出改组军政府,妄图将大元帅制改为合议制。孙中山虽多次呼吁反对改组军政府,却无力阻止军阀政客们的夺权阴谋。5月4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孙中山当天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了《辞大元帅职通电》,指出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这时,他已打算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但北洋军阀的爪牙密探遍布上海各码头,在困窘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下,孙中山一度考虑“漫游海外,略为休养,复我元气”,等待时机,以图再举。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军政府总裁,又推举老官僚政客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此时的军政府已经完全由桂、滇军阀控制,护法不过是西南军阀利用的幌子。孙中山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第二天就启程离开广州,随行人员有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等人。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怀着极度苦闷的心情离开广州,取道台北再赴日本。在得到宋庆



■ 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外景

30

愈挫愈奋
永不息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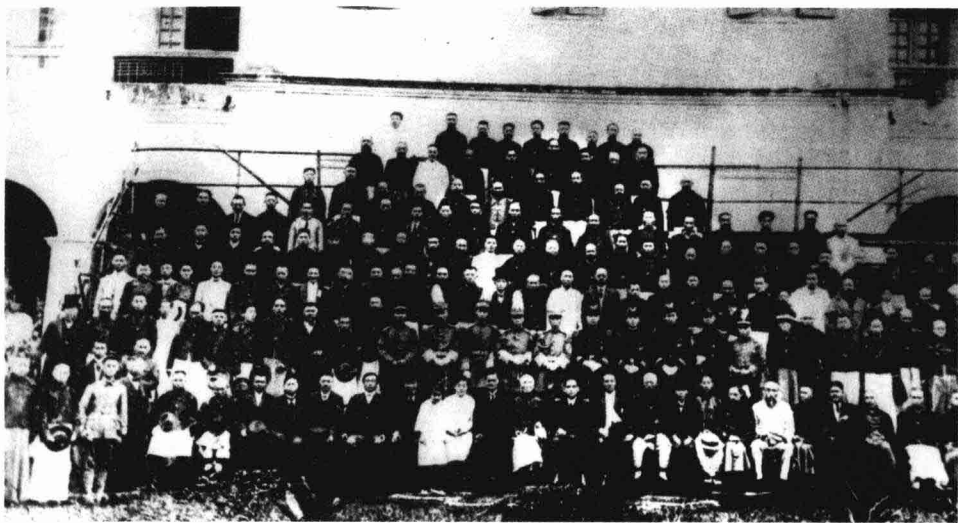


龄“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的电报后，他从神户乘船于6月26日回到上海。当天就和宋庆龄一起住进由加拿大华侨捐赠的、位于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寓所。段祺瑞阴谋从法租界引渡孙中山，但没有得逞。

1918年7月4日，改为总裁制的军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病中的孙中山躺在床上接待了前来劝说他就政务总裁职的吴玉章。在吴玉章的一番劝说下，为了顾全大局，保持所谓的革命联合战线，孙中山复函国会表示接受政务总裁职，并派徐谦为代表赴粤代行其职。9月，皖系控制下的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广州军政府通电反对。在宋庆龄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下，孙中山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他对政局仍很关注。他深居简出，认真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发愤著述，先后完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部著作。

1919年上半年，南北双方进行和议，孙中山主张和谈应以“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为唯一条件。5月28日，孙中山发表《护法通电》，坚持护法救国主张。7月，在各国驻华公使的“劝告”下，南北和议酝酿重开，孙中山指示胡汉民辞去南方议和代表职务，并致电南北双方，重申护法救国主张。而陆荣廷和岑春煊对广州人民和“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群众，施行独裁和镇压。孙中山气愤之余，于8月7日辞去政务总裁职务，与军政府一刀两断。

1920年2月，桂系与滇系因争夺驻粤滇军指挥权而发生内讧，大部分国会议员对桂系军阀的专制表示不满，纷纷脱离军政府。孙中山开始制订讨伐桂系、收复



■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与军政人员合影

广州的军事计划。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共同发表宣言,指责岑春煊、陆荣廷等牺牲护法主张,私自与北京政府议和。7月28日,4人再次联合宣言,重申护法救国主张,“倘有违背护法救国主张,复假借名义以谋个人权利者,不问南北,不问派别,当与国民共讨之”。同时,孙中山紧锣密鼓地布置讨伐桂系的军事行动。8月,命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兵分3路从福建回广东讨伐桂系。



■ 孙中山使用的行军餐具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粤军攻克广州后从上海来到广东。他意识到目前的军政府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无法起到护法的作用,应当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7日,220名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依照大纲的第二条,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大总统,孙中山以218票当选。5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设在观音山(今越秀山)南麓旧粤督府,原军政府取消。当天,广州市有数万人集会,举行欢庆游行活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依照国会授权组织中华民国政府。

统一两广,出师北伐,是孙中山第二次护法的中心任务。7月,孙中山正式下达讨伐令。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就接连攻克南宁、桂林、龙州,完成西征任务,两广统一。为统一西南各省和为北伐作准备,孙中山决定亲自出巡广西。10月8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出师北伐令。孙中山要求陈炯明抽调粤军40个营参加北伐,但陈炯明只想偏安广东,热衷于“联省自治”,心里反对北伐,表



■ 桂林大本营旧址

面上则敷衍孙中山,对出兵要求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为整顿军队,孙中山于12月在桂林设立大本营,进行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军事训练。至1922年初,整军工作大体完毕。2月,孙中山颁发动员令,命令北伐军分路出师北伐。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兼

30

愈挫愈奋
永不息战



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直攻武汉。不到10天时间，北伐军前锋部队分别进入湖南。北伐战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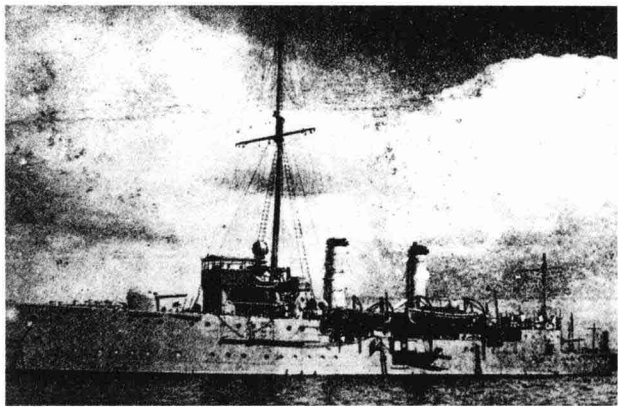
平定陈炯明叛乱



■ 陈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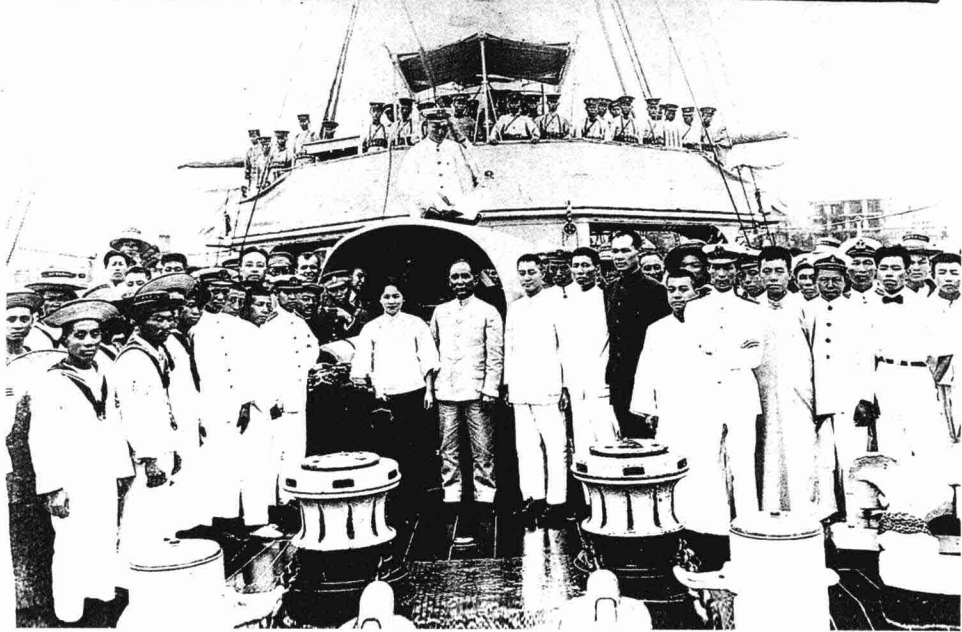
北伐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湖南督军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境，更为主要的是来自陈炯明的干扰和破坏。积极拥护孙中山北伐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被陈炯明部下刺杀，成为形势急剧恶化的征兆。同时，北伐军在江西节节胜利，使陈炯明担心对他在两广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准备背叛孙中山。孙中山对此已有所察觉，他一方面免除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长的职务，让陈炯明专任陆军部长；另一方面反复劝导陈炯明改变态度。

1922年5月间，陈炯明背叛革命的征兆日渐明显，广州局势呈现危机。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孙中山，为震慑陈炯明部、安定前线军心，不顾个人安危，自大本营率卫士返回广州。这时，他对陈炯明仍抱有一线希望。因为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原是由1917年孙中山主持军政府时的广东省长公署二十营警卫军改编而成，在陈炯明极为困难时，孙中山曾派廖仲恺、朱执信帮助陈炯明，同时还经常拨款接济，为了筹款甚至将上海莫利爱路的住宅抵押给银行。孙中山希望陈炯明迷途知返。不料就在北伐军攻克赣州时，截获了陈炯明与北洋军私通的信件。6月14日，孙中山看到这些信件后，顿感陈已不可救药。当晚，北伐军收复赣州的公报在广州发布，陈炯明意识到自己阴谋败露，遂于6月15日夜悍然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陈炯明有5万多兵力，而孙中山只有区区500人左右的警卫部队，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在宋庆龄“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的恳请



■ 永丰舰(后名中山舰)

孫大元帥蒙難一週年紀念
（艦軍豐永於鄂馬五峇）
民國八年八月十四日



■ 孙中山、宋庆龄与永丰舰官兵合影

下,孙中山先行离开总统府。他在化装登上“永丰”舰脱险后,立即发出讨伐陈炯明的号召,并率舰队炮轰叛军,同时,急令北伐军回师广州。宋庆龄脱险后也来到“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在极其困难的情势下,孙中山冒着酷暑坚持战斗近两个月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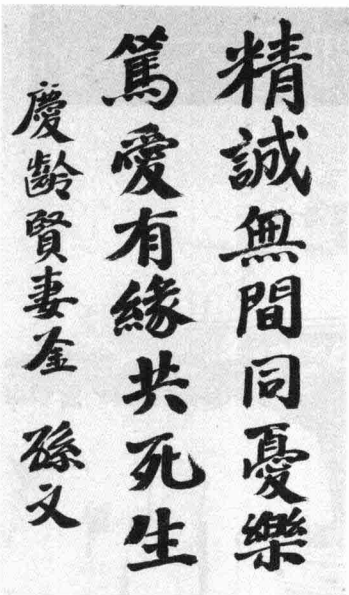
在黄埔“永丰”舰上的50多个日日夜夜,孙中山指挥北伐军和海军的力量与陈炯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间,孙中山严词拒绝了陈炯明的两次求和,表示“将于此地斗争下去,终其一生”。由于北伐军与陈炯明在赣南拉锯战多日后失利,难以南下讨贼,局势已经不能改变,孙中山只好离开广州去上海。1922年8月9日,孙中山率领蒋介石、黄惠龙等登上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到香港。在炮舰上,孙中山表示:“不图吾与君等竟得脱险,以有今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自负初心也。”随后,在香港转乘俄国“皇后”号赴上海。8月14日,经过5天的海上颠簸,孙中山一行人终于抵达上海吴淞码头,受到数千群众的热列欢迎。

陈炯明叛乱,是孙中山一生中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在《致海外同志书》中,他沉重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

30
愈挫愈奋
水不息战



孫中山



■ 广州脱险后孙中山书赠宋庆龄的题词

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所以，一回到上海后，孙中山立即着手安排平定叛乱事宜。

8月15日，孙中山发表宣言，揭露陈炯明叛乱经过，并表示：“为国法计，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当去此虫贼。”9月12日，他致函蒋介石促其来沪，商讨平定陈炯明的叛乱事宜。10月初，原北伐军攻占了福州，孙中山闻讯后异常兴奋，稍后，组建了3个军编制的讨贼军。12月8日，孙中山下令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部、范石生部，桂军沈鸿英部，粤军陈济堂部、莫雄部，共同出兵讨伐陈炯明。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伐陈炯明通电》，决心“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9日，滇桂联军攻打陈炯明部。16日，桂军攻占广州，上海各界代表60余人到孙中山寓所向他祝贺。

驱逐陈炯明后，广东各团体邀请孙中山南下。2月中旬，孙中山偕宋庆龄、陈友仁转道香港于21日抵达广州，在广州东郊设立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不再称非常大总统。3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正式成立，下设五部、三局、一库。第三次在广州建立临时政权，孙中山把扫除叛军余部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兼顾了和平统一的手段。他抛弃了护法的陈旧口号，指出了它的局限。他决心整理内政，铲除贪污之风；他提出任命官吏，要考察其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胜任职务的，发养老费退休；他已经认识到，只靠“枪”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于是改变策略，联合东北军阀张作霖商谈和平统一。

护法运动已经成为过时的斗争，与时俱进的孙中山认识到必须“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

31 著书立说 规划建国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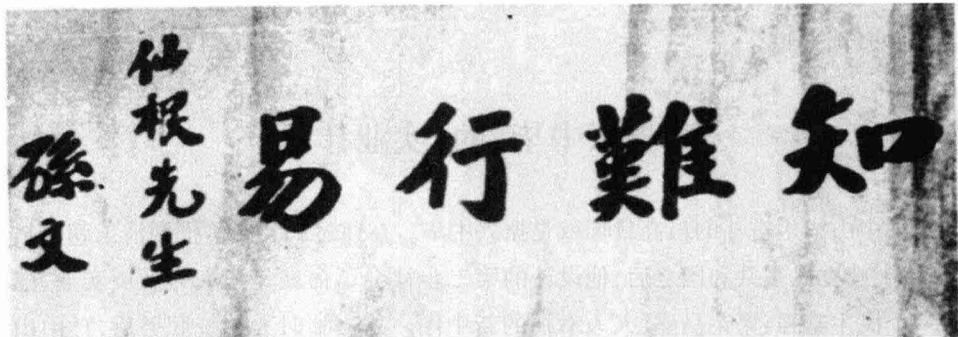
在两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为了总结辛亥革命以来国事变幻和革命跌宕起伏的教训,规划建国宏图,曾一度闭门著书立说。从1918年到1920年,他写下了一系列著作,汇编成《建国方略》一书,给世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撰“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

经历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最初的心情可谓极度苦闷,以致生病卧床。在宋庆龄的精心照料下,孙中山身体状况日渐恢复。在艰难困顿中,他专心致志从事著述,力求“以主义普及国民”,并准备开展新的革命斗争,“扫除前清的遗毒官僚、政客和武人三种陈土”,重新创造一个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

推翻清王朝之前,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从没有流露出悲观情绪,更没有放弃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可是建立民国后,为什么每一次革命斗争都失败了?原因是什么?苦苦求索,终有收获。孙中山深刻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历时3个月,一气呵成《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1919年春定稿,1919年6月5日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该书对



■ 孙中山书赠日本友人仙根“知难行易”



孫中山



孫文學說序

文舟之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涵
 無間古折不四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
 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用能鼓動風
 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嚮向作人志士之贊襄獲得
 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本可從此進進實行革命完
 所抱持之五民主義五權憲法此夫革命方肇所規定
 之種種建設宏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
 強之域躋斯民於安樂之天也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則
 起異此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圖中國之同胞

■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孙文学说》

■ 孙中山撰写的《孙文学说》序

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训，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孙中山从哲学高度探索民国以来“人心涣散”、“不图进取”、“国事日非”的根源，认为这是国人存在着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障碍。知行学说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学派纷呈。孙中山对此早有相当认识，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知”、“行”问题。在上海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他再一次关注这一命题。

孙中山认为，由于革命党人思想上存在“知易行难”的错位认识，他们就会“视吾政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怕苦畏难，丧失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用大量的篇幅，以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10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为证，来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进而总结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以及日本、欧美诸国“突飞之进步”情况，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证明“知难行易”学说才是救国之道。

著“振兴中华”的《实业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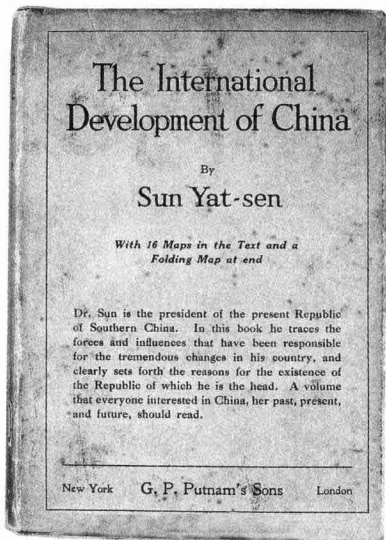
孙中山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就是振兴中华。在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之后，他设计的第二步社会革命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繁荣昌盛、人人幸福的新中国。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一度满怀热情和信心，投身于“振兴实业”和“发展物力”的实践，但袁世凯的独裁

统治中断了他宏伟计划的实施。在同封建军阀、官僚政客进行斗争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关注民生，振兴中国实业。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回到上海除了总结经验教训，还制订了令人惊叹的旨在发展中国的宏伟规划，这就是1920年7月最终完稿的《实业计划》。这是一个以工业化为中心、全面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大规模建设方案，孙中山提出了发展交通、通讯、水利、钢铁、采矿业、农业等10个方面的中国实业的计划，以及6个具体实施步骤。他主张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国资金、人才和技术来振兴中国实业，在10至2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100万里公路，建造北方、东方、南方3个大港口和多处商埠，建立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械制造、有色金属、水泥等大工矿企业，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业，以及发展纺织、食品等多种轻工业等。在利用外资问题上，孙中山强调要权操我手，“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实业计划》用英文写成，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满怀希望地认为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将出现资金、机



■ 孙中山1921年绘制的《中国铁路全图》，附于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实业计划》中正式发表



■ 孙中山著《实业计划》英文版

器、产品的过剩，而巨大的过剩资金自然需要寻找投资的市场，中国则可成为消纳过剩资金的巨大市场。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帮助中国发展实业，但是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愿提供任何资金和技术；而国内战争不断，南北分裂，革命政权远未建成。所以，《实业计划》无法实现。但是振兴中国实业是孙中山始终不曾放下的理想。宋



庆龄曾回忆说：“他只要有一点空，就在书房里把大地图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深色铅笔和橡皮，在上面绘出铁路、河道、海港等。”直至临终前，孙中山仍不忘向病榻边的同志嘱咐：“切记一定要开发我们的西部！”

述“行民权第一步”的《民权初步》

1917年，孙中山写成《民权初步》，目的是使中国人学会行使民权的第一步知识。他说：“今后民国之安危如何，则全民权之发达如何耳。”《民权初步》共分5卷及附录，初名《会议通则》，1920年汇编时改名《民权初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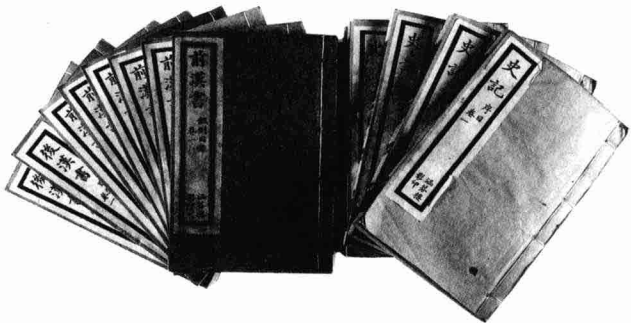
孙中山是一个极为重视民主建设的革命家。他认为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之所以不能成为富强的国家，原因在于人心涣散、民心不固，致使中国四万万人成为一盘散沙。这决非天生如此，完全是由封建专制政府所造成，当时“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因之，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国，必须发达民权，而这本书的写作主旨是“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若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显然，孙中山写作目的是为了反对专制、培养民权、凝聚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团结力、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

孙中山著书立说前，曾拟定过完整的写作计划。如果说《孙文学说》是从国民的心理方面树立“知难行易”的正确观念，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战胜困难，《实业计划》是为了使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强国而制定的宏伟计划，那么，《民权初步》就是从实行民权中学会做国家的主人。他把这3部著作汇编成《建国方略》一书，其中，《孙文学说》易名《心理建设》，《实业计划》易名《物质建设》，《民权初步》易名《社会建设》，从而构成了系统的《建国方略》。他在总结自己几十年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施的具体措施、步骤。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3书汇编成《建国方略》出版后，孙中山准备再继续写《国家建设》一书。他说：“《国家建设》一书，较前三书为独大，内涵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



■ 1917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会议通则》

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而《民族主义》一册已经脱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册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册，于思想之线索。方拟全书告竣，乃出而问世。”



然而，陈炯明叛变，炮

■ 孙中山藏书《二十四史》

击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竟将孙中山“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殊可痛恨”。这不仅将孙中山著书立说的庞大计划打断，而且使第二次护法运动又以惨痛的失败告终。

31

著书立说
规划建国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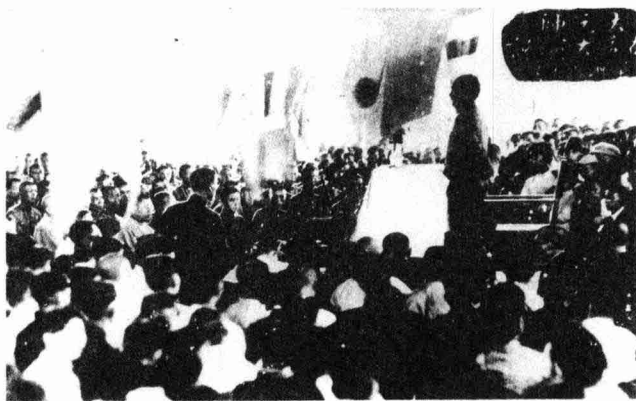
32 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曾经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的民主革命政纲——三民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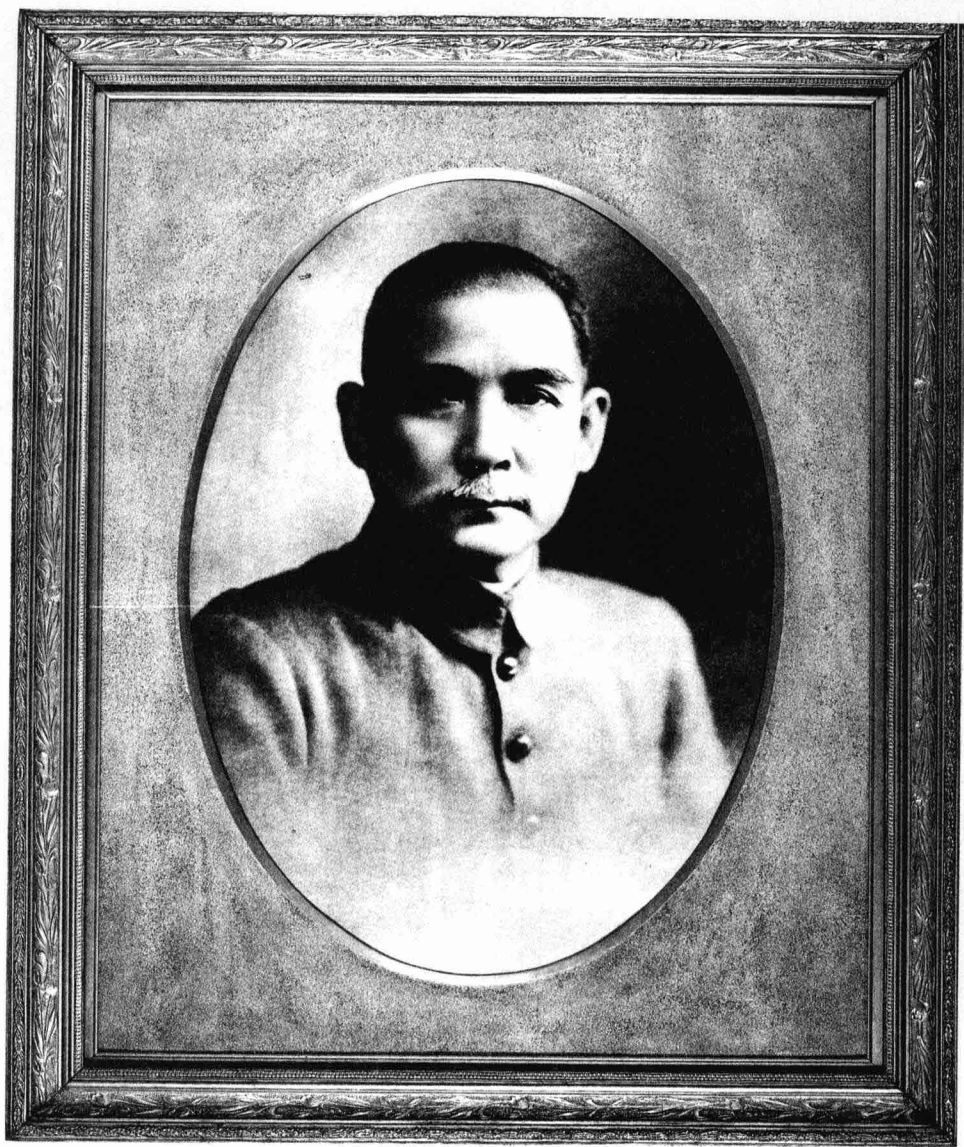
“三民主义”发展新阶段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不久，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并宣布要将它“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辛亥革命，就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

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



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原先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已逐步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孙中山在总结革命实践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对三民主义有了一个从“没有更改的必要”到“重新来解释”的



■ 1922 年底孙中山在上海留影



转变,使三民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政府,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残酷地压榨广大民众的血汗,少数民族也和汉族一样仍旧受着歧视和排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逐步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对帝国主义有了新的认识,逐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1920年,他认为:“当初同盟会还只明白民族主义,拼命去作……其实民族主义也未完成。”稍后,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脱离了满洲人的奴隶,还要作外国人的奴隶”。他认识到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中国依然被列强所包围,中华民族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所以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成了孙中山民族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特色和内涵。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消除侵害中国主权”的具体政策,确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从而使新时期的民族主义超越了旧民主主义时期,具有了明确的反帝斗争的特点。

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清王朝,废弃君主专制,代之以“平等”、“民治”和“国民”的共和国。其中建立共和制度是民权主义的核心。辛亥革命胜利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国家的政权还是被封

自序
自建国以来之心理建设物质
建设社会建设国家建设法律
千分以从事国家建设以
完成此快国家建设之任务各
书之大内涵民族主义民族
主义民族主义五福宪法
地方自治而后中央政府国法

計畫外至强策(一)而民族主义
一册已能脱稿民族主义民族主义
其二册小书机大印其他各书
於整理之役案研究之門徑
大書則查初稿僅有餘暇僅可
執筆直書不得思慮才敢
書者致乃出而門世不期于
十月十日陳明和電的

學觀者山光浩劫年心版所
成之若稿並付考考之而觀
數名種志激激去味可憐限
在此國風強固志決心從事
此心之奮鬥正當三民主義之
聖義五福憲法之要日急定
待之望故於每星期演說
一次由黃品君書華之

自序
自建国以来之心理建设物质
建设社会建设国家建设法律
千分以从事国家建设以
完成此快国家建设之任务各
书之大内涵民族主义民族
主义民族主义五福宪法
地方自治而后中央政府国法

有限者也 民國十三年
三月二十日 孫文序於
廣州 大石居

自序
自建国以来之心理建设物质
建设社会建设国家建设法律
千分以从事国家建设以
完成此快国家建设之任务各
书之大内涵民族主义民族
主义民族主义五福宪法
地方自治而后中央政府国法

年之精華與私滿之付理
及印理之年實所覺遠不
知尚尚也問在清老可也
若破國難引伸巨步開運
更正付理俾成虎一完善之書
以作宣傳之課才則其偉
益飛武民族我國國家實之

建軍閥、官僚和政客們所把持,普通百姓依然没有丝毫政治权利,仍然处在被奴役的境地。宋教仁被刺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到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和革命同志们发动了多次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最终认清了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真正面目。

他以革命的精神重新阐释了民权主义。在一系列的演讲中，他不仅批判和揭露封建暴政，而且明确指出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与帝国主义朋比为奸、互相利用的事实。与此同时，他对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代议政体”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力求建立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能够“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以“适合于现代中国革命需要”。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这样写道：“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之后，孙中山又多次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在孙中山看来，最理想的共和国应当是人民“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



■ 孙中山著《三民主义》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最初倡导的民生主义以“土地”和“资本”为中心。在同盟会的宣言中，他明确指出“平均地权”的内容是通过“核定天下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和“土地涨价归公”的手段，实现“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方案，从而达到预防资本主义的垄断“祸患”，“解决农民自身问题”和造福社会的目的。资本问题则是民生主义的另一项基本内容，孙中山主张采用“节制资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孙中山赋予民生主义以新的内容：在土地问题上，他正式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资本问题上，重申并发展了“节制资本”的观点，希望通过国家垄断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大企业的方法，“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以免社会遭受“资本的危害”。

提出“三大政策”

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传承和发展。联俄、联共、

32

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三民主义的新阶段与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定意义上，前者是原则和纲领，后者是战略和策略，即途径、方法和手段。三民主义的新阶段和三大政策相结合，使得三民主义成为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纲领。毛泽东也反复指出：“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联俄是三大政策的发端。联俄政策的形成是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希冀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幻想破灭，并在十月革命后对苏俄进行观察、接触、比较后，深切认识到只有俄国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挚朋友的结果。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新生的苏俄。1920年7月、9月，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对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权，使孙中山深受鼓舞。1920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与孙中山会见，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同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孙中山询问了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的一些情况，提出了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的要求。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的北伐军总部会见了孙中山，马林在桂林逗留了9天，与孙中山作了3次长谈。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认识到只有苏俄才是他真正的朋友。8月，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告诉前来拜访的马林，他现在感到与苏联建立更紧密的



■ 马林



■ 越飞

关系是绝对必要的。1923年1月，苏俄代表越飞抵达上海。在沪期间，越飞3次到莫利爱路29号与孙中山商谈中国革命问题，并于1月26日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此后，苏俄陆续派遣政治、军事顾问到中国，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孙中山也派代表到苏俄去考察学习。

联共是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和核心。“联俄”必须联共，“扶助农工”也必须联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且也是工农运动的领导者。孙中山为使国民党得到新鲜血液，从而使中国革命得到新



■ 李大钊

飞跃,联共成为他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处于危难之际的孙中山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1922年7月中下旬,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与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的方针。1922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李大钊根据党的决定,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表示支持。此后,李大钊又多次同孙中山会面,他们“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共同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天下大势到国共合作。孙中山十分兴奋,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够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随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也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从而使联共政策进入实质性阶段。可以说,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就是通过改组国民党来实现的。1923年10月,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共产党的参与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扶助农工政策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孙中山早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发动和依靠的革命力量大多是华侨、会党、新军和知识分子等,后来曾一度依靠军阀来进行“护法”斗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思想转变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推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学生代表,鼓励他们斗争。特别是上海工人的“六三”罢工,使孙中山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中国不仅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而且各地的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孙中山从这些工农运动中得到深刻的启示,他于1922年12月在上海向外国记者指出:“余之目的,在使劳工被认为社会间一种有资格之人”,“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孙中山认为“有了团体的工人”可以充当“国民的先锋”,他把占全国人数最多的农民视为“革命的基础”。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指出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随着斗争的发展,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工人和农民的作用和力量,在决定联俄联共时,也确定了国民党必须唤起工农和依靠工农进行奋斗的方针。

改组国民党 实现国共合作

陈炯明叛乱发生时,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达林就通过孙中山的代表陈友仁转告孙中山,共产国际和苏俄是站在孙中山一边的。

陈炯明叛乱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支持孙中山,严肃处分了支持陈炯明的共产党员谭平山。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的中央执委会。会议原则上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按照民主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随着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对国民党改组信心更足。

西湖会议后,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与马林在莫利爱路寓所再次会晤。马林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同苏俄结盟,还建议孙中山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孙中山非常乐意接受马林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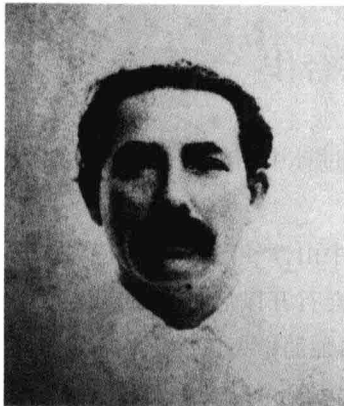
当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要吸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寓所书房,孙中山和李大钊曾在此会晤

32

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鲍罗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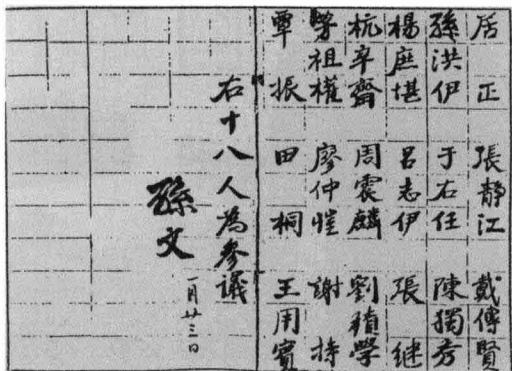
从1922年9月起,国民党改组工作进入筹备阶段。1922年9月到12月,孙中山先后3次在上海召开讨论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各省代表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共产党人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共有9人的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草拟《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支持工人运动,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从依靠

地方军阀改变为依靠广大民众。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1923年1月,南方政治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孙中山策划组织的滇桂联军击败了陈炯明,收复广州。此时孙中山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在那里设立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进一步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正当孙中山加紧改组国民党准备工作步伐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确认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从1923年10月起,国民党改组工作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孙中山任命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帮助国民党改组。10月19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工作,并派人密电在北京的李大钊来沪会商。稍后,李大钊从北京直接到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1923年10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着手改组国民党事宜。11月25日,孙中山正式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孙中山还对国民党员连续发表演说,重申他改组国民党的决心。改组工作首先在国民党员较多的广州、上海进行,主要进行了党



■ 1923年1月23日,孙中山手书任命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参议名单

员登记,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划分各区,建立各级党部,在上海,复旦大学、永安公司等单位和工、商、学各界都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12月16日,正式成立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廖仲恺、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和共产党人的支持和帮助。1923年



■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

底,陈独秀签发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帮助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坚决反对国共合作。为此,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教育工作,也对一些顽固派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仍有一些人坚持反对。就在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后不久,张继、冯自由等11人联名向孙中山提出报告书,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见到报告后十分生气,亲笔在报告上做了批示,对他们的言论严加痛斥。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孙中山驳斥了种种反对国共合作的谬论,他越说越激动,最后用手把桌子一拍,说:“你们反对改组,我就抛弃国民党参加共产党。”冯自由等人最终被孙中山开除了党籍。

改组工作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

32

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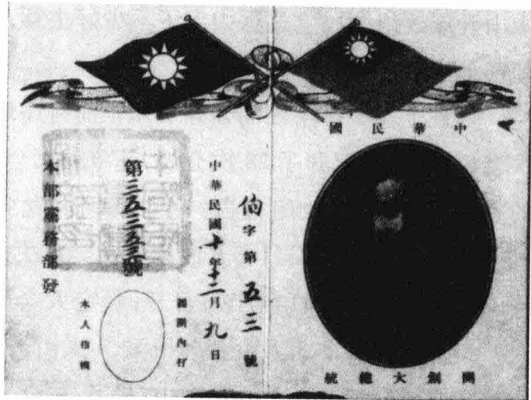
33 召开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坐落在广州文明路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孙中山身穿中山装端坐在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大钊、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等人也在主席台上就坐，来自海内外近200名会议代表端坐台下。看着济济一堂的代表们，孙中山心情异常激动，他将与他们共同讨论决定有关国民党和国家前途的大政方针。此时，孙中山感慨万分，创建兴中会以来，经过多少艰难曲折才一步步走到今天！今天的大会将是革命蓬勃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国民党的历史沿革

国民党是1912年8月在北京建立的，其前身是中国同盟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国、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后，社会民主空气日益高涨，各种政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不少人士和组织都希望能能在共和政府中获得参政的机会。为了扩大政党的力量，以保证同盟会在组建民国政府及议会中能占领导地位，同盟会联合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组成了国民党。这样，同盟会就由原来秘密的革命政党转成了公开的政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孙中山被推荐为理事长，后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为了保证国民党能在议会选举中占有多数席位，宋教仁积极开展活动，这给希望独裁统治的袁世凯造成了威胁。1913年3月，袁世凯撕破了假共和的面纱，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开展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为了更好地领导反袁斗争，孙中山决定重组政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他同时通告国内各省国民党支部均秘密改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希望经过这次改组,能够建成一个坚强的战斗的革命核心。但是由于党内意见不一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并没有大的起色。孙中山一直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他深感要使革命获得成功,“从根本上着想,非整理党务,先固实力,不足以及时奋起”。因此,他一方面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研究,确立党的指导思想和建国主



■ 中国国民党党证

张,希望以新的思想和实践唤醒全国民众,再启革命,建设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重订党章,从组织上作好重建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19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从10月10日起中华革命党正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会议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公约》,强调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发展很快,在工、学、军各界均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到1923年底,海内外恢复及新增加的组织达400处,党员也由1919年的不足10万人激增到20多万人。

起草“一大”文件

中国国民党成立后队伍虽然壮大了,但由于思想教育、党的建设未能及时跟上,因此组织松散、成分复杂、战斗力不强的状况并未改变。1922年6月,又发生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的事件,不少国民党党员也跟着陈炯明背离了孙中山,使北伐统一大业受到沉重打击。痛定思痛,孙中山深感要改变当时中国军阀横行的状况,就一定要先下大力整顿国民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全党。孙中山决定要采取新的措施来彻底改组国民党:一、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二、吸收新鲜血液;三、用新思想去改造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协助下,孙中山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负责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由9名执行委员和10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邓泽如,以及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等都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鲍罗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由于他比较熟悉苏联的革命经验,在协助孙

33

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山开展改组国民党过程中出了不少好主意,深得孙中山信任,因此执委会成立时即被孙中山聘为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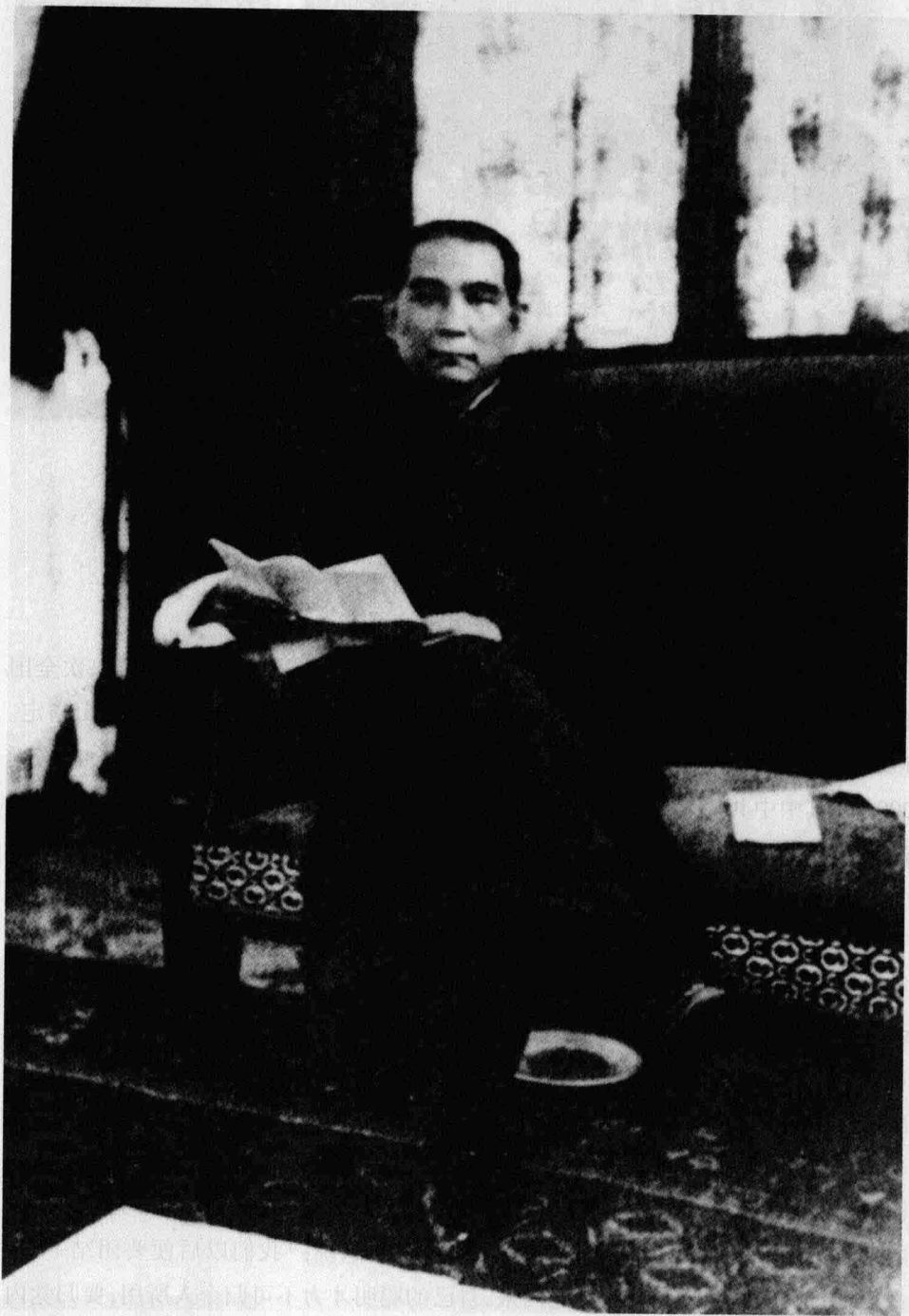
筹备工作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执委会每隔三四天就开一次会议,先后共召开了28次会议,起草的大会决议要案达400余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等。1923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十次会议决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确定大会的总预算为5万元;代表名额为144人,每省6人,其中3人由总理指派,3人由当地党员推选;同时规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可介绍若干人给孙中山,供其选派。之后,各地的党员登记和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的组织建构工作随即展开。

“一大”宣言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关系到国民党今后工作的新的方针政策。孙中山非常重视宣言的起草工作,他先请鲍罗廷提供一份宣言草稿。鲍罗廷是共产国际代表,他在起草“一大”宣言时基本上是按照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决议”的提纲精神来撰写的。为了写好这个宣言,他还多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相关会议,听取他们对宣言的起草意见。共产党人瞿秋白作为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也直接参与了起草工作。鲍罗廷用俄文起草宣言草案后,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并加以修饰。之后,孙中山派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一起参与修改工作,他们将孙中山的意见和想法及时转达给鲍罗廷。有时孙中山也直接与鲍罗廷沟通,由精通英、俄文的廖仲恺担任翻译。宣言的初稿完成后,1923年12月下旬,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举行会议,讨



■ 瞿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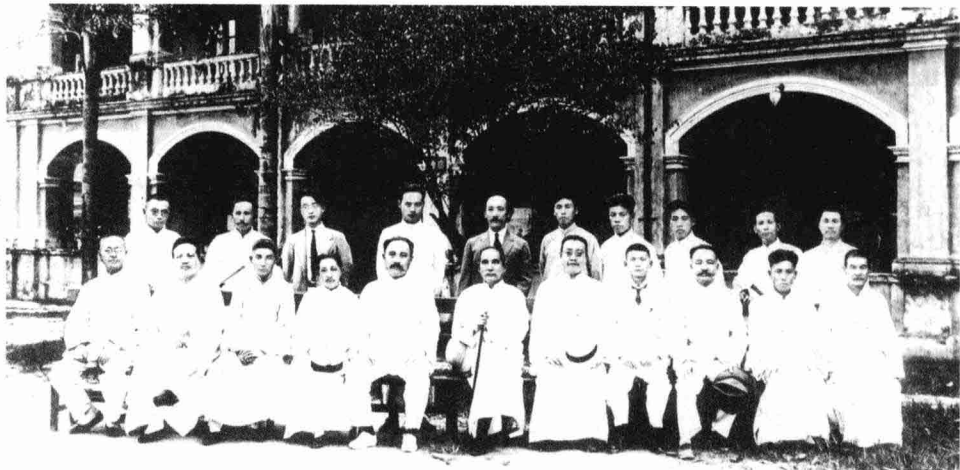
论鲍罗廷起草的这份初稿。鲍罗廷、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瞿秋白、蒋介石等人出席了会议。会后,临时中央执委会委派汪精卫为宣言起草员,负责对宣言的俄文中译稿进行再次修改。在此期间,宣言草案的内容却遭到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广东支部部长邓泽如等人还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面对来自党内的各种声音,孙中山要求执委会多听取一些意见。执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对宣言草案进行反复讨论,孙中山也抽时间亲自参加讨论。宣言最后经孙中山审定后提交大会审议。



■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留影



孫中山



■ 孙中山与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的部分人员合影

召开“一大” 确定新的方针政策

经过充分准备,1924年1月19日,胡汉民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并决定大会主席团人选由孙中山指定。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实际到会代表近200人,其中中共代表为24人。“一大”主要议程有:讨论通过“一大”宣言;讨论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等文件;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正确的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很好……今天民国的国基还没有巩固,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功夫,把国家再造一次。”他又强调:“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我们对于改组党和改造国家之外,另外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够巩固的地方……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最后,他号召大家说:“我们以后便要团结一致,都要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归个人所用,要归党内所用。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像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接着大会通过了会议规则及秘书处组织规则。上午11点30分大会休会,

广东支部及海员工会等各团体 3000 余人来到会场祝贺代表大会召开。大家环绕会场 3 周,3 呼“万岁”,孙中山登台检阅了队伍。国民党各地支部和各团体也纷纷给大会发来贺电,表示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重大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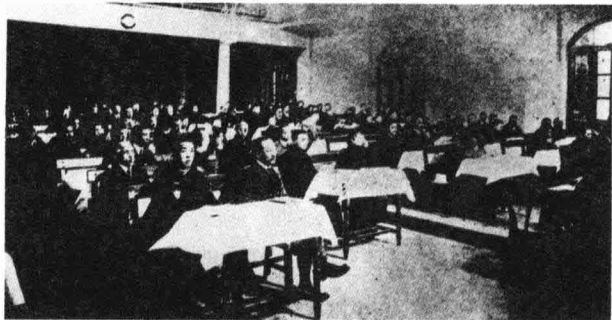
在下午的大会上,孙中山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请代表审查。孙中山着重指出了大会宣言的重要性——“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因为这个宣言“将国民党的精神、主义、政



■ 孙中山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

纲”完全公布于众,并使之付诸实现。他要求大家认真细致地加以审查、修改。为了使宣言能集中反映大会精神,在孙中山的提议下,大会成立了“宣言”审查委员会,成员由胡汉民、戴季陶、恩克巴图、叶楚伦、黄季陆、王恒、茅祖权、于树德、李大钊等组成。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孙中山在广州西濠酒店设晚宴招待出席大会的蒙古和各省市及海外代表。

在接下来的几天会议中,代表们围绕“宣言”等大会文件展开讨论;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焦点是:第一,关于国共合作问题。邓泽如、黄季陆及海外部分国民党右派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及建立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的决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没有采纳这条意见。第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等问题,鲍罗廷、李大钊等提出要没收地主土地和大公司资产,把土地收回国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对此也不予采纳。第三,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宣言”主张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一些代表、尤其是海外代表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担心会刺激西方列强,不利华侨在海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外的发展,主张删去。最后在孙中山的坚持下,保留了这方面的内容。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孙中山针对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员的疑虑,在代表大会上先后作了 8 次讲话,向代表作了充分的解释和说服工作。



■ 大会纪念品

在为什么要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问题上，他说：“以党治国的俄国制度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制度，中国必须仿效……至于共产主义经过6年实践，渐渐与民生主义相类似。俄国革命的方法应该当作一种模范。”在会上，李大钊也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作了诚恳严肃的解释。他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亦即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绝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时，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他恳切希望两党同志相互理解：“既然国民党同意我们加入，如果大家认为我们是为发展国民党而来，就不要加以怀疑、加以防制，这样对国民党的发展是有害的。”廖仲恺也发表讲话，认为“宣言不但代表本党大会诸君的意思，并且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

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孙中山将“宣言”正式提交大会表决，获得了一致通过。随后，孙中山发表讲话，说：“现在本党大会宣言已经表决，这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但是我们表决‘宣言’之后，大家必须依‘宣言’而行，担负此项实行责任……现在本党召集此次大会，发表此项‘宣言’，就是表示以后革命与以前不同：前几次革命均因半途上与军阀官僚相妥协调和，以至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败……此时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打倒，把受压迫的人民来解放。”对外要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主义”，解放全世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

在“宣言”中，国民党第一次明确指出党的直接任务、党的政治原则和立场；确认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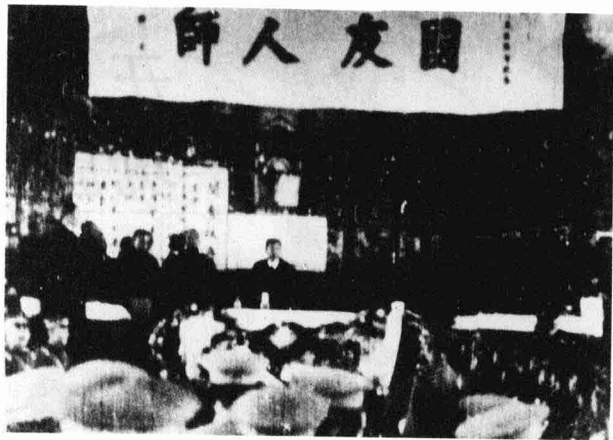
“宣言”的内容分为3个部分：

第一，“中国之现状”：主要指出中国辛亥革命后，国内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导致中国的悲惨处境。

第二，“国民党之主义”：阐明了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基本内涵。

第三，“国民党之政纲”：即对内对外政策。对内，规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宣布给农民、工人及各阶层人民的民主权利，改善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经济条件；对外，加入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条文。

1月21日,列宁逝世。25日,正在参与国民党“一大”的孙中山闻讯后,即在会上作了《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并提议用大会名义发电哀悼列宁,休会3天,下半旗致哀。当日,孙中山也以个人名义致电在华的苏俄代表加拉罕,对列宁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28日,大会继续进行,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等一系列文件。



■ 1924年2月24日,孙中山出席中国国民党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的追悼列宁大会,任主祭并宣读了《追悼列宁祭文》

1月30日,大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决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前提下,实行委员制,根据孙中山提议和委员推选,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中共党员3人;选出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中共党员7人;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和中央候补监察委员5人。1月31日下午,大会胜利闭幕,孙中山致闭幕词说:“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去奋斗……以前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有了办法,就要诸君担负责任,拿这个办法去替国人发生一个新希望。”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使原来思想混乱、成分复杂、组织涣散的国民党实现了改组,获得了新生;同时,会议的召开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会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国民党进一步改组和建立地方组织,清洗了一部分反动分子,吸收了一大批新生力量。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亦即革命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迅速出现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33

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34 开展群众运动 巩固革命策源地

随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各级组织,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妇女陆续加入国民党,大大加强了革命的力量,开创了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扶助农工 发展群众运动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工农群众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扶助农工”的政策、措施,为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国民党中央专门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这两个部主要从事建立工人、农民组织,培养农民干部,指导工人、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等工作。工人部部长由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担任,共产党员冯菊坡担任秘书;农民部部长由共产党员林祖涵(即林伯渠)担任,共产党员彭湃任秘书。这些部门的很多要职,不少都是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

■ 廖仲恺 (1877—1925)

近代民主革命家。原名恩煦,广东归善(今惠阳)人。生于美国华侨家庭。1893年归国,1902年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协助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致力于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财政部次长、广东财政厅厅长。此后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历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长等职,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孙中山逝世后,坚持执行三大政策。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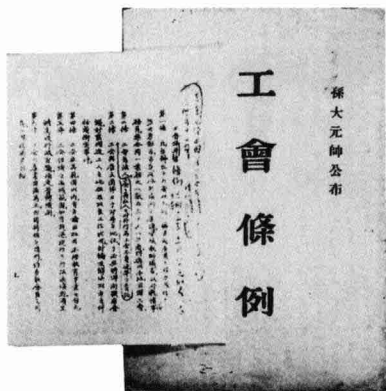


工人部、农民部设立后,国民党中央开始开展农民运动,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农民运动的初步计划,决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发出告全国学农工商书,号召国民投身国民革命斗争。4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制定了农民运动规则,“规定组织各种农民团体,积极开展农民运动”。5月,又建立了中



■ 1924年春,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留影

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辅助农民部的工作,毛泽东曾担任委员会委员。农民部还派出秘书彭湃赴广宁县,调查农民运动状况。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广东省广宁、香山等地开展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也派出干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各地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拟定了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章程》,作为指导各地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由孙中山签署并由广东革命政府颁布,对农民协会的组织原则、领导体制,各级农民协会的组织办法、权限与职能等方面,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6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规定在广州开设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人才。7月3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开学。7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广州革命政府的《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



■ 1924年11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布的《工会条例》及其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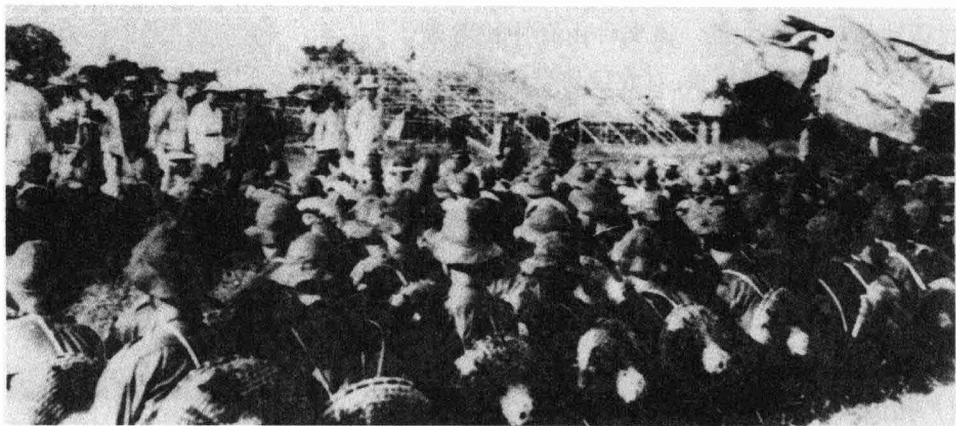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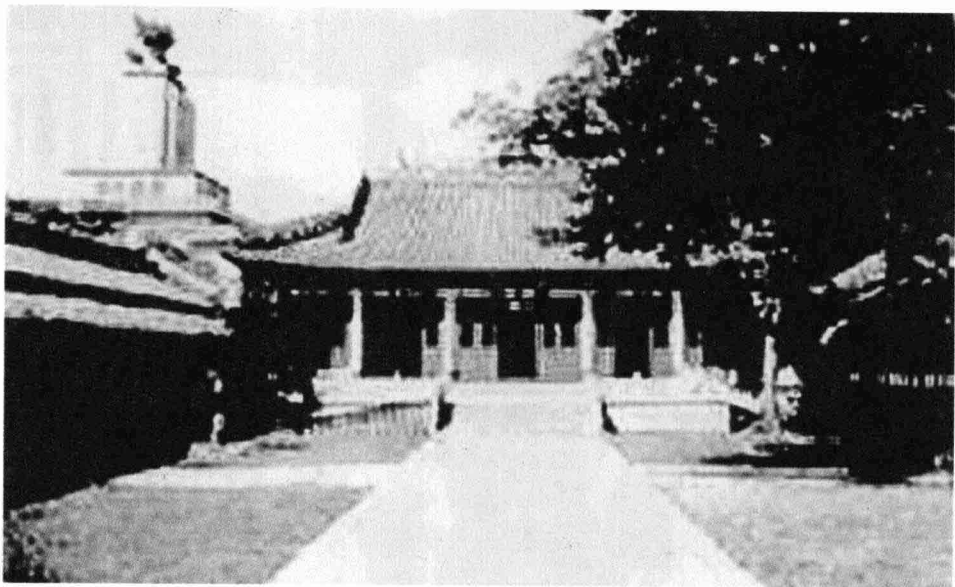
开展群众运动 巩固革命策源地

国民党中央对工人运动也相当关注和重视,1924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工人部提出的《工人党团组织原则》,决议组织广州市青年工人俱乐部。5月1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并演说,号召工人组织大团体,学习俄国工人,做国民的先锋。5月8日,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议决设立广州工代会执行委员会。11月,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命令公布《工会条例》。条例规定:允许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组织工会,“工会在其范围内,有言论、出版及办教育事业之自由”;“工会在必要时,得根据会员多数决议,宣告罢工”。这是我国第一个承认工人阶级有成立工会和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自由的工会法,对广东以至全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数月,广东花县、东莞、中山、番禺等各县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1924年底,广东有14至15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8万人。1925年5月,广东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1万多人。到1926年5月,广东全省90个县中,有66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共有会员62万人,农会能领导的群众在300万人以上。至此,广东的农民群众已基本上组织起来,形成民主革命的一支伟大的力量。与此同时,1924年7月底,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了广州市农民联欢大会,广州近郊农民党员1000多人到会。孙中山在廖仲恺和彭湃等人的陪同下,亲自出席检阅大会,并登台演说。许多打着赤脚、衣衫破烂的农民,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积极地参加会议。看到这番情景,孙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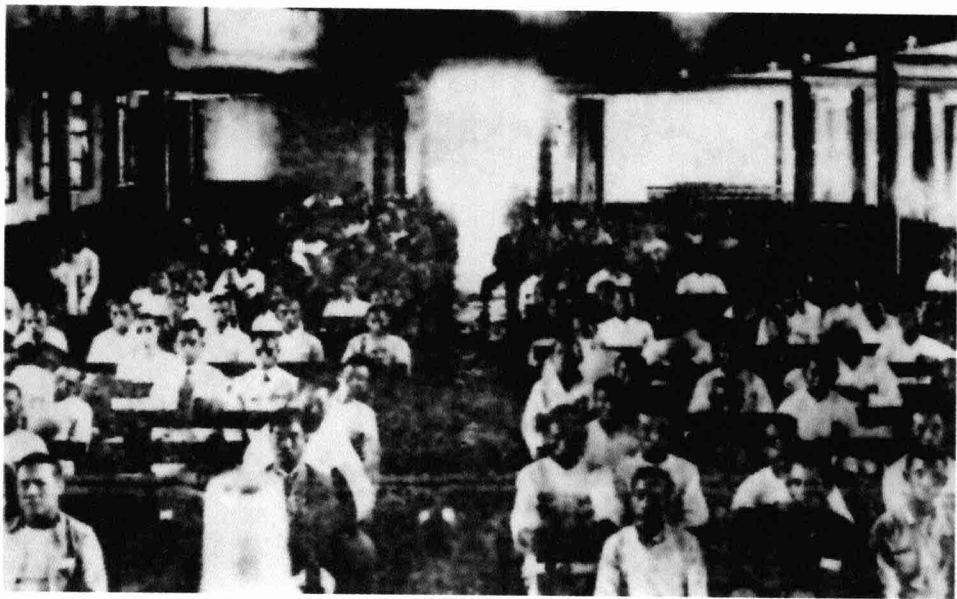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高兴地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

为更好地指导农民运动,适应农民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在孙中山、廖仲恺的支持下,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干部。创建农民运动讲习所,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列为“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1924年7月3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到1926年9月,前后开办了6届,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干部。8月21日,农讲所第一届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孙中山亲临祝贺,并作了演讲,鼓励农讲所毕业学员“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这是我们国民党做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他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彭湃、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李立三、恽代英等都担任过农讲所的教员。

广东各县农民从组织农民协会之日起,就成立了农民武装,积极投身反对军阀、买办势力和封建土豪劣绅的斗争。1924年8月,由广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改编组成的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奉命移驻省署,担负警戒任务,成为“农民自卫军之始”。到1925年春,广宁、海丰、花县、东莞、顺德、高要、普宁、曲江等县也都先后成立了农军组织。广东各地的农会、农军还积极参加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战役。1924年11月,广宁县农会和农民自卫军掀起了第一次“减租”斗争高潮。

37



■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会场

农民协会的成立和农民武装的出现,把广东农民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在广东农民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推动下,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苏、江西、山东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农民运动的高涨,既加强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实力和地位,又进一步扩大了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和影响。

工人运动的恢复与发展

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一度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国共两党有力的合作,中国工人运动从1924年开始出现了新的高潮。

首先,工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广东已建立工会组织,但工会繁多,情况复杂,如广州地区工人不到20万,却有160多个工会,且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为更好地领导和开展广东工人运动,由中共广东地委牵头,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发起“劳工统一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会组织。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于1924年5月1日召开,到会代表160多人,代表10多万工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勉励工人“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工人大团体”,他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要“作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于5月10日胜利闭幕,会议通过了进一步统一工会组织等20个决

议案,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标志着广东工人阶级从分散走向联合。

广东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声势不断壮大。1924年6月30日,帝国主义借口法国驻越南总督遇刺,公布了歧视中国人民的“新警律”,规定住在广州沙面英、法租界的中国人,进出沙面均需携带贴有雇主相片的护照,而外国人均可自由通行。为抵制这种歧视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做法,沙面工人于7月15日宣布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广东革命政府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罢工坚持了32天,英、法帝国主义被迫于8月17日宣布撤销“新警律”,罢工最终获得了胜利。在罢工期间,孙中山非常关注斗争进展情况,常常在大本营接见沙面罢工大会委员以了解情况。沙面罢工打破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我国工人运动重新走向新高潮的起点。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直接促成了广州工人阶级自卫武装的建立。罢工结束后不到10天,广州工代会即开会议决“立即进行编练工团军”。8月20日,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工团军正式成立。这时,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工人已达15万多人,占广州有组织的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工人运动在革命根据地广州乃至全国各地都已开始高涨。

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后方基地,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风暴准备了广泛而又坚实的群众基础。

34



35 黄埔建军

孙中山很早就有建立革命武装的思想与实践。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就着手举办军事训练班,以培训起义所需的军事人才;1903年,在日本友人帮助下,创办了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1910年3月,在美国洛杉矶长滩,他和美国人咸马里讨论,准备在美国成立军事训练营,为中国革命培训起义军事人才。“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聘请日本友人中井佐开办“军事浩然社”,培训100余名留日学生,蒋介石曾经在“军事浩然社”受训。组建军校、建立革命军队是孙中山殚精竭虑的重要革命事业。

以俄为师 谋建军校

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英勇无畏的红军在内战中打败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军,又击退了武装干涉的协约国联军,不禁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知道,布尔什维克党起初只是拥有几千人的赤卫队,在短短几年里就发展成为由300万人组成的7个方面军,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红军听从党的指挥,由主管思想工作的政委负责鼓舞士气,保证军队铁的纪律,这不正是孙中山理想中的军队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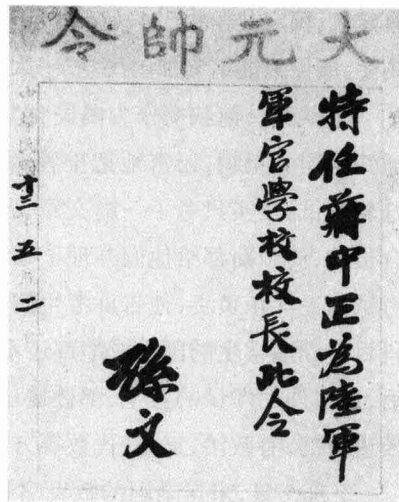
苏俄曾经面临过的内忧外患,正和现在南方革命政府所处的境地类似。然而苏维埃政权最终赢得了和平,能够实施新经济政策,使社会获得了发展。孙中山很钦佩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功,羡慕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红军,他也希望能建立起这样一支军队,早日实现《建国方略》里对中国未来的构想规划。

1920年,孙中山派遣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通过他向苏俄政府正式提议缔结军事同盟。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孙中山又提出希望俄国能帮助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组建一支掌握在革命党手中的军队。

陈炯明叛变发生后,躲过劫难的孙中山痛定思痛,更加迫切地感到不能再依靠新军阀打旧军阀了,只有革命的军队才是值得信赖的军队。这时从苏俄传来好消息:1923年3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了孙中山的请求后,决定提供军事援助,并派出政治、军事顾问小组,前来帮助孙中山建立一个军事学校,为中国的革命军队培养干部。

对此,孙中山深感欣慰。他指派蒋介石、张太雷等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党务、政治和军事。在那里,代表团参观了步兵、军用化学、高级射击、海军机器等不同类别的军事院校,还拜访了彼得罗夫斯克等军事将领。当看到红军战士配备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严格地进行训练时,代表团成员都鼓起掌来,他们感到“以俄为师”确实是壮大革命军事力量的必由之路。

这时,陈炯明的叛军还在反攻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组建“本党义勇军”抗击敌军。义勇军的军校被改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蒋介石担任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当时蒋介石尚在俄国考察,因此由廖仲恺先行筹备。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亲自出任学校总理。国民党中央拨给学校开办费186600银元,此外,每月拨款3万银元。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手令

择址建校 选拔良材

孙中山把校址选定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岛上,所以后来学校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黄埔军校”。从广州坐汽船到黄埔,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黄埔岛上山峦起伏,树木葱郁,是办校练兵的理想之地。

2月6日,军校筹委会正式成立,建设学校和招收学生的工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顺利开展。经过讨论,筹委会把拟定的名额分配到了各省区,各省招生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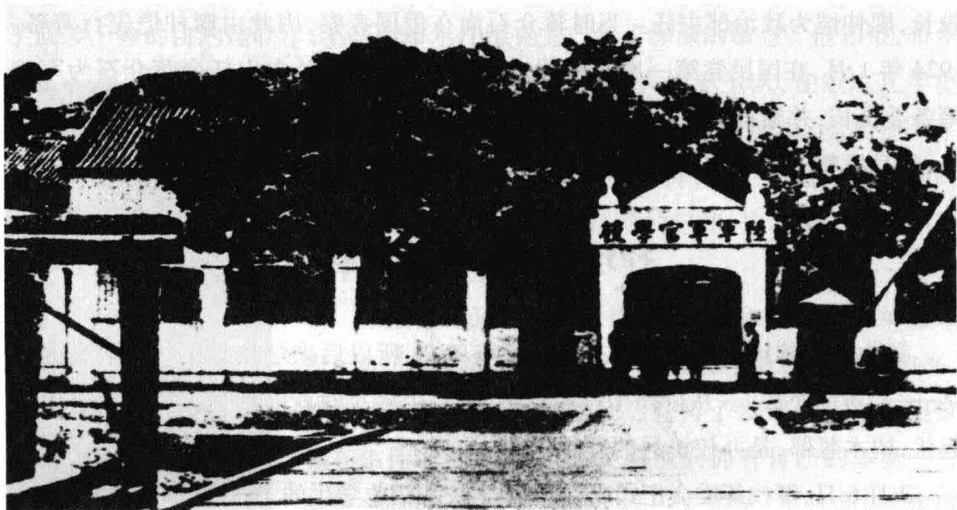


有定额,预定共招收324人。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军阀的势力范围内,不能公开招生,所以只能请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回省后秘密介绍青年应试。

中共党员何叔衡作为国民党“一大”湖南省代表,参加会议后回到长沙,立即通知基层党组织,秘密地把推荐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送到长沙清水塘参加考试。这轮考试,其实只考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凡是初试合格的,何叔衡都给他们办理了手续,还发放路费,安排去上海进行复试。上海的考试由毛泽东负责,他告诉考生们:复试除了国文之外,还要考三角、几何和代数等科目。湖南学生的国文成绩都还不错,可是因为没有准备,其他成绩就很一般。随后,通过两轮考试的考生,都被送往广州参加总复试。总复试是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有政治、三角、代数等方面的考题。

5月5日,来自全国的数百名被录取学生陆续入学。廖仲恺被任命为学校的党代表,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军校的总教官。孙中山设想将黄埔军校办成一所新式的军事学校,因此在训练之外还开设了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解剖、社会进化史等课程。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也在学校担任政治教官,分别讲授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和政治经济。

到6月16日,学生们在军校里已经学习了一个多月,孙中山指明一定要在这天举行开学典礼。因为1924年的6月16日是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两周年。孙中山希望从此能率领真正的革命军队进行北伐,而不再依靠南北军阀。



开学演讲 操场阅兵

16日一早,在初升旭日的辉映下,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驱车来到江边。他们登上了“江固”舰,在“江汉”舰的护卫下从大元帅府大本营出发,开赴黄埔岛。

7点40分,“江固”舰抵达黄埔军校。宋庆龄搀扶孙中山走下舷梯,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早已率领学校师生在码头列队奉迎,此外还有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林森、张继,外交总长伍朝枢、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和各军总司令在一旁恭候。

孙中山先到校长室浏览了教学计划,亲切慰问教官,随后巡视了讲堂和寝室,仔细询问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到了9点20分,便前往礼堂,发表演说。

孙中山站在讲台上,望着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们,激动地说:“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最后他手一挥,提高嗓音说:“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话音方落,全场就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此后,孙中山的这篇讲稿成为了黄埔办校的指导思想。

11点30分,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全体人员向党旗、校旗和孙中山三鞠躬后,孙中山就座,下令奏乐,全体唱校歌和《国民革命军军歌》。校歌的歌词是:

莘莘学生, 亲爱精诚,
三民主义, 是我革命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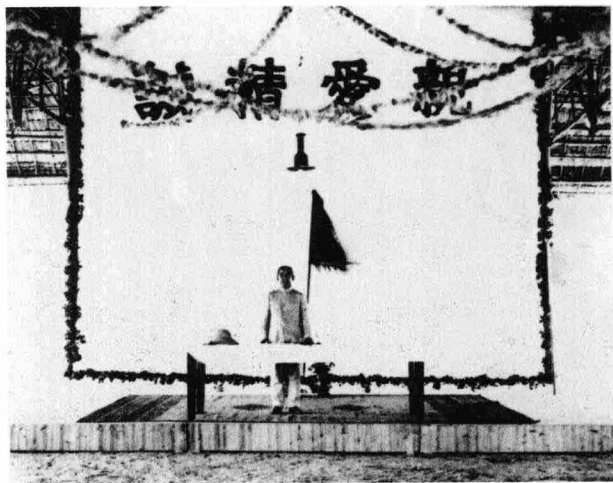
革命军人, 奋斗牺牲,
再接再厉, 继续先烈精神。

同学同道, 以学以教,
始终生死, 毋忘今日本校。

纪律神圣, 重于生命,
服从遵守, 革命军人本性。

以血洒花, 以校作家。
卧薪尝胆, 努力建设中华。

《国民革命军军歌》则这样唱道:



■ 孙中山在军校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随后,孙中山双手捧着校印,亲自授予校长蒋介石。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上台代孙中山宣读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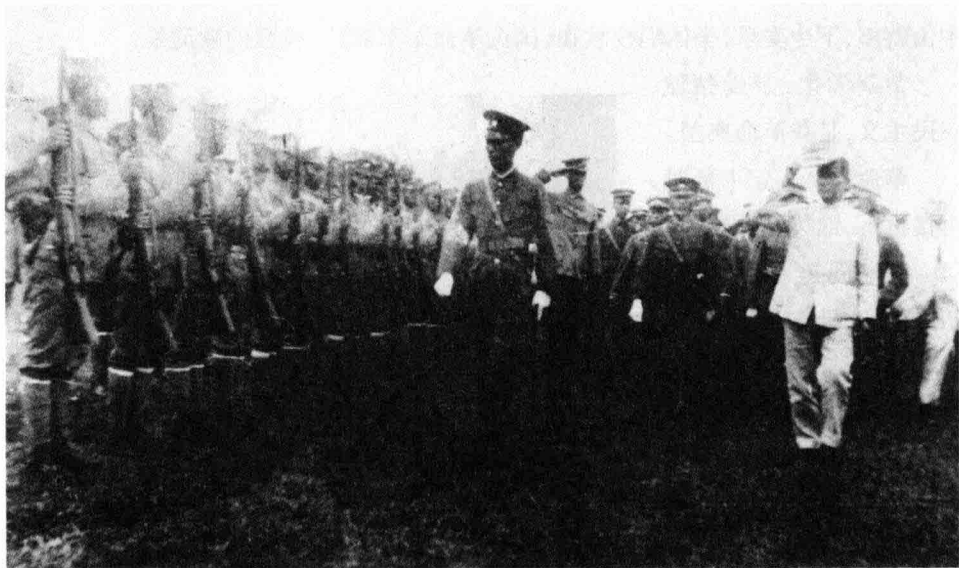
这一篇48字的训词,日后被校方四处张贴,无论礼堂、饭厅还是宿舍,触目皆是。全校师生,朝夕所见,都能随口背诵。后来,训词又被谱成中国国民党党歌,进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歌。

接下来,校长蒋介石上台勉励师生,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下午1点,典礼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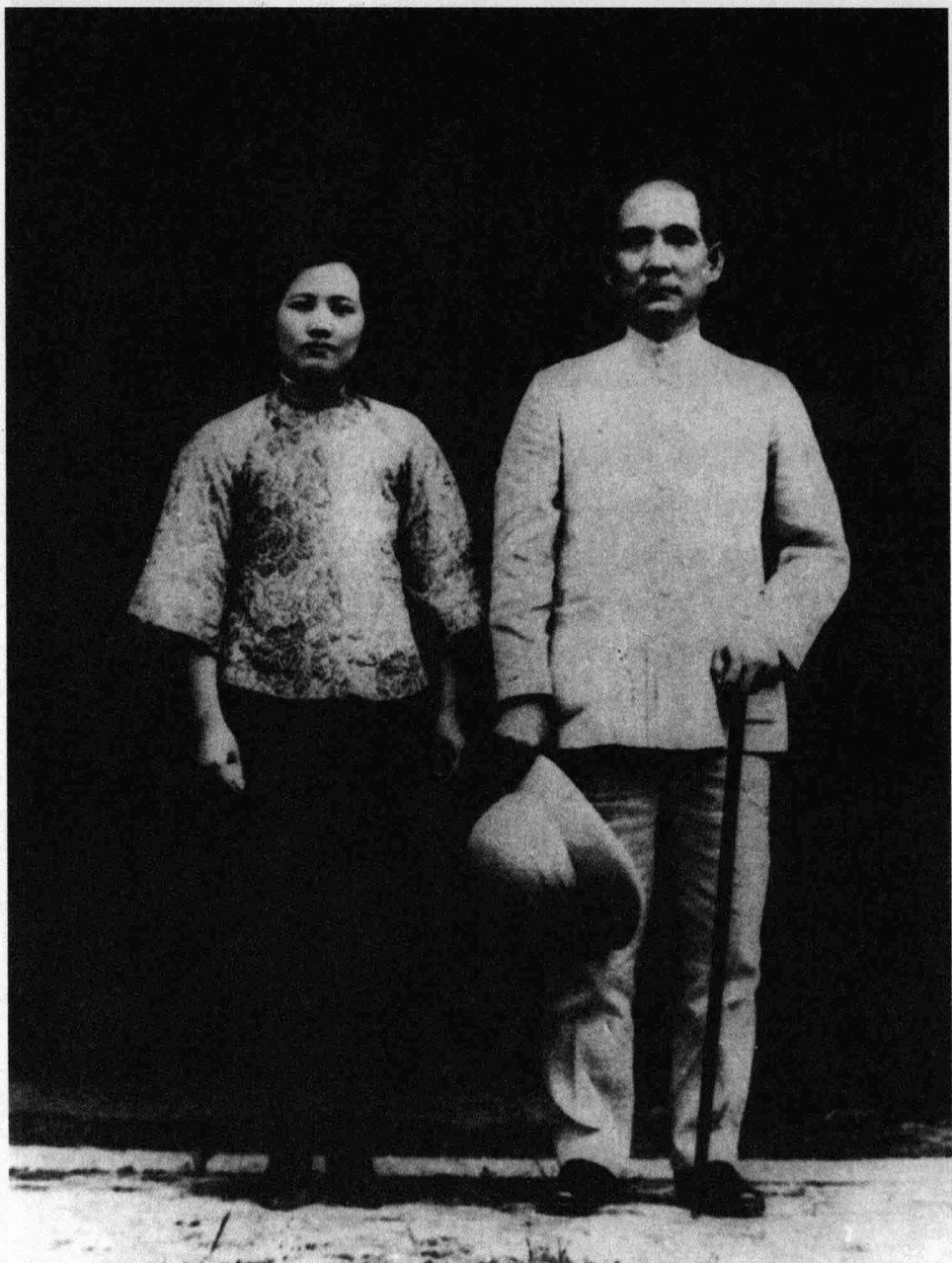
中午,孙中山在学校简单用餐,又详细了解了军校的教学情况。下午3点,他来到操场,在宋庆龄、廖仲恺和蒋介石的陪同下登上主席台,隆重的阅兵式和分列式开始了。在指挥官何应钦的指挥下,孙中山检阅了这支革命军队。

晚上,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广州市党部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设宴款待全校六百多位师生,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森、孙科、吴铁城、邓演达等参加宴会,对师生们提出了希望。当时皓月当空,欢声雷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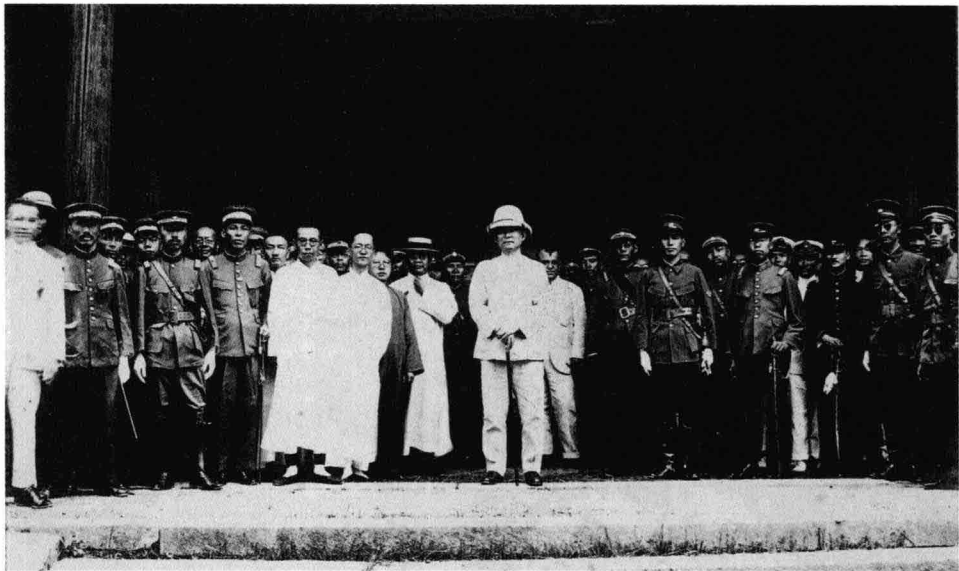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李默庵和宋希濂对两件事仍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



■ 孙中山在军校操场检阅



■ 1924年11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合影



■ 孙中山与出席军校成立典礼的党政官员及师生合影

当日检阅台正中央高悬校训“亲爱精诚”，两边对联则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孙中山穿着白色的中山服，头戴一顶遮阳帽，宋庆龄优雅地站在他的身边。另一件事则是广东口音浓重的胡汉民向全体宣读《总理训词》——“三味煮鸡，萝卜大葱……”，台下的师生们一头雾水。事后细看贴在墙上的训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对孙中山创办军校的工作，苏联政府一直非常支持。1924年春，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和契列帕诺夫组成顾问小组来到中国，把经验传授给军校师生，并用苏联的军事制度组织起革命军，开始建设北伐基地。几个月后，“伏罗夫斯基”号军舰又给广州政府运送来近万支枪，每支枪还配有500发子弹。听到这个消息，全校师生无不兴高采烈。

孙中山一生中曾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援助，结果均遭到无情的打击，这一次，他得到了真正的国际援助——苏联的援助。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将才，既有国民党的军事骨干，也包括共产党人徐向前、陈赓、左权等，他们在日后的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垂青史。

36 弭平广州商团叛乱

广州革命政权日益巩固，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收回了广州海关关税的主权，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视。他们先是极力扶持陈炯明，妄图利用陈炯明来推翻广东的革命政权；在陈炯明几次对广州的进攻惨败之后，他们又找到了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于是，一场叛乱与反叛乱的斗争，拉开了帷幕。

扣械引发风潮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1年，是广东各地商人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成立的准军事化组织，其宗旨是“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对“其他事项，概不干预”，就连捉到小偷这样的小事也只是扭送警察局处理。但是，陈廉伯当上商团团长之后，情况起了很大变化。

陈廉伯是广东海丰人，16岁时就在汇丰银行广州支行工作，很快当上了银行的中国买办。身为买办的陈廉伯先后通过宗族关系等手段，逐步成为广东的地方名流，并取得了当地商人的信任。陈廉伯担任团长期间，有目的地发展自己的实力，从商团经费里拿出200万元向加拿大政府购买枪械弹药，扩充商团人数，并积极策划全省商团的联合。

1924年5月，为筹措革命经费，广州市政厅财政局决定开征铺底捐等。由于当时广州驻军繁杂，各军各自为政，纷纷设卡征税，使商民不堪重负，再加上铺底捐等的征收，引起了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广州商团借此联络附近商团及乡团酝酿罢市，各地商团、乡团同时向广州集中。后经调停，政府取消捐税。然而商团代表们却于5月28日在广州召开所谓的“团务会议”，组织“联防”会议决定成立联防总部，推举陈



■ 陈廉伯

36

弭平
广州
商团
叛乱



孫中山

仲愷已獲裁緝那威商船私
運軍械今晚着鄧彥華率
同江固艦來長洲之後更約派
國兵船來黃埔協助如遇有事可
協商共同一致行動可也
八月九晚 文白

■ 1924年8月9日，孙中山为扣械事致廖仲愷函

廉伯和邓介石、陈恭受为总长和副总长，同时决定筹款购买军械以扩充势力。后因水灾影响，没有成立。延至8月中旬，各项部署完备后，他们一面报省政府批准立案，一面发通知给各地商团，定于当月13日正式成立“联防总部”。时任广东省长的廖仲愷因计划在省政府设立商团民团统帅处，以管理商团、民团事务，因而没有批准商团的呈文，并发出布告制止商团总联防的成立及其庆祝活动。商团联防总部的成立仪式被取消，但庆祝活动却仍在商团军的武装保护之下举行。此后，陈廉伯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长短枪9841支和子弹33742万发，在贿买粤汉铁路局局长许崇灏向军政部蒙领护照

后，通过悬挂丹麦商船国旗的挪威轮船“哈佛”号将枪弹运往广州。8月8日，“哈佛”轮抵达虎门并停泊于沙角炮台附近。孙中山得悉商团偷运枪弹消息，即令滇、桂军查办，但杨希闵、刘振寰“奉令而不照行”，孙中山只得于8月9日令黄埔军校当局处理此事。10日晨，发现“哈佛”号已停泊白鹅潭，孙中山当即命令“永丰”、“江固”两舰将“哈佛”轮押至黄埔，并把查获的全部枪械、弹药封存于黄埔军校。第二天，广东省长廖仲愷即发布了《扣留商团私运枪械的布告》，“扣械潮”就此引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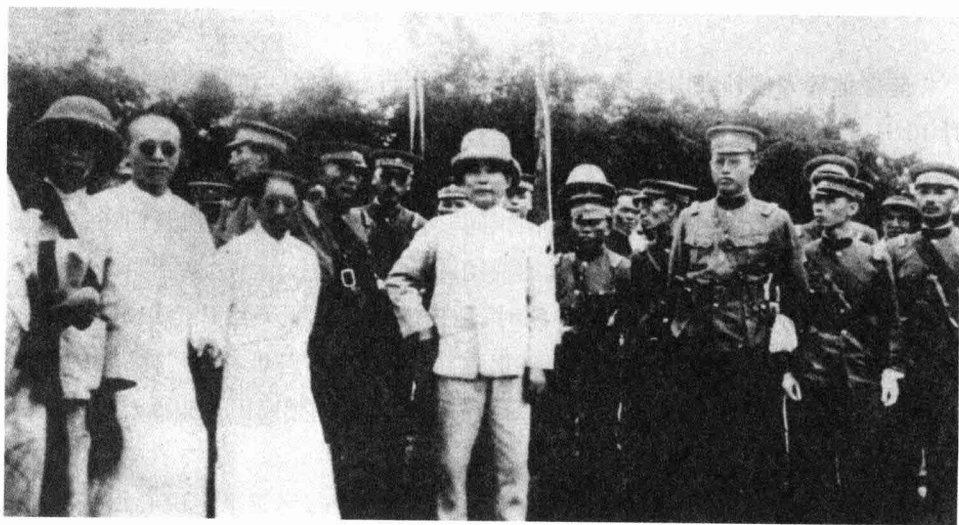
揭露商团阴谋

扣械事件令蓄意谋反的商团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借口。11日晚，陈廉伯等发布公告，声称要辞去广州商团团长的职务，并声称在其不担任团长职务期间，如果广州市内出现治安问题，概不负责。次日，两千余名商团成员公然列队前往大元帅府请愿，蛮横索取枪械，并以罢市威胁孙中山。13日起，各地商团军纷纷武装前往广州，15日举行了“大联防开幕典礼”的代表，再次赴大元帅府请愿。18日，陈廉伯又煽动广州银行业罢市，拒收广州政府发行的纸币。20日，“商团联防总部”转移到广东佛山，陈廉伯龟缩在佛山遥控指挥广州的商团军。24日，广州商团又以以广东商团全体团军的名义致电政府，威胁要对政府采取行动，并在广州各地散发反动传单，制造混乱。

对于陈廉伯等人的行为,孙中山立场鲜明、态度坚决。他在第一次接见商团请愿代表时,曾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商团头子们的谰言,说明政府扣留偷运枪械的正义性,并指出正在追查陈廉伯等颠覆政府的阴谋。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讨论商团罢市问题,主张解散商团,以武力制止罢市,同时,调豫军樊钟秀部回驻广州市内以维持治安。商团对广东革命政府的多次警告置若罔闻,并阴谋实施更大的反革命活动。

广东革命政府的正义行动威胁到英国在广东的利益,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警告中国军队不得对商民开枪开炮,否则英国人将对中国军队采取行动。与此同时,英国的9艘军舰开进了白鹅潭,大炮脱去炮衣,炮口对着广州方向。面对英国的干涉,孙中山不屑一顾,他致电英国政府,警告英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了中国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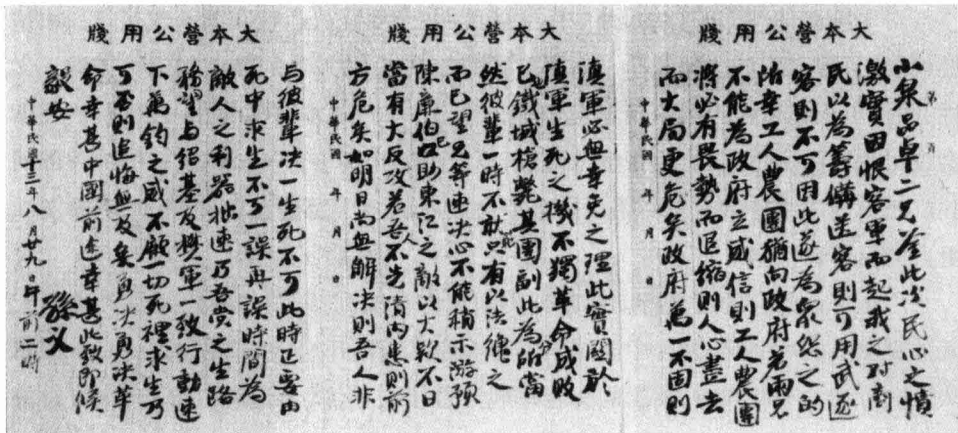
然而此时的革命阵营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国民党内有不少人反对孙中山对商团采取行动,甚至有人充当商团的内应,与商团狼狈为奸。当时手握军权、驻扎在广州市内的范石生、廖行超等,则一面勾结商团、反对政府,一面又以调停人自居,与政府敷衍,责备商团。29日,接受了商团贿赂的范石生和廖行超与商团达成交易,炮制了所谓的“调停六条件”:陈廉伯等人通电悔过,拥护大元帅;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商团报效政府军费50万;政府发还商团枪械;政府撤销市内驻军;由范石生担保商团联防总部具呈请予立案,省署于7日内批准。然后,又以“调兵入省”和“独立”的半兵谏方式,图谋胁迫孙中山接受。调停条件得到了汪精卫、伍朝枢



■ 孙中山在广州对商团训话



孫中山



■ 1924年8月29日，孙中山致范石生、廖行超函

等人的赞同，以致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难以贯彻，武装镇压商团的方案也就无法实施，给广州商团留下了喘息的时间。8月底，紧张形势表面趋于和缓，广州和各地于30日先后复业。

正当此时，长江流域爆发了江浙战争，拉开了反直战争的序幕。由于此前孙中山曾与皖系、奉系订有反直同盟，所以他决定参与讨直战争。9月4日，孙中山召开了北伐筹备会议，迁大本营于韶关，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并兼广东省长，负责处理商团事件。20日，在韶关举行北伐实施典礼，各军分两路挥师北进。

平定商团叛乱 巩固根据地

陈廉伯等人借孙中山注意力转向北伐之际，进一步向广州政府施加压力。10月10日，他们以发还枪械的数量不够为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双十惨案”。

当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广州的革命群众在第一公园举行武昌起义纪念大会。会场上高悬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标语，群众团体的代表们在发言中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揭露商团的反革命面目。会后，数千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太平路时，预先埋伏的商团突然开枪扫射，前后夹击，游行民众当场死伤数十人。叛军四面追袭，甚至凌辱遇难者的尸体，残忍地斩首剖心。负责该地防务的李福林和廖行超所部竟然加入到商团军兜捕游行民众的行列，公然与叛乱势力为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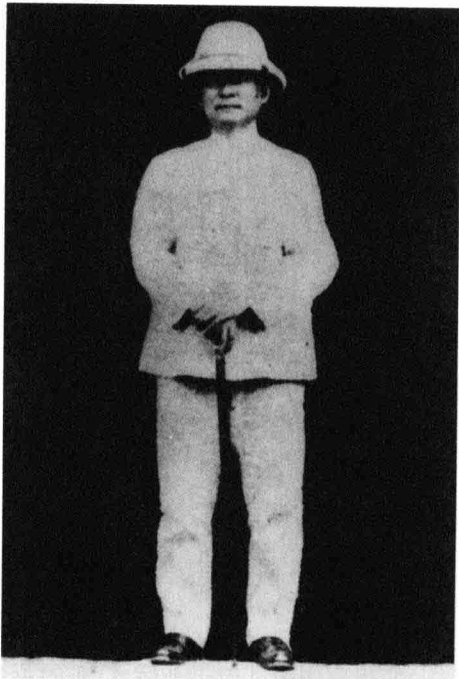
消息传到韶关，孙中山面对反革命叛乱的严重威胁，终于下定决心镇压商团。他在给胡汉民等的电报中指出：“商人罢市与敌反攻同时并举，是叛迹显露，万难

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11日，孙中山电飭胡汉民立即宣布戒严，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任命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陈友仁、谭平山等为全权委员。13日，革命委员会命令胡汉民解散广州商团机关，警卫军等连夜回师广州。14日，孙中山正式下达平定商团叛乱的命令，将黄埔军校、飞机队、工团军等全部交蒋介石指挥，又令胡汉民和驻广州各军立即收缴商团的全部枪械。

15日凌晨，商团军首先向警卫军开枪。革命委员会立即向早已准备就绪的各军下达了总攻击令。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以及粤、湘、桂、赣军等部队纷纷投入战斗。滇军的

范石生、廖行超所部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向商团开火。各军分5路包围商团军在广州的最后据点西关，并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击溃商团武装，一场波及整个广州的商团叛乱被平息了。

粉碎商团叛乱使广州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孙中山也进一步看到了革命力量的伟大。之后，他再度奔赴韶关筹划北伐行动。



■ 1924年，孙中山在韶关留影



37 壮志未酬

孙中山北伐的目标乃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正当他平定商团叛乱后准备大举北伐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孙中山旋即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共商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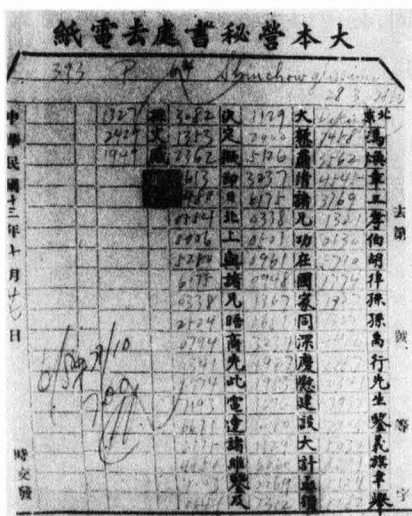
不顾安危 共商国是

广州商团叛乱被弭平后，广东的革命形势依然阴霾重重。当时，陈炯明仍盘踞东江，滇、桂军阀对北伐消极应对，但这些都丝毫动摇不了孙中山挥师北伐，打倒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决心。正当他积极部署北伐时，传来了北京政变的消息。

原来，自江浙战争开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军入关，与直系军队在榆关一带激战。直系军阀内部发生分化，爱国将领冯玉祥突然率所部由前线日夜兼程，于

10月23日赶回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以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并与胡景翼、孙岳等将领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电报中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领教诲是祷！”

冯玉祥虽是吴佩孚手下将领，但对曹锟、吴佩孚的行径早就心存不满，在形势推动下开始倾向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对于冯玉祥，孙中山并不陌生。在曹锟贿选总统的时候，孙中山曾假手孔祥熙向冯玉祥



■ 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致冯玉祥等人的电报原文

赠送了自己撰写的《建国大纲》。

北京政变后，政权事实上处于冯玉祥、皖系军阀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共同支配下。孙中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拿这次变动的结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因为政权“不是在革命党之手，而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尽管此时孙中山已重病在身，并曾一度因病离职休养，然而在韶关收到冯玉祥等人的电报时，孙中山认为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好机会，他当即电复冯玉祥等，表示愿意北上。



■ 冯玉祥

10月30日，孙中山由韶关返抵广州准备北上事宜。一些国民党人鉴于张作霖、段祺瑞等人反复无常、居心叵测，十分担心孙中山的安危，劝他取消北上。但孙中山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只要北上对革命事业有利，不管有多大的风险，他都要前往北京。他对同志们说：“我这次赴京，明知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但我之所以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怕什么危险呢？”

1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指出：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使国家独立自主可保；对内要消灭军阀实力，使民治之基础莫能动摇。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

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同时，基于对当时政局的认识，孙中山并没有因决定北上而停止北伐的军事部署。他指派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

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乘“永丰”舰启程。



■ 广州总、市商会欢送孙中山北上而赠送的“统一先声”银杯

谋求祖国和平统一

“永丰”舰于13日午夜抵达香港港口外。次日，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等转登“春洋丸”轮船前往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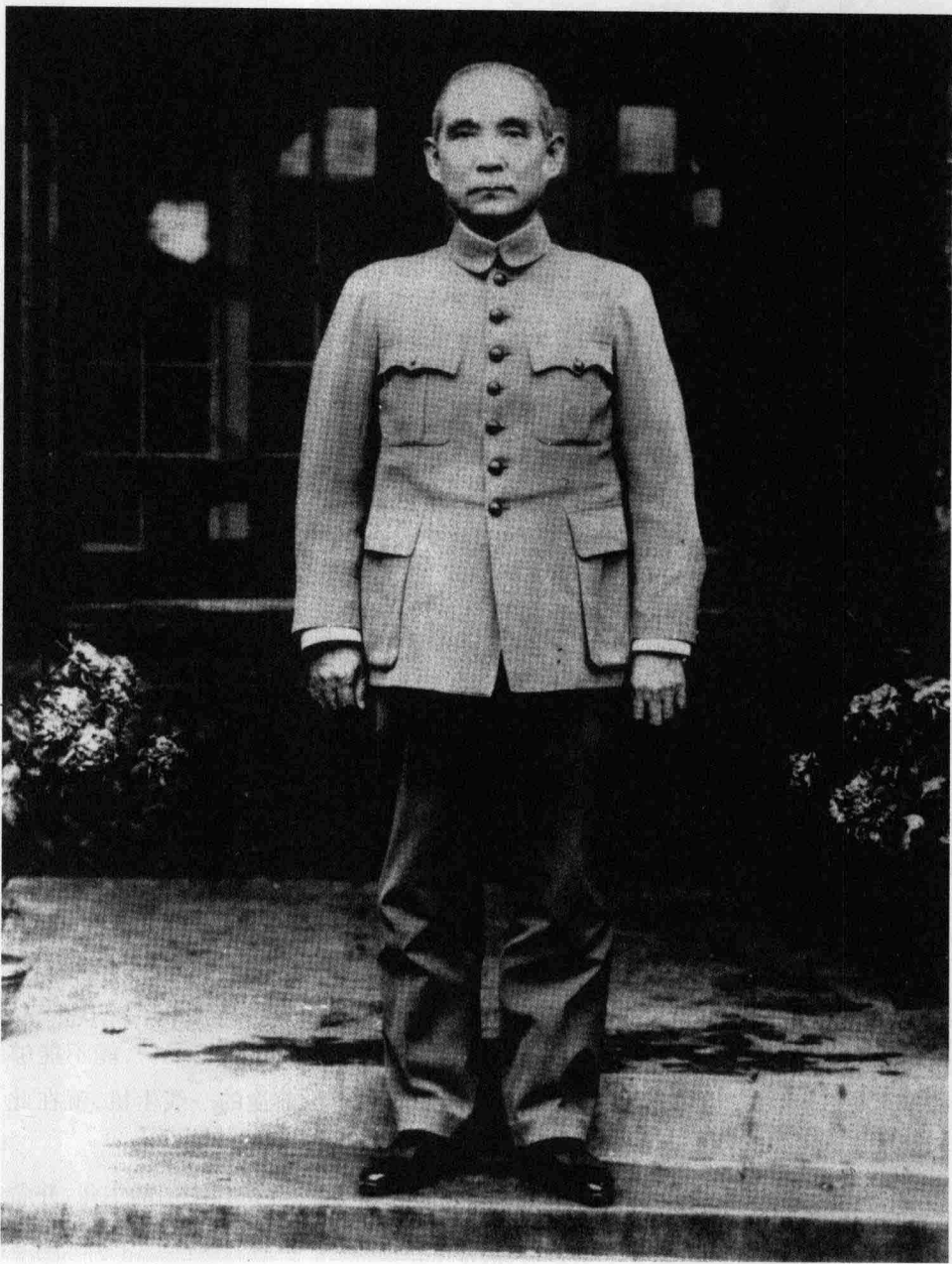


11月17日,孙中山所乘船只抵达上海吴淞口外。国民党人李烈钧、于右任、居正、戴季陶、石青阳、杨庶堪、宋子文、叶楚伦等与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段祺瑞的代表光云锦,还有记者共计20余人搭乘小火轮前往迎接。在船上,东方社记者告诉孙中山说:英国《字林西报》在孙中山抵沪前一天发表文章称,上海不需要孙中山,应阻止他登岸;孙中山是广州大本营的大元帅,一举一动都负有政治上的任务;上海租界之内,完全是商务性质,反对孙中山在沪登岸久居。对于帝国主义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孙中山立即予以坚决反击,大意是: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不能干涉。严正指出要尽一切力量收回租界,“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之飞扬跋扈”。

上午9点25分,孙中山一行转乘“褒尔登”号火轮在上海外滩法租界码头登岸。码头上,万余人自发聚集欢迎孙中山,他们齐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孙中山向欢迎者颌首微笑致谢,然后乘汽车前往莫利爱路29号寓所。10点,孙中山在寓所接见国闻、东南两家通讯社记者严慎予、陈冰伯。下午3点又接见《申报》记者康通一。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孙中山指出:“惟奠定国是全仗国民通力合作,而尤望舆论界尽力声援,方克有底于成。现在武力政策既已打破,和平统一之期相去非遥。国民对国内政治前途极宜注意,而于外力侵涉内政尤宜严加防遏……深望国民全体注意及此,共起打破此帝国主义之发纵者,则中国可谋长治久安矣!”



1924年，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在寓所留影



■ 1924年，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在寓所留影



■ 1924年11月24日,孙中山与宋庆龄抵达日本神户时合影

11月19日下午3点,孙中山在寓所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媒体记者。到会的有《商报》、《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大陆报》、《神州日报》、《中国晚报》、《民国日报》等中外报社以及国闻、远东、公平、东南等通讯社的陈布雷、潘更生、康通一、戈公振、沈能毅、沈卓吾、严慎予等30余名记者。孙中山即席发表演说:“这回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这次单骑到北京去,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至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有办法……大概讲起来,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

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大乱,大乱便无穷期……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便应该做我的后盾。中国以后之能不能统一,能不能够和平统一,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成。所以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

孙中山的演说唤起了大家的共鸣。记者们纷纷发言,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并希望孙中山早日北上贯彻其主义,以造福民众。然而依然有部分人出于对孙中山安危的担忧,不赞同孙中山北上,甚至不惜以自杀的方式阻止孙中山放弃计划。孙中山在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之后,毅然于22日上午乘坐“上海丸”号离开上海,假道日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



■ 孙中山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天津张园行馆前留影



力争召开国民会议

就在孙中山风尘仆仆一路北上时,北方的政局却发生了变化。

11月15日,在天津会议上,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以联名推戴的方式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通电宣布他将接受各方拥戴,就任临时执政,并宣布于24日入京就职,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11月27日,冯玉祥在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下野。

孙中山在抵达天津的当天下午,即在孙科、汪精卫、李烈钧等的陪同下,按事先约定时间驱车前往曹家花园访张作霖。宾主见面,一时无语。在一段时间的沉默后,孙中山先开口对张作霖派军警前往欢迎表示谢意,并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却不以为然。双方在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均无法达成统一。当天晚上,孙中山寒热发作,肝胃区疼痛。德、日医生初步诊断为感冒兼胃病,后又疑为胆囊炎,劝孙中山暂时谢绝演讲、宴会等活动,静心调养,接受治疗。

孙中山虽在病中,但仍坚持与段祺瑞等军阀作斗争。对段政府所谓“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保证,孙中山在接见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予以驳斥:“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针对段





■ 北京铁狮子胡同同行馆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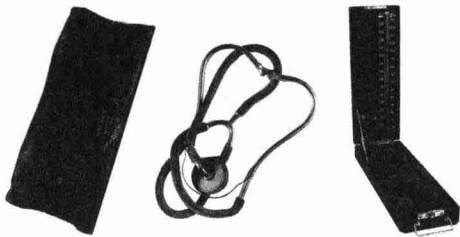
祺瑞公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孙中山坚决反对。他特派宣传员赴北方各省区宣传国民会议的性质与关系，决定国民党员不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力争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

孙中山在津期间“连日热度升降无定”，病势愈发严重，遂决定听从医嘱，于12月31日入京疗养。

12月31日下午4点许，孙中山乘坐的专车抵达北京，受到北京各界200余团体约3万余人的热烈欢迎。欢迎队伍由车站一直排到城门旁边，欢迎者手持彩旗，高呼欢迎口号。随从人员向欢迎者散发孙中山事先准备的宣言书，重申北上目的不是为争地位、争权力，而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为方便治疗，孙中山下车后直接往北京饭店506号房下榻。

赍志以歿 死而后已

抵京当晚，孙中山即请北京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诊视病状。1925年1月2日，又延请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协和医院医生及俄国医生等7人会诊，诊断结果认定孙中山所患为“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病势现仍严重，但此病并非绝症”。当时，协和医院美国医生建议孙中山用



■ 孙中山病危就医时使用的听诊器和血压计

外科手术探查病状,但孙中山没有同意,决定采用内科治疗,请德国医生克礼为主治医生。尽管克礼医生尽心治疗,反复用药,孙中山的病情却毫无起色,“体温升降失常,有时高到摄氏四十一度,有时又低到摄氏二十七度,时升时降”。

1月26日上午,在宋庆龄请求下,孙中山同意入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下午3点,孙中山被抬入该院E楼。入院后,孙中山体温升高。医生在给孙中山作常规检查后,认为病情危急,必须立即手术。6点30分,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郇乐尔主刀,助理医生有代院长刘瑞恒、王逸慧、顾大夫等,观察台上有德国医生、俄国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宋庆龄则在旁边的房间内等候。郇大夫将孙中山腹壁切开后,只见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将腹部的器官连在一起,脓血很多,已无法通过手术医治。郇大夫见状即向观察台上示意不治,在肝脏上取出小块组织作活体检查标本后就缝合了伤口。整个手术前后仅花了20多分钟。手术结束后,国民党特聘的俄国医生就向国民党几位要员宣布:通过肉眼观察,证实孙中山所患为肝癌,挽救乏术。大家听罢,极为悲伤。

自2月初手术创口愈合后,孙中山即开始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不见效果。家属及随同人员见西医无效,考虑改用中医治疗,希望奇迹出现。2月18日中午,孙中山在宋庆龄、孙科、汪精卫、孔祥熙及医护人员的护送下,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养病,并令秘书处发表专心养病、不谈军国事启事。

孙中山家属及国民党人为挽救、延续孙中山的生命,曾延请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名中医为孙中山治病。移居铁狮子胡同第一天,北京、上海的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来为孙中山诊治。然两人所得病象和所开药方各有不同,经家属及侍疾的国民党人商议,并征得孙中山同意,决定先由陆大夫诊治。孙中山服用第一第二剂中药后,睡眠转好,脚肿消退,气色也好了起来。然而,第三剂药服用后22日起又



■ 孙中山逝世时遗容

开始腹泻，陆大夫见状即告束手。此后，仍由克礼施以西医治疗。

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4人征得宋庆龄的同意，来到孙中山病榻前，请示遗言。经孙中山口授，汪精卫起草，又经孙中山确认后，遗嘱定稿。孙中山本待签字，但听到宋庆龄在隔壁哭得十分伤心，又搁下笔，决定以后再签。

3月11日晨，孙中山神志清醒，其眼睛却已开始散光。汪精卫、宋子文、孙科、邹鲁、邵元冲、孔祥熙、吴稚晖、何香凝、戴季陶、戴恩赛等来到孙中山病床前，请他在遗嘱上签字。孙中山身体虚弱，连笔都拿不稳，宋庆龄含泪用手托着他的手腕签字。孙中山在两份遗嘱上都签上了“孙文 3月11日补签”。孙中山签完后，汪精卫在“笔记者”处签名，在场其他9人则在“证明者”处签名。签完家事、国事遗嘱后，英文秘书陈友仁将致苏联政府遗书呈给孙中山，由宋子文念过一遍后，孙中山也用英文签上名字。

3月12日上午9点30分，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行馆病逝，临终犹口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国民会议”、“同志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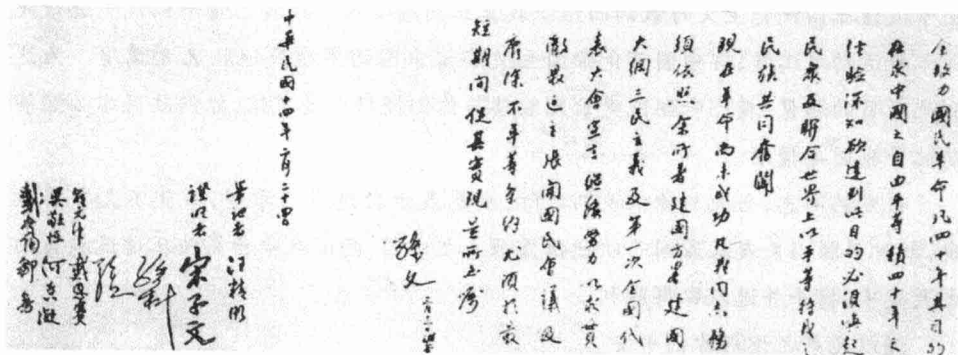
一代伟人，溘然长逝，留下了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宏愿和未能实现的宏伟建设蓝图。他，奋斗一生；他，壮志未酬。



■ 冯玉祥委托夫人李德全敬赠孙中山的绣品

三份遗嘱 伟人品质

孙中山临终前留下了3份亲笔签名的遗嘱。第一份遗嘱，是1925年2月24日口授，由汪精卫笔录，于3月11日签名的《国事遗嘱》，全文如下：



■ 孙中山《国事遗嘱》



孫中山



■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刊登的孙中山《致苏俄遗书》
《致苏俄遗书》，全文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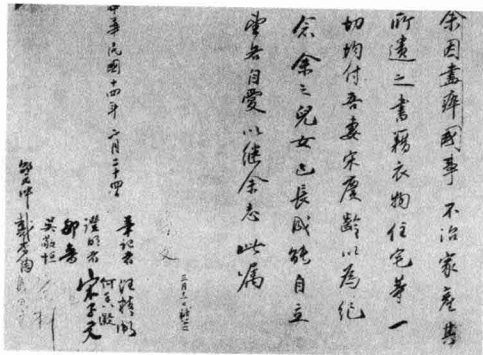
第二份遗嘱，是1925年2月24日以英文口授，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笔记，于3月11日签字的

孙逸仙(签字)

《国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是孙中山留给中国人民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自由、平等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另一份是《家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 孙中山《家事遗嘱》

据统计，《家事遗嘱》中，孙中山遗留下的“一切”，除了简单的衣物，只有2000多本书、一所有5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既无金钱，又无珍宝，不名一文，反映了孙中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浩然正气。



38 奉安南京中山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时年59岁。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移往北京碧云寺暂厝,待选定基地后再安葬。1929年春,历时3年建造的中山陵竣工。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奉安大典,一代伟人从此长眠在风景秀丽的紫金山麓。

遗体暂厝碧云寺

孙中山逝世的当晚,中国国民党在京人员组成了治丧办事处,随后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员一律臂缠黑纱,停止宴会、娱乐7天,以示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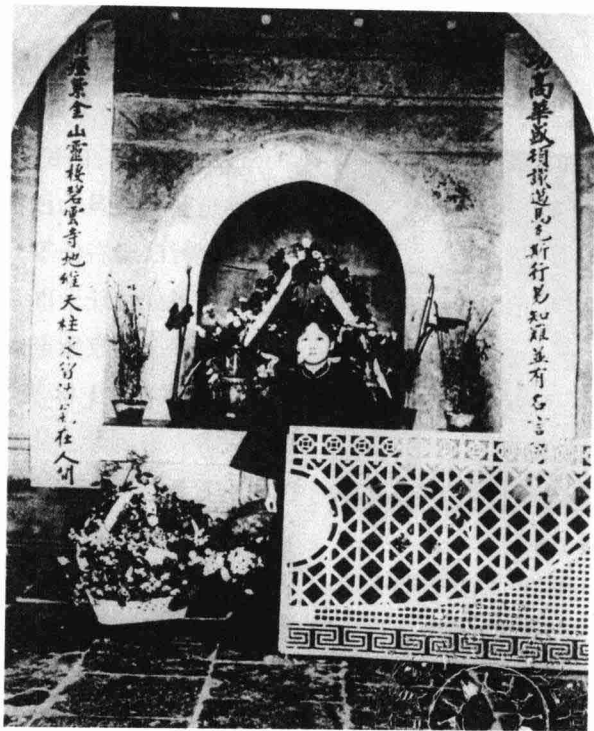
按照孙中山生前保存遗体的遗愿,治丧办事处数百人将其遗体送往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了防腐处理。3月15日中午11点举行小殓,遗体穿西式衬衣,外罩民国大礼服,足穿皮靴,头戴大礼帽,由孙中山的侍从武官马超俊将遗体放入棺内,顶面用玻璃盖上,以便群众在吊唁时能瞻仰遗容。



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柩被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前殿。当时中央公园大门扎素色彩绸牌坊一座,上缀“天下为公”匾额,两侧的对联是“人类进化,世界大同”,甬道两旁扎有10余丈长的席棚,悬挂各界赠送的挽联

数千幅。李大钊的挽联长达214个字，对孙中山先生的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

3月24日开始举行公祭，仅一周内，公祭处共收到花圈7000多个，挽联5900多幅，唁电唁函不计其数，签字留名的吊唁者计746823人，机关团体1254个。除了北京外，广州、香港、澳门、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开封、太原、长沙、重庆、昆明、福州、厦门等全国数十个城市及许多县城举行了追悼大会。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也举行了追悼



■ 宋庆龄在香山碧云寺为孙中山服丧守灵

活动。尽管日本殖民当局极力阻挠台湾人民举行各种悼念活动，5000多位台湾民众还是于3月24日冒着滂沱大雨，参加了对孙中山的悼念活动。国内外对孙中山的悼念活动，规模之盛大，礼仪之隆重，影响之深远，在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公园公祭结束后，治丧处决定于4月2日上午11点举殡，暂安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待南京中山陵竣工后，再正式奉安。

4月2日上午11点，在33响礼炮之后，孙中山的灵柩从中央公园缓缓移出。殡列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等街道时，市民们不约而同地肃立在便道上，主动脱帽，行注目礼。城中礼炮哀鸣，一派肃穆，3架飞机，绕空护送。在行进中，群众高呼口号：“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场面十分悲壮。

下午4点25分，灵柩抵达香山碧云寺。因碧云寺坐落在山上，为使灵车能平稳地运上去，事先将山道台阶用木板搭成长坡，当灵车到碧云寺后，由执绋的人们拖曳而上，很平稳地将灵车运至碧云寺金刚宝塔前。碧云寺各院门早已搭起牌楼，挂满了挽联。

4点30分，在庄严的哀乐声中，孙中山的灵柩被安置在金刚宝塔内。



中山陵设计方案



■ 吕彦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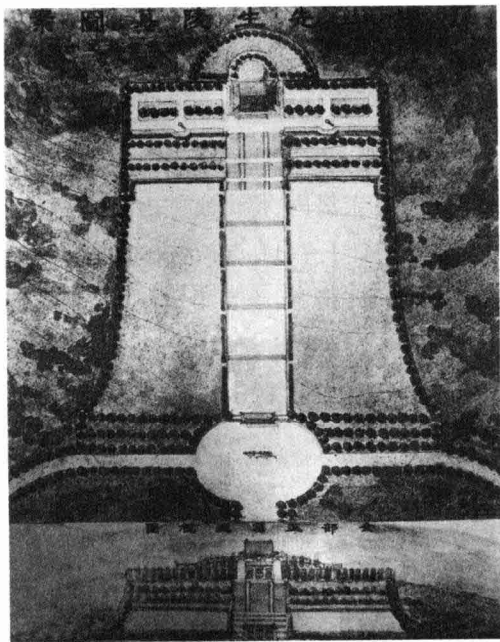
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了“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为汪精卫、林焕廷、宋子文、叶楚傖、戴季陶、张静江、于右任等12人。同时成立葬事筹备处,杨杏佛为筹备处主任干事,筹备会议决定按孙中山遗愿,将孙中山安葬于南京紫金山。

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来到紫金山。在南坡的半山寺附近休息时,孙中山看到这里背负青山,前临平川,草木葱茏,气势十分雄伟,便对同行者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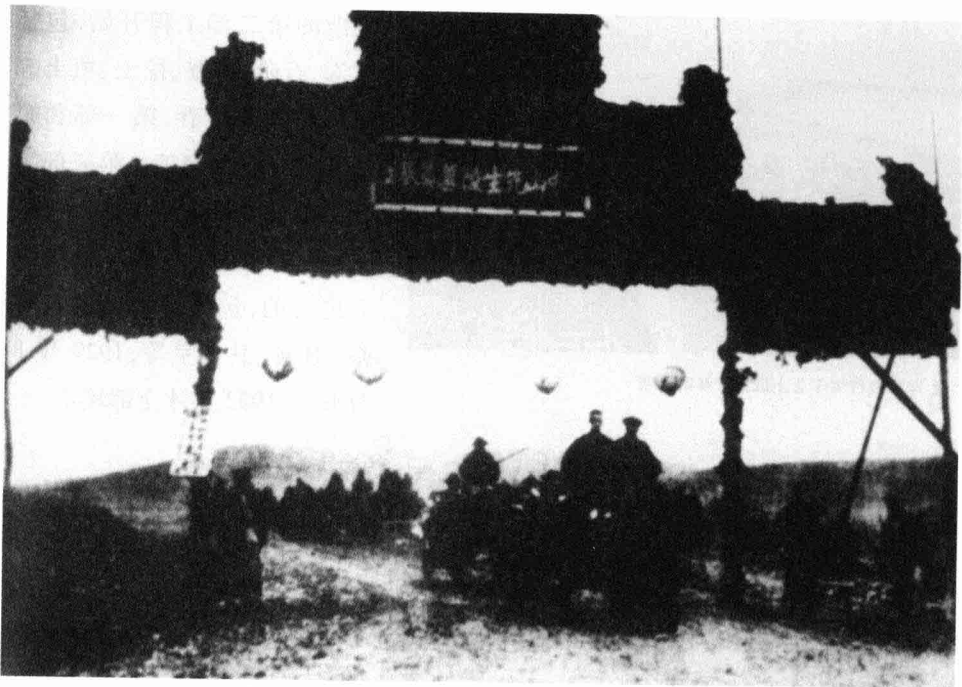
其实,孙中山选中紫金山作为自己的墓葬地,当有更深的原因。孙中山虽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却体现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建立民国的发端地。因此,他对南京怀有很深的感情。孙中山临终前曾与宋庆龄谈到,死后遗体“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这就是孙中山自选墓葬地的根本原因。

治丧活动结束后,孙夫人宋庆龄两次去紫金山勘查墓址,最后决定将紫金山主峰东侧一处向阳的地方,即中茅山的南坡作为墓址。随后,杨杏佛赴南京拍摄了中茅山南坡的照片,并请江苏陆军测量局协助测量了墓地。葬事筹备处随后向江苏地方当局交涉圈地建陵,经过多方交涉后,北洋军阀当局同意拨地2000亩建陵。

在选址、圈地的同时,葬事筹备处向全世界公开征求陵墓设计图案。结果,40余种海内外应征图案中,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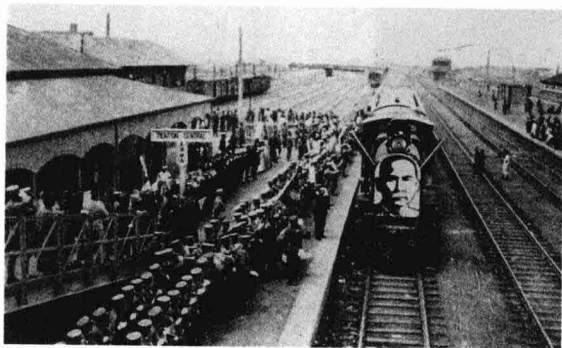
■ 吕彦直设计的警钟形中山陵图案



■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在紫金山墓地隆重举行

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警钟形中山陵图案获首奖。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墓,平面呈警钟形,给人以警钟长鸣、发人深省之感。孙中山在临终遗嘱中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吕的设计图案,最贴切“唤起民众”之意,寓意深远。从设计图形看,祭堂在前,墓室在后,使用祭堂时,墓门可以不开。墓室为圆形,墓圻周边筑有石栏,便于谒陵者依次瞻仰。而且墓穴在下,即使地面建筑被毁,孙中山遗体也不会受损。整个建筑朴实坚固,糅合了中国观念和西方建筑精神,符合孙中山的气概和精神。葬事筹备委员会一致决定采用吕彦直设计的陵墓图案并聘请他为陵墓建筑师。吕彦直设计中山陵时才31岁,因悬奖设计中山陵名列榜首而蜚声海外。他主持建造中山陵,终因积劳成疾,在中山陵墓工程还未完成时,于1929年3月18日因病去世。陵墓图案和设计师确定之后,葬事筹备处开始着手准备招标包工。1925年12月19日开标,最后由上海一家资本雄厚、经验丰富的营造厂——姚新记营造厂得标。中山陵工程浩大,由于受经费限制,陵墓工程分3部分进行。

1926年1月15日,陵墓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进行第一部工程的建造。第一部工程主要为祭堂、墓室、平台、石阶、围墙及石坡等。由于时局动荡,加之建筑材料运输困难,工程进展缓慢,直至1927年10月,第一部工程才完成。1927年11月,



■ 迎榇宣传列车北上抵达天津时情景

建陵的第二部工程开始,包括水沟、石阶、护壁、挖土、填土等工程。1929年春,第一部和第二部工程全部完工。第三部工程由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承建,工程是在孙中山葬入中山陵以后进行的,包括牌坊、陵门、碑亭、围墙、卫士室等,1929年8月开工,1932年才全部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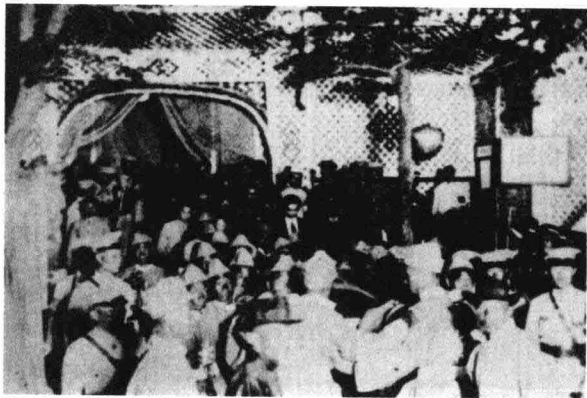
奉安大典

1929年春,坐落在南京郊外紫金山麓的中山陵竣工。整个陵墓庄严雄伟。1929年1月14日奉安委员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公布了总理奉安委员会章程,委员有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戴传贤、蔡元培、林森、冯玉祥、张继、孙科等28人,蒋介石为首席委员,孔祥熙为办事处总干事。下设总务组、财务组、典礼组等8个组,后增设卫生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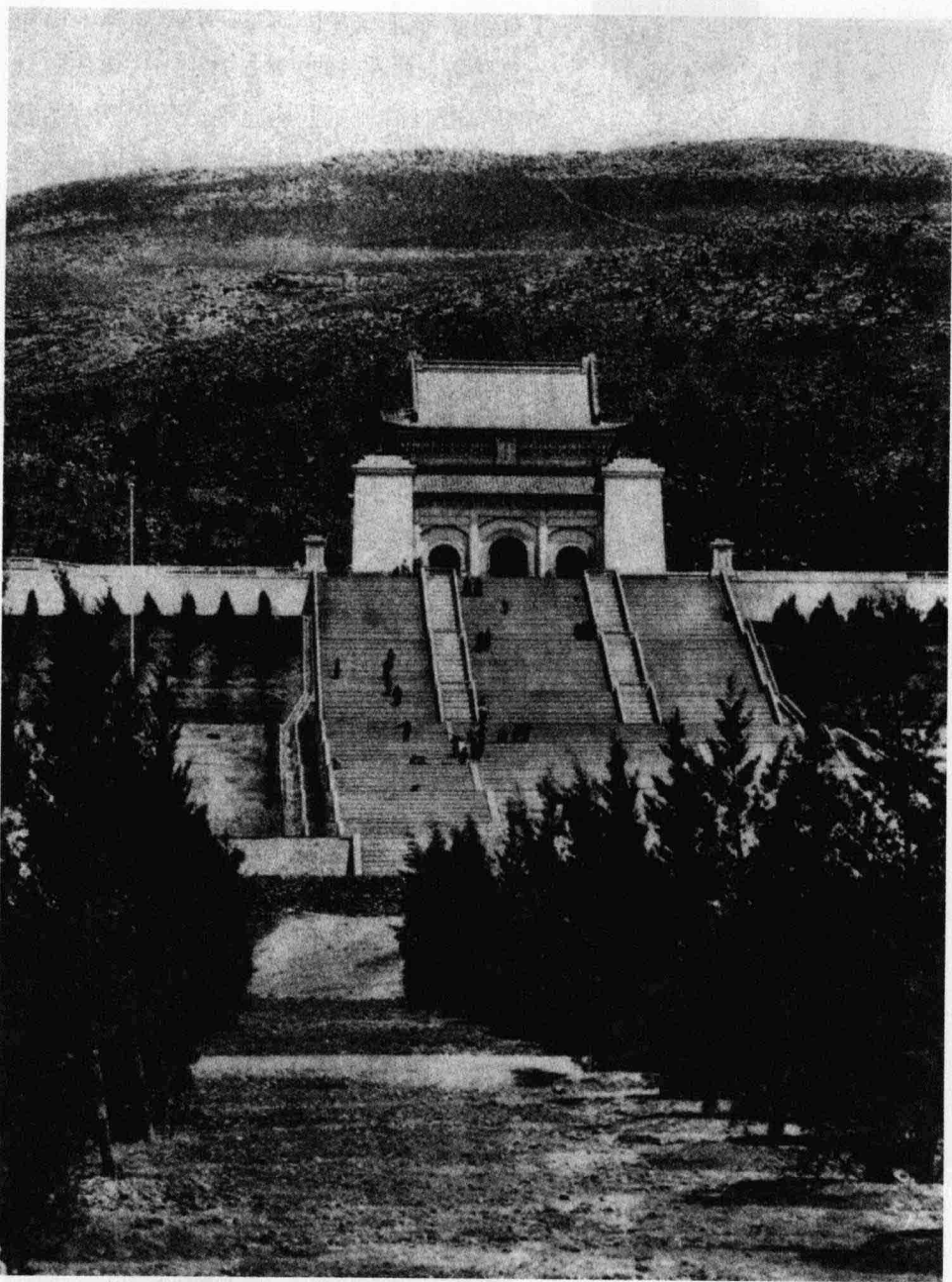
早在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就发布第51号训令,批准葬事筹备委员会的建议,特派林森、郑洪年、吴铁城为迎榇专员,赴北平迎孙中山灵柩南下安葬。12月下旬林森一行抵达北平,设迎榇专员办事处于北魏胡同17号。

迎榇专员办事处和方案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迎榇奉安的各项准备工作。除南京、北平修筑迎榇大道外,1929年2月20日由汉口江岸机车厂制造的孙中山灵车完工。1929年5月,孙中山移灵奉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为了使孙中山灵柩经过的各地群众了解迎榇的重要意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了迎榇宣传列车沿途宣传。1929年5月10日,迎榇宣传列车从浦口出发北上,5月21日下午抵达北平。宣传队沿途



■ 孙中山灵柩移出碧云寺



■ 1929年,中山陵落成时全景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的陵墓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落成。



孫中山



■ 孙中山奉安纪念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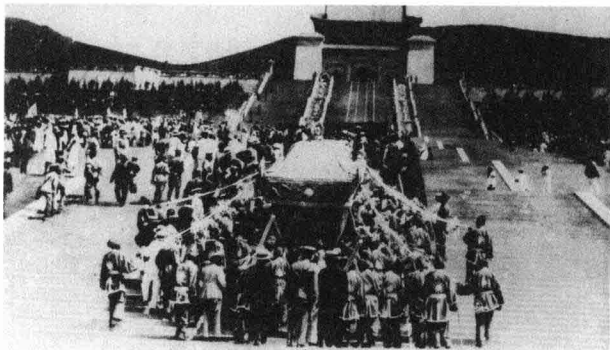
发表演说,放映电影、散发宣传品。列车机车车头悬挂孙中山遗像。此外,南方的沪宁、沪杭线上也组织了迎榇宣传列车。为参加孙中山先生移榇南京典礼,1929年5月18日,宋庆龄从德国绕道西伯利亚抵达北平,当天下午,她在孙科夫妇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陪同下赴西山碧云寺祭灵,瞻仰孙中山先生遗容。

5月22日晨,迎榇专员郑洪年指挥护灵队长马湘等率领卫士7人,将孙中山灵榇由金刚宝塔内移入大堂殓堂。8点多钟,孙中山遗体正式奉殓,移入新铜棺奉置祭堂。23日至25日,碧云寺灵堂供各界人士公祭。5月26日凌晨1点,孙夫人宋庆龄、子孙科、媳陈淑英、孙儿孙治平、孙治强等家属和国民政府特派的迎榇专员等齐聚碧云寺灵堂,举行隆重的移灵仪式。凌晨1点起灵,乐队奏哀乐,101响礼炮后,孙中山灵柩由24名杠夫抬出灵堂,徐徐下山。送灵队伍缓缓而行,直至下午2点30分,迎榇队伍到达前门火车站,灵柩随即奉移灵车上,灵车列车共有十几节车厢,第5节是灵车。下午5点,灵车缓缓驶离北平车站,经过天津、济南、徐州等大站时,都在站上举行了公祭。5月28日,灵柩安全抵达南京浦口车站,下午3点15分,灵柩停于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

从29日至3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了3天公祭。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直属机关的职员、华侨代表、军队、群众代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及德、英、法、日等18个国家的专使、外宾等先后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参加公祭、敬献花圈。

31日下午6点,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孙中山家属和国民党要员举行了封棺典礼。宋庆龄、孙科、蒋介石、胡汉民、孔祥熙和医生等人将灵榇上的玻璃棺盖移开,换上铜棺盖,拧紧螺丝,然后盖上国民党党旗、民国国旗,再行3鞠躬礼,封棺典礼告成。

1929年6月1日,奉安大典正式举行。大典总



■ 灵柩移入中山陵祭堂



■ 孙中山题词

指挥是朱培德，总干事是孔祥熙，典礼指挥是赵戴文。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委员代表、孙中山亲属、故旧、各国公使、日本朋友，均参加了大典。清晨4点，举行移灵典礼，由胡汉民主祭。4点15分，狮子山炮台开始鸣礼炮101响，灵柩移出大门，由杠夫抬上汽车。4点25分，灵车启动，送灵的队伍共分10个行列，长达五六里。迎榭大道沿途全用各界所赠送的花圈、花篮及青天白日旗进行装点，各主要道路均扎了素彩牌楼，航空署派飞机5架回翔空中致敬。

10点8分，灵柩抵达祭堂。10点15分，奉安大典正式开始。蒋介石主祭，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等国民政府5院院长陪祭。蒋介石读祭文，胡汉民献花圈。礼毕，由孔祥熙率杠夫将灵柩移奉进墓，随后孙中山家属、国民党中央代表蒋介石、孙中山故旧代表犬养毅、各国公使代表欧登科进入墓室，率同杠夫将孙中山灵柩奉安于圹内。这时，狮子山炮台鸣礼炮101响，向这位伟人致敬告别，全国各地车辆暂停，行人肃立，全体国民停止工作，默哀3分钟。10点50分，灵柩安位完毕，进墓人退出。再由日使芳泽率全体专使及海外高级军官，胡汉民率全体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特任官，头山满率其他外宾，依次入墓瞻仰。最后由孙夫人宋庆龄率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将墓门关闭，庄严肃穆的奉安大典告成。

一代伟人从此长眠于紫金山中山陵。



编写这本书的念想已有许久,应是从担任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职务开始,以后愈发强烈。没有细想过其萌生的原因,也许是责任的驱使,也许是人生的感悟,也许是年少时读书的深刻记忆——也许都有。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因工作原因在对孙中山、宋庆龄两位伟人的研究思考中,由内心的崇敬所产生的强大震撼。我以为,感受人物的伟大并不是把人物神化,血肉情义人皆有之。从父母姐弟到家庭生活,从婚丧嫁娶到喜怒哀乐,这些常人的生活轨迹伟人也有,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然而,当我们用人性的目光去细细体察,就能感受到从平凡中脱俗出来的伟大。触摸伟人的生活轨迹,用真实的故事让人近距离地感知伟人,从中不难领悟和理解“伟大出自平凡”的真谛。就像突如其来的汶川地震让我们读懂了寄寓在平凡里的人性关爱,源于责任感的惊人意志让我们在催人泪下的感动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当然,伟人并不是普通人,这是因为除了常人情感之外,他们的精神境界在时代风雨的磨砺和洗礼中已经超然于平凡。他们为民族的崛起,把生死置之度外,百折不挠,毕生奋斗。孙中山直至临终,仍然竭尽全力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宋庆龄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光义无反顾,终身“嫁给了革命”。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时代所处的环境和人物内在的精神力量造就了伟人的不朽业绩。孙中山一生处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尽管他的

一生屡遭失败,但他愈挫愈奋的斗志,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强品格的经典写照。宋庆龄一生追随革命,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安危与自己紧紧相连,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他们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脊梁,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斗转星移,伟人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然而,当今人们对伟人的怀念是否依然?伟人当年的一腔热血是否还在后人的血脉里涌动?伟人的形象是否在当代青少年的记忆中渐行渐远?时代的拷问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责任:应当把我们的内心感知告诉人们,把我们从伟人那里汲取的精神力量传承给当代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注入精神动力。我们的作为可能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因此忘却责任,更不能辜负责任。

虽然这是一本容量不大的作品,但我深知其编写的难度,且随着工作的深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一个创作经验不多的群体,凭借有限的知识,通过择取生活片段,去串联伟人完整的人生线索,用尚属稚嫩的笔触准确还原当年的史实,这很难。何况我们面对的大部分受众是一个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青少年群体,为此,我们的确底气不足。好在国内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给了许多关键性的指导,长期从事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的盛永华、张磊、沈渭滨教授担任本书的顾问并亲自审稿。尤其是长期分管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炜同志,欣然命笔为本书写序。胡炜同志素来热心助人,对孙中山、宋庆龄文物事业及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也十分关心,平时扶持甚多,他的相助更使我备受鼓舞。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沈晓明副市长及教育、出版部门的领导也给了极大的支持。毫无疑问,这本书的问世是集体力量的结晶。

得遂我当初的念想,作为编者,藉此向所有给予热情帮助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陈永华